

從底特律到迪士尼世界

權力地景

[C. WRIGHT MILLS AWARD 榮膺獎項]

LANDSCAPES OF POWER

Sharon Zukin

雪倫·朱津 —— 原著

國立編譯館 —— 主譯
王志弘·王明民·徐蒼特 —— 合譯

From
Detroit
to
Disney
World

本書追求某種涵蓋一切的概念，能同時表達世界經濟的斷裂和整合，包含物質實踐及美學形式，強調經濟結構和文化計畫的匯流，再現所有社會階級的經驗，但不會誤解經濟權力的根本不對稱性。社會和經濟權力結合的空間結果顯示，地景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主要文化產物。我們的認知地圖、美學形式意識形態，反映了塑造地景的成長和衰落的多重轉變和對比模式。因此，尋求個體自主性，即是探究地景的結構規則。這些規則則是資本主義經濟秩序的一般規則；是使生產由一地移往另一地的市場決策；是勞工與僱主、開發商與消費者、企業家和創意人才之間在特定地方的實際妥協。

作者從兩個截然不同的結構變遷經驗著手——內在地景和都市地景，兩者同時再現並抗拒新市場經濟的抽象化、國際化和消費偏向；再以一系列個案研究（五個二十世紀地景）探索去工業化與後工業或服務業經濟之間的變化光譜。

「當前基於以往，而未來更基於當前，每個人的個人認同，每個集體的希望，都取決於地方與全球之間的複雜中介。雪倫·朱津在《權力地景》中，給了我們一個我們全都需要的多向度思考的絕佳範例。」

—— Marshall Berman 《一切固體都溶解了》[*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 作者

「朱津分析五種不同類型的都市社區，詳細說明了經濟、社會與政治權力建構都市地景的方式，如同詹明信與哈維，她認為文化是我們城市當前反覆轉型的關鍵……」

朱津的結論及時提醒我們，都市空間的道德性質，並呼籲振興公共價值與課責的信念。這是我們據以面對1990年代的珍貴啟發。」

—— Elizabeth Wilson 《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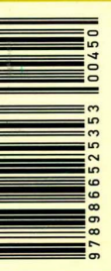
「《權力地景》大膽運用視覺證據，提出了有關現代社會的純熟觀點。」

—— Richard Sennett 《美國社會學刊》[*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G	P	N
1009904446		

LANDSCAPES OF POWER

From Detroit to Disney World



從底特律到迪士尼世界

權力地景

國立編譯館__主譯 | 王志弘·王珮民·徐苔玲__合譯

SHARON ZUKIN | 雪倫·朱津__原著



© 1993 The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Complex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2010 Socio Publish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國立編譯館與群學出版有限公司合作翻譯發行
出版日期：二〇一〇年十二月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權力地景 從底特律到迪士尼世界 / 雪倫 朱津 (Sharon Zukin)
著, 國立編譯館 主譯; 王志弘、王玥民、徐苔玲 合譯 --1版--
台北市, 群學, 2010 12
面, 公分
含索引
譯自 Landscapes of Power. From Detroit to Disney World
ISBN 978-986-6525-35-3
545 1 99020226

作者 雪倫 朱津 (Sharon Zukin)

主譯·國立編譯館 譯者·王志弘、王玥民、徐苔玲

總編輯：劉鈞佑 編輯：沈志翰

出版者 群學出版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 61 號 7 樓 712 室

電話·(02)2370-2123 傳真·(02)2370-2232

電郵·socialsp@seed.net.tw 郵撥 19269524·群學出版有限公司

封面：井十二設計研究室 電話：(02)2952-0672

印刷：權森印刷事業社 電話：(02)3501-2759

著作財產權人：國立編譯館

本書保留所有權利，欲利用本書全部或部分內容者，
須徵求著作財產權人同意或書面授權。

請洽·國立編譯館世界學術著作翻譯委員會 電話·(02)3322-5558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 179 號 網址·<http://www.nict.gov.tw>

展售處 國家書店松江門市 地址 台北市松江路 209 號 1 樓

電話：(02)2518-0207 網址 <http://www.govbooks.com.tw>

台中五南文化廣場 地址 台中市區中山路 6 號

電話 (04)2226-0330 傳真·(04)2225-8234

ISBN 978-986-6525-35-3 GPN 1009904446

國立編譯館與群學出版有限公司合作翻譯發行 著作權所有 翻印必究

定價 450 元 2010 年 12 月 一版 1 印

圖目錄

- P001 | 珍涅特·盧騰伯格 (Janet K. Ruttenberg)，《追隨李奧納多》 (*After Leonardo*) (1990)
- P028 | 保羅·史川德 (Paul Strand)，〈華爾街，紐約，1915〉
- P048 | 砲台公園市，紐約 (1989)
- P068 | 查理斯·席爾勒 (Charles Sheeler)，《美國地景》 (*American Landscape*) (1930)
- P128 | 凱薩琳·雷蒙德 (Catherine Redmond)，《午後光線：同時與序列》 (*Afternoon Light: Simultaneous and Sequential*) (1987)
- P165 | 貝聿銘，IBM設施，索莫斯 (Somers)，紐約 (1989)
- P169 | 圖 6.1 威切斯特郡各鎮商業發展與家戶年收入中位數
- P203 | 圖 6.2 主要企業雇主的董事會，威切斯特郡，1955-85
- P220 | 西撒·培利 (Cesar Pelli)，冬園，世界金融中心，紐約市 (1988)
- P268 | 明日世界，迪士尼世界，佛羅里達 (1990)
- P315 | 麥可·葛瑞夫 (Michael Graves)，工業與勞工歷史中心，楊斯鎮，俄亥俄 (1986-90)
- P328 | 圖 9.1 文化資本迴路：縉紳化
- P330 | 圖 9.2 文化資本迴路：迪士尼世界

謝誌

本書撰寫期間，我仰賴許多支持來源，包括個人的、社會的，以及財務上的支持。1980年代初，我開始研究歐洲和美國的舊工業區域。我訪談企業、政府、工會和地方規劃組織等形形色色的人士，花時間回答有關他們工作的詳細問題。我也蒐集了來自自我所有同事的建議和案例，他們知道我正在寫一本書，有關當代市場經濟的文化。

我初期的研究和旅行獲得美國日爾曼馬歇爾基金（The German Marshall Fund of the United States）、國家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以及紐約市立大學 BHE-PSC 教師研究獎的資助。雖然資助機構的財務全都日益窘迫，卻願意支持像我這種不太尋常的跨學科邊界研究，對獨立的學術研究實屬關鍵支持。若無這些組織的實質協助，這項計畫就不會展開。

接受我訪問的人士，也值得敬致同等感謝。由於我嘗試保留他們的匿名狀態，無法在此一一致謝。然而，他們都盡力讓我從他們的觀點來理解他們的工作。儘管這些觀點不見得與我的看法一致，我卻已努力坦誠加以描述。我也請求三位受訪者——來自 Lazard Freres、IBM 和美國經濟發展局（U.S. Economic

Development Agency) —— 閱讀他們所貢獻的部分手稿，並予以更正。

其他章節則有同事讀過，提出有用的建議。謝謝 Richard Child Hill、Harvey Molotch，以及 Louis Asekoff，他們分別評論了有關底特律、縉紳化，以及迪士尼世界的章節。

我欠最多人情的當屬我的朋友 Paul DiMaggio 和 Neil Smith，他們閱讀整份草稿並向我提出敏銳但溫和的要求——要有清晰的寫作、要牢牢掌握材料。如果我能滿足這些要求，即使是一小部分，我就能比剛起步時有更多成果，但遠低於它們所應得的。當然，我要替成果擔負完全責任。

這本書的物質生產也反映了其他人的善意。有些材料是由研究助理 Philip Kasinitz（現在也是個教授了）、David Radick 和 Bruce Haynes 蒐集或檢視。紐約市立大學研究生中心計算機中心的 Steve Yoman，將威切斯特郡那章從電腦裡救回來，免於永久銷毀。羅素賽吉基金會（Russell Sage Foundation）的 Jennifer Parker，當我在那完成手稿最後修訂時，以歡欣鼓舞的態度和有益的批評，處理許多手稿和索引編輯的瑣碎工作。我的編輯 Naomi Schneider 從閱讀頭兩章初稿以來就一直鼓勵我；這種鼓勵涵蓋從出版到個人友誼的每件事情。

在制度性的鼓勵方面，我要感謝布魯克林學院的沃夫人文學中心（Wolfe Institute for the Humanities），以及1985年至1989年間我在那裡的同事：主任 Robert Viscusi、Lou Asekoff、Bruce Hiffacker、Geri DeLuca 和 Paulo Spedicato。他們在許多漫長討

論裡遷就我，始終相信一名社會學家可以寫有關文化的事情。羅素賽吉基金會是我 1989-90 年擔任訪問學人的地方，提供了溫暖的環境和知識刺激。本書的最後修訂雖然只花了我待在那裡的一小段時間，我仍要感謝 Eric Wanner 理事長和其他成員讓這最後階段更容易度過。

最後，一如往常，我得到了 Richard Rosen 的物質和精神支持。他的許多想法已和我的想法融合，以通常沒有銘記、結合在一起的方式進入本書。他幫助我對這項計畫保持信心，卻沒失去他對我的意圖或結論的批判距離。

目錄

圖目錄	II
謝誌	III

導論

第 1 章 市場、地方與地景	3
第 2 章 「創造性的破壞」：內在地景	29
第 3 章 都市地景	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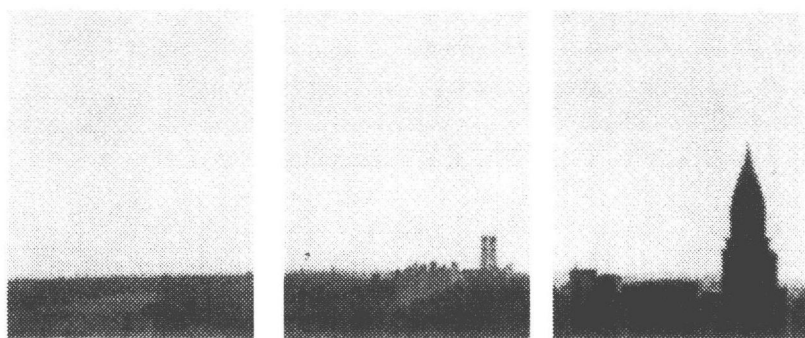
五個二十世紀地景

第 4 章 鋼鐵鎮：西維吉尼亞威爾頓的權力與自主	69
第 5 章 汽車城的鋼鐵鎮：底特律生產性勞動的權力	127
第 6 章 工廠與購物中心：威切斯特郡的權力與均質性	167
第 7 章 縉紳化、料理與評論階層：權力與中心市區	221
第 8 章 迪士尼世界：立面的權力 / 權力的立面	269

結論

第 9 章 道德地景	317
注釋	347
索引	393

導論



珍涅特·盧騰伯格 (Janet K. Ruttenberg) , 《追隨李奧納多》 (*After Leonardo*) (1990)

第1章

市場、地方與地景

「其他使節警告我有飢荒、強奪勒索與謀反，或者，他們告訴我新發現的土耳其玉礦藏、貂皮的好價錢，建議供應有鑲嵌裝飾的刀刃。你呢？」大汗問馬可波羅：「你來自同樣遙遠的地方，但是，你告訴我的只是傍晚坐在自家門階乘涼的人心裡所想的事。那麼，你這一切旅行有什麼用處呢？」

——伊塔羅·卡爾維諾，《看不見的城市》
(Italo Calvino, *Invisible Cities*)

社會鉅變同時標誌了結束和開始。在過去二十年的結構變遷中，美國人一直嘗試界定他們的生活中有哪些元素已完全毀滅，而哪些正在形成。迅速從腦海中消逝的是美國支配世界經濟所保證的工業繁榮，以及可以憑藉工作和技能達到的中產階級生活形態，取而代之的是巨大財富、不安及片斷化等其他意象。

很少有城鎮會像紐約維佛利鎮 (Waverly)，寫信請求教宗若望保祿二世 (Pope John Paul II) 為該鎮劃入經濟開發區一事賜福。也只有很少數城市——芝加哥、紐貝福 (New Bedford)、揚克斯 (Yonkers) ——曾試圖利用法律制度禁止公

司關閉工廠。大多數時候，如底特律通用汽車公司的裝配線工人及矽谷蘋果的電腦組裝員，則會因工廠關閉、遷移或母公司轉往海外投資而失去工作。更常見的情形是大批白領員工被杜邦（Dupont）和伊士曼柯達（Eastman Kodak）等大工業集團裁員，不得不提早退休或失業。

四十年前，當約瑟夫·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談到資本主義的創造性破壞時，他想的並非將生存押注在經濟成長的地方社區。他強調的資本主義「基本事實」是一再創新。他指的是新產品、新組織、欲望和需求間的新連結，可以「不停從內部徹底改革經濟結構，不斷破壞舊結構，也不斷創造新結構。」¹ 熊彼得承認在資本主義創新的「恆久風暴」下，無力競爭者必須付出代價。但是終結「舊事業」的「衰退、喪失地位和淘汰過程」自有補償，將障礙清理乾淨以供新人崛起。在他的描述下，經濟生活均衡的「循環流動」自有不斷向上（和向下）的社會流動作為對應。熊彼得形容上層階級就像「永遠爆滿的旅館，只不過房客總是不斷更換」，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認為這個意象道盡了典型的美國消費社會。²

這種進步意象在經濟成長的戰後時期難以存續。我們知道美國企業必須與更廉價或更精明的對手競爭，企業組織必須全球化以求生存，自動化科技則取代大部分人力。但是為了追求更大利潤而重組生產，卻帶來痛苦的社會代價。能仰賴傳統工業強調的高收入、優良技能和穩定工作的美國人越來越少。區域差異是常見的現象——陽光帶和霜凍帶、城市和郊區、「東西岸經濟」

(bicoastal economy) 和心臟地帶。不但如此，構成經濟制度的文化理解和社會結構也陷入混亂。今天，勞工的重要性在於他們消費，而非生產這個文化所重視的任何東西。工作和社區等公共場域促使個人追求私利。猶如發生於18和19世紀英國的「鉅變」，促使人們遠離社會制度的抽象市場力量，壓過了認同地方（place）的具體依附力量。³

這類創造性破壞創造了一個截然不同的經濟權力地景（landscape）。銀行與其融資的產業相互獨立；企業總部隔絕於旗下工廠之外。城市的財富朝著廣闊區域滲透，而城市內部的中心則沾染一種新的、具侵略性—誘惑性的魅力。不但如此，地方還鮮明地劃分為消費地景和荒廢地景。那些男男女女還在產製維生所需的實體產品，亦即屬於生產經濟一環的地方，都是輸家。這些地方在服務業經濟中苟活下來，但缺乏收入和聲望，連靈魂都屬於銀行家和政客所有。反之，那些與不動產開發、金融交易、演藝娛樂（移動錢與人的行業）有關的地方則欣欣向榮，在這裡，消費者的愉悅掩飾了掌控集中式經濟的韁繩。有些人認為，這些轉變是所謂去工業化的衰退和去中心化的一部分。其他人則將此視為高科技、後工業社會的證明。但這些詞彙都無法描繪同步發生的經濟形式的發展和衰落，也無從傳遞當地面在我們腳下移動，更高大的建築物卻持續升起的意涵。

20世紀末的經濟和文化地景不但樣貌多元，而且不斷改變。熊彼得曾說，經濟要素並不足以解釋制度變遷，我則追隨他的看法，將地景視為一種創造性破壞的社會、文化和政治產物。由於

受到經濟歷史學家卡爾·博藍尼（Karl Polanyi）影響，我將地景界定為市場和地方之間的脆弱妥協。追溯權力地景中的社會地理，會挑戰對市場根深柢固的信念。市場代表自由流動及客觀判斷，是托克維爾（de Tocqueville）以迄雷根（Reagan）的美式生活印記。市場強調賺取（earning）而非給予（giving）或拿走（taking），滿足了美國對於某種獨特社會平等形式的道德渴望。⁴但諷刺的是，誠如市場文化最終從美國輸往世界各地，它也對地方的文化價值造成最大威脅。

市場與地方的分離

市場和地方之間的對立，實際上可追溯至現代市場社會形成之初。博藍尼探討有關17世紀英格蘭圈地運動的各項爭論時，發現都鐸時期（Tudor）的貴族十分清楚「仕紳」（gentleman）的「改進」渴望及「窮人」的「居住」目標之間有所矛盾。博藍尼指出，英國貴族早已料到，需「以社會離亂為代價來達到改進目標」，而此代價大部分得由貧農及其家庭承受。但他認為，1670年所描繪的居住和改進之間的對比，「也暗示了」保護人們扎根的地方，免於市場生產的夷平力量的「悲慘必要性」。⁵

當然，市場和地方向來交織緊密。究其起源，市場既是確實的地方，也是象徵性門檻，是「社會建構的空間」及「文化銘刻的限制」，卻包含跨越邊界的遠距交易，以及處於社會邊緣的商人。⁶但是，市場與地方社區的緊密關連無可避免。不論在封建

時代或其後，地方市場總是占據特殊的位置和時間，通常是在節慶日的教堂前方。其互動的密度及交換的商品，提供地方社區的社會再生產（亦即其做為社區的存活）所需的物質和文化工具。至少到17世紀，英格蘭的市場都還是「一個時空中的島嶼，一個特定地域的對抗、互助和團結會週期性地受到限制，並鍛鍊成簡單或小商品生產之社會和文化母體的門檻」。⁷很明顯的，市場和地方這兩個社會制度相互扶持。

最能清楚說明這點的，莫過於市場實踐對於「地方感」的時空作用。18世紀歐洲的大城中，市場界定了街道和地區，以及日常生活節奏。「光是巴黎的市場和野味小市集、谷地碼頭（Quai de la Vallée），就能寫成一整本書」，布勞岱（Fernand Braudel）表示：「可以寫來自果尼斯（Gonesse）麵包師父的每日拂曉攻擊；每天半夜時五六千名半睡半醒的農夫趕著貨車，『帶來蔬菜、水果、花卉』……樓上僕傭的耳朵早已習於解讀各種嘈雜聲，才不會在不當時機下樓。」⁸

但在19世紀以前，市場交易並未創造出一種與特定地方分離的文化。兩者的分離最早出現在勞動市場。法國革命後的幾十年間，獨特的企業家角色概念逐漸形成。僱主認同企業主義後，最先用於削減生產成本的方法，包括將生產由家庭勞動或作坊生產，轉變成按件計酬生產，並在不同勞工群體中不斷來回更替。家庭勞動是在一個熟悉的環境中工作，通常使用自己的工具和材料，勞動者往往具高度自主性。在某種程度上，他們是企業家也是被剝削者，考量的是產品而非生產。但在1815年到1900年

間，僱主的訴求與勞動者的反訴求，逐漸開始附和市場力量獨特的量化修辭和象徵語言。⁹

從那時起，市場不再內化地方。相反的，在 19 世紀大部分時間中，地方開始經歷一段漫長且痛苦的內化市場文化過程。由伊利諾州的蒲門（Pullman, 1880年）和印地安那州的蓋瑞（Gary, 1905-8年），到法國的勒克魯索（Le Creusot）和德卡茲維（Décazeville）等新建工廠城鎮（factory town），代表市場規範下社會－空間結構化的極端案例。他們建立一個因應工業資本家需求的社會體制，替勞動力儲備提供住宅，使勞工長期附著於僱主。僱主的全副心思都在如何善用工廠的固定資本，以滿足國內和世界市場對其產品與日俱增的需求，並確保擁有足夠技能以操作複雜機器的勞工來源。這些城鎮的擘劃者在蓋學校、商店和醫院之前就先招募勞工，藉以反映勞動市場條件。他們還根據勞工的技術水準將住宅分級，強制勞工居民力行節制及符合道德水準的家庭生活。居住在這種空間中意味著屈從於工廠控制：不同於城市裡的自由勞動市場，工廠城鎮提供僱主一個受其控制的勞動市場。

為達到這個目的，僱主訴諸道德教育理論、衛生系統及都市設計策略，藉以建造一個勞工聚集地，但免於大城市環境的社會亂象，包括性放縱和缺乏監督的社交活動。僱主相信對市場規範的反抗，只會發生在都市勞工階級社區。擁有工廠城鎮的企業提供公共建築和私人住宅、各種公用設施，以及工廠和城鎮運作的秩序規則，以家長式領導試圖創造一批「溫順平和的群眾。這些

被馴養的人就像一群蜜蜂，而礦業城鎮就是他們的蜂窩。」¹⁰

整個19世紀，有兩種矛盾過程並置了市場與地方。一方面，僱主安排生產，以便利用臨時勞工（遷至工業城鎮的移民和「露宿」或寄居城內的季節性勞工）與牢牢依附工廠，由技能熟練的工匠組成的固定勞動力。另一方面，勞工參與社區生活，渴望讓自己的文化模式社會化、組織和制度化。當僱主嘗試改變工資的慣有基礎或單純減少工資時，通常會利用一群勞工對抗另一群勞工，他們對勞動市場的操縱有可能威脅特定地方的凝聚力，造成分裂。¹¹

多年以來，專業經濟學者對勞工應該附著於工作地點還是自由流動，看法頗為分歧。兩個多世紀以來，意見隨著各種實務、理論和道德關切而轉變。亞當斯密著名的古典觀點認為，惟有能在工作間自由移動，勞工才能找到「最佳」價格。然而19世紀時，工廠城鎮規劃者的論述顛覆既有觀點，盡可能加強勞工與工作的附著關係，能使僱主能擁有最大控制權。但經常使用移工和外來勞工，又在實質上承認了勞工的移動性。

20世紀初，經濟觀點再次擺動。經濟學家建議重新將勞動力附著於工廠，反映了僱主對勞工異動成本的關切。但在二次世界大戰後，隨著資本投資流向新的區域，他們的看法再變，重新贊成勞工移動。這種觀點持續到1970年代，經濟學家才又開始鼓吹將勞工附著於工廠。僱主這次建立內部勞動市場，使勞工的整個就業生涯不斷在同一公司的各種工作間轉換。觀點轉移有部分是權威關係，以及社會和經濟成本等更廣泛共識的結果。隨著

1970年代出現反對勞工移動的專業觀點，社會對於根據財產權來強化制度重新燃起興趣，對失業的容忍度也日益增加。¹²

到了1980年代，新古典主義的觀點再度支持勞工移動。僱主致力於縮小公司規模、降低過剩產能，並將工作由某個地理區轉移至另一個，這都得將勞工和公司分離。商業文獻讚揚勞工「彈性」，而制度手段的設計旨在促成自願和非自願的分離。

僱主藉由改變退休條件和退休金福利，建立外出勞工就業安置服務，並且贊助無就業能力者再訓練的社區計畫，擺脫了其大部分勞動力。最好的狀況是像IBM，僱主會提供機會，讓技術精良的員工轉移至其他地區的工廠或辦公室，通常會在過程中變換工作。然而，絕大多數員工連這樣的機會都沒有。當西屋公司（Westinghouse）關閉該公司幾年前在康乃狄克州收購的一家高科技公司旗下的機器人作業部門，並將部分工作轉移至匹茲堡時，210名工人中只有50人得以隨著工作一同遷往匹茲堡。

面對僱主的利益轉變，經濟學家嚴重分歧，各自立場鮮明地擁護新古典主義觀點或新自由主義觀點。部分專業經濟學者和政府官員贊成「可攜式退休金」（portable pensions），並提供減稅優惠，給自行儲蓄費用再訓練甚或轉換工作地區的勞工。其他人則主張政府應更積極的干預貿易政策，以及規範結束營業前應給予員工預先通知的最短期限。這可不是個小問題。從1981年1月到1986年1月止，共有超過500萬美國勞工因關廠、業務緊縮或裁減職務而失業，這些勞工如研究者所言，與其僱主有「顯著的附著關係」。¹³

有趣的是，這些改變對高階主管及失業勞工的衝擊程度並不相同，前者享有優渥的離職條件，可以提早退休，後者則僅能依賴短期失業救濟。這種分離現象對於不同類型社區的影響也有類似差異。如同所有白領職員，高階主管的居住地區通常包含不同行業的人。但是，工人則大都住在個別公司和產業集中的地區。因此，當工廠、公司或相關業務的顧客和供應商網絡裁員時，他們居住或購物的社區就跟著一蹶不振。主管居住的社區享有經濟基礎多元化（包括居民的股票持有及就業）的緩衝保護。另一項差異則涉及不同勞動力群體地理移動性的高低傾向。在所有工業社會中，專業和管理人員的移動性往往高於勞力工作者。因為這些原因，市場變動的影響程度，在勞工居民集中的社區，高過大多數中上階級和上層階級居民的社區。例外狀況主要發生在如底特律、休士頓或紐約州的羅徹斯特（Rochester）等地區，這些地區歷來是由單一產業或公司支配——汽車城的三大汽車製造商、遍及整個西南部的石油產業，以及羅徹斯特的伊士曼柯達——可以將產品和利潤週期強加於所有周邊社區的生活循環中。¹⁴

10

市場和地方的對立雖然具有眾多結構性因素，而且會在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中持續下去，但是社會菁英能夠扭轉情況，消費組織則可以降低衝擊力道。

地方企業及地方政府對地方社會制度的生存越來越重要。州政府及其商業部門積極介入企業再結構（restructuring），尤以中西部最為明顯。他們努力對外招商，吸引外來投資，俄亥俄州、田納西和肯塔基等地的新汽車組裝廠甚至學習日本禮儀。在

各州內的區域層次方面，地方政府官員將反對關廠的社區抗議，轉化為新的、具有提升收入能力的經濟發展委員會。賓州靠近匹茲堡的莫農加希拉山谷（Monongahela Valley），由教會支持、抗議鋼鐵廠關閉的普世聯盟，逐漸轉型為區域發展委員會，並發行工業發展債券。

經濟菁英中，波士頓的主要企業籌組一項計畫，保證該市成功進入大學的高中畢業生都能獲得助學金，完成學業後也將提供就業機會。根據另一項較早也較單純的方案，稱為「波士頓契約」（Boston Compact），十四所公立高中的畢業生都能在當地企業獲得一份低階工作。近年來，在全國企業聯盟（National Alliance of Business）的支持及美國健康與人類服務部（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和民間企業資助下，阿布奎基（Albuquerque）、辛辛那提（Cincinnati）、路易斯維爾（Louisville）、曼菲斯（Memphis）、印第安納波里（Indianapolis）、聖地牙哥（San Diego）和西雅圖等地，也開始制定類似計畫。雖然這些努力並無法帶來結構性轉變，卻有助於緩和市場力量對地方的衝擊。¹⁵

消費組織也能減緩市場和地方的對立。失業勞工經常以提供服務代替付現。與親戚一起分擔也可以減輕經濟壓力。不過，在擴張期的經濟中，男人和女人可能會因為還「買得起」生活消費品，忘了自己的市場地位並不安全。便宜的價格、信用制度，加上將個人購買合理化的意識形態，使大量消費成為20世紀中期以降福特主義生產系統（裝配生產線、工會化勞工、政府福利保

障等)的一大支柱。在那個時期，汽車、房屋和電視的銷售量劇增，新的消費社會應運而生。

買屋或租屋或許是最重要的消費手段，而且也必定是大多數人一輩子最重要的花費。但擁有住宅也籠罩自主和依賴的矛盾氛圍。一方面，頭上有片屋頂，周圍還有一小塊土地，代表毋須再看房東臉色，也不必寄宿在親戚家。另一方面，掃地出門的命運現在繫於銀行或抵押債權人手中，定期還款則意味必須擁有穩定的工作和存款，還有最重要的是固著在地方上。擁有住宅也指出了投資和消費的關係。過去40年來，購置住宅除了是確保有棲身之處的傳統方法，也成為參與土地增值大獎賭局的門票。不過，根據研究波士頓地區住宅所有權歷史的學者表示，擁有一個家可能是種「昂貴的資產」。它隱含的社會流動長期而言可能只會帶來「貶值資產的積累」。不僅如此，短期而言，由於購買和維護住宅的成本可觀，一個人在住屋市場裡的地位會塑造他或她進入勞動市場的條件。¹⁶

住宅自有是將經濟生產聯繫上社會與文化生活的制度。它也連結了生產手段和消費手段。當房貸利率上升或住屋市場緊縮時，其變化將影響個人在住宅、勞動和資本市場的地位。住宅自有制度可能會強調穩定性或著重於缺乏移動性，視這些相互關聯的影響而定。就這層意義而言，它代表市場和地方的文化妥協。

地方

12

不同於市場的耀眼，大多數現代文化若非輕視，就是根本忽視地方這個觀念。現代主義的語彙也表達一種遺棄地方，渴望沒入或融入「較大」整體的普遍經驗。直到伊朗革命以前，地方主義（localism）——一個與地方有關的概念——從未在社會和經濟現代化理論中扮演任何角色。一般都假設傳統的地位系統和教區性忠誠，會隨經濟成長而漸趨式微。近年來世界各地興起的去中心化或分離主義活動，突顯地方（猶如族群性和宗教）在這種現代生活觀念中承受的嚴重壓抑。¹⁷

科技雖然讓人更易取得地方影像，但也強化地方社區是過時產物的看法。19世紀的鐵路和照片讓人易於前往遙遠的地方，但也令地方的前景視野喪失其直接性和深度。今日，即使是最小的地方也能在電子媒介的同步交換下結合，卻破壞了賦予地方經驗獨特性的社會距離。¹⁸ 簡言之，隨著市場漸趨全球化，地方則日益式微。

我們習慣將地方設想為某個地理位置，是界限分明的地圖上的一點。就這個層次而言，地方確實指涉領域（territory）——一塊有其特殊動植物群落及地方忠誠的領域。與此密切相關的概念，則是指人口與經濟活動聚集的特定地方。地方在此意義下是一種地方社會（local society）的形式，因經濟和人口組成而顯得特殊，讓人立刻想起某種意象：底特律、芝加哥、曼哈頓、邁阿密。地方的第三種概念，廣義而言是指一種社會衝突和凝聚的文

化製品。由資本投資及勞動組織所創造的各種經驗層次，使工廠城鎮和市中心成為對改變有著可預測反應的特殊類型地方。「去工業化」區域、「縉紳化」(gentrifying)都會區、由富人聚居地轉變為企業總部的郊區：這些應該被看為是具體地方，也是更一般性的地方觀念的再現。做為社會理論的一個有用概念，地方表達了一群在空間上有所關連的人，調節文化認同、國家權力及資本積累之需求的方式。¹⁹

近年來，地方的諸多面向中最引人注意的便是它在某些方面同質性變高，但其他方面卻變得更為異質。國家文化，甚至是全球文化的傳播（尤其是源自好萊塢和迪士尼樂園的文化）削弱了地方獨特性。交通成本降低也有促使工業產品遠距離散播和消費的作用。不僅如此，新科技的使用讓世界不同區域的產品生產條件趨於相等。同一款標準化的汽車或牛仔褲可以在美國奧斯科士(Oshkosh)或新加坡、或任何其他地方生產。製造這些產品的工作可以從北美洲勞工轉移到墨西哥或中國勞工，或從中年男工換成年輕女工。隨著越來越多女性加入勞動行列，以及更多工作機會移出先進工業化經濟體，傳統的工資差異也縮減了。這種均等化趨勢轉而磨損了以特定群體的傳統技能習得和利益為基礎的勞工戰鬥精神和談判策略。²⁰

於此同時，地方之間的區別也越加明顯。新的區域專殊化模式顯示高技能和高價值經濟活動——金融、企業領導與研發——會選擇聚集於某些提供適當設施的地區。這種聚集可以讓地方利用原有的優勢。同樣的，失去企業投資的區域會變得更沒吸引

力，完全無法發展高階生產及消費。同一個國家和同一個區域，很可能會分裂為前述兩種發展路徑。²¹

我們經常認為這些過程起源於大企業的決策。但企業重塑地理的力量與勞工抗拒變動的潛能間存在緊張關係。將生產過程切開使其配置於不同地方的組織能力，通常都會面臨當地居民、勞工及僱員的強力抗爭。企業組織也會回應地方的形象——溫馴或自主、均質或社會混雜、中央集權或衰落。

以英國和法國的傳統產煤區為例，舊產業的衰落及新行業的局部進駐，導致男性高薪技術勞工的工作數量減少。隨著產業和男性就業的盛衰消長，許多未受過訓練的婦女（通常是失業礦工的妻子）都受僱成為勞動力。同時，在農業和觀光比礦業重要的濱海區域，就職於工業的男性和從事自僱工作的女人，則缺乏礦工眾所週知的高薪與工會化的激進抗爭歷史。這些地區成為新資本投資所屬意的地點。²²

14 其他因素也導致區域趨向專殊化。例如，美國高科技公司便看中了英格蘭東南部的教育環境和氣候。這似乎特別適合較為動態多變的產業活動，像電子、電腦和通訊設備等。企業服務是否容易取得也很重要，尤其對成熟型產業如接收器、發射機、塑膠製品和塗料業等更是如此。然而對成長最快速的部門（與軍備支出有關的行業）而言，勞動力的特徵，包括黑人勞工的比率，則會影響公司迴避特定區位。²³

但資本積累過程可能在同一地域裡造成出乎意料的分歧。一個城市或都會區內可能會有某些地區成長、其他地區沒落的現

象。核心商業區可能成長，城市其餘部分則陷入沉睡。再者，過去幾年來，舊工業區雖然獲得新工作，卻未能創造長期發展的前景。這些工作多半來自契約轉包、部分工時和臨時僱用。待遇優厚的高技能工作與缺乏向上社會流動機會的工作，兩者的差異是新式區域二元狀態持續的主因。

最令人擔憂的是不再創造高技能、高薪工作的問題區域。每個國家都有這種負面案例：英國的南威爾斯、泰恩塞（Tyneside）和克萊德塞（Clydeside），法國的諾爾（Nord）和洛林（Lorraine），以及美國中西部等地，相對於各自國內的成長區域都呈現相同的衰落模式。舉例而言，在1980年代前半，美國中西部的高薪工作流失和低薪工作增加比例都是最高的。在此同時，美國各區域間的經濟差異則趨於擴大。1979到1986年間，朝向每人平均所得區域均等的五十年趨勢已經逆轉。²⁴

事實上，區域差異變得極為明顯，以致人們常將「東西岸經濟」（bicoastal economy）掛在嘴邊。美國東西兩岸的16個州，實際上壟斷了高度分歧的經濟成長利益。1980年代，這些州的實質經濟成長是國內其他地區的三倍，每人工作機會增長也比其他地區高出90%。這些州的一小部分居民還因全美工資和財產收入的實質成長，而分到其中大部分利益。²⁵

這種社會和空間再結構違反既有人口及許多地方政府的意願。基本的問題在於投資和就業之間完全失衡：資本移動但社區不動。對許多熱衷於下一波經濟轉型的人而言，失衡和錯置固然痛苦，卻是轉變過程的必要部分。但對憂心眼前、又發現未來也

不確定的人而言，地景分裂為二確實是個嚴重問題。它們不但體現不同的經濟和政治策略；這些策略也背負存在式抉擇的重擔。

某些人認為二分的源頭在於資本移動與勞工移動，或資本和社區的對立。有些人將「生活空間」與「經濟空間」相互對照。另一些人則對比了「資本」再結構與「勞工」再結構，而前者的投資報酬優先性高於人和地方，後者則是以投資提供現有勞動力生存的手段。另一個相關議題是男人和女人能否跟地方分開討論。經濟成長應該首重有利於人，還是裨益於人所住的地方？²⁶

同樣的爭論也觸及美國「去工業化」的辯論。總體而言（製造業部門對國民生產毛額的貢獻、總就業率、出口值等），美國工業並未完全失敗。而且許多美國企業持續獲利，尤其是美國跨國公司的海外營運部門，顯示還有部分美國人知道如何經營企業——雖然可能是在其他國家經營。相同模式也出現在海外研發投資的不斷增加。²⁷

企業考量維繫著一個假象，即回應市場力量是決定美國工業社會存活（或創立後工業社會）的唯一要素。宣稱美國正經歷去工業化的批評者，則引用與地方相關的因素為證。對他們而言，高薪、高技能工作的流失與削弱工會力量的縮減，摧毀了支撐美國經濟的文化。這種文化由市場和地方形塑而成，基礎是高度的生活水準、自生的組織能力，以及地方對支配性社會制度的影響。直到不久前，構成美國地景的正是這些。²⁸

地景

地景，一如我在這裡的用法，延伸了想像。它不僅代表一般常用的「實質環境」地理意義，也指涉物質與社會實踐及其象徵再現的總合。狹義的**地景**代表強權機構強加的社會階級、性別和種族關係的結構。但廣義而言，地景代表我們看到的整個全景：包括有權有勢者的地景——大教堂、工廠和摩天大樓——以及無權無勢者附屬的、抗拒的、或飽具鄉土氣息的地景——村落禮拜堂、貧民窟和廉價公寓。不論在象徵上或實質上，地景都中介於**市場**暗示的、資本的社會－空間分化（socio-spatial differentiation），與**地方**意味的、勞工的社會－空間同質性（socio-spatial homogeneity）之間。²⁹

地景概念經過一段長期的物化，近年來逐漸成為分析文化的重要工具。它意味了一種有爭議、妥協性的社會產物，也是一種觀點的體現。誠如與風土（vernacular）^[1]的對立所暗示的，強權機構擁有優勢力量，能將自身觀點強加於地景——削弱、重塑、並取代源自風土的觀點。

即使在藝術史中，地景對物質現實的容納和拒絕，也一直具有高度選擇性。這個詞彙本身同時指涉一片鄉村景色，及據以觀

[1] 「風土」（vernacular）也可譯為「鄉土」，意味了地方性事物或生活風格，尤指方言或本地語言，也指建築的地方特色或風格，即所謂「風土建築」。作者於本書使用「風土」一詞，既指建築的地方風格，也泛指在地生活風格，並與由上而下或外來的塑造地景力量形成對比。

看這片景色的概念稜鏡。風景畫始於 14 世紀的西歐，這時的地景是象徵的圖畫，與事實無關。這些畫作結合觀看者熟悉的要素，藉以再現某種宗教或道德體系。同樣的，18 世紀英格蘭的風景畫中，畫者對於鄉村及其居民的描繪反映一種觀看之道，而這種觀看是廣大社會系統的一部分。藝術家通常類似上層階級，對農村地區的看法從安逸和懶散之地，轉變為企業式農耕和勤奮農業勞動力的所在。然而，更多的風景畫若非忽視近期的鄉村改良，就是堅持描繪舊時景象，好似完全沒有任何改變。³⁰

17

整個早期現代歐洲，製造地景同時也是以權力的形象來重建自然地形。常見的活動如鄉間宅邸的造景與繪製世界地圖，但以扭曲、抹滅和重新排列地理，來迎合觀看者的愛好。更廣泛而言，地景同時施加和再現了某種視覺秩序。在現代藝術的起源中，**風景**是指一種以構成元素的重複和獨特性來刺激觀看者認知的畫作。³¹

今天，地景概念較常指稱一種社會學意象，而較少指涉某種繪畫類型。當我們聽人談論「都市」或「郊區地景」時，我們想到的是生產和交通密集的城市生活——被摩天大樓、橋梁和高速公路吞噬的人類社會——或是在內陸地區群簇冒現的購物中心、牧場式住宅和辦公園區。同樣的，早期「工業地景」的工廠大煙囪和紅磚煙囪則喚起某種生活的方式、節奏及其抽象的社會控制（正是這種建成環境的力量所在）。工廠老闆強力推行其紀律規定，創造「工業資本主義的**熟悉地景**，有著工時單、計時員、告密者及罰金」。³² 現代溫哥華或矽谷的「後工業地景」同樣也能

召喚意象，其生態、休閒及「宜居性」(liveability)的意象餵養著服務經濟中專業人士的消費偏好，即使這些偏好掩蓋了商業和個人的緊張狀態、女性少數族裔勞工湧入裝配工作，以及郊區日益萎縮衰敗等弱點。³³

地景的概念日益複雜，還意味一種包容性的社會現實已成為這個時代的通用詞彙。^{*}有關我提到的各式各樣地景，最有趣的是我們今天對它們都有所認識。雖然它們以不同規模依序建構而成，目前卻共存於時空之中。它們讓我們更了解經濟權力的不對稱性。當然，在社會變遷過程中，男人和女人總是面臨不同的地景，或被迫在不同地景間移動。對逃離中世紀莊園的農奴而言，城鎮與鄉村有極大差異。在解放黑奴前，美國的逃亡奴隸會為了生存，由南方逃至北方。但自19世紀起，從一處地景移轉到另一處很少取決於個人移動，經常是因地景本身的各種大規模重塑。

19世紀中期奧斯曼(Haussmann)規劃下的巴黎，其都市規模和商業多樣性，造就了美學和科技上的紀念並促成快速變遷，界定了現代主要城市的空間和時間運用。相反的，舊地景的持續存在則開始意味經濟和社會的衰退。在現代主義中，「舊」極少意味「更好」。舊地景備受折磨的生存能力被視為一種刺激物或興奮劑，據以推動更多且最終趨向同質化的結構變遷。³⁴

^{*} 這個詞彙運用很廣，甚至紐約聯邦儲備銀行總裁在對倫敦海外銀行家俱樂部(Overseas Bankers Club)的演說(1987年2月2日)中都用過：「私人公司可以選擇他們在金融地景中的位置」(黑體字係作者所加)。

多年來，至少在范裘利（Robert Venturi）出版《向拉斯維加斯學習》（*Learning from Las Vegas*）之後，建築師便接下詮釋現代地景發展的任務。不過，近年來地理學家也再度宣稱地景是其專業領域。為此，地理學的焦點必須是建成環境而非自然環境，並願意在實質分析之外接納文化分析。文化地理學者認為，「日常地景」是「我們周遭的連續表面」，他們「視所有地景為文化價值、社會行為及個人行動在一段時間中對特定地點作用的象徵與表現」。就這個廣泛意義而言，地景「同時是一種全景、一種構成、刮去重寫的羊皮紙、一種縮圖」。³⁵

誠如早期的歐洲風景畫，歷史上的美國地景往往代表某種道德或哲學系統全景。18世紀新建的教堂藉由親切的內部設計，以及地理上遠離既有社區，徹底顛覆組織化宗教的階層式空間。這種空間組織於其全景中呈現了牛頓（Isaac Newton）的科學觀念。另一種全景以格網模式出現，可見於19世紀中西部城鎮的街道格局。這種全景傳遞永恆感，推翻先前美國不斷向西部拓荒所呈現的短暫停留和遷移不定的狀態。³⁶

在不同的意義上，地景也代表社會關係的縮影。在現代國家興起前的幾個世紀，地景呈現的是權威和抵抗之間的衝擊場域。這種地景概念與**鄉村**（country）概念形成對比。地景是農民安居樂業的領域，農舍與田地體現了它們利用空間的集體和鄉土方法。相對的，**鄉村**代表有權者施加於無權者的空間組織；鄉村體現的是主教、莊園領主和女領主，或君主所維護的「貴族的或政治的空間概念」。* 然而和當代地景一樣，農民的風土和貴族的

鄉村並存於時空。如同現在，解讀地景就是研究「永久的政治權力象徵……背後的」社會和技術，而受到傳統和習俗主宰的社區則「非自願地」適應移動和變遷。³⁷

權力、壓迫和集體抵抗的主題將地景形塑為一幅社會縮圖。但還是得靠經濟地理學提供地景的「結構連貫性」(structured coherence)。對基進經濟地理學者而言，地景是一塊資本積累的白板，反映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各歷史階段的「空間性」(spatiality)。從這個視角看，地景的重覆和獨特性的潛在原因是獲利動機，將資本移轉於工業投資及地產投資，循環進入新的營造或重建，穿梭來回於市中心和週遭郊區。地景觀念也意味著我先前描述的市場和地方之間的對立。社會階級關係既決定了「自由的地理移動和有組織的再生產過程之間的張力」，同時也受其影響。這種持續進行且充斥衝突的人類生活建構，其社會連貫性來自地方政治自主的事實，以及地方經驗和集體意識等因素的結合。但在拓展建成環境及控制空間使用的鬥爭中，經濟力量壓倒國家和風土文化。「資本創造並破壞了自身的地景」。³⁸

經濟權力提供美國變化中地景背後的結構連貫性。複製、散

20

* 然而，在20世紀初期，史賓格勒 (Oswald Spengler) 在《西方的沒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 一書中認為地景等同於鄉村。他將城市文明與「地景的質樸」互相對照 ("The Soul of the City," in *Classic Essays on the Culture of Cities*, ed. Richard Sennett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Crofts, 1969], p. 69)。不過，大多數地理學者與所有的結構主義分析學者，通常傾向於將貴族、官方或政治文化——有權者的空間性——與無權者的風土地景或通俗文化視為相互對立。

布煙囪林立的美國與最終遭到廢棄、先行於另一個以超級市場、購物中心和辦公大樓為特色的歷史階段。這又引起另一波複製、散布和廢棄。這種聚集和分散、成長和衰落的同時存在，讓我們難以掌握今日美國地景的特徵。

以文化意義來看，沒有任何單一的明確地景足以代表當代美國社區。我們也沒有特定的建成環境空間意象，可以適當地描繪大多數美國人居住的「都會分散」地景——既非都市、又非郊區。誠如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於1950年代初期所預示的，美國地景是一系列無邊際的空間，在裡頭大量生產與大量消費再製了一種標準化的準全球文化。³⁹

在這種地景中區別「非地方的地方」，需要相當的想像力。然而，在尋求區別的意象時，地方企業和政治領袖仍在不斷建造和重建，做為經濟成長的標誌。他們的成長藍圖往往局限於製造過去的縮圖或未來的全景，並以歷史保存技術或與特定地方完全分離的未來主義式新建設來再現這種地景。由於缺乏具體的社會和物質脈絡，這些地景的組織原則只是單純的視覺主題（theme）。誠如布什公園（Busch Gardens）和迪士尼樂園抽離未來的脈絡，內港（Inner Harbor）、費紐爾中心（Faneuil Hall）及南街海港（South Street Seaport）^[2]則抽離過去的脈

[2] 布什花園（Busch Gardens）是美國著名的主題樂園，位於美國佛羅里達州的坦帕（Tampa）和美國維吉尼亞州的威廉斯堡（Williamsburg）。內港（Inner Harbor）位於美國馬里蘭州的巴爾的摩，在舊工業與航運蕭條後轉為開發商業和觀光遊憩，曾被譽為成功轉型的案例，引起各地水

絡，將內城荒廢地景轉變為一種消費地景。當市場力量毀滅並重新創造某個既有地景時，頂多是其人造物（如巴爾的摩法瓦水果公司的 110,000 磅鑄鐵立面）會被保存、修復甚至遷置，營造某種「真實的」地方感。⁴⁰

圖繪文化與經濟力量

書寫當代鉅變時，往往傾向於認為每一組經濟結構都會孕育各自的文化形式。我們是否相信，自己活在邁向後工業社會或晚期資本主義經濟的轉型期，會影響我們對後現代文化的接受。我們是否相信，當今局面是晚期資本主義的危機，會塑造我們在新的書寫、建築或藝術中看到衰微或抗爭的意願。然而，每組經濟結構都與各式各樣的美學形式、物質實踐及政治制度同時並存。環繞著當前結構變遷結果的不確定性——與丹尼·貝爾（Daniel Bell）描繪的「活在縫隙時間中的感覺」⁴¹有關——呼應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尤其是政治和文化，在我們對經濟力量的理解上，各自創造其內蘊限制的可能性。

近來有部分社會學和地理學著作的解析方式，呈現恢復唯

岸開發風潮。費紐爾中心（Faneuil Hall）位於美國麻塞諸夏州的波士頓，落成於 1742 年，是新英格蘭地區最早的公共集會場所；目前一樓改裝成購物商場，也是國家歷史地標，為著名的觀光景點，引發美國各地城市建造類似市場的風潮。南街海港（South Street Seaport）位於美國紐約曼哈頓南端，是鄰近金融中心的歷史保存與復原街區，亦為知名景點。

物論分析的榮譽，又不損及文化和政治自主性的可能。這類著作從社會世界的物質基礎著手，意在探索社會結構（尤其是權力和階級制度）與社會再生產（或代表、傳送和轉變制度性鑲嵌的權力關係形式）的相互關係。這些分析的觀點各異。有些理論家試圖界定建構社會世界的一般原則，如紀登斯（Anthony Giddens）、哈維（David Harvey）和索雅（Edward Soja）；另一些研究者則嘗試描繪特定情況，如拉許（Scott Lash）和厄瑞（John Urry）、史考特（Allen Scott）、史托普（Michael Storper）等。然而他們共同的關切，都源自靈活運用社會史和政治經濟的唯物論批判。

其中有三項關切影響本書的議程。首先是整合空間與時間，使其融入社會模式的描述和解釋的共同努力。其次，著重經濟、政治和文化於再結構過程中的交互作用。第三，對等看待經濟體系的變遷及經濟行為的文化脈絡變化。這對兩項知識趨勢的合流將有些微貢獻：制度經濟學的再起，以及重申對經濟、政治和文化因素的兼容並重。

其他學者業已付出許多研究心力，記載社會建構的價值與關係，呈現全球經濟變遷的地方脈絡，尤其是勞動市場。⁴² 這類研究結合總體經濟及個體經濟策略（這兩個層面都以涉及權力的社會過程為核心），以及如家庭或職業社群等社會制度。這項研究可以歸入下列三個一般範疇：

1. 結合工業投資、職業變遷與地方社區的階級、性別、種族和族

群關係再結構研究；

2. 連結中央政府政策與隨機應變或企業型「地方國家」(local state)興起的政治變化研究；
3. 結合國際企業決策與彈性的(但並不活潑的)家戶經濟適應之道的研究。

雖然這些題目都很重要，但本書追求的是某種涵蓋一切的概念，能同時表達世界經濟的斷裂和整合。這種概念必須包含物質實踐及美學形式，強調經濟結構和文化計畫的匯流，再現所有社會階級的經驗，但不會誤解經濟權力的根本不對稱性。於是，這最後成了一本有關地景的書。

社會和經濟權力結合的空間結果顯示，地景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主要文化產物。我們的認知地圖、美學形式意識形態，反映了塑造地景的成長和衰落的多重轉變和對比模式。因此，尋求個體自主性，即是探究地景的結構規則。就某個層面而言，這些是資本主義經濟秩序的一般規則。在另一個層面，這些是使生產由一地移往另一地的市場決策。然而，就第三個層面而言，它們是勞工與僱主、開發商與消費者、企業家和創意人才之間在特定地方的實際妥協。⁴³

觀諸繪畫史，風景包含實際景物及我們觀看這些景物的觀點。這揭示了社會學家的問題，即如何以令人信服的觀點描述實際的社會世界。由於沒有任何單一觀點足以涵蓋美國經濟的各種變化，社會學的取向必須廣泛採樣，並提出尊重各種差異的合成

23 圖像。我們從兩個截然不同的結構變遷經驗著手——內在地景和都市地景，兩者同時再現並抗拒新市場經濟的抽象化、國際化和消費偏向。在這個起點之後，再以一系列個案研究（五個二十世紀地景）探索去工業化與後工業或服務業經濟之間的變化光譜。部分讀者或許會質疑在這些觀點中，文化似乎優於經濟。的確，市場文化同時再現和挑戰市場經濟的規則。



保羅·史川德（Paul Strand），〈華爾街，紐約，1915〉。Aperture Foundation, Inc., Paul Strand Archive版權所有© 1971。感謝費城藝術博物館：保羅·史川德回顧展（the Philadelphia Museum of Art: The Paul Strand Retrospective Collection, 1915-1975）允許複製。保羅史川德資產（the Estate of Paul Strand）的贈禮。

第2章

「創造性的破壞」：內在地景

[連環漫畫「登斯柏里」(Doonesbury)裡的兩個角色，穿著工作褲的藝術家和她丈夫，凝視她的新作品，一幅以餐盤碎片鑲在牆上的拼貼]

她說：麥克，基本上，碎裂的外表訴說著近期影像挪用的粗鄙不文。它們頌揚連續性，卻同時哀悼後塗鴉固體性的貧乏。你也可以說這是一種對於評論的評論。

他說：啊！那不是我們結婚時用的瓷器嗎？

她說：看的人並不知道。對他而言那是美國夢的碎片。

——蓋瑞·杜魯多，〈華盛頓郵報〉

G.B. Trudeau, *Washington Post*

1985年8月29日

幾年前，文學評論家詹明信(Fredric Jameson)建議由後現代文化下手，尋找經濟地景變遷的「認知地圖」(cognitive map)。這項建議令人敬佩，部分原因在於他描述的景象引人入勝：波特曼(John Portman)的中庭旅館所誘發的疏離感，許多都市/郊區購物中心等大型內視建築計畫所傳達的「超空間」

感。此外，詹明信的部分吸引力也在於他尋求文化象徵的物質基礎。不論對錯，他認為後現代主義風格等同於當代跨國資本主義的勝利。¹

26 雖然詹明信並非唯一主張「圖繪」經濟變遷者，**後現代**一詞卻令人困惑。^{*}這是廣泛用在從電影到建築、小說到設計等各種不同文化領域的標籤。它與視覺再現有密切關係，尤其是搖滾音樂影帶、建築和廣告。然而，對於共享這個標籤的畫家、建築師和都市規劃者，後現代主義的視覺技術兼含了寓言與寫實主義。後現代主義於 1970 年代以作現代主義的美學對立體而崛起，主張創造新事物，同時尊崇工業化以前的設計；但它也和眾多不同的現代主義形式並存，提供另一種選擇，而不是繼承者。除此之外，它是與社會有關的理論——世界有許多不同的倡議、知識和權力中心——因而也是一種整體理論，「就像思想中的豐田汽車，在許多不同地方生產和組裝，然後賣到世界各地」。²

不過，後現代主義在地景上留下了刻痕。後現代建築的引人注目，已經達到誇張諷刺的地步：後現代主義是一棟頂上有個三角形的新建築。雖然建築陪審員已將這種風格賜死³，但對於無孔不入的消費文化而言，它仍提供了一種視覺修辭。當美國第七大連鎖速食店艾比氏（Arby's）決定提升該店形象時，它在肯德

^{*} 我經常在要去進行有關後現代地景的演講時，碰到一些同事敦促我務必界定後現代主義，好讓他們徹底了解這個詞彙的涵義。另一方面，我曾經聽到一位研究生毫不遲疑地對同學描述某件衣服為「後現代毛衣」。結果那是件看起來像「仿拼布」的編織物。

基州路易斯維爾市 (Louisville) 打造了一座後現代風格的「新概念」餐廳原型，有著「以絕緣材質做成的弧形外牆，漆上淡紫色、玫瑰色和酒紅色條紋；霓虹飾條；以及豎立著一枝長竿的正式入口」。艾比氏的後現代主義屬於「個人化」的大眾產物，在霓虹燈繽紛色彩的裝飾下，形成一種不具威脅性，甚至有點嬉戲意味的經濟權力象徵。這裡意味的不僅是後現代主義與 20 世紀晚期經濟間的共鳴，也說明了後現代風格的商業適應能力。⁴

在社會結構高度分化的複雜經濟中，市場競爭會使文化產品致力於標新立異。艾比氏的管理階層利用後現代裝潢銷售標準化漢堡，看來並無衝突，但這種情形卻突顯了後現代主義的兩大核心困境。一個獲得商業應用的美學反對運動要如何對抗市場文化？如果後現代主義的複製品出現在全世界各地的公路上，它又要如何尊重「地方」脈絡？理論上，後現代文化意味著地景與風土，以及市場與地方調和的可能；但隨著它的能見度增加，就日益抽離脈絡，形成一副市場導向的特許文化面目。於是，後現代建築令地方失去特色。它們成了全球市場中的「非地方」(nonplaces)。⁵

市場和地方的對立是後現代主義的內在成分。這也是為何沒有任何單一地景能控制「駭人的」與「脈絡性的」後現代建築的差異，為何當某部分後現代文化風格——即脆弱、退化、片斷化——指稱去工業化時，另一部分——即多元論的去中心化、視覺編碼優於文字編碼，以及隨心所欲盜用不同的藝術模式——卻描述了後工業化社會。後現代主義啟發了兩種市場文化，各有其

實踐、美學和政治意涵。介於「抵抗的後現代主義和反動的後現代主義」之間的，是市場（創造性破壞的所在地）與地方藕斷絲連的曖昧不清。或許理解後現代主義的最好方式，是將其視為當代經濟轉變的地景：是不確定的社會脈絡，也是對這種脈絡的反諷視角。⁶

這暗示在物質地景之外還有內在地景。為了傳達一種破裂和不連續感，並使過程的脆弱成為理所當然，後現代象徵地景再現持久性、文化層次和既得利益的破壞，這和使市場與地方對立的破壞一樣。但這與 19 世紀末期的現代主義沒有太大差異。當時的現代主義，尤其在視覺藝術方面，也表現（並反對）先進工業時代的「發達」（high）資本主義。它也傳達某種速度感和變化感，以及一種解除限制、鬆動傳統權威，改變社會控制的意識。⁷

藝術史學者克拉克（T. J. Clark）指出，在藝術實驗時期，現代文化的新形式和社會控制的新形式有著共生關係。不論個別藝術家的意識形態為何，馬奈（Manet）那個時代的現代藝術創新再現，只不過是設法將「一種控制形式繪製於另一種之上」。⁸ 印象派畫家雖以繪畫評論市場對地方的破壞，其筆下的城市是一種無政府領域，充滿自由流動的符號及隨手可得的獨特標記，然而金融和不動產市場則替巴黎各區烙下更嚴厲的社會階級標誌。

雖然擁有抵抗的意識形態，後現代主義卻暗示了與市場交易文化的類似順應。它以易辨識、在地、「友善」的經濟權力符號裝飾城市，但真實的經濟結構則較為抽象，受國際流動的影響較大，其樣貌較不易為公眾所理解。但後現代主義興起的脈絡與

現代主義不同，這時市場更為無常，地方（尤其是職業藝術家社群）自主性也更低。象徵地景的歷史性新成分，是一種後現代焦慮，探問文化權威到底是源於脫離市場力量的自主性，或剛好相反，正是源自市場權力。

繪製這種模稜兩可的地景固然不易，但繪製文化本身二元概念的難度也不遜色。畢竟，文化既屬於文人雅士，也是一般的生活方式。文化越局限於前者的精緻藝術概念，就越傾向於成爲一種可以買賣的區別符號（不論藝術家的看法是什麼）；然而，它若越局限於後者的一般意義，就越屬於一種不可剝奪的地方產物。在這兩種完全相反的文化挪用模式進退兩難，後現代主義的核心問題，在於替不斷分化的過程找到並恢復某種「永恆的」社會意義。⁹

這種創造性破壞過程唯一可能的觀點是「臨界性」（liminality）。文化人類學家維克多·透納（Victor Turner）首先使用**臨界性**描述社會群體由一種地位或範疇轉換成另一種的通過儀式。在這種場合裡，慣用的社會規範都暫停適用，因為該群體已放棄一種地位，卻尚未接受適用新行爲的另一種地位。這些過渡轉換並非全然不穩定的情況。儀式的進行自有其文化腳本，在社會價值的暫時顛覆中，經常會顛倒人的角色。歐格紐（Jean-Christophe Agnew）在研究英國歷史時，將透納的概念延伸爲市場的**臨界空間**（liminal space）。這是一個買家和賣家從事短暫的、社會所認可的轉換或「交易」的地帶。它也是「居中」（betwixt and between）於主要社會機構間的地帶，如市場廣場

座落於商業世界和宗教世界間，介於工作日與假日之間。¹⁰

然而時至今日，經濟再結構使臨界性成為一種無所不在的經驗。在工業市場經濟面臨創造性破壞下，個人可以同時體驗到某部分由文化傳遞的經濟角色擴張，以及其他角色的萎縮。某些經濟角色則有了重大逆轉。隨著（以及儘管）服務業雇用增加，人們經歷了社會意義來源從生產移轉至消費領域的質變。隨著（以及儘管）製造業就業機會萎縮，希望保住工作的生產者往往成為勞工認股的投資人。抽象來看，可以將經濟再結構設想為一種臨界過程。它在社會層次重組了空間和時間，重新設定經濟角色，並且重新評估生產和消費文化的價值。

這些過程中永遠新穎的是它們與特定社會群體的相互影響。一旦經過文化的中介，相對得失的經驗就會折射出一般性的變遷意識。衰退區域勞動力的女性化、大多數製造工作的去技能化，「生產者」的具體形貌從戴工程帽的人轉變為藝術家和投資銀行家：這些市場形勢的質變，迫使經濟權力地景的觀看角度跟著改變。

我們先從個人對結構錯置的認知著手，探索創造性破壞的地景，這類認知表現於以小說為主的文學作品中，通常有相當標準的敘事主線。或許有人會說，無論怎麼看，敘事作品都不能被視為後現代，電影（而不是書）才是最重要的後現代產物。然而，如果我們有意尋找社會鉅變的錯置和片斷化經驗，可以在這些小說的變動地景中找到。

變動中的地景

大部分當代小說所描述の後現代特質，反映了置身不斷變動地景中的存在式苦悶。有些小說中，出生地的工業衰落剝奪小說主角與生俱來的權利，形成關注時間的背景。主角的中年於是成為一個支點，並置社會群體的存續和個體死亡的必然。在約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的《兔子發財了》（*Rabbit Is Rich*）中，主人翁哈利·「兔子」·安格斯壯（Harry "Rabbit" Angstrom）是賓州小鎮一個事業小成的汽車代理商，他對過逝親朋好友的強烈感情——他對自身根源的明確關注——反映在經濟地景上。¹¹ 當他開車駛過小鎮，想到的是鎮中心逐漸式微的店鋪，該區已變成蒼白乏味的購物街。

安格斯壯原來是萊諾排鑄機（Linotype）^[1]的操作員。當排版成為過氣行業時，他沒辦法找到任何工作，只好進入岳父的經銷公司從事汽車買賣。他後來的成功取決於兩個要件，這些要件既確認也否認與過去的連繫。一方面，雖然哈利的妻子和岳母持有經銷公司的大部分股份，但賣車給了他一個當地中產階級的立足點——包括不屬於上流社會，但也十分體面的當地鄉村俱樂部會員資格——以及自己當老闆的機會。另一方面，汽車代理的利潤來自銷售進口的豐田汽車。與安格斯壯岳父當老闆時銷售的美國車相較，日本進口車看來輕薄短小、不甚可靠，是當代石油危

[1] 一種將整行文字鑄成一塊金屬字模的機器，主要用於報業。

機一個出乎意料的悲劇後果，是烙入安格斯壯意識中恆久的存在性限制（也是厄普代克於 1980 年寫這部小說時的深刻印象）。安格斯壯的兒子看起來也不太可靠。一個大學中輟生，帶著懷孕的妻子搬回哈利家——事實上是哈利岳母的家——還不斷弄壞哈利的車子。兒子面對的是哈利對這個精力旺盛的年輕人不堅定的承諾，以及一連串羅曼史的內疚。在這些狀況下，兔子哈利淒涼的內在地景應和著家鄉的荒蕪地景。

另一本風格迥異的小說，德里羅（Don DeLillo）的《白噪音》（*White Noise*），也瀰漫著類似觀點。¹² 本書的主述者傑克·格拉尼（Jack Gladney）是位大學教授，任教的大學（我們假設）也位於賓州西部，有著富麗的哥德式校園景觀。教授在這個「後工業」社會結構中的日子過得比兔子安格斯壯舒適。他有很多休閒時間，而且顯然不會因此感到內疚。相反的，兔子記得自己的父親，一名體力工，總是拖著精疲力竭的身子回家；他常會想起父親髒兮兮的指甲。他也總會將自己母親一輩子的勞碌和岳母及自己相對安逸的生活互相對照。

然而，在《白噪音》中，德里羅的敘述者憑著無用的知識舒適度日。他在大學中教授「希特勒研究」，常來往的朋友則是研究通俗文化的同事。他們回想老電影的內容細節，在超級市場中觀察行為禮儀，並因此時而失望、時而狂喜。但是，格拉尼相對富裕的環境，讓他否認周遭地景已陷於貧困。格拉尼回憶開車時看到的景象，他行經「城市主要街道，一間間折扣商店、支票兌現處、批發賣場。一家挑高的舊摩爾式電影院，現在奇妙地

成了清真寺。即將成為航站大樓、貨運大樓、商務大樓的未完工結構體。這與典型的懷念照片多接近啊！『鋼鐵城市中灰暗的一天』，我說」（p. 89）。

這種美好生活的保護性飛地遭受某種普遍威脅包圍的想法——這種觀念以一連串生態和醫療災難緩慢入侵格拉尼的生活——造成呼應格拉尼中年危機的緊張狀態。推著裝得滿滿的購物車，與他豐滿的妻子巡迴於超市走道間，一股對全球災難和自身死亡的確定感，倏然襲上格拉尼教授的心頭。

「兔子」安格斯壯和傑克·格拉尼都生存於二元地景，與死亡共眠，同活人共事，走在位居工業時代廢墟中的繁榮島嶼上。但是，對於失業的巴爾的摩工人瑞德·貝克（Red Baker）——羅伯·渥德（Robert Ward）同名小說《瑞德貝克》中的敘述者——而言，社會災難和個人生活悲劇絕非只是並置：它們是同一件事。¹³ 瑞德·貝克同時面對自己的40歲生日，以及他待了一輩子的鋼鐵廠關閉。結果，喪失生計和邁向生命盡頭是相同地景的一部分。當地的製造業經濟和瑞德成長且一直居住其中的勞工社區排屋（rowhouse）、公園和酒吧，位於同一個時空框限中。

在小說中一如在生活裡，瑞德所在地景中的地方，與市場驅動下（巴爾的摩等城市所期盼）的都市振興並置。某天早晨，在找新工作時，瑞德看到周遭街坊的熟悉地景被另一個不帶希望的地景取代，自己的生命則在其間流逝。

〔他說〕我開車在高地鎮繞了三個小時，經過封閉的

32 舊國家釀酒廠，沿著百老匯街來回開，經過「馬戲團電影院」（Circus Movie Theatre），那兒正在上映《綠門之後》（*Behind the Green Door*），我以前曾到那裡看過《執法者》（*Gangbusters*）的一系列電影……接著是兩三部「伍迪啄木鳥」（*Woody Woodpecker*）或「樂一通」（*Looney Tunes*）卡通系列，然後還有兩片連映場。我看第一部3D電影《布瓦納魔鬼》（*Bwana Devil*）也是在這家電影院。現在則全是從普拉特街上岸的希臘船水手，他們欲火中燒、膝蓋上放著報紙。

往昔，那些電影、影集、卡通和兩片連映，都只要13分錢。那是1948年，當時我5歲。

這是百老匯街，每逢復活節，人們會穿上最好的衣服，在海軍藍和陸戰隊綠色制服的衛兵帶領下，沿著這條街遊行，通過約翰霍普金斯醫院。

現在這裡除了供藝術家和律師聚會的酒吧，以及一堆死氣沉沉的商店外，什麼也沒有，而且它們全都不要雇人。（pp. 46-47）

如果服務業經濟提供瑞德·貝克任何工作機會，他就必須由高技能工作降級到非技術性工作。瑞德自然抗拒這種改變。在失業服務處，一群最近遭裁員者讓他想到照片上大蕭條時期排隊領湯食的人，有位工作人員把他分派到無技術人士的隊伍。他從過去的經驗知道，他在這裡注定被迫接受「和普拉特街的毒鬼及雷

鳥酒鬼一起，把週日增刊夾進報紙中的新人生」。

等一下，小姐……〔他說〕……，妳或許不清楚粗軋機是做什麼用的。我負責轉動那些燙死人的鐵棒。如果我沒弄好，鋼條會脫軌，有人就可能得拄著假腿過後半輩子。你最好相信，這裡面的技術可大著呢！（pp. 26-27）

那名職員不肯重新幫他分派，當隊伍緩慢向前移動，終於與那位滿臉不耐的無技術工人就業諮詢人員面對面時，瑞德沉入服務業經濟的最底層。^{*} 諮詢人員提供他一個在內港收垃圾的公共事務工作，該區是巴爾的摩碼頭區的購物和娛樂商場，瑞德的妻子才重新回到那裡工作。

是啊！我能想像那幅畫面〔瑞德說〕……我老婆在「維弗螃蟹屋」當女侍，當她往窗外看去，會看到我，她的丈夫，在打包人們丟掉的垃圾、蟹鉗和薯條；撿拾糖菓紙和冰棒棍。你真的認為我受得了嗎？

清潔工，瑞德·貝克。（p. 30）

* 或許失業服務處的職員在面臨自身失業時，也會滑落到最底層。美國某些州的失業率下降，通常是因為服務部門就業率增加，這些州的失業服務機構便會縮減聯邦經費，導致這些職員的工作機會減少。

雖然在服務業工作只帶給瑞德羞辱，它對《燈紅酒綠》（*Bright Lights, Big City*）裡的紐約作家、模特兒及他們的朋友而言是羞恥，而對《小於零》（*Less than Zero*）中洛杉磯的好萊塢和大學常客而言則是場騙局。但新地景屬於他們，屬於東西岸經濟中兩大成長中心裡的流動居民。然而，不同於預期的是，這種經濟下的工作死氣沉沉、毫無生產性，而且階層分明。

《燈紅酒綠》中的敘述者想當作家。¹⁴ 大學畢業後，他在堪薩斯市的報社做了一小段時間記者，又花了兩年待在紐約，想試試自己的能耐。白天，他在一家模仿《紐約客》（*New Yorker*）的雜誌社檢查文稿的正確性——稱不上是工作的話，也是人人搶破頭的就業機會。

「查證部門」是雜誌社裡最大的房間。如果棋社裡有衣物間，看起來就會像這樣。房間內有六張桌子——其中一張保留給來訪作家——牆上有幾千本參考書，灰色油布桌面、棕色油氈地板。桌位分配反映了絕對的階層區分……但大致而言，整個部門就像一個民主團體俱樂部。別處可見對雜誌社的狂熱效忠，在這裡則因部門忠誠而略為緩和：我們相對於他們。如果雜誌內容出現錯誤，慘遭修理的是我們其中一人，而不是作者。不會開除，但少不了一頓罵，甚至可能被貶職，流放到傳達室或打字房。（pp. 16-17）

創意才能就是一切。靠近紐約的雜誌界代表成為知性的、愉悅的新地景之一，但也充滿不容許表達個人意見的絕望。一進去就困在那兒。唯一的出路就是下放到「傳達室或打字房」。

除了受僱及自僱的科層差異外，對雅諾維茲（Tama Janowitz）而言，這與《紐約奴隸》（*Slavs of New York*）中浮動但禁錮的新潮流藝匠圈是同樣的地景。他們是住在東村合租的廉價破舊公寓中的藝術家、音樂家和珠寶設計師。他們擠在一起是因為沒法獨立負擔房租。這種空間和社會的限制感，更甚於〈藍色房間〉（*The Blue Room*）裡的敘述者。在這篇發表於《紐約客》的故事中，他和妻子住在上東區一間狹窄的工作室中，開始每天晚上大聲朗讀一位19世紀英國婦人的自傳。他們逐漸相信，「我們看得最仔細、也了解最透澈的紐約——研究生及充滿理想的藝術家和作家的紐約、小的可憐的公寓，以及圖書館和出版社兼職工作的紐約——其基本形式還是維多利亞時代的」。¹⁵

這種說法所要表達的是一種對生活不如意的無奈。一方面，服務業經濟重建了一種「辦事員環境。誠如我們所見，在紐約，新時代看來並不像藍寶堅尼（Lamborghini）經紀商，反而更像一個包著毛線圍巾的書記人員。」另一方面，租金昂貴的小公寓裡，永恆貧困則塑造樸素的生活風格。他們及朋友加起來沒幾件傢俱，也不太常舉辦吵死人的派對，婚姻生活中養不起小孩。將就湊合這些條件，「我們有著小店職員的蒼白臉色，自然主義者的惆悵難解，教區牧師的複雜躊躇」。^{*}

在這幅地景的另一頭是《小於零》中那些後現代、厭倦無

聊、嗑毒成癮的富家子弟。對他們而言（顯然對他們的父母也是）服務業經濟的工作是一種自戀和墮落，猶如納坦尼爾·威斯特（Nathanael West）在《蝗蟲之日》（*The Day of the Locust*）中描述的好萊塢地景當代版，只是角色比較年輕。他們的洛杉磯在片斷的都會區中沿著高速公路和峽谷伸展，從這些渾渾噩噩的大學生就讀的西木（Westwood）區大學校區，到他們父母位於比佛利山莊和貝爾艾爾（Bel Air）的住宅，馬里布（Malibu）和棕櫚泉（Palm Springs）的海濱度假屋和鄉村住宅，亞斯本（Aspen）或拉斯維加斯的週末寓所，以及（雖然較少見）經常旅居墨西哥、倫敦、瑞士等地。¹⁶ 空間和社會上的毫無限制，反映夢想商人（他們的父母）和毒品商人（通常就是他們自己）的市場力量，引致一個無邊無界卻龐大而單調的地方。敘述者內在地景的存在性苦惱，相較於「兔子」安格斯壯的內在地景，同樣是對外在地景的再現。在這本書中，洛杉磯的最終意象是個闖入者、強暴犯、食人族。要成為這個地景的一部分就得失去理智。

雖然後現代城市和現代城市之間的差異很明顯，但《小於零》和《燈紅酒綠》同樣定義了某種夏普（Bill Sharpe）和沃勒克（Leonard Wallock）形容為「文學縉紳化」（literary

* 閣樓的波西米亞主義，願望受挫的布爾喬亞眼中的都市邊域（limbo），跟尤金·古德（Eugène Goudeau）對1870和1880年代巴黎波西米亞主義的小說式描述一模一樣。請參見Jerrold Siegel, *Bohemian Paris: Culture, Politics, and the Boundaries of Bourgeois Life, 1830-1930* (New York: Viking Penguin, 1986), pp. 216ff。

gentrification) 的小說類型。¹⁷ 然而，與其詮釋不同的是，這些有著類似地景的小說，只有兩個共同元素（另一個夏普和沃勒克並未提到的相似點，是許多人有將這種地景再現當成全部社會現實的傾向）。兩本小說都處理大學畢業，與藝術有某種關係的青年準專業和準知識分子圈。不論富裕與否，這些角色代表在衰敗中成長的經濟的主旨，正是典型的**精神化**概念。而這又轉而反映區域二元狀態的社會主旨，是結構變遷令人擔憂的一面。

這兩部小說也提供一份城市做為消費地景的旅遊指南。兩位敘述者白天求生、夜晚過活，流連在餐館、夜總會和夜店之間，參加無數狂飲嗑毒的派對。俱樂部場景是小說極為重要的部分：書中的角色既乏味又無聊，渾然不知生活的虛無混亂是一種存在性限制。《燈紅酒綠》的敘述者談到俱樂部時說：「你會出現在這，只是在進行一種極限測試實驗，提醒自己你不是那塊料。」事實上，他心目中設想的與俱樂部夜貓子全然相反者——他的內在自我——只是相同消費模式的變體：

你想像自己是那種在週日一大早起床，出門買份《時報》和牛角麵包的人。會查看藝術休閒版並決定去看場展覽，如大都會博物館展出的哈布斯堡宮廷（Hapsburg Court）服裝，或亞洲協會藝術館的日本室町時代漆器展。是那種會打電話給週五晚上在出版派對中認識的女人的男人。……她可能很晚才回家，也許去了夜總會。或許也會在前往博物館之前，打上幾局網球。（p. 4）

《小於零》中的年輕角色，也不停從小餐館和速食店，游移到冰淇淋店、夜店和新式料理餐廳。他們看起來和其他同年紀、收入水準相同的人沒什麼兩樣，也許除了他們消費時那種全然的冷淡。

敘述者的洛杉磯只有在想到過去與未來景象時，才勉強有些生氣，而《燈紅酒綠》的敘述者卻在自己以觀光客的角度觀看時，開始（再一次）以愉悅的眼光來看紐約。某次與一位頗具魅力的女人約會時，他帶她到住家附近逛逛，在曼哈頓屬於較古雅、帶些異國風情的地段。此時食物聞起來是頗令人愉悅的民族風味，而非令人厭惡的腐臭味；街道和聯排房屋則規模小巧，充滿市民社會的記憶。不似人類地景的奇特怪誕，觀光客地景完全不令人畏懼。

〈藍色房間〉的敘述者也住在紐約一間小工作室，晚上會去朋友的公寓小小放鬆一下。「我們的派對就利用破爛的家具將就湊合——拿門板當桌子、浴缸作酒窖——就像鮑伯·索耶（Bob Sawyer）在「匹克威克」（Pickwick）中的晚餐派對，我們甚至得努力壓低聲音，以免吵到房東太太」。相較之下，《小於零》的敘述者也到朋友家中，但這些聚會實際上完全沒有時間和空間限制。

那是個週六夜，某些週六晚上，當沒派對可去，也沒音樂會可聽，全部的人看遍所有電影時，大多數人會待在家中，邀請朋友來家裡和講電話。有時候有些人會路過

進來坐一下，喝杯酒聊聊天，然後回到車上，開往另一個人的住處。有些週六晚上，同時會有三或四個人開車像這樣從一家逛到另一家。這些人從週六晚上十點左右出發，直到次日天快亮了才回家。（p. 77）

消費的地標和消遣活動構成了後現代小說的地景。佛列德瑞克·巴瑟姆（Frederick Barthelme）的小說和短篇故事大多以美國南部和西南部為背景，故事中充滿速食店、小餐館、破舊酒吧、有棕櫚樹和磚牆的飯館。其中一個故事結尾時，敘述者發現踏上他門階的那個女孩在一家他偶而會光顧，叫做「餡餅世界」的烘焙屋工作。另一個故事的開頭則描述「餐館所在過去曾是硬體販賣店；現在則擺設洛杉磯1930年代末期的粗俗器具，但更不帶感情些——棕櫚樹、陳舊的畫作、霓虹燈、人造柱子、彩色燈泡、淡橙紅色牆壁、剝落的灰泥、黑色地磚」（p. 87）。¹⁸

巴瑟姆故事中的拖車停駐區、集合住宅區，以及廉價酒吧和速食店重現了風土文化，美國社會那種對移動性的獨特熱愛。巴瑟姆的餐館比麥金納尼（Jay McInerney）和艾利斯（Brett Easton Ellis）的餐館便宜，食物也粗糙，但這是他書中角色經常流連的地方。在《白噪音》裡也一樣，其中描述的地景也是一種消費地景，只不過超級市場和購物商場取代了餐館或俱樂部。

這與瑞德·貝克的勞工階級社區地景有如天壤之別，那裡昔日是生產的地景，如今是毀壞的地景。那裡的酒吧和餐館有價值是因為那是朋友聚會的所在，並且更新著與市場和地方既未明

言、也不可說的妥協。當瑞德拜訪舊情人，一位現在已是寡婦的酒吧老闆時，她告訴他自己打算遷往佛羅里達，但很害怕搬家：

「我在這兒長大。我認得每個人，但這兒什麼都沒有了，瑞德。你不能靠記憶過日子。」

「露比，我知道我們不常碰面，但是……嗯！我喜歡知道你還在這兒。我是說……該死，你知道我的意思。」

(p. 46)

後現代主義並未以戲仿 (pastiche) 和其他反敘事技巧揚棄回憶，而是隱約承認占用時間和空間正是今日文化面臨的核心議題。占有往昔人工製品的能力，現在平均地分屬「機械地」附著於地方的社會再生產過程（厄普代克的賓州、鋼鐵城市、勞工階級的巴爾的摩），以及「有機地」源於經濟和文化市場的社會分化（如《燈紅酒綠》中的「文學縉紳化」和《小於零》中的後現代城市）。

實質地景是否會被後一種消費需求改變，取決於建築和都市設計如何影響經濟變遷。內在地景的臨界性在城市臨界空間的生產上找到了共鳴，將原本被社會限制所嚴格界定的領域納入市場文化。生產的空間不再重要，退守成為歷史性風土；都市地景則比以前更加仰賴影像消費。

第3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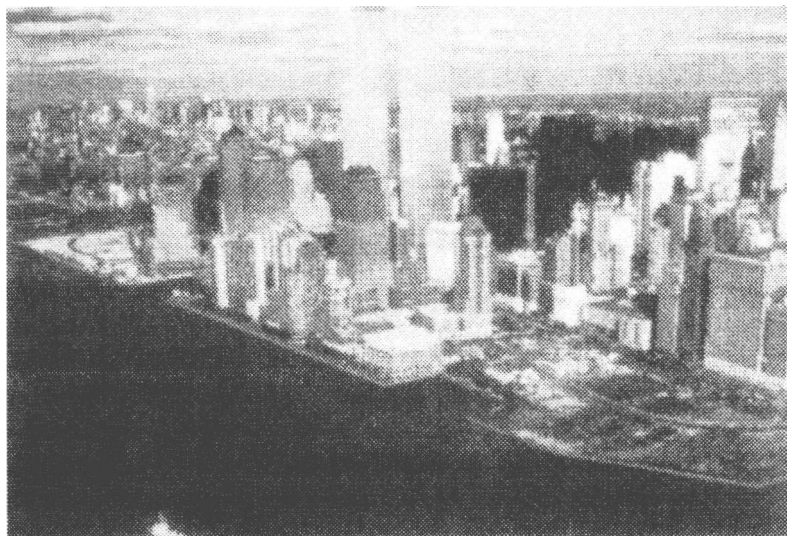
都市地景

昨晚……超過1,200名佳賓齊聚慶祝「古董廣場」(Place des Antiquaires)開幕，紐約最新的古董中心……。西西莉·齊卡(Cecile Zhilka)是當晚的女主人，她贊助大都會歌劇院，說話帶著獨特的紐約和巴黎口音……。馬哲睿大使(Ambassador de Margerie)說：「我只想知道我身在何處：在巴黎、紐約，還是某個漂浮在兩者之間的新城市。」

——《紐約時報》，1987年11月19日

我們所知最清楚的結構變遷的文化地圖，並非出自小說家或文學評論者之手，而是拜建築師和設計師所賜。他們的產品、身為文化生產者的社會角色，以及他們介入其間的消費組織，創造出最實質的變動地景。同時作為欲望對象和結構形式，他們的作品連結了時間和空間。它也透過同時遵守和建構由市場驅動的投資、生產和消費規範而直接中介了經濟權力。

這種文化中介有一項重要結果，就是模糊了許多我們每日經歷的空間和時間範疇之間的區別：設計精巧的機器侵入閒適的居家生活，城市越來越相像，而週末購物車潮造成的交通堵塞



砲台公園市，紐約（1989）。相片感謝砲台公園市政府提供。

情形，比平日早晨的交通尖峰時間還要嚴重。大體而言，以往獨立存在的空間——代表人們心目中的「純淨」自然或文化——現在則混合了社會和商業功能、贊助商和符號。以往時間被視為獨特的，因為與其相連的社會經驗若非有限、就是「永遠」持續，現在則被濃縮或合併。雖然大衛·哈維（David Harvey）曾嘗試捕捉這些經驗，指出現代的「時空壓縮」（time-space compression）始於啟蒙運動時代，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加劇，當前全球經濟重組時期則達致頂峰，但他對這些令人不安的經驗還有許多未盡之言。一個重要的未決議題就是：地景的視覺經濟如何影響市場文化。¹

在此，維克多·透納的臨界性概念再次登場。然而，不再是

社會群體經歷了臨界性時刻，市場的臨界經驗擴大了，臨界性形成、滲透且定義新的都市空間。所有這類空間「居中」於制度之間，尤其是神聖的文化領域與世俗商業世界之間。在生意往來而公共角色交換的地帶，臨界空間於地景中將市場文化制度化。

受到市場規範的深刻影響，臨界空間不再提供透納所形容的創造性破壞機會。在他觀察的非市場和前工業情境裡，群體因臨界性而回春、重現活力，社會價值也再度鞏固。即使是渥特·班雅明（Walter Benjamin）描寫的19世紀歐洲城市，都市空間也承載著游移於循規蹈矩和烏托邦（即商品世界與夢想國度）之間的可能性。² 今日，都市空間回應市場壓力，私人開發計畫界定了公眾夢想，公共娛樂則僅限私人進入。地景中的臨界性因而看似熊彼得描述的創造性破壞，反映出文化贊助人、生產者和消費者的重新定位。

創造性破壞對建築師和設計師是助力、也是阻力。他們在新市場文化中面對的狀況，與挑戰傳統製造業者自主性的情況類似：價值抽取來源從實質產品轉變為意象和符號、全球市場，以及社會意義的主要來源從生產移轉至消費。他們不僅適應這些變動，還根據這些變動量身打造產品；他們賦予熊彼得所謂資本主義創新的「恆久風暴」某種視覺形式。

建築師與權力地景

最能直接繪製地景的兩種文化產物，就是建築物與都市形

式。它們塑造城市以及我們對城市的感知，因而兼具實質性和象徵性。如同其他市場經濟中的建成環境，設計和形式與空間有各種不同的關聯方式：是一種地理（或地形）限制，是潛在衝突或凝聚的地帶，以及是一種商品。因此，它們傾向於不斷變動，快速淘汰。我們必須強調建築和都市形式深受市場影響，但同時不能輕忽它們在地方象徵性依附上發揮的重大作用。建築和地區的外觀如何、使用者是誰、它們的多樣性或同質性、在拆除前維持了多久：這些特質反映市場文化的時間和空間限制。³

今天的建築師多半在企業贊助下工作，都市規劃者、不動產開發商和市府官員則在國家制度和地方偏好的範疇內運作。兩者既非完全不受市場力量和地方依附的影響，又非全然為其所限。雖然建築師通常是替個別客戶做設計，而非「出於投機」拿著構想到處兜售，但提供大部分委託案的商業客戶設定了市場條件，要求縮短工期並創造更多可出租空間。愈來愈多這類客戶屬於全國性或國際性投資客（尤其是加拿大人、英國人和日本人）。因此，建築及都市形式與「多國資本主義」之間有了實際連結。⁴

不僅如此，新建築和都市形式是在與消費產品幾乎相同的社會條件下生產出來。它們日益循著類似的標準化和市場區隔模式發展。地方不動產市場和地方建成環境則促成某些變化。多樣性也受到鼓勵，納入基於「情感」或美學因素而吸收的舊都市形式，此即哈維稱為「彈性積累」的經濟過程。⁵ 不論這些珍貴的人造物本身如何，現在已難以區分對都市形式的感知與國際化投資、生產和消費的效果。

1945年以後，郊區化過程要求融資和營造必須集中控制，即使它快速促使住宅和購物中心往外分散，挾其旗艦店、受控制的環境與室內商店街，摧毀許多市中心商業區的商業活力。⁶然而1973年以後，集中化的多國投資在支持商業發展分散化的同時，也鼓勵都市購物區的重新聚集，並加強分層區隔。相同的產品與氛圍來自紐約、法國、日本和義大利的多國企業集團。短短幾年內，類似的產品和氛圍便出現在上麥迪遜街（upper Madison Avenue）或羅迪歐路（Rodeo Drive），以及法國聖奧諾雷街（rue du faubourg St. Honoré）或義大利的蒙特拿破崙大道（via Montenapoleone）。在地商店因這些承租者支付更高租金而被迫遷移、無處容身時，他們正確地指責那些背後有多國企業母公司補貼租金的精品店是罪魁禍首。猶如早期轉變的微妙重演，更多國際投資使購物街區從手工藝（餡餅）轉化為大眾（麥當勞或班尼頓）生產和消費。⁷

麥當勞和班尼頓（Benetton）是國際都市形式和國際化生產與消費連結的縮影。它們的分店遍布世界各地城市，替母公司的國際擴張策略增添力量。一位班尼頓美國總部主管甚至這麼形容自家公司的策略：「我們自認是時尚界的速食。我們希望出現在每個地方，就像麥當勞。」⁸但兩家企業的全球經營方式卻有所不同。麥當勞出售傳統加盟特許權給地方業者；班尼頓既不投資各地的班尼頓，也不收加盟權利金，而是對個別的班尼頓服飾店擁有者授予班尼頓服飾經銷權。此外，麥當勞經理人在當地採買店內所用的食材；班尼頓經理人則必須向班尼頓採購所有貨品。

44 兩家連鎖企業還透過其他企業政策來維持統一標準，包括嚴格的分店經理訓練；堅持遵循公司的品質和服務標準，就班尼頓而言這包括店內裝飾和櫥窗展示；總公司還經常派員到現場視察。儘管販賣的是不同類型的產品，麥當勞和班尼頓的成長有部分都得歸功於組織創新，大部分優勢集中於生產和配銷。麥當勞將「自動化」速食餐點作業流程精雕細琢到最精緻的地步；班尼頓則研發更省錢的羊毛軟化和衣服染色法、投資電腦化製造與設計，以及執行倉儲作業的真正機器人。兩大連鎖企業在過程中都發展出一套整體「造型」，融合產品、製造方法、獨特的消費經驗及某種廣告風格。隨著「經典」的量產毛衣和漢堡連結全世界的消費者，這些多國企業在國內經濟上也日益舉足輕重。麥當勞對牛肉的饑渴需求，傷害了整個拉丁美洲畜牧國家的食物鏈。相反的，班尼頓設於美國北卡羅萊納州的新工廠則提供紡織工人（自動化的）就業機會。⁹

班尼頓和麥當勞是許多地方風景裡的地標。然而支撐其生產的社會過程，印證了我們認為重要的三項結構性轉移：抽象化、國際化、由生產轉移至消費。尤其意義的是，它們的利潤同時反映基本民生物品的生產（衣服和食物），以及較不明顯的經濟要素如地租、行銷和配銷組織等。

相較於量產消費品，建築的行銷就高調多了。即便個別建築物越來越標準化，但設計者始終宣稱其建築能賦予所有者更多獨特性。專業建築師持續提出潛在的美學或社會方案的理論觀點，尤其是附著於許多後現代風格的偽民粹主義（populism）。

在通俗化潮流驅策下，越來越多建築師接受企業贊助。企業則透過資助建築而贏得公眾接納。企業和區域總部的「人性化」（user-friendly）建築風格，讓這些公司有別於1950至1970年代棲息於現代主義的商業版玻璃箱內的公司。¹⁰

出售辦公空間的開發商就沒那麼多知識分子的包袱。某位建築開發商表示：「我的建築物就是產品，它們和透明膠帶或保鮮膜一樣都是產品。人們第一眼看到的是產品包裝。我出售或出租空間，包裝必須吸引人才能得到好價錢。」彷彿要印證熊彼得對企業家沒落的冷酷預言，他補充說：「我可沒法蓋一棟紀念碑式建築，因為我不是個機構。」建築評論家艾達·賀克斯塔伯（Ada Louise Huxtable）在評論特別常見於紐約市的極端巨大、異常個人化的新摩天大樓時，將這段評論轉向，她說：「過去五年來，新類型開發商以某種稱為『簽名式建築物』的構造重建城市，這是一種結合行銷和消費主義的後現代現象，它可能會讓貝尼尼（Bernini）感到困惑，但是現代企業家卻能完全理解。」¹¹

簽名或「獎盃」（trophy）建築物連結建築的文化價值以及土地和建物的經濟價值。近年來，這項連結因新的地產投資者（尤其是外國投資人）入場與地產價值膨脹而更形緊密。成長的中心點以東西岸經濟區為主：紐約市、華盛頓特區、波士頓、舊金山、洛杉磯，這些也都是後現代建築的中心。獎盃建築對企業主而言具有雙重價值。這些建築是有識別度的企業形象，還可以出售。當企業重整、裁減人員時，它們會將建築物賣給外國投資人。因此，花旗銀行將其削過曼哈頓天際線的斜頂總部空間租給

日本投資人，將大部分勞動力移至皇后區（Queens）一棟新建築物內。¹²

會強調可以等同於個別文化生產者的個別化產品，與大眾消費時代的市場競爭激烈脫不了關係。後現代建築設計的「埃及風」（Egyptoid）特色，如同 1920 年代房地產繁榮期競相興建的「馬雅式」金字塔辦公大樓。¹³ 同樣的競爭也出現在角逐觀眾產品忠誠度的好萊塢各大製片廠之間，因而鼓勵個別導演拍攝「簽名式電影」（signature film）。* 在建築方面，由於人工成本上升而工藝技巧退化，社會分化的重擔便轉移到昂貴材料的運用及設計本身的獨創性。而且就像好萊塢導演，建築師宛如商業資產，甚至根本就是。菲利浦·強生（Philip Johnson）獲選為 AT&T 企業總部的建築師，或凱文·羅契（Kevin Roche）被通用食品及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董事會選中，是因為這些建築師都是具知名度的品牌名稱。誠如湯金斯（Calvin Tomkins）對菲利浦·強生精於市場之道的俏皮評論——他們有可能比他們的建築物活得更久。¹⁴

建築師向來是基於他們的名聲及作品而中選。但近年來日益強調個別建築師的主觀和客觀運用。選擇某位建築師可以賦予建

* 如同艾達·賀克斯塔伯見到開發商在創造簽名式建築上扮演的角色，在創造 1930 和 1940 年代簽名式電影上，重要的電影製作人與特定製片廠的功勞也不亞於導演。1950 和 1960 年代的非商業評論家試圖將導演的角色理論化，淡化好萊塢製作的商業主義色彩，故稱導演為電影的「作者」（auteur）。

建築資助者正當性，也提供資助者某種競爭優勢。同樣的，隨著建築設計的日趨普遍，它也就逐漸取得經濟和文化價值。雜誌在時尚版中加入新建築和設計的調查報導；博物館增設建築部門；建築師的設計草圖開始被當成藝術作品以高價出售。室內設計也同樣常規化，成為文化素養和社會地位的要件。在這些狀況下，大多數人可能對建築師印象深刻，卻未必實際知道其建築作品。¹⁵

若說建築師是對現代主義美學不滿而採取差異化風格的修辭，尤其是後現代主義建築師，這只訴說了一部分故事。事實上，他們在爭取企業委託上也面臨日益激烈的競爭。重要建築師和多數大型法律事務所一樣，都設有準企業式的營業處所。他們必須依賴企業客戶來支持業務。建築師生涯與市場分化之間並無必然的相關性。一般常舉出的例子是菲利浦·強生在高舉現代主義大旗四十年後，於1970年代轉向後現代主義，現在他的每件作品風格都各有不同。麥可·葛瑞夫（Michael Graves）在1980年代因轉向後現代主義而遭受建築界同僚嚴厲譴責，但他開始接到知名企業和公共工程委託案。同樣的，出現在電視影集「邁阿密風雲」（Miami Vice）片頭背景中那棟造形獨特、引人注目的晚期現代建築物，則奠定邁阿密 ARQ 建築設計事務所（Arquitectonica）的地位。1920年代的不動產投機熱潮與1980年代那波一樣，顯示建築師之間的風格區分有利於商業擴張。到了1920年代，建築師事務所的辦公室規模和員工人數都比以前大了許多。土地取得和建造的成本令他們「與工程師、律師和金融家一樣，成了大企業的一部分」。¹⁶

47

矛盾的是，建築和設計日漸專業化以後，開始以專門教育條件及執照考選程序對這個專業的進入門檻設限，關切重點也逐漸與贊助人合流。一方面，建築師和設計師與富商名流往來熱絡，另一方面，強調文化以加強產品和不動產市場的商業價值，則使建築師和設計師成為權力地景的一環。

由於各城市急於吸引新資金投注，尤其渴望獲得高檔企業服務業青睞，於是重新打造商業區，委託興建新建築物和都市計畫。傳統市中心在產業式微和外移，以及郊區新購物中心的競爭下，逐漸破敗衰落。為了振興（或創造）風土的光彩，地方利益團體會聘請「知名」建築師，因其聲望有助於減少財務風險。但這些建築師面臨雙重的市場限制：分別來自客戶及其事務所，兩者都要求獨特且賣相良好的產品。結果，建築師將自己的簽名置入地景，無論建築案在何處都一體適用。

巨星級建築師創造出某種標準化形式，反覆運用於所到之處。他們創造遠觀上（由都市天際線來看）令人讚嘆不已的建築，卻與當地「背景」格格不入。這類建築對投資人而言固然風險較低，卻難以引起地方共鳴。¹⁷ 一位波士頓建築師對水岸區的扇形碼頭（Fan Pier）新計畫頗有怨言：「突然之間，對在其他地方過度接案的『知名』建築師的需求，讓這些建築師和他們的產品齊肩並置。」這可能會讓歷史悠久的水岸區，在外觀上和其他城市沒什麼兩樣。¹⁸ 巨星建築師挾其文化商品，透過跨國經濟投資而調和地方與區域獨特性的差異水準。

巨星現象可視為文藝復興時期天才崇拜的現代版。早在

15世紀初，建築師布魯內列斯基（Brunelleschi）為佛羅倫斯（Florence）、比薩（Pisa）及曼都華（Mantua）的貴族設計宮殿和公共建築，成就遠超過當地建築師。根據瓦撒利（Vasari）的說法，布魯內列斯基變得「非常有名，想要他設計重要建築的人遠道而來，請他提供無人能比的設計和模型；有辦法的人會透過朋友或運用關係爭取他的服務」。¹⁹ 但今天巨星級建築師的崛起反映了市場競爭。它顯示大型服務業公司渴望從產品開發（其辦公建築）的長期大規模投資中回收價值。巨星級建築師產生的市場條件與搖滾巨星和電視主播毫無二致。²⁰

約在1880年到1930年間，在不動產要求不斷創新都市景觀的趨勢下，現代建築也蓬勃發展。1905年，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返回紐約，對自己認識的城市遭到破壞表達強烈譴責。他將三一教堂（Trinity Church）的瀕臨死亡——被該教堂的教區委員會出售以供不動產開發——怪罪於「不斷前進的普遍意志——前進、前進，為前進而前進，一種不計代價的強大胃口」。紐約辦公大樓當時的平均壽命縮短到只有二十年。到了1920年代，商業大樓的生產仰賴投機客（他們的資金使建設計畫得以進行）與「可以繪製……壯觀摩天大樓設計圖」的建築師（而且「如果能比伍爾沃斯大樓（Woolworth Tower）高上幾層就更妙了」），還有急於刊登「高聳大樓照片」的新聞媒體（「不管是真實還是想像的建築，因為……讀者無法抗拒它們」）。²¹

商業和文化

如同建築，設計師創造的視覺影像也融入權力地景之中。服務業經濟的成長將設計抽離物質生產系統，將其塑造成觀念力量的象徵。由於設計與產品成敗息息相關，設計師也因此成了巨星。他們因具有結合商業與文化的能力而受到重視。^{*}法國室內設計師安德莉·普曼（Andréé Putman）於1987年洛杉磯家具設計業年度大會中，對現場上千名觀眾發表演說，談到設計業近年來的蓬勃發展時，她說：「我不認為15年前會有機會對這麼多人演講。世界各處都有一種對新構想的著迷與熱情，以及對於簽名作的奇特飢渴。設計師是當今的大師，一種受到過度尊崇的動物。」他們也是公眾人物和媒體名流。當法國高級服裝（*haute couture*）時尚設計師克里斯汀·拉克魯瓦（Christian Lacroix）出現在紐約服飾店，介紹他首次為「大眾市場」推出的成衣系列時，就被大批購物群眾包圍索取簽名。²²

設計師的新文化價值某種程度也反映高階服務業經濟重要性的整體提升。然而在歷史上，建築設計的角色早在17世紀就已開

^{*} 例如日本語言就直接引進 *deezainah* 一字而不加翻譯，其他引進的如「廣告文案」（advertising copywriter）和「專案負責人」（project coordinator）等，在日語中都沒有對應的詞彙（*Business Week*, July 13, 1987, p. 51）。當製造業者的競爭戰場由純粹成本轉向產品品質時，工業設計的重要性就與日俱增，這點在當前的美日商業競爭中尤其重要（*Business Week*, April 11, 1988, pp. 102-17）。

始超越營建。²³ 20世紀初的建築師，從柯比意（Le Corbusier）到法蘭克·洛伊·萊特（Frank Lloyd Wright）也會靠設計家具和物件推銷建築設計。但直到近幾年，建築師的設計天分才被其他商業領域大量借用。現在，建築師在行銷小件商品上表現突出，產品包括鳥舍、腕錶、咖啡壺和餐盤等。此外，建築師跨足設計家具者也與日俱增，呈現一個蓬勃發展的市場。安德莉·普曼甚至因「真實的」複製（authentic reproduction）20世紀初期設計師的作品而獲益——她製造並銷售愛琳·葛瑞（Eileen Gray）的作品。²⁴

商業上最成功的建築師也是最炙手可熱的消費品設計師。但這種成功的循環也限制了建築設計師，迫使其迎合更多市場標準。低劣審美和商業判斷的混合可能帶來風險，時尚設計師豪斯頓（Halston）被迫退休就是明證。當他喪失在潘尼百貨公司（J.C. Penny）銷售大眾化時裝的特許權時，也就「喪失了他的名氣」。另一方面，「知名」設計師的價值反映其商業夥伴的敏銳度，至少不亞於其設計品質。²⁵

室內設計、家具和時裝設計也因百貨公司的宣傳推廣而提升價值。引進新產品時，百貨商店通常會說明和銷售整個「類型」的設計，宣傳推廣因此在設計師、消費大眾和高級文化的富裕贊助人之間建立新的連結。誠如狄波拉·希佛曼（Debra Silverman）的精準觀察，高檔百貨公司如布魯明岱爾（Bloomingdale's）規劃促銷的進口商品，是在紐約設計、在海外的低工資工廠大量生產，然後猶如置身博物館般展示於旗艦

50 店的中心位置。事實上，布魯明岱爾百貨在 1980 年代初期主辦的促銷活動（正值雷根第一次總統大選時），是打算搭配大都會博物館（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服裝館的主題展覽而進行。因此，在古代中國長袍與今日的中國進口產品、法國聖羅蘭（Yves Saint Laurent）設計的高級服裝，以及羅夫·勞倫（Ralph Lauren）的休閒騎馬裝等文化消費上，布魯明岱爾百貨與大都會博物館享有共同利益。希佛曼相信，「貴族式」品味因百貨公司和博物館的推銷而再度受到重視，催生一群支持保守派雷根總統（Ronald Reagan）的富裕菁英——「消費主義權力菁英」。²⁶但混合了包含富商名流及百貨公司顧客等多種來源的贊助，加上高級文化機構與商業機構的框架，顯示的是更廣泛的設計價值。設計以消費的視覺組織結合公共大眾與私人菁英。

百貨公司向來都利用設計行銷產品。但自 1980 年代起，新品差異化的競爭需求，促使業者更依賴設計來塑造整個消費空間。百貨公司不斷重新改裝，設立各種主題或設計師精品店；以各種取自歷史、院線電影和世界各地設計主題為中心，精心策畫促銷活動。一旦強調重點由產品轉移至設計，時尚和藝術的社會贊助者發現，百貨公司成為一個願意接受特殊事件的環境。百貨公司贊助慈善義演、招待非營利文化機構，並且促銷設計師作品——利用同一個事件，以同一批人為對象。藉著降低商業和文化之間，以及私人贊助與大眾消費之間的隔閡，百貨公司創造了一個都市臨界空間。

在單一商場的四面牆壁之外，新的海濱購物中心以視覺消

費為基礎，擴大市中心的臨界地帶。它們通常建在老城沒落港區的廢棄碼頭上，將購物塑造成一種享受都市文化的方法。這類更新計畫包括波士頓的費紐爾中心（Faneuil Hall）、巴爾的摩的內港（Inner Harbor），以及紐約市南街漁港（South Street Seaport），所有計畫都利用歷史保存法規補助商業建設。自1970年代至1987年止，聯邦稅法支持歷史保存，賦予將舊都市形式再利用為工商業振興用途的投資人財務上的優勢。1986年稅法修訂時減少了這些優惠，而較有利於小型投資人。然而，以美學觀點而言，歷史保存常可贏得原本反對都市更新、修築高速公路與大規模破壞的團體支持，轉而贊成以消費為主的市中心商業再開發計畫。這種反對破壞舊都市形式的原則，與1950和1960年代以現代建築宣誓商業區能見度的作法大異其趣。在那些年裡，開發商和市政府以標準化、「國際化」的辦公建築取代年代久遠的廉租結構體。1965年以後氛圍丕變，這類高聳建築物代表疏離，故而改以規模較小、尊重脈絡環境和混用空間等方式，恢復地方的視覺感。

51

購物中心取代政治會議和市民集會，成為公共生活的場所。所有權雖然屬私人，也只服務付錢的顧客，但這些場所被視為一種相當民主的發展形式。不但如此，一般認為它們能建立某種地方感，進而「開放」市中心。市中心開發商由原有的經濟用途（港口、市集、工廠等）擷取主題，然後提供消費者一個結合購物和藉由觀光窺視城市過往歷史的機會。真實性（authenticity）的氛圍是吸引購物人潮的重要因素，足以產生對零售競爭極關鍵

的群聚效應。某些市中心的高密度企業服務創造了需求，即使是某種人造地方感也能促進消費。但在其他城市，市中心與工業用途的關連仍過度緊密，無法刺激消費空間的臨界性。

在水岸的活化過程中，舊碼頭和商店大街（Main Street）變身為供大眾消費的大型百貨商場。在這些地方投射的地域意象下，它們其實是販售非本地生產商品的市集。至少「美食」（Gourmet foods）和可頌麵包坊在初期是進口的，而充斥這些都市購物中心的各色服飾連鎖店，販售的也多屬進口服飾。觀光產品也幾乎都是外地製造。就連波士頓招牌的山謬亞當啤酒（Samuel Adams）及佛蒙特州（Vermont）奶油之類的產品，要不是由外州生產（啤酒是匹茲堡製），就是以其他州的原料製成（製造奶油的牛奶來自佛蒙特州以外的酪農場）。費紐爾中心之類的開發計畫則由全國性企業負責，融資來自紐約的貨幣中心銀行。這些購物中心就像高級商店街，結合國際性的投資、生產和消費。²⁷

私人消費與公共空間

博物館、百貨公司與水岸購物中心，開放公共空間供私人消費，從而創造臨界性。這種臨界性的一個更引發爭議的例子，是建築師海默特·雅恩（Helmut Jahn）於1986年設計的伊利諾州政府中心（State of Illinois Center）。在他先前設計的各種私人 and 公共大型建築中，雅恩兼容並蓄採納各時期的建築元素——所

謂後現代主義的歷史參照。但這棟位於芝加哥的州政府新辦公大樓之所以值得注意，不在於建築風格，而是它的空間運用。在中庭圓形大廳下，這棟18層的公共建築裡設有三層的購物中心，另有一些公眾使用的空間散布於各樓層。對這種結合公共和私人的空間使用方式，論者批評是公共場所淪為私人市場。它將都市的公共與私人空間之間始於19世紀的臨界性推到極致。

自1880年代起，新發明的運輸和通訊機械設備塑造了各種公共和私人文化的混合形式。電話使男人和女人易於接近與分神；大量發行的報紙提供親密感與資訊；鐵路縮短旅程規模，通過大型車站由鋼鐵與玻璃建造的臨界性透明通道抵達城市。²⁸從這個時候起，都市形式的定義愈來愈取決於私人空間的公共使用。相對於公民社會公共空間的衰落，這種地方感與市場消費手段則同步成長。

現代城市的社會生活，常將一度專用的市場消費手段擴大，及於更多民眾。1860年代起，咖啡店、茶室和餐館這些曾是滴酒不沾的中產階級人士避難處的場所，成了集會和娛樂的公眾場所。剛開始是單身婦女購物天堂的百貨公司，也逐漸發展成為一般商店街。亨利·詹姆斯認為足可做為美國典型代表，那些奏出「極度合群狀態音符」的旅館，一開始則是上流社會有錢人的社交集會場所。²⁹

詹姆斯對大飯店的觀察——熙來攘往的人群、飲著午茶閒聊的女士、提供琳琅滿目進口珍品的商店，都是歐洲未曾見過的景象——預示了詹明信（Fredric Jameson）對洛杉磯波納凡裘旅

館 (Bonaventure) 的描述，那是建築師兼開發商約翰·波特曼 (John Portman) 於 1970 年代建造的中庭旅館。詹明信和詹姆斯一樣，都對旅館內部世界的凝聚性和「公共性」印象深刻。和詹姆斯不同的是，詹明信稱其為後現代，「**波納凡裘**〔原文如此〕渴望成為一個整體空間，一個完全世界，某種微型城市……〔而且，對其而言〕對應著新的集體實踐，某種前所未見的新型超級群眾 (hyper-crowd) 的實踐」。對詹明信而言，波特曼對建築元素的選擇，標示了現代主義壯闊（但易於理解的）規模的創造性破壞。諷刺的是，詹明信並未將波特曼旅館自然採光、屋頂高得異常的內部中央空間，與法國好市集百貨 (Bon Marché, 1876) 等 19 世紀百貨公司做個比較。在他看來，波特曼的中庭龐大，超過人類的體驗能力；而電梯和電扶梯延伸加速（但同時也限制）人類的行動，超越「我們不再被允許自行從事的舊式漫步」。³⁰

但亨利·詹姆斯早就在「全世界的華爾道夫旅館 (Waldorf-Astoria)」中察覺到「集體溫順的大眾」被「燦爛奪目、價格高昂的大旅館」誘捕。不亞於置身中庭的詹明信，詹姆斯看到「整屋子的人移動著，對於被捕獲與受支配的狀態帶著溫和且同意的猜疑，它們必須同意這種過度融合，做為對過度豪華看似滿意的代價。」³¹

在亨利·詹姆斯的 1905 年紐約華爾道夫旅館與詹明信的洛杉磯波納凡裘旅館之間，有一種視覺消費的直線關係。但旅館內部私人空間的公眾使用，僅象徵周遭城市的改變。近年來，在權力的不對稱性朝私人部門傾斜的情況下，都市形式顯得特別

脆弱。自1970年代起，由於聯邦資金抽離，加上地方「財政危機」的後果，市政府越來越依賴取悅私人投資者，包括市政債券持有人、不動產開發商，以及大型銀行和企業主管。少數城市，如紐約、克里夫蘭、揚克斯，由大型金融機構領導階層組成的非民選委員會，自1975年以來便掌握了市政預算的否絕權（克里夫蘭的金融規劃和監督委員會於1987年解散；紐約市的市政援助公司則承擔新的融資任務，並要求重整運輸和教育系統）。即使擁有民意基礎或由少數族裔和種族支持的新市長就任，如芝加哥及丹佛，市政府在從事公共工程時仍需與民間開發商合作。³²

在制度和意識形態的雙重限制下，城市面對「可能領域及公共領域的同時萎縮」。³³投機開發商、民選官員、金融機構及建築設計師創造的實質地景，以結合公共地方和私人市場的方式來回應這些狀況，通常置於某種準公共的都市開發公司管理之下。重要的公共生活從街道往室內移動。

根據熊彼得的說法，經濟中的創造性破壞改變需求的本質，促使資本沿著新的路線布局和分化。建築設計及都市形式顯示文化領域的創造性破壞也循著同樣的過程發展。20世紀對視覺消費的重視助長形象設計師的社會生產，其想像力則受到公共和私人展示的經濟價值制約。文化贊助、生產和消費的社會脈絡，降低生產者相對於贊助人和消費者的自主性。它也驅使先前界限分明的機構——百貨公司、博物館、旅館——轉變為迷失方位的市場和非市場文化消費的臨界空間。

由於這些原因，美術館就不可能作為「表達對炫耀性消費踩

下道德煞車的領域」；博物館真的「成了百貨公司的延伸，也是幻覺製造這門大生意的展示櫃」³⁴——但其旨在達成自身的「文化」目標。這些過程雖強化文化在社會分化中的角色，它們也導致文化生產乃「為了市場」和「為了藝術」的兩種看法趨於等同。這是後現代文化的難題。

同樣的，都市地景同時賦予**市場**和**地方**的對立實質形式和象徵形式。市場複製變化的固定壓力與地方複製穩定的一貫壓力相衝突。大部分的人真切希望享受漂亮建築、精美商店，以及美好都市空間帶來的愉悅，然而創造它們的過程使城市更為抽象、更仰賴國際資本流動，對消費組織也比對生產組織更有反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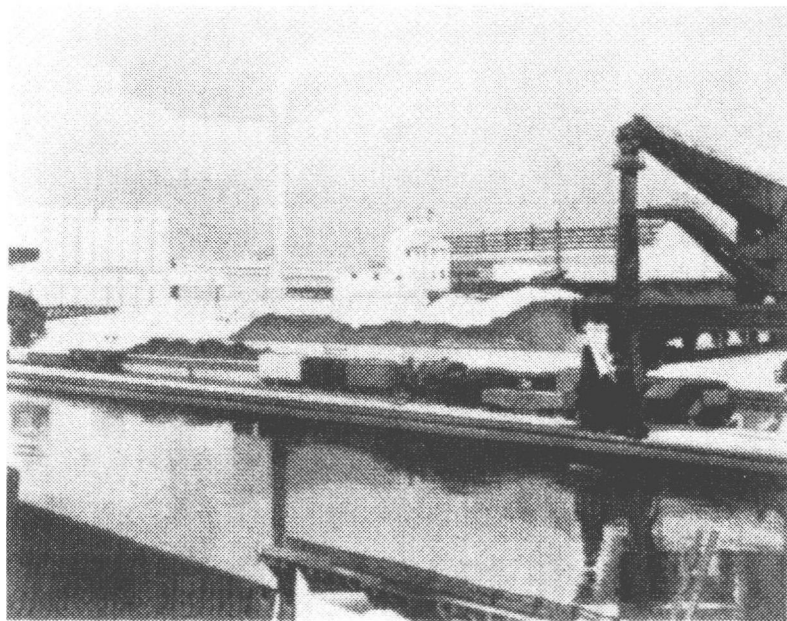
五個二十世紀地景

以下五章將探討一系列橫跨二十世紀，眾人耳熟能詳的美國地景，藉以反映市場經濟和市場文化的交互影響。

這些地景一開始將聚焦於經濟本身，深入剖析一個公司城鎮（威爾頓）、一個工業城市（底特律），以及一個成為企業總部所在地的富裕郊區（威切斯特郡）。反映文化對經濟影響力的增加，接下來的地景與生產的關係逐漸疏遠，與消費組織則日益靠近。第四和第五個地景描述紐約、芝加哥和波士頓市中心經由縉紳化而擴張的過程，以及邁阿密、洛杉磯和迪士尼世界等後現代觀光殖民地或夢想城市裡，都市形式的再造。

每個地景都在生活起伏和生意往來之間，因為經濟國際化、價值日漸從生產勞工抽離，以及社會意義的主導來源從生產移轉至消費而經歷轉變。這一系列地景因而陳述了空間、時間和經濟權力的概念，也強調了如工作和社區的社會關係、消費模式變化、國家政治和意識形態氛圍等「偶然因素」的重要性。

然而，更重要的是，這些地景所記載的空間與時間中的某刻，正是地方社會關係因為社會和經濟制度大環境改變而發生轉變之際。就此，它們謹記熊彼得的呼籲，探究的是資本主義形式如何被創造和摧毀，而非如何延續。



查理斯·席爾勒 (Charles Sheeler) , 《美國地景》 (*American Landscape*) (1930) 。 24 x 31 英吋帆布油畫。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收藏。阿比·阿德瑞克·洛克斐勒 (Abby Aldrich Rockefeller) 贈。

第4章

鋼鐵鎮

西維吉尼亞威爾頓的權力與自主

伊莉莎白女王時代從政者最關切的議題，依舊是當前關心的焦點；因為我們發現，就算過了近三百年，鐵匠和鐵器製造商仍是最重要的公共議題……國家的實力和財富取決於煤、鐵，還有人，重要程度遠遠超過黃金。

——山繆·史邁爾

《工業傳記：鋼鐵工人與工具製造者》

(Samuel Smiles, *Industrial Biography: Iron Workers and Tool Makers*, 1863)

但是鋼鐵業帶有某種神祕性，使其成為世界各地經濟實力的象徵。19世紀崛起的工業化經濟強國都奠基於鋼鐵，也靠它贏得大小戰爭。有超過一世紀的時間，政客和經濟學家都把鋼鐵產量當成工業進步的評估標準及地緣政治權力的來源。因此，鋼鐵危機的震撼程度往往與涉及的實際數據全然成不比例。

——《商業週刊》封面故事，1977年9月19日

沒有任何工業的意象比鋼鐵業更為強大。它在國家經濟中的象徵分量反映出許多物質因素：製造鋼鐵需要的蠻力，投資一家工廠注入的龐大資金，熔煉、澆注、鑄造和運送涉及的勞力規模，以及鋼鐵在所有現代結構物中無所不在，從鐵軌和橋梁，到汽車車體、摩天大樓、飛機和輪船。鋼鐵的力量非凡，因為它一直是工業社會的生命線。

但是以鋼鐵生產為中心的社會生活，向來與權力脫不了關係。幾千年來，基本金屬製造在權力與社區之間維持某種近乎神祕的關係。鐵矛使一小群人就能保衛家園或征服新土地；鐵製犁頭則幫助他們耕種作物並建立永久聚落。隨著時間流轉，務實的心智不斷改進傳統技術。當金屬製造業日益龐大，深藏不露的師傅和老練的好手，都小心翼翼保護他們在熔爐和地坑中開發的冶煉祕方。早在大型蒸氣鐵工廠利用資本和勞工生產鐵之前，鋼鐵與煉金術、命運、財富和權力是合而為一的。鐵器製造者牢牢駕馭這些基本力量。個別冶鐵師傅則將其當地社區的經濟專殊化，轉變為全球市場裡的主導地位。

18 和 19 世紀之間，鑄鐵生產讓垂死的英國城鎮雪菲爾德（Sheffield）重獲新生。稍晚，鋼鐵工業又協助匹茲堡（Pittsburgh）從貿易中心成長為工業城市。南北戰爭後，匹茲堡的煤和玻璃業僱用人數成長一倍，但鋼鐵就業人口卻增加兩倍。20 世紀時，世界各地紛紛建立鋼鐵生產中心。印地安那州的蓋瑞鋼鐵城是 1906 年由美國鋼鐵公司（U.S. Steel）私人興建，並以該公司總裁艾伯·蓋瑞法官（Judge Elbert Gary）命名。三

年後，厄尼斯特·威爾（Ernest T. Weir）在西維吉尼亞州威爾頓（Weirton）建立一座較小的鋼鐵城。這座鋼鐵廠成了國家鋼鐵公司（National Steel）的核心，該公司於1929年成立，由威爾擔任總裁。

鋼鐵向來就比其他國內產業（包括電腦和汽車業）享有更重要的全國地位。它藉由戰爭和國際貿易，往上與中央政府搭上關係，往下則跟地方製造業有密切關聯，成為經濟權力的象徵。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法國、義大利、日本和韓國政府紛紛於沿海地區設置新一代整合式鋼鐵廠，在鋼鐵廠周圍建造新社區，或將原有的農村和漁村重建成為鋼鐵社區。

無論是事實上還是象徵上，鋼鐵都意味著陽剛力量。這種工業的原料因堅硬的特性而受重視，成品則因堅不可摧而價值非凡。直到晚近的機械時代以前，要舉起沉重的鋼板半成品，必須仰賴強壯的肌肉力量和協調，而這一般認為是男性的特徵。此外，鼓風爐的高溫和噪音既猛烈又駭人。多年來，為了熔解金屬和澆注鋼鐵，各種不同的「燒冶」過程發展出一套嚴苛的工作時程。過去，由於採取開放式熔爐的燒製技術，工人必須全天無休照顧一批產品。20世紀以來，輪班制可以保持工廠全天運作。夜班職員和加班工人可以在妻兒入睡時繼續生產作業。直到最近，女性才爭取到在鋼鐵廠受訓和工作的權利。鉚釘女工蘿西（Rosie the Riveter）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全民總動員期間進入鋼鐵廠，但這只是暫時現象，直到1970年代在平等就業機會法的壓力下，才又有少數女性被接納成為鋼鐵工人。現在，自動化生產技術讓

鋼鐵作業對男性和女性都更為簡易。但勞動力還是以男性為主。

新招募的勞動力往往挑起最困難的工作。在 19 世紀後半葉大移民潮和合理化〔按：原文作 rationalization，可能為 nationalization（歸化）之誤〕的期間，斯拉夫人取代英國鐵匠移民，成為非技術勞工的主力。從第一次大戰結束到大蕭條為止，最不需要技術的工作主要由非裔美國人擔任，他們也常被運用為罷工破壞者（strikebreakers）。大蕭條期間，黑人和墨裔美人的失業率遠高於白人鋼鐵工人。那些留下來的人就被派往擔任煉焦爐和高爐等最辛苦、最危險的工作。¹

鋼鐵工人及其僱主向來處於某種男性生產文化中。從安德魯·卡內基（Andrew Carnegie）和亨利·弗里克（Henry Clay Frick）^[1] 的時代以來，不管是老闆還是經理，多半寡言無禮、粗野強悍，有時甚至使用暴力。如果一名工人是「鋼鐵男兒」（man of steel），他面對的是毫不遜色的對手「鋼鐵大王」（steel baron）及其環伺周圍的警衛與親手挑選的民選官員。在 1982 年因弗里克禁止賓州候姆斯戴（Homestead）卡內基鋼鐵廠成立工會而引爆的著名大罷工裡，他甚至僱用平克頓

^[1] 安德魯·卡內基（Andrew Carnegie, 1835-1919），蘇格蘭裔美國工業家和慈善家，於匹茲堡創立卡內基鋼鐵廠，後發展為美國鋼鐵公司，號稱鋼鐵大王，並投資許多企業；晚年從事教育和慈善事業，捐贈成立卡內基基金會，並設立許多大學、學校、圖書館與博物館。亨利·弗里克（Henry Clay Frick, 1849-1919）為美國企業家，經營將煤炭轉換焦炭以供鋼鐵業使用的公司，後與安德魯·卡內基合作，作風強悍。

(Pinkerton) 警衛鎮壓參與遊行示威的工人和社區居民。那次事件樹立了工業衝突的標準。衝突背後的力量，大部分來自鋼鐵工人面對僱主時抱持某種約略平等感的傳統。製鐵在傳統上是技藝主導的生產過程，技能嫺熟的工人因擁有專門知識和技術而得以累積權力。一旦所有權的獨占槓上技能壟斷，引發的權力鬥爭即是以工匠技能的特權為核心。

62

某位史學家曾指出：「通往候姆斯戴的路，其明顯、單純的意圖就是想一舉終結鐵器時代的擁護者，繼而領軍前進鋼鐵時代。」當製鐵業敗給鋼鐵，鋼鐵廠老闆趁機挫敗工人的意志，拆散生產流程，將原本連貫的鋼鐵生產技藝，拆解成幾項高度專殊化的作業單元，降低工會化工匠與無組織、非技術工人間的社會差距。此外，僱主將不同的鋼鐵生產階段整合於單一工廠內，在他們控制下一氣呵成，藉以鞏固他們對整個勞動力的控制權威。²

即使是在公開聲明和對政府官員協商時，鋼鐵廠老闆的態度也明顯較其他工業領導者強硬。他們主宰指揮的公司和工廠規模向來大過其他工業家。這是男人與男人在第一個現代大型生產企業中的對抗，直到 1970 年代以前，選用經理人主要看他對生產知識的了解程度：這一切創造出某種鋼鐵大男人主義的社會脈絡。這也創造某種自主氛圍。地方生產場所（某種公司城的原型）通常與其他聚落和產業隔絕。這類城鎮雖然接近原物料供應商（主要是煤和鐵砂礦）和交通樞紐，也是地方市場的常客，但鋼鐵城硬是自成一個世界。

根據 1931 年《社會科學百科全書》(*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的一篇文章，所有公司城的主要問題在於控制權集中於僱主手中。³ 僱主是城內所有住宅的建造人兼擁有者，使居住權取決於就業。再者，由於身兼住宅及生產的投資者，公司極不重視城鎮規劃的設施。更甚者，身為贊助人與道德權威，公司還控制各種社區機構，如教會和學校，而且強迫工人只能在公司經營的商店購物。僱主的政治控制擴及法官、市長、市議會與整個警力。公司城將商販摒除在外，禁止工會，也對任何可能競逐受困城中勞動力的其他僱主關上大門。鋼鐵強化了19世紀的家長式工業權力地景。當時大多數公司城都遵循伊利諾州蒲門 (Pullman) 的模式，只提供公司員工出租住宅。但鋼鐵公司早在1890年代便鼓勵勞工購置住宅。公司城的住宅所有權使整個債務循環趨於完整。它以抵押貸款綁住勞工，同時也鼓舞某種個人自主意識。⁴

將所有生產階段整合在一座大型鋼鐵廠內，使其得以獨立自外於其他非鋼鐵機構。自給自足的整合式工廠，本身附設碼頭和鐵路設施、鑄造廠、熔爐、煉焦爐及機械作業，是後來紅河廠區 (River Rouge) 的雛型。紅河廠區是亨利·福特 (Henry Ford) 在狄爾伯恩 (Dearborn) 的綜合工業區，美國鷹級巡邏艇 (Eagle boat)、Model T 汽車，以及福特森 (Fordson) 曳引機都從這裡出廠。與整合式鋼鐵廠一樣，紅河廠區代表現代經濟權力的典型地景。它支配地景的方式與它的科技和組織，正是大量生產的生動意象。⁵

這種意像當時頗為常見。早在1908年，羅素塞奇基金會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贊助下的匹茲堡調查 (Pittsburgh Survey)，委託藝術家約瑟夫·史戴拉 (Joseph Stella) 記錄該市鋼鐵廠的環境。史戴拉的紀錄展現大型鋼鐵設施的力與美，與路易斯·海恩 (Lewis Hine) 以攝影呈現煤礦城和紡織廠內人性尊嚴盡失的一面迥異。他為 20 世紀經濟力量的藝術呈現樹立一種模型。15 年後，愛德華·威斯頓 (Edward Weston) —— 以對自然形體和裸體的深入研究而著名 —— 記錄俄亥俄州昂柯鋼鐵廠 (Armco Steel Plant) 的建築設施。1927 年，艾兒西·德瑞格斯 (Elsie Driggs) 素描瓊斯與拉弗林鋼鐵廠 (Jones and Laughlin) 的大煙囪和高爐，後來轉化為《匹茲堡》(Pittsburgh) 這幅畫作。從 1920 年代末到 1936 年，瑪格麗特·伯克-懷特 (Margaret Bourke-white) 針對工業場址做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正式研究。她的照片，包括奧提斯鋼鐵 (Otis Steel)、羅馬線材 (Rome Wire)、史都貝克公司 (Studebaker Company)、美國鋁公司 (Aluminum Company of America)，以及從美國科羅拉多州到俄國馬格尼托戈爾斯克 (Magnitogorsk) 的輸送管和水壩營建攝影照片，經常刊登在如《生活》(Life) 和《財富》(Fortune) 等知名新雜誌上。⁶

查理斯·席爾勒 (Charles Sheeler) 及狄亞哥·里維拉 (Diego Rivera) 的委託案，則為紅河廠區留下異常豐富的視覺紀錄。紅河廠區成為當時美國工業力量最顯著的象徵，反映出福特家族與《生活》、《時代》和《財富》等大眾媒體共同發展出的現代贊助風格，以及他們仰賴的廣告媒介。事實上，席爾勒就

是由福特自身的廣告公司艾爾廣告 (N. W. Ayer) 推薦。拜福特及其委託的藝術家之賜，這座整合式汽車工廠成為大量生產與大眾消費的交會點。

席爾勒的《美國地景》 (*American Landscape*) 畫作以水平分層全景圖方式呈現紅河廠區外觀，令人聯想到17世紀荷蘭鄉村風景畫。就像工廠本身，畫中景觀將大多數生產活動融會在單一的非階層性地景中。畫的前景中，駁船運來煉焦爐所需的煤炭，火車則載走製成的鋼鐵。鐵路後方是1920年代興建，大小和形狀各有不同的庫房、鑄造廠、沖壓廠及排氣煙囪。席爾勒的繪畫和相片強調堅定的水平面。視野內沒看見半個人，卻傳達出某種作業繁忙及人員和原料不停移動的感覺。這種移動向外延伸，超越工廠位址及藝術再現：鋼鐵廠本身就是一個世界，卻稱不上是個自足的世界。

這些地景中的橫向移動，與席爾勒約同時拍攝的沙特爾大教堂 (cathedral of Chartres) 中的垂直感形成對比。兩者的力量意象完全不同。席爾勒是注重精確、崇尚機械美學的人，他把沙特爾大教堂和紅河廠區都當成哥德式教堂，特別強調兩者在建築形式上的相似性。但他對紅河廠區的煙囪和筒倉交錯從事的研究——「交錯的輸送帶」 ("Criss-Crossed Conveyors", 1928) —— 就比沙特爾教堂的對應圖像——「交叉飛扶壁」 ("Flying Buttresses at the Crossing", 1929) —— 更富動態。值得玩味的是，席爾勒絕非概念論者，卻將「交錯的輸送帶」當成亨利·福特的「肖像」交給《浮華世界》 (*Vanity Fair*) 發表。⁷

席爾勒和大部分同期的藝術家，多從外部觀點凸顯工業生產的空間和美學形式，但壁畫家狄亞哥·里維拉卻繪製了工廠內部製造區與生產線的景象。不過，這些福特出錢委由狄亞哥·里維拉完成的壁畫，傳達了與席爾勒早期照片相同的力量感，但里維拉本人可能從未見過這些照片。狄亞哥·里維拉的多牆面紅河廠區高爐壁畫（1933年）是經濟權力的內部地景。我們能想像它在訴說鋼鐵生產的故事：

壁畫中……高爐正在出鋼，熔鐵湧出，流入一具開口的沙槽，再導入一個金屬閘，在此分流成上方的熔渣與下方的純熔鐵。熔渣和熔鐵分別流入不同的沙槽，匯集至鐵道上的渣罐車，準備運出……。壁畫中，兩名工人手持長金屬棒調整閘門，拉動金屬閘改變金屬熔液的流向並對熔鐵進行採樣。一旁則是用以鑽進熔爐中釋放金屬的鑽機……。在爐底流動的熔鐵投射出橘紅色光芒。壁畫並未改變熔爐的設計或規模，也未誇大冒出的煙霧和顏色。一旦看過實際的出鋼過程，立即令人聯想到它與火山的類似之處。⁸

65

再沒有比鋼鐵生產那種固有的力量更強烈的意象了。對火焰這種原始力量的控制，自古以來一直都沉潛在對人和物質的控制中，將無序的地形轉變成條理一致的經濟權力地景。此外，地景與風土在這種意象中合而為一：鋼鐵大王的資本與勞動力量和地

方社區的文化密不可分。這就是匹茲堡、楊斯鎮（Youngstown）或蓋瑞過去與現在的地景。

然而，這幅鋼鐵意象的背後存在權力與自主間的未解張力。它預示的問題是：誰該為美國鋼鐵工業最後的衰退負責？像鋼鐵業這般擁有巨大力量的企業，是否真的享有自主性？誰自主於誰之外、為了什麼目的、有多長時間呢？雖然我們活在一個地方屈從於市場力量的時代，但這些力量可能受到非經濟因素的中介作用，以致限縮了市場行動者的自主性。

相較於其他國家，美國的鋼鐵業素來享有高度自主性。政府從來不曾透過鉅額注資或國有化等方式直接控制鋼鐵工業。其產量也未曾納入嚴格的經濟規劃。直到今天，官方一直都沒針對擴大鋼鐵工業的國內外市場制定任何工業政策。而且，與歐洲共同體鋼鐵生產業者不同，美國工業並未受到任何超國家機構控制。然而，相對於政府規劃的自主性正好吻合了美國發展出的市場文化。鋼鐵業者也得面對其他市場文化要素，像抽象化、國際化以及從生產至消費的移轉，而他們在某種程度上也積極參與共謀。

匹茲堡鋼鐵城的工業菁英早在 1880 年代就開始由地景的經濟權力中萃取社會和文化權力。靠著建立內含在市民俱樂部、博物館及公園中、使他們和巴黎及紐約等偉大城市連繫的國際都會文化，還有讓子女融入全國上流社會人際網絡，他們熱切想彌補自己的工業出身。⁹ 即使是對鋼鐵廠的精確主義式美學興趣，也可視為一種對經濟地景的**抽象化**。它象徵否定物質生產的「後工業」的開端，比工業和金融菁英明確表達這種否定早了許多年。

此外，國內鋼鐵業自始就深受國家財政及金融政策轉變的影響，也受到政府監察的左右。從進步派政治人物採取反托拉斯策略開始，20 世紀以來，幾乎每十年都會發生鋼鐵製造業者與全國政治領袖的衝突。政府不斷批評鋼鐵業的市場結構過度集中、拒絕擴大產能、工資過高（自 1950 年代中期起），以及定價策略不具競爭性等。鋼鐵業十分關切海外市場上來自國際卡特爾（cartels）的競爭，最終卻因杜魯門（Truman）和艾森豪（Eisenhower）總統決定支持在西歐和日本建立國家鋼鐵工業而一敗塗地。¹⁰

總而言之，鋼鐵工業凌駕於**地方**——界定為公司城、單一工業區或「社會性社區」——的經濟和文化權力，及其明顯缺乏相對於全球市場的自主性，兩者之間有著極大的不一致。因此，現代工業地景的結構化連貫性（structured coherence），自始就反映了自主與權力之間的脆弱平衡。¹¹

工業地景「片斷化」

1880 年代至 1920 年之間，人們想當然爾認為鋼鐵產量就代表國家經濟力量。事實上，至 1901 年止，鋼鐵工業一直與全國鐵路和銀行系統同步成長。憑著與這兩類公司的密切關係，鋼鐵業享有無限的資本來源。這些資本除了用於擴大生產，也資助業界內部的併購。此外，鋼鐵業在這段期間基本上沒有競爭對手，水泥和瓷磚等較新的材料仍無法取代鋼鐵成為主要建材。就

規模、複雜度、整合設施及地理隔絕性而言，在國家經濟力量等於工業力量的時代，鋼鐵工業代表美國製造業的全貌。無論在全球或地方尺度，強有力的鋼鐵工業與國家自主間都能劃上等號。

但即使在成長高峰期，鋼鐵業也不曾擁有全然的自主性。鋼鐵城所在的地方社區與全國經濟成長息息相關。不僅地方社區的生存取決於其他經濟部門和區域對基本鋼鐵產品的需求，擁有鋼鐵城的公司也得仰賴融資和公共政策。再者，每家公司都必須擁有一批可靠的當地勞力，以及穩定的顧客和供應商區域網絡。

政府在 1930 年代早期批評鋼鐵業生產過剩，但十年後，正值美國捲入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卻指責其生產不足，這種轉變導致某種「弔詭經驗的背景」。¹² 鋼鐵業者對杜魯門總統的猜疑更深化這種不確定性。杜魯門於 1948 年贏得總統大選後，公開支持民粹主義和國際主義，導致鋼鐵業面臨更大的公共壓力。杜魯門既威脅要以缺乏競爭力的理由將該產業國有化，迫使其擴大產能，又堅持必須放眼全球市場。

自 1950 年代起，鋼鐵業自主性的社會、政治和文化基礎逐漸遭受侵蝕。1960 年代起，尤其是 1973 年以後，鋼鐵業者在產品和資本市場上的自主性急速減弱，以致該產業的物質力量及其對地方的文化力量日益支離破碎。在美國，橋梁和高速公路等大規模公共工程持續減少，對鋼鐵的需求降低。海外方面，具有充分競爭力的外國工廠取代美國的鋼鐵出口。不但如此，原本應用在許多產品上的鋼鐵，逐漸被鋁和塑膠等更便宜、更具彈性的材質取代。另一種取代過程則是一些原本以國內鋼鐵生產的資本

財，本身被廉價的輸入品取代。隨著美國本土運輸工具、機械工具及農業器具製造商減少，國產鋼鐵的市場也進一步萎縮。猶如雪上加霜，商業和投資銀行在金融營運步伐加速及其世界性範圍的牽引下，也於此時紛紛捨棄鋼鐵業。

1977年以後，大部分的美國鋼鐵公司縮減規模，採取多角化經營、仰賴關稅保護或申請破產。關廠導致中西部地區從水牛城到匹茲堡，由南芝加哥至底特律的鋼鐵城紛紛關閉。鋼鐵業勞工人數不斷減少，其中大多數屬於美國鋼鐵工人聯合會（United Steel Workers' Union, USW）：由1970年的627,000人，到1981年時降至500,000人，至1983年時僅剩300,000人。¹³幾乎每次刪減都創下歷史新低。例如，在1974年的衰退期間，5月25日出刊的《商業周刊》（*Business Week*）宣布鋼鐵就業人數已來到1939年之後的最低點。

相較於大型整合式鋼鐵業者的困境，小型工場（mini-mills）則蓬勃發展。這類工場通常專營鋼鐵生產的中間步驟，不從事焦炭和鐵砂生產，也不製造比較精緻的成品。這些小工場大都座落於傳統鋼鐵市場以外的東南部、西南部和西部。自1960年代興起以來，這些小工場享有低成本結構和較整合型工廠「彈性」的優勢；他們採用高效率的電弧爐新科技，買進廉價、通常是進口的廢鐵，僱用非工會勞工、支付較低工資（包括生產配額和獎金）。這種「精實」（lean and mean）的經營方式吸引大量資金。跨區域的小工場如紐柯鋼鐵（Nucor）等公開發行股票，積極擴充工廠和產品線，與大型業者直接競爭。¹⁴

改變的跡象也逐漸蔓延至市場文化。經濟學家顧志耐（Simon Kuznets）的著作最先將重點由鋼鐵生產轉移到鋼鐵消費。根據顧志耐，後者（而非前者）才是工業實力的指標。到了1940年代末，雖然處於二戰後的積極重建時期，英國經濟學家又進一步挑戰鋼鐵的結構化角色。然而，一個世代後，在1970年代的國際經濟危機中，美國鋼鐵公司（U.S. Steel）總裁大衛·羅德瑞克（David Roderick）抱怨美國社會不肯面對現實，依舊習慣將鋼鐵視為美國最首要的工業。他說：「我們只是1.5兆美元經濟中一個360億美元的產業，現在汽車和石油這類產業都使我們相形見绌。」¹⁵

公共壓力與財務壓力

儘管鋼鐵製造業者在1973年後依舊受到公眾矚目，但這個部門的主導權已轉移到政府、金融機構及鋼鐵消費者手中。早在1964年左右，大部分業界內外人士就發現，進口鹼性鋼（basic steel）的成本比過去控制美國市場的大型國內鋼鐵公司生產的便宜。¹⁶ 這項認知改變對大型鋼鐵業的壓力——主要來自聯邦政府——要求它們擴大產能，同時降低被認為過高的人為「設定」價格。¹⁷ 多年來，許多公部門人士都認為更多鋼鐵廠、降低所有權和生產的集中度，可以促使價格下降。現在，擴大產能的論點因國際競爭而不再具有實質意義，但降價問題仍備受社會矚目。

大型鋼鐵業則對議程看法不同。在它們看來，業界最大的五

或六家企業可以採取兩種方法回應國際競爭。它們可以著手進行緊急建設計畫，蓋更多現代化工廠；也可以跨足非鋼鐵投資，從事多角經營。公眾討論仍然指責鋼鐵業者拒絕將價格調降到與進口品相同水準。儘管如此，大型鋼鐵業的策略也受制於「外在」力量。業界領導者的自主性一方面受限於金融機構，另一方面則受既有的義務約束。1960年代期間，鋼鐵製造者越來越倚賴銀行和保險公司等其他金融機構的短期貸款。這些放款機構對於在美國成立更多鋼鐵廠並不熱衷，因為它們能從其他投資獲得更高報酬率，包括海外投資。大型鋼鐵業本身也發現不易擺脫舊包袱。政府撤下的責任與義務大綱——包括公司對勞工的財政義務、業界龍頭負有樹立堅強和傳統典範的社會責任，以及企業發言人早已肩負的維護「自由企業」的意識形態責任——使鋼鐵業者難有大刀闊斧的作為。

但大鋼鐵企業確實有意改變。有好些年它們一直想減少而非擴大產能。自1950年代中期起，它們也半真半假地從事多角化經營——先是將煤炭和鐵砂供應商納入其企業組織，後來又轉而投資鋼鐵以外的事業。然而，在進口比例增加到足以造成危機之前，鋼鐵業者無法精簡到它們想要的程度。此外，一如其他國家，鋼鐵以外的分散化投資受到產業傳統局限。生產導向的經理人仍堅持以鋼鐵作為地方和國家經濟權力的來源。¹⁸

到了1960年代中期，資本市場也試圖縮減鋼鐵生產規模。金融市場在這段「狂飆歲月」（go-go years）中，基本上可以決定資金布局的條件。儘管金融市場控制下的資產增加，但企業負

債、海外直接投資，還有對美國市政府、州政府和聯邦政府及外國政府的貸款也增加了。鋼鐵公司同樣難以避免負債升高的趨勢，然而其吸引股票投資人的能力卻不斷降低。這自然成了現代化的阻力。不但如此，金融分析師和企業領袖也無法就多角化經營達成共識。美國鋼鐵產業籌資能力降低，某種程度上也反映金融分析師對該產業的幻想破滅。1958年的全球衰退使外國鋼鐵價格下跌，加上1959年一場三個月的罷工，導致國內生產銳減。但投資人抽身也反映股票報酬率降低。鋼鐵的股價已開始下跌。

鋼鐵公司必須提供高股利爭取外部資金，導致鋼鐵公司進退失據。全球競爭一方面削減獲利率，另一方面則要求更具彈性的定價結構。鋼鐵產業通訊《鐵器時代》（*Iron Age*）於1959年底一篇報導中指出：「這是世界鋼鐵地圖明顯改變的時代。自美國崛起成為製造大國以來，可能從未有過任何一個時期發生如此重大的鋼鐵生產權力均勢移轉。」在這些狀況下，鋼鐵經理人的自主性在金融機構面前敗下陣來。¹⁹

資金成本增加及報酬減少，必然令鋼鐵製造業者卻步。^{*}這是否使鋼鐵投資的成本效益降低，抑或只是讓公司董事會產生

^{*} 分析鋼鐵工業——或任何企業——的一項長期問題是，業者不願意提供完整的經營數據。根據經濟學家加德納·閔斯（Gardner Means）的說法，直到1960年，無論是產業還是個別公司，都還沒有適當的資料蒐集、預測和規劃方法。鋼鐵分析師羅伯·肯道爾（Robert Crandall）於1980年指出，由於美國缺乏公開發表的經營新整合式碳鋼廠的資料，以致很難評估鋼鐵公司的聲明。

疑慮，不願再冒風險呢？至1960年止，鋼鐵公司在資本改良支出上始終高於其他製造部門。然而，它們並未花錢建造現代化的「綠地」（green-field）工廠，反而基本上「滿足於」「充實」既有設施。並無單一因素足以解釋它們為何不採用創新技術。對於鹼性吹氧轉爐（basic oxygen furnace）的效能有所疑慮，可能導致大多數公司決意延用既有的平爐技術。或者，鋼鐵製造業是受到自身力量制約而動彈不得——凍結在既有工廠設施裡的資產過於龐大。無論如何，它們必然曾認真思考建造一座新的整合式鋼鐵生產工廠所需的高昂資金成本。這些成本可能高到即使降低營運支出或增加利潤都無法回收。²⁰

由於美國市場由各家鋼鐵廠瓜分，它們自然能以特定市場預期作為放棄投資新科技的藉口。這種循環特性使市場不致因在舊工業區興建新型整合式工廠而碎裂。舉例來說，1951年業界領袖成功破壞來自產業外部的一項現代化提案——提議在新英格蘭沿海興建一座整合式工廠。鋼鐵業根據的理由是某「獨立」工程公司所做的一項可行性評估。一方面，新工廠只會瓜分巴爾的摩雀角（Sparrows Point）的伯利恆鋼鐵公司（Bethlehem Steel）（也是小說中瑞德·貝克工作的工廠）以及新英格蘭其他小製造商的市場。另一方面，新工廠不可能建立自身維持所需的本地客戶臨界量，因為附近的金屬工廠通常會拆散訂單分給不同供應商。根據一般看法，在現有公司底下設置新工廠會比較便宜。無論是工廠折舊課稅法規、市場結構，還是融資等條件，都對保持現況較有利。新英格蘭建廠計畫從未付諸實現。雖然區

域政治利益團體從「重建金融公司」(Reconstruction Finance Corporation)獲得多筆聯邦建廠補助金，但「新英格蘭鋼鐵開發公司」(New England Steel Development Corporation)的力量卻不足以對抗業界領袖的否決權。²¹

72 1970年代初，在1973年經濟衰退前曾開啟一扇投資現代化的機會小窗。尼克森執政時期，由於進口限制及貨幣貶值，使美國製造商對國內市場的控制程度提高。伯利恆鋼鐵總裁路易斯·弗伊(Lewis Foy)將位於印地安納州伯恩港(Burns Harbor)相對較現代的廠房予以升級。美國鋼鐵總裁艾德格·史匹爾(Edgar Speer)則宣布該公司計畫在俄亥俄州康尼奧特(Conneaut)蓋一座大型新鋼鐵廠。但金融機構阻止了這些計畫。伯利恆鋼廠的計畫飽受商業媒體批評。康尼奧特計畫在多項可行性評估中均得到負面評價，導致美國鋼鐵無法籌得建廠所需的40億美元。或許金融業不希望鼓勵它們從多角化經營的試探，再回到專營鋼鐵廠的老路。即使在1970年代，美國鋼鐵公司已有一部分營收(當時大約是40%)來自鋼鐵以外的事業。²²

當現代化步履維艱、進口又持續增加時，鋼鐵公司面臨弔詭的週期性產出短缺。在一個片斷化的政治環境中，它們喪失對產品和資本市場的控制，導致它們修改對抗勞工的策略。這項策略在戰後的1946年、1952年、1956年和1959曾引發多次罷工。然而自1960年起，大型工會化公司以昂貴的代價，與美國鋼鐵工人聯合會就工資和福利等方面達成和解。但在降低每噸鋼鐵所需的工時方面，它們仍無法與外國公司——尤其是日本公司——並

駕齊驅。美國鋼鐵業者之所以未改變工作規定，或許是因為預感這會引起勞工抗爭。事實上，1970年代初期，鋼鐵和汽車業經歷一波自發性及計畫中的地方性罷工。鋼鐵工人聯合會內部既有的領導權，面臨一般成員的激烈挑戰。

就爭取勞工福利的角度而言，這段時期來得真湊巧。契約正好在進口競爭減輕而鋼鐵需求增加的時刻期滿。再者，在1959年長期大罷工後，鋼鐵工人聯合會領袖因獲得全國性集體薪資協定而享有新的正當性。管理階層和工會領袖雙方發現，透過「人力關係」(human relation)的方式獲取長期和平，對勞資雙方都有好處。1973年，鋼鐵公司和工會採用「試驗性談判協議」(Experimental Negotiating Agreement, ENA)，禁止鋼鐵業的罷工行動。這段期間，鋼鐵工人享受了繁榮的果實。1968年到1983年這段時間，鋼鐵業時薪的增加速度比任何其他美國製造業都來得快。不過，薪資和紅利並未反映對市場的實際控制，國內鋼鐵公司在這段期間越來越仰賴政府的進口限制。²³

73

到了1970年代，全球鋼鐵市場使本國產業失去自主性的事實更加清楚明確。獲利率下降，於1977年降至最低點。各地生產勞工的時薪雖然都增加，但總有其他地方更為低廉。最重要的是進口品在美國市場的占有率越來越高，包括所有鋼鐵產品，從管建用的結構鋼和鋼板，到汽車和電器用的冷軋和熱軋鋼片，以及於用途廣泛的鋼條。²⁴ 鋼鐵業者成功遊說政府採取進口管制，但仍因政府的新限制而承受打擊。他們不喜歡1973至1974年間尼克森總統領導下的共和黨政府實施的價格控制，也厭惡需要使

用昂貴設備的汙染防制規定。某種程度上，鋼鐵生產競爭性的國際化，對各國鋼鐵業帶來相同的限制。即便是在日本和西歐，傳統煙囪工業區都必須想出新辦法，以求在全球市場文化中延續既有的生活方式。²⁵

但外國鋼鐵業者選用的策略，在美國則因政治和意識形態而無法施展。例如想藉公司合併、整合設施來節省開銷（這是鋼鐵業向來的主張），就必須接受美國司法部嚴格審查，而且往往因違背反托拉斯法而遭駁回。另一方面，政府以股權或直接投資挹注資金，又會被業者和政治人物以違反自由企業原則拒絕。就算是政府的現代化融資貸款，也得不到無條件支持。美國商業部（Commerce Department）和美國住宅暨都市發展局（HUD）對這件事各吹各的調。商業部向來不贊成提供類似貸款，而大鋼鐵公司會反對，則是因這類貸款協助較小型的公司。在這種情況下，以協商總量管制（1968年）及「觸發」（trigger）價格（1978年）為基準的控管方式，代表減緩進口競爭的最低成本解決方案。²⁶ 有些人痛批鋼鐵業者過度依賴聯邦政府，站在勞工那邊的人則指責企業經理人不夠現代化、不重視行銷或生產品質、漠視顧客服務，以及定價無法和外國業者競爭。²⁷

最後，金融業界也有共識：如果美國鋼鐵業者堅持繼續生產鋼鐵，這些企業就鐵定沒希望。鋼鐵利潤受到需求景氣循環、進口、汙染控制及龐大負債的限制。根據金融智慧，必須採多元化經營才有出路，如美國鋼鐵公司早就針對相關領域從事多方面投資。但要採取這種策略，鋼鐵業者必須進行制度性改革，將工業

的物質力量轉化成金融權力。而這得靠運氣。位在傳統鋼鐵核心區的匹茲堡國家銀行（Pittsburgh National Bank）副董事長就曾說：「鋼鐵男兒是優良的工業家而非生意人，移動山岳比賺錢更能引起他們的興趣。」²⁸

國家鋼鐵公司

如果華爾街無法改變鋼鐵業，那麼就改變鋼鐵男兒。金融資本可以藉由低獲利率、消失的股利，以及相對稀少的投資資金影響鋼鐵經濟的國際化。這一定會造成產業最上層的變動。多年來，一直被金融和政治圈評為「傲慢、目光如豆，或根本就是無能」的主要鋼鐵公司管理者，現在全換了一批新執行長。為了維持董事會（對華爾街放款人和投資客負責）對他們的信任，這些執行長必須將業務重心從生產轉移到財務。從某些觀點來看，即使鋼鐵大王也一直過於在意經營淨損益。不過，換掉執行班底，思考觀點也就跟著變了。現在，鋼鐵業者理當藉由降低對鋼鐵的承諾來提升利潤率。

1980年的美國第四大整合型鋼鐵生產公司「國家鋼鐵」（National Steel），新執行長是擁有哈佛企管碩士學位的銷售主管，出身保守的鋼鐵和汽車製造圈的霍華·洛夫（Howard Love）。他的父親曾是國家鋼鐵公司副董事長及克萊斯勒汽車董事長，後者是國家鋼鐵的大客戶。洛夫一輩子都在國家鋼鐵工作。他的同行美國鋼鐵公司的大衛·羅德瑞克（David

75 Roderick) 及伯利恆鋼鐵公司的唐納·特羅萊因 (Donald Trautlein)，都各自從公司會計部門爬升到執行長的位置。商業報導一般認為這三個人替這個產業帶來全新的財務觀點。²⁹

1980 至 1981 年間，洛夫擔任執行長的第一年成就非凡。他成功說服威爾頓 (Weirton) 工廠的工人放棄獎勵工資，未因此激起罷工事件。威爾頓廠的工人自厄尼斯特·威爾 (Ernest T. Weir) 時代起就有獨立工會組織，工資高於美國鋼鐵工人聯合會旗下其他廠的工人。洛夫的其餘計畫可能是以大衛·羅德里克的生涯為模型。羅德里克下令針對關廠做可行性調查，藉以鋪設自己在大公司的升遷之路。這項調查導致美國鋼鐵公司旗下 15 家工廠永久或暫時關閉，並裁減將近 13,000 個工作機會。洛夫也宣布國家鋼鐵公司未來將採取多角化經營及減資策略，希望藉此提供股東優厚股利。但他曾公開表示遺憾，認為國家鋼鐵公司的這項策略「晚了五年」。

然而，國家鋼鐵公司的財務策略最後還是導致 1982 年威爾頓工廠的關閉計畫，以及 1984 年出售底特律分公司大湖鋼鐵 (Great Lake Steel) 的提案。當然，威爾頓是該公司的歷史核心。該廠提供四分之一的企業總營收，卻沒人認為它可以吸引任何買家。相較之下，大湖鋼鐵公司的設備效率較高 (以美國標準而言)，加上位於中西部的有利條件，吸引了外國買家日本鋼管公司 (Nippon Kokan)，一家希望在北美建立生產據點的大型日本鋼鐵製造業者。國家鋼鐵的多角經營策略很快就有了收穫。1983 年時，該公司的年產能已由 1,200 萬噸減至 600 萬噸，

並從原有的 16,000 名員工中裁員 5,000 人。當時，國家鋼鐵是所有美國大鋼鐵企業中唯一發布營運獲利的公司。重要的是，這是 1932 年以來國家鋼鐵員工人數最少的時候。洛夫在不引起社會騷亂下帶領該公司走出鋼鐵領域，這種能力令華爾街印象深刻。到了 1984 年，鋼鐵占國家鋼鐵公司的營收比率由原本的 80% 銳減至不到一半，洛夫被譽為「令人目眩神迷的資產洗牌者」。1986 年，國家鋼鐵再次追隨 USX（原為美國鋼鐵公司）的腳步，將公司名稱變更為：國家集團公司（National Intergrupp）。³⁰

國家鋼鐵公司在鋼鐵業界打滾的最後幾年，值得進一步細究。該公司管理階層於 1981 年年度財報中，描述常見的公司資本投資不足狀況。該公司的工廠支出預算只有 13 億美元，主要用於汰換既有設備及執行強制性環境控制。投資「短缺」金額約 3.6 億美元。此外，該公司似乎也不曾為開發新市場或新產品真正付出心力。國家鋼鐵的確宣布該公司將自 1982 年起，提升對底特律汽車業客戶的技術支援服務。但有鑒於扁鋼的前景實在黯淡，這想必只是種迎合潮流的姿態。國家鋼鐵也並未努力增加出口。在全部出貨中（主要是來自威爾頓的錫製品），只有 1-2% 運往海外市場。不但如此，國家鋼鐵和其他鋼鐵公司一樣，都不肯在研發上花大錢。該公司 1979 年、1980 年和 1981 年的研發經費都只占總營業額的 1% 左右。再者，國家鋼鐵跟其他同業相同，在非鋼鐵投資方面呈現散漫的實驗模式。國家鋼鐵與其他幾家鋼鐵公司，自 1951 年以來即聯手從事小規模的煤炭行銷，1960 年代中期起涉足鋁生產，1970 年代起也透過鋼鐵服務中心（亦即批發

分銷點) 經銷一些產品。此外，國家鋼鐵亦宣布有意在歐洲建一座鋁箔紙製造廠，並資助石油和天然氣探勘活動。

一旦跨出傳統重工業領域，該公司似乎變得較有活力。1980年，國家鋼鐵以 2.41 億美元現金買下加州聯合金融公司 (United Financial Corporation of California, UFC)，搖身變為金融服務提供者。加州聯合金融公司於 1981 年再收購位於紐約和邁阿密海灘的兩家儲蓄貸款機構，規模頓時加倍。同年，根據國家鋼鐵的年度財報，該公司的長期負債權益比由 36% 下降至 31%。³¹

當國家鋼鐵逐漸擺脫鋼鐵製造業包袱時，公司甚至開始轉虧為盈。挾著將大湖鋼鐵公司賣給日本鋼管公司所得的 300 萬美元，與另外 300 萬元的租稅抵減，國家鋼鐵更積極地尋找併購對象。但 1985 年管理階層提供給股東的併購交易，是由規模較小的加州製藥公司伯根布魯斯威格 (Bergen Brunswig) 接收國家鋼鐵，以交換該製藥公司的股份。根據霍華·洛夫的說法，這項併購案目的在於阻止萊卡迪亞公司 (Leucadia National Corporation) 惡意併購國家鋼鐵的企圖，前者是一家作風強勢的投資及保險合夥公司。*

77 伯根布魯斯威格最後退出併購交易，但洛夫在與萊卡迪亞的委託書爭奪戰中採取防禦策略，讓他和衛斯瑞公司 (Wesray)

* 根據下一章麥克勞斯鋼鐵 (McLouth Steel) 的故事，該項併購案一項有趣的特色，是交易中包含一項「金櫃」(Golden Casket) 提議，即提供高額死亡給付作為財務誘因，說服國家集團公司董事長兼總裁霍華·洛夫未來十年繼續留任新公司伯根國家公司 (Bergen National)。

形成股權結盟。衛斯瑞是美國前財政部長威廉·賽蒙（William Simon）成立的私人投資公司。國家鋼鐵在這項交易中取得德州原油運輸公司帕米爾企業（Permian Corporation），對價則是國家鋼鐵將部分既有股份及大量新發行股票的選擇權讓予衛斯瑞。1986年該項交易完成後，衛斯瑞持有國家鋼鐵14%的股份並拿到11席董事中的2席。運作過程中，國家鋼鐵另將經營狀況良好的全國第一金融（First Nationwide Financial corporation）81%的股權賣給福特汽車公司（Ford Motor Company）。福特則表示這項收購可以與其汽車本業相輔相成。³²

擺脫鋼鐵生產的局限，意味著與金融圈的關係更緊密。從這個角度，國家鋼鐵與被它拋在後面的鋼鐵城有截然不同的經驗。

地方社區

1980年時，鋼鐵工業的問題有兩項重大改變。這些問題首次被描述成「結構性」問題，而非由週期性「衰退」所造成。另外，產業問題也趨於個別化，過度依賴瀕於破產的單一產業的鋼鐵生產區域和城鎮，因此注定要沒落。³³受到關注的焦點位在中西部的鐵鏽帶（Rust Belt）。這塊地區中的破落地景，集中於俄亥俄州莫農加希拉（Monongahela）周圍的鋼鐵山谷、俄亥俄州與賓州西南部的馬洪寧（Mahoning）河域、紐約州的水牛城（Buffalo），以及印第安納州西北部沙丘區。相較之下，北方大湖區的鋼鐵城由於占據策略位置，得以保有某些程度的凝聚力。

這些城鎮所在地接近鐵砂礦床，交通便利，又離海港夠遠，進口競爭的壓力較小。儘管蒙谷（Mon Valley）一帶的社區因美國鋼鐵業長期對現代化投資不足而垮掉，大湖區一帶鋼鐵城的前景看來卻還沒那麼慘澹。³⁴

1977 到 1980 年之間，鋼鐵公司關閉了 5% 的產能。老舊過時的工廠多半集中在少數地區，但關廠對它們仍造成重大打擊。位於賓州康斯赫肯（Conshohocken）的艾倫伍德鋼鐵（Alan Wood Steel）結束營業。伯利恆鋼鐵公司關掉賓州詹斯鎮（Johnstown）及紐約州水牛城附近拉卡瓦納（Lackawanna）的工廠。美國鋼鐵公司減產，並關閉加州托倫斯（Torrance）的工廠。俄亥俄州楊斯鎮（Youngstown）則失去楊斯鎮鋼鐵公司（Youngstown Sheet and Tube，屬於萊克斯公司〔Lykes Corporation〕的一部分）、美國鋼鐵公司，以及才剛合併的瓊斯與拉弗林公司（Jones and Laughlin）和 LTV 鋼鐵公司（Lykes-Temkin-Voigt）的工廠。這些關廠行動對居民造成的效應，充斥於各種商業報導、全國媒體及激進報紙。絕大部分沒事先通知的大規模解僱，導致成千上萬鋼鐵工人失業，使他們的家庭只能依靠失業救濟金，或靠配偶鋼鐵業以外的較低工資度日。家庭爭吵、酗酒、暴力及自殺事件比比皆是。某些報導則指出，失業工人運用職場技術，不斷翻修自己的住家。地方經理人的困境比起生產工人也沒好到哪兒去，他們發現自己在地方菁英中無法再扮演領導角色。就像小說裡「兔子」安格斯壯加入的西賓州鄉村俱樂部，鋼鐵城的菁英機構為了尋求新的資金來源，開始放寬會員

條件，允許以前不被鼓勵申請會員資格的鎮民加入。由於沒有大企業移入高爐投射下來的陰影，許多失業工人最後都轉入服務業或從事兼差工作以謀生。無論如何，他們的收入都變少了，而這提升了對地方社會服務的需求。³⁵

1970 年代末，楊斯鎮代表鋼鐵城面臨的各種問題的精細縮影。楊斯鎮鋼鐵廠混亂的公司所有權狀態，顯示大規模同步關廠的背後有三項因素。企業主操作跨部門的帳目，挪用鋼鐵業資金支應多角化經營的石油和天然氣投資。外地控制則導致對地方的關注淡薄。此外，跨地區投資策略的結果是楊斯鎮的舊工廠飢腸轆轆，資源全被用來餵養其他設施。當地社區也無法有效與企業溝通。注意焦點雖集中在社區對關廠的抗議，但相距遙遠且對立的兩造實在很難有效協商。雙方對地方狀況的認知極為不同。地方社區認為至少有一家工廠還能獲利而得以存活，但企業經營者看事情的角度卻截然不同。³⁶

楊斯鎮地方社區的失望情緒，最後轉化成地方行動。抗議關廠的草根行動發展成新的社區動員形式。最初長期的「搶救我們的工廠」（作為生產工具）的行動，最後變成「拯救我們的山谷」（作為消費工具）的努力。這些行動超越地方工會的組織限制。組織「社區」意味著動員失業和退休的生產及維修工人、地方管理幹部和業務人員、小企業主、地方和區域銀行、教會團體，以及配偶。以地方文化為基礎的動員行動，發揮的效果大於經濟或職場的關聯。這些反對關廠的社區動員展現風土的力量，令人回想起 19 世紀和 20 世紀初工會合法化以前的大罷工。

雖然獲得激烈批判政府及資本主義經濟的人士支持，但地方社區鮮少攻擊資本主義體制。在靠近賓州匹茲堡的蒙谷，工人確實曾因地方銀行未從事地區投資而加以抵制。地方社區抗議關廠的和平行動，獲得幾乎所有楊斯鎮民選官員支持，不論黨派。不但如此，地方和區域性國會成員、「都市」利益代表者，以及全國性的自由派政治人物，全都有志一同，聲援楊斯鎮鋼鐵工人。

但是位居要津的官員——民主黨總統吉米·卡特（Jimmy Carter）、美國鋼鐵工人聯合會領袖，以及城市政治人物等——都無法或不願意表達對鋼鐵城的支持。他們在楊斯鎮危機中袖手缺席，與白宮、財政部和美國汽車工人聯合會（United Automobile Worker's union）在大約同時期的克萊斯勒（Chrysler）紆困事件中扮演的關鍵角色形成強烈對比。³⁷

鋼鐵業結構性危機的全新認知，雖然對官方介入的形式和程度必然有影響，但其他因素也很重要。以楊斯鎮而言，地方社區生存之潛在制度性支撐的各個元素裡，有些太弱、有些又太強。勞工是以社區擁有鋼鐵廠所有權為目標而緊密團結，但不論聯邦政府或地方政治組織顯然都無法接受這點。此外，當社區反關廠抗爭發展成對企業控制權的進一步挑戰時，全國各地的希望火把都被點燃。也正因如此，它在那些能促使其成功的人和制度面前無法建立正當性。³⁸

這背後的理由頗具啟發性。坎貝爾工廠（Campbell Works）是楊斯鎮預定關閉的三間鋼鐵廠之一，挽救該工廠的社區自救行動成為聯邦機構間競爭及任務衝突的犧牲品。一方面，國會

指定商業部下的經濟發展局（Economic Development Agency，EDA）負責擔保和提供小企業貸款，但往往受到嚴厲批評，指其不該花錢援助依市場法則應該倒閉的小企業，尤其大企業批評最烈。另一方面，社區導向的住宅暨都市發展局（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HUD）則可透過「都市發展行動補助」（Urban Development Action Grant，簡稱UDAG）計畫，提供小額資金以供經濟發展。然而，HUD一直面臨地方利益團體間的競爭壓力。在楊斯鎮危機中，HUD委託經濟學家卡爾·艾伯羅維茨（Gar Alperovitz），一位去工業化的批判者，從事坎貝爾工廠的社區所有權可行性研究。HUD官員也表示有意在楊斯鎮成立一項過時產業再開發示範計畫。但HUD的權力很快就遭受EDA挑戰。1978年，為因應鋼鐵業的結構性危機，國會針對小型鋼鐵公司設置一項五億美元的貸款計畫，交由EDA執行。然而在國會批評人士不斷施壓，要求對「邊緣」公司保持強硬態度的情況下，EDA對楊斯鎮的立場日趨強硬。該機構將HUD擠走，剝奪後者對UDAG補助款的主導權，並駁回楊斯鎮的申請。

美國鋼鐵工人聯合會挽救楊斯鎮鋼鐵廠的行動也宣告失敗。坎貝爾工廠地方工會反對由社區和工人接收鋼鐵廠，因為帶有「社會主義」的傾向。另一家布萊爾丘（Brier Hill）工廠的好戰派美國鋼鐵工人聯合會地區工會，則未能獲得國際工會組織領袖的支持。坎貝爾工廠抗爭期間，各地方宗教教派聯合組織取代鋼鐵工人聯合會，扮演主要的組織動員角色。但是此聯合組織在兩大教派退出後失去動力：以勞工階級為主的羅馬天主教，還有以

管理幹部為主的長老教會。

地方民選官員也未針對社區和工人所有權提供堅定支持。楊斯鎮的地方民主黨和商業界都反對接管坎貝爾工廠。同樣的狀況也發生在都市化的南芝加哥，那兒有三家鋼鐵廠在楊斯鎮危機後接連關閉，重創地方社區，白人族裔政治人物及地方工會領袖，若非軟弱無能，就是不願改變支持工廠老闆的傳統立場。³⁹

反對關閉美國鋼鐵公司楊斯鎮工廠的社區行動，發展出一種有趣的訴訟策略，也發揮部分作用。該社區控告美國鋼鐵公司拒絕考慮將財產出售給社區的行為，侵犯憲法第一修正案賦予他們的權利。另外，社區還控告公司背信，未遵守在工廠尚有獲利的情況下維持運轉的協議。這場官司的第一回合由社區獲勝，承審法官認為自由企業或市場的權利，與地方的堅定義務之間須保持均衡。在這份觀點新穎的判決聲明中，法官提出他的意見，認為依賴單一產業的社區，應有自己的財產權。這些權利範圍較所有權人的權利更廣泛，且存在時間至少同等悠久。法官指出：「所有發生於馬洪寧谷的事情，長久以來都是因鋼鐵而生，學校因此成立、道路因此建造。所有擴張都是源於鋼鐵。該社區居民的生活和命運都是為了適應這個產業，一切基礎和規劃都植基於鋼鐵這個體制。」⁴⁰

法官繼續表示，社區的權利「也許並非一種財產權，在某種程度上能藉由強迫美國鋼鐵公司留在楊斯鎮來予以補救」，因而承認了資本移動的力量。然而，美國鋼鐵並非全然自主。公司不能就這樣「遺棄」社區，因為兩者之間牽纏交錯的歷史，賦予

社區某種既定權利。這項觀點在上訴中遭推翻。上訴法庭以缺乏前例為由，駁回社區的財產主張。此外，它也駁回背信違約的主張，理由是工人仰賴工廠承諾在獲利的情況下持續營運是不「明智的」。

歸根結底，楊斯鎮的生存並非法律問題。它是一種對既有市場文化的經濟及意識形態挑戰。除非有資本方面的改革，或社區更加努力適應市場規範，否則社區收購根本無法施行。一方面，社區收購須付款給賣家美國鋼鐵公司，但不論美國政府或金融圈都無意提供資金。另一方面，美國鋼鐵並不認為社區收購的想法可以信賴或值得考慮。

然而兩年後，在國家鋼鐵公司更名國家集團公司後，西維吉尼亞州的威爾頓社區因勞工收購計畫而存活下來。當勞工於1984年1月11日買下國家鋼鐵威爾頓分廠時，他們為那個人口26,000人的城鎮保住了約7,000份工作。這是美國鋼鐵業第一次勞工收購案，也是當時最大規模的員工入股計畫（ESOP, Employee Stock Ownership Plan）。這個新獨立的公司威爾頓鋼鐵（Weirton Steel），立即成為全國第九大鋼鐵製造公司。

威爾頓如何維持經濟權力地景？威爾頓、楊斯鎮和南芝加哥都根植於相同的鋼鐵城風土環境。這三個地方的當地社區和工廠都有眾多的白人族裔，其祖父母和曾祖父母來自義大利、波蘭、捷克和英格蘭。此外，這些城鎮也有類似的商人社區，其生存完全仰賴鋼鐵廠的工資。每座工廠都成立工會組織與具有相同生產文化的當地管理階層。威爾頓雖然克服結構性和制度性的阻

礙，成功延續鋼鐵城的生命，但那是因為它接受了糾纏鋼鐵業多時的自主性喪失。這並不是楊斯鎮或南芝加哥獲得的選項——或它們必然會採取的選項。

威爾頓

威爾頓的生存取決於兩項楊斯鎮和南芝加哥缺乏的重要因素：溫馴的勞動力和一位精明的投資銀行家。兩項因素加起來，造就了一個可行的勞工收購環境，以及足可落實的交易條件（無論是公開或檯面下的條件）。至於這對社區的長期發展是否有利，仍有待觀察。⁴¹

威爾頓的工人雖然雙重受限，卻非處於弱勢。在該鎮創建人厄尼斯特·威爾（Ernest T. Weir）的家長式領導下，公司於1930年代成立工會，以防止勞工加入較激進的工人組織，即美國鋼鐵工人聯合會，後者最後成為整個業界的協商代理人。獨立鋼鐵工人工會（Independent Steelworkers' Union）代表威爾頓工人達50年，工廠沒發生過罷工事件，工會一般成員也不曾有意見分歧。這種和諧可歸功於兩項理由，其一是工作保障，其二則是工廠勞動力主要來自相當溫馴平和的勞工階級，這種狀況和南部紡織業城鎮頗為類似。部分威爾頓家庭曾捲入以前的西維吉尼亞煤礦業騷動，但英格蘭和斯拉夫族裔家庭形成勞工階級社區安定的基石。工資是維繫安定的另一個原因，威爾頓工人的時薪高於全國工會成員。為此，他們被附近匹茲堡的美國鋼鐵工人聯合會總部

視為「威爾頓工賊」（Weirton Scabs）。⁴²

威爾頓勞工有能力維持舒適的生活。許多工人享有自有住宅、鄉村狩獵，以及直到 1970 年代以前，一份男性薪資撫養全家的戰後家庭所能享受的一般社交生活。勞工收購前的威爾頓工人每年工資介於 35,000 美元至 45,000 美元，或約時薪 22 美元。兒子通常會追隨父親叔伯的腳步進入工廠工作。1980 年代初，在霍華·洛夫（Howard Love）協商提早退休之前，該工廠僱用約 11,000 名來自威爾頓，以及附近位於俄亥俄河對岸，俄亥俄州斯圖本維（Steubenville）的員工。

威爾頓和上俄亥河谷城鎮似乎都不是後工業結構轉型的合適候選者。整個收購期間，西維吉尼亞州的失業率高達 19%，是 50 州中最高者。煤礦開採（前景不看好的工業）在大地留下傷痕，周遭城鎮堆滿礦渣。斯圖本維西邊不遠的購物中心，吸走該鎮與威爾頓的大部分商業活動，剩餘的主要是一些小餐館、咖啡店及銀行。威爾頓分廠是州內最大僱主，收購前的員工約 7,000 人。簡言之，威爾頓鎮代表典型的工業地景。鋼鐵廠那四座高爐的煙囪占據大街的一頭，過了橋，從俄亥俄河的另一邊看去，工廠聳然俯視著整個城鎮。

上俄亥俄河谷的社會雖由工業塑造而成，但這種影響力在過去 30 年來逐漸衰微。與大多數舊工業區一樣，勞動力的職業和性別結構已經轉變。1960 年時，在威爾頓和斯圖本維的工作人口中，有超過 47% 從事製造業，但到 1970 年，只有 43% 的人從事工業相關職業，1980 年更只剩下 39%。再者，同一段時期內，

男性就業人數下降，更多女性則加入地方勞動力的行列。1970 至 1980 年間，女性占威爾頓和斯圖本維就業人口的比例，由 25% 上升至 35%。不過，大部分女性從事的是緩慢成長中的健康照護和教育類工作。儘管整個職業結構向服務部門工作略微偏移，但管理和專業人員卻很少，只占勞動力約 5%。金融、保險和不動產業工作就更少了，僅約 3%。不過，技術員、銷售員、辦事員及其他服務業勞工則穩定增加。這種朝向較低階服務業工作變動的趨勢，與地方勞動力的局部女性化，以及工業勞動（技術和非技術工人）的相對和絕對降低同時發生。⁴³

在這樣的地景中，可以從兩個不同角度來看待勞工收購鋼鐵廠一事。從民粹主義觀點來看，這是「美國獨特神話的一部分——一部如同法蘭克·卡普拉（Frank Capra）《風雲人物》（*It's a Wonderful Life*）的電影……居民在災難發生時團結一致，挽救他們的小鎮」。這種景象包括七月四日當天沿威爾頓大街表達支持收購工廠的遊行示威隊伍，其宣傳價值受到工會的投資銀行拉扎德（Lazard Frères）高度肯定。⁴⁴ 但以另一種較具衝突性的觀點來看，勞工收購是自相矛盾的主張。透過收購其雇主，勞工否定他們身為生產者的階級利益。勞工用以收購和經營自有工廠的資本，仍然來自向金融圈借來的資金。管理階層繼續掌控日常營運，也依舊主導利潤再投資的決策。尤其當大多數美國勞工收購案都強迫在薪資上讓步，成立非由工人股東控制的董事會，以及仰賴當地社區的跨階級支持時，勞工收購形同出賣勞工權益。⁴⁵

威爾頓收購既避開了、也重複了這些模式。這項收購案從一開始就是 1980 年代企業重組熱潮下的產物。不過，資本移動的需求雖然迫使其他公司步上減薪、出售資產、裁員，以及投資銀行或經理人槓桿收購之路，威爾頓的勞工卻設法利用這些壓力，既不喪失自尊，又保住工作。在新的所有權底下，威爾頓甚至推翻國家鋼鐵公司時代的削減資本支出措施。參與威爾頓收購的麥肯錫投資公司（McKinsey and Company）管理顧問在談到威爾頓進行這次全盤重組，一方面降低成本結構，又讓國家鋼鐵擺脫固定投資的重擔時，表達他的敬佩：「他們完成了大陸航空（及許多其他公司）一直想做的事。」威爾頓與其他公司既相似、又有所不同。儘管新威爾頓是 1980 年代第一批強制大幅減薪的鋼鐵公司之一，卻也是第一家透過勞工收購方式這麼做的公司。如同其他領域中的管理階層槓桿收購，這次勞工收購立即造成管理階層和地方工會領袖大換血。但和其他企業重組不同，這次行動的結局大致稱得上圓滿。

威爾頓會獨特，在於它找到了中庸之道：根據「同等犧牲」（equality of sacrifice）* 的原則擬定公司復興的大策略。整個收購過程中的經濟和政治策略是關鍵。一方面，威爾頓的重組必

* 大多數美國人都知道這個詞彙是李·艾科卡（Lee Iacocca）在遊說聯邦政府提供克萊斯勒公司貸款保證時所用，最早是費利克斯·羅哈廷協助 1975 年紐約市政府財政重整時的用詞。因此，這證實這種與自由派民主黨有關的企業重組，其所提倡的「工業政策」（industrial policy）並無廢除私有資本市場的意圖。

須計算如何最有效削減成本。另一方面，從勞工到投資者的態度都要改變，才能讓大多數員工接受新公司的財務政策。某位參與威爾頓收購的威奇法爾與蓋樂葛法律事務所（Willkie Farr & Gallagher）的律師，提到這項雙重策略的發展經過時，認為這次事件對全體參與者都是「一趟重要的教育過程」。一位投資銀行家補充說：「讓工會接受經濟導向，而非工作導向的決策方式，跨出了一大步。」於收購協商開始時當選的工會新主席，也證實了這種從生產者轉為投資者的角色改變，他說：「這是工會頭一遭知道成本這回事。」這意味著分享公司財務資訊是擴大工人視野極為關鍵的一步。⁸

86

與其他大多數收購案相較，這次收購過程曠日費時、繁複無比。必須同時說服勞工和放款者。銷售條款不但包括賣方（國家鋼鐵公司）和買方（新威爾頓鋼鐵公司）之間常見的基本契約，還包括以各種公司治理方案（如員工入股計畫 ESOP、削減薪資和福利的成本控制措施）及透過貸款償還和退休福利擔保等方式，控制參與各方所需承擔的不確定性（尤其是貸方及員工）。無論這些安排有多麼不符合慣例，威爾頓地方的保存允諾要將對潛在市場力量的破壞降至最低。

⁸ 這位主席是因其立場較前任工會主席更貼近收購策略而當選，後來則因支持管理階層重訂 ESOP 條款的計畫而於 1988 年下台。

可行的交易

威爾頓收購案中實際轉手的現金數額不大。新威爾頓公司以1億9,390萬美元，取得價值3億8,620萬美元的舊威爾頓分廠資產，頭期款僅需支付7,470萬美元。第二期分期款4,720萬美元票據於十年後到期，末期款7,200萬美元票據則要再過五年於1998年到期。交易當時的通貨膨脹率頗高，使這些付款條件相對優於銀行貸款，尤其是威爾頓設法拿到基本放款利率加1.5%的優惠利率。放款銀行成立一筆最高1.2億美元的循環貸款基金。條件是新公司同意將第一年營運資金保持在4,000萬美元以上並逐年增加。此外，放款銀行也持有該公司財產和商業資產的抵押權。

收購案的主辦融資銀行是花旗工業信貸銀行（Citicorp Industrial Credit），即花旗銀行在克里夫蘭的分行。聯貸銀行團中還包括匹茲堡及底特律的區域銀行。新公司採取的第一項行動，就是由「循環額度」中提出5,500萬元，支付國家鋼鐵前述款項。另外提領3,500萬元做為初期營運資金。這些貸款安排的一項非凡特色——慮及鋼鐵業老舊工廠的財務前景——就是完全沒有政府參與。不像楊斯鎮社區收購般落得失敗下場，威爾頓勞工收購案完全透過「傳統的」銀行貸款安排來進行。

比較不傳統的部分在於這並非現金交易。由於威爾頓員工的年齡結構偏向於中壯年，退休金是關切的重點。雖然國家鋼鐵積欠勞工總計7.7億美元的退休福利，但該公司實際上僅提撥3.5億美元退休基金。當時正是鋼鐵業退休金制度最為艱難、搖搖欲

墜的時期。其他公司都未認真面對提撥不足的危機——尤其是財務困難的惠靈匹茲堡鋼鐵公司（Wheeling-Pittsburgh）及LTV鋼鐵公司，於1987年申請第11章破產保護^[2]。他們威脅要將聯邦政府基金撤出退休福利擔保公司（Pension Benefit Guaranty Corporation），這是一家退休福利擔保機構。不過威爾頓和國家鋼鐵以交換未來義務的方式自行解決這個嚴重的問題。威爾頓願意承擔國家鋼鐵的1億9,230萬元債務；國家鋼鐵則同意，如果威爾頓在五年內經營失敗，國家鋼鐵就支付退休福利。此外，國家鋼鐵也同意承購一定比例威爾頓生產的鋼板（用於大湖鋼鐵公司），以交換供應其鋼板半成品。

前述條件是否能被雙方接受，或金融機構是否會與楊斯鎮情況不同而願意參與，事先都無法得知。高度的風險與不確定性，使得每個協商階段格外艱鉅也更富戲劇性。正因如此，勞方所諮詢的外聘顧問角色就顯得更為重要。收購的建議一提出，第一個浮出檯面的問題便是該聘用誰與由誰主控？參與各方都心知肚明，經驗豐富的顧問最後有可能會變成駕馭者，反過來控制聘用他的人。顧問聘請事宜由代表買方的共同研究委員會（Joint Study Committee）負責。委員會成員包括工會執行委員及威爾頓分廠管理階層。勞工－經理人委員會的形成，動搖了工廠原本涇

[2] 第11章是美國破產法規中的一章，無論是股份公司或獨資企業或個人，都可以援用此章來重組。此時，債務人受法庭監督管轄，但依然控制其企業營運。相對的，依破產法第7章則是企業停止營運，由信託人拍賣其資產以償還債務，餘款則交付公司所有人。

渭分明的階級陣線。

將威爾頓賣給勞工的想法，顯然是霍華·洛夫撤資策略的結果。這項策略係於1982年3月國家鋼鐵董事會會後對外宣布。洛夫在公開表示將停止對威爾頓的所有投資後，立即前往西維吉尼亞州尋求州長傑伊·洛克斐洛（Jay Rockefeller）的意見。雙方會談後，洛克斐勒同意擔任國家鋼鐵公司協調人，帶著三名助理飛往威爾頓，以州政府經濟發展負責人的身分提供服務。次日，威爾頓分廠總裁瑞萊恩（J.G. Redline）便向工會建議成立共同研究委員會。

透過瑞萊恩，國家鋼鐵董事會告訴威爾頓勞工，董事會有三項選擇。第一，國家鋼鐵可以關閉威爾頓，這條路行得通，但囿於聯邦政府規定，關廠的代價勢必高昂。第二，國家鋼鐵可以出售工廠，但必須找到買家。第三，國家鋼鐵可以設法從工廠榨出現金，或將該廠改成精軋廠，將原有的8,000個工作裁掉6,000個，以維持工廠繼續運作。面對這些選項，工會和分廠管理階層聯手評估勞工收購的可行性。事實上，這也是國家鋼鐵管理顧問所傾向的選項。兩階段的收購程序從1982年3月持續到1983年9月，耗時18個月。第一階段經過幾個月的談判協商後，擬訂共同研究委員會和母公司之間的收購條件。第二階段和最後的步驟則由勞工投票決定是否接受這些條件。

共同研究委員會無法獨自進行決策。國家鋼鐵的管理顧問不但建議該公司出售威爾頓分廠，也建議共同委員會先從聘請自己的顧問著手。他們建議的人選是北紐澤西的律師艾倫·羅文斯坦

（Alan Lowenstein），他曾指導海耶克拉克（Hyatt Clark）員工向通用汽車公司收購該工廠。但羅文斯坦只在威爾頓待了幾週。他遭到解職的原因，對協商及該項交易的未來形式有重要影響。

重要的是，羅文斯坦有意與工會保持距離，表示自己的角色並不是替工會工作。他希望代表的是新公司董事會，自認為應該與洛克斐勒州長一起親自挑選董事會成員。他也堅持新公司需要新的管理團隊，但這些是工會和管理階層無法立即接受的事。不過對工會而言，最難以接受的條件是羅文斯坦提出最後通牒，要求工人就即將透過 ESOP 取得的股票，放棄投票權。羅文斯坦堅持最初十年採取「穿越式」（pass-through）表決（即強制代理），令這段期間董事會享有完全控制權。幾乎同樣令人難以接受的，是他認為公司不需要設置自己的焦化廠（重要的工作來源，成為後來漫長協商的主要議題），以及他建議威爾頓轉型，從鋼鐵廠變成德國帝森鋼鐵公司（Thyssen Steel）的服務中心。對工會而言，最後一根稻草是羅文斯坦沒有完整揭露他與國家鋼鐵公司之間的財務和私人關係。

威爾頓出生的獨立鋼鐵工人工會律師戴夫·羅伯森（Dave Robertson）決定共同研究會必須自立自強。羅伯森拜訪朋友和舊識，依賴自己閱讀商業報導，以及在一趟往返紐約市的旅途中蒐集的各種建議，最後憑藉這些努力，共同研究委員會選擇麥肯錫公司擔任管理顧問，並以威奇法爾與蓋樂葛法律事務所為法律顧問。最後，在某位資訊靈通人士表示「如果你得了癌症，而且願意公開承認，就找費利克斯·羅哈廷（Felix Rohatyn）」之後，

委員會委任拉扎德（Lazard Frères）為其投資銀行。

對威爾頓的生存而言，聘用外部顧問是揮別草根策略的重要關鍵。雖然當地人花了一段時間才消化掉這些「紐約公司」的龐大費用，但這些顧問個別與共同提供整個交易賴以成功的信譽、政治策略和宣傳效果。麥肯錫是聲譽卓著的國際管理顧問公司，很早就建議英國鋼鐵公司降低鋼鐵產能。然而，派赴威爾頓的麥肯錫團隊不但努力維繫工廠生存，也關心美國工業的長期發展。威奇法爾是一家大型公司法律事務所，專精於公司合併與收購。其律師同樣也致力保存威爾頓的命脈。拉扎德銀行本身就是個重要個案。資深合夥人費利克斯·羅哈廷在卡特政府時代成了自由派民主黨工業政策的非官方發言人。從那時起，他鼓吹的國內工業重組永遠包含三項要素：縮小產能、增加資本支出以重建（私有）工廠及（公共）基礎設施，以及促使資方和勞方相互包容遷就。在一個比目前平靜、風險較低的環境氛圍中，羅哈廷所設想的重組，其資金可望來自私人資本市場。同樣的，依他之見，波動較少的資本市場與國際經濟秩序穩定有密切關係。⁴⁶ 雖然羅哈廷本身從未見過威爾頓代表，但他對工業經濟的看法吸引了共同研究委員會。因此，羅哈廷的形像塑造了勞工收購的結果，而且從聘用拉扎德的那一刻起，便賦予其某種輝煌名聲。

拉扎德派往威爾頓的代表曾與羅哈廷共事。尤金·凱林（Eugene Keilin）曾協助羅哈廷於1970年代成立市政援助公司（Municipal Assistance Corporation），管理紐約市財政危機，後來當選新威爾頓公司的董事。喬許·高邦（Josh Gotbaum）曾

在羅哈廷底下工作過一年半，先前於卡特政府時代擔任白宮國內政策幕僚。在那個職務上，他曾經歷過楊斯鎮和芝加哥威斯康辛鋼鐵廠（Wisconsin Steel）事件。凱林和高邦認為，威爾頓的市場機會相當好。該公司素以製造高品質鋼板和鍍鋅鋼產品聞名，在這類產品上的國內市占率相當不錯，足以與美國鋼鐵及伯利恆鋼鐵分庭抗禮。問題在於這些市場持續衰退，新材料迅速崛起、取代鋼鐵。此外，獲利率不高。收購前的十年，威爾頓分廠有七年賺錢，但獲利水準不足以支持現代化。事實上，這十年中有四年，國家鋼鐵曾將威爾頓的資本改良費用挪作其他部門之用。1980年前後，當國家鋼鐵決定停止繼續投資威爾頓時，該分廠的年獲利率約在1%左右（當時鋼鐵業的平均獲利率約為3%）。在以汽車、營建和電器工業為主要客戶的熱軋和冷軋產品方面，威爾頓因結構性衰退而受到接二連三的打擊。一方面，在中西部和海外競爭的擠壓下，市占率下降；連國家鋼鐵都將較多訂單分配給大湖鋼鐵公司，而非舊威爾頓分廠。另一方面，資本財和耐久財的國內市場衰落，也導致威爾頓的潛在市場縮小。⁴⁷

總而言之，雖然沒有其他買家，但拉扎德相信員工開價收購威爾頓，應該能吸引商業放款者。威爾頓工廠的現代化程度應具有足夠的生產競爭力——只不過它還需要大約10億美元的額外資本投資，首先是建置污染控制設備，更換四座高爐的襯裡，並購置第二具連鑄機，以利連續鑄造它生產的鋼鐵。拉扎德也認為，該廠創造的現金流量符合放款銀行的標準。即使如此，無論威爾頓勞工還是其顧問團，都無法承擔沒有放款銀行願意貸款的風

險。誠如某位拉扎德代表指出，挽救威爾頓有三項不利因素：這是鋼鐵廠；工廠剛換管理團隊；它是由員工而非管理階層收購。

儘管拉扎德「打出羅哈廷牌」，而且「極度低調，一再表示悲觀」，以免勞工期望過高，並努力吸引全國媒體報導威爾頓地方社區對工廠的支持，麥肯錫的顧問卻發現擺出戲劇性姿態的必要性。麥肯錫在其可行性研究中，要求工人接受刪減 32% 的財務補償，這是顧問採取的行動中，第一項對勞工產生實質影響的策略。麥肯錫團隊堅持，若不這麼做，新公司根本沒有生機。除了該工廠的具體成本結構、其他鋼鐵製造業者的資本結構，以及威爾頓的市場狀況，麥肯錫的計算還考量了三項策略因素。首先，它以當時業界領導者美國鋼鐵公司為對照標準，估量威爾頓的成本必須相當於美國鋼鐵旗下全體工廠成本結構的最低水準。其次，它認為如果勞工不採取折衷措施，新公司的成功機率比較大；也就是說，它必須避免容易承受的 10% 或 15% 減薪幅度。因為這樣會使存款不足，導致新公司經營失敗。第三，麥肯錫有一項策略，與拉扎德精心策畫以吸引潛在貸款銀行的措施不謀而合，亦即若採取像 32% 這等前所未見的減薪幅度（或譬如從時薪 20 美元減至 14 美元），將可產生驚人的政治效果。它將會讓員工受到巨大衝擊，真正了解自身處境的嚴重性，讓他們更堅定支持勞工收購和新公司。麥肯錫以較客觀的角度替這項減薪提議辯護，因為勞動成本代表「威爾頓各種製鋼成本中，唯一可以控制，且金額大到足以使」現金流和股本基礎「有明顯改善之項目」。⁴⁸

最後塵埃落定時的減薪幅度只有 20% 左右，但宣示減薪 32% 的象徵性效果就如顧問團所籌畫的一樣驚人。某投資銀行便表示：「威爾頓和楊斯鎮的最大差異，就在於前者的勞工願意犧牲。楊斯鎮一案中的可行性研究〔由加爾·艾伯羅維茨所為〕完全不切實際，因為**報告中說工人將不需要做任何犧牲。**」麥肯錫團隊有充分理由自比為威爾頓收購案中的「突擊部隊」。勞工確實以當前的財務利益來交換 ESOP 中的未來權力。但是這項權力高度取決於新公司的生存、有所節制的漸進主義，以及透過適當管道來過濾勞工權益的意願。身為投資者，工會必須透過其參與共同研究委員會的執行委員會來運作，最後則透過在新董事會的三席代表來執行。然而，身為賺取工資者，勞工可以持續經由工會提出要求。

威爾頓初期聘請的短命顧問艾倫·羅文斯坦，原先建議 ESOP 採取穿越式表決。諷刺的是，ESOP 最後的提議就是採取此案，只不過時間限制縮短為最初五年。屆時，ESOP 股票將分配給所有要求配股的參與者，並舉辦一人一票的全員投票，以決定是否將股票開放出售給威爾頓員工以外的任何其他人（亦即，公司是否該「公開上市」）。勞工並未享有直接投票選舉 10 至 14 名新董事會成員的權利。穿越式表決的特色是持有股票的 ESOP 委託人，有權挑選大部分董事會成員。只有三名董事是由工會提名，最後一名董事席位則由執行長兼任。公司可以發行 700 萬股股份，其中 650 萬股將立刻由 ESOP 信託認購，該信託實際上擁有公司。

勞工和僱員持有的威爾頓股份也不相等。雖然拉扎德、威奇法爾及共同研究委員會剛開始都支持股權平均分配，但最後都迫於 ESOP 稅務規定及財務考量，轉而支持根據薪酬水準按比例分配股份。因此，薪資較高的員工——簡言之就是管理階層——分到較多 ESOP 信託股份。薪資階層的影響反映了 1974 年國會立法，將 ESOP 設定為特別類型退休計畫的事實。根據「員工退休所得保障法」（ERISA, Employee Retirement Income Security Act），公司得以其收購 ESOP 貸款案股票所支付的全部金額，抵減公司的應稅所得，但最高抵減稅額不得超過薪資的 25%。這個百分比並不是以薪資總支出計算，而是以最低薪酬為基準。因此，威奇法爾事務所的律師推斷，除了海耶克拉克（Hyatt Clark），威爾頓必須遵循所有其他 ERISA 收購案立下的前例。為了新公司能充分享受 ESOP 的節稅效益，工廠收購也必須是階層式的。因此，威爾頓號召員工的集結點就從原來的同等所有權（equal ownership），轉變為更主觀的同等犧牲（equal sacrifice）。

93

與這些條件相對的則是另一項較正面的「或有條件」（contingency）。只要威爾頓賺錢，且維持 1 億美元淨值，就最快能在兩年後，即 1985 年起開始分享利潤。屆時，勞工可以選擇將 33% 的利潤做為分配紅利。當淨值達到 2.5 億美元時，分配紅利最高可以達到利潤的 50%。就 ESOP 而言，這是相對優渥的利潤共享條款，有助於減輕員工對麥肯錫減薪提議的不滿情緒。

即使訂有這些極度複雜的保證條款，要吸引商業貸款機構

仍不是件容易的事。地方社區公開支持的宣傳效果十足，幫助極大，尤其是拉扎德強調地方踴躍捐款，用以支付該銀行超過 100 萬美元的顧問費用（一小部分，約 12.5 萬元是由西維吉尼亞州經濟發展局支付；州長傑伊·洛克斐洛在州政府編列該筆款項預算前曾親自給予保證）。與多家銀行不斷協商的結果，終於由花旗銀行旗下負責槓桿收購和資產擔保貸款的單位，承諾提供大部分貸款。但根據另一家參與協商的商業銀行表示，花旗之所以承接本案「是基於公共關係的因素」。這位銀行家表達擔憂之意，表示他自己的區域銀行可能會因借錢給威爾頓「而惹上麻煩」。無論他是在表達銀行的審慎，抑或傾向於追隨國際經濟權力的潮流，他認為工業貸款應支持全球自由貿易體制。在他看來，這個時候「韓國的就業比威爾頓更重要」。

但銀行之所以接受威爾頓交易，確實有充足的財務理由。如同所有其他較具風險的狀況，他們堅持貸款必須有資產作擔保。他們密切注意違約「控制」措施，一旦有狀況發生即可取得該公司資產——現金、建物、原物料等——而安全脫身。短期而論，銀行要求每日提供現金流量數據報告。如果現金流量低於商定的水準，銀行可以宣布沒收貸款。長期而言，銀行獲得的保證包括對勞工的控制：尤其是不罷工條款和勞動契約效期內的薪資凍結。最重要的是，集體薪資協定在新公司的頭六年內雖然有效，但貸款期限只有五年——確保勞動條件在貸款有效期限內都維持不變。最後，貸款給 ESOP 對銀行絕對是門好生意。根據 1984 年（也就是收購案投票後不久）由國會通過的「縮減赤字法案」

(Deficit Reduction Act)，銀行可以由應稅所得中扣除 50% 的 ESOP 貸款利息收入*。

大多數勞工發現，比起反對勞工收購而冒退休金縮水或丟掉工作的風險，這些條件好得多了。全國新聞報導拍攝當地民眾（美髮師、靠退休金過活的人、失業勞工的妻子等）上街遊行，高舉「我們做得到」的標語，表達對收購的支持。但自 1982 年 3 月霍華·洛夫力勸威爾頓勞工買下該工廠起，到 1983 年 9 月收購案付諸投票為止這段期間，相對於社區幾乎一面倒的支持，勞工方面卻充滿不確定性與異議，甚至對共同委員會進行法律訴訟。

一個稱為基層委員會 (Rank-and-File Committee) 的異議團體，在斯圖本維的民眾住家和一個社區法律服務辦公室裡成形。這個 15 人團體包括白人和黑人勞工，以及已被資遣的生產工人和仍就業中的勞工。他們在整個一年半的收購案討論期間，不斷表達對收購流程的不滿，對於地方管理階層及工會的憤怒，並嚴辭批評種族主義、政客及資本主義體制。他們知道所有的全國性宣傳已讓他們處於一個舉足輕重的核心位置，而更加深信勞工收購對勞工階級而言無異於「政治自殺」。誠如某位在鋼鐵廠澆鑄台工作的成員所言，他們不介意被形容成激進分子，但共同研究委員會及其他外部顧問卻視他們為一小撮不肯妥協，在假議題上爭執不休的異議分子。

* 延續 1974 年 ERISA 的前例，本法案也將持有 ESOP 信託股票的股利收入從公司稅中排除，並針對多種 ESOP 可能進行的股票轉移給予租稅優惠。

95 成立基層委員會是要對三項策略性觀點表達反對意見。他們要對工會放棄與國家鋼鐵和分廠管理階層的對抗立場表達失望。他們也認為應該對 ESOP 進行更多的批判性討論，少些啦啦隊式的社區動員。如果 ESOP 通過，他們希望能確保邊緣勞工——亦即被資遣及可能提早申請退休的勞工——的最大福利。此外，基層委員會呼籲在最後公決收購案前途以前，先辦理全體勞工的初步投票。他們要求財務數據和預測資料的揭露更公開——尤其是麥肯錫據以計算出 32% 減薪幅度的獨門工業分析模式。基層委員會認為勞工在這項交易中吃了大虧：用過高的價格買下國家鋼鐵的舊資產，讓國家鋼鐵輕鬆擺脫退休金支付的義務，並且放棄太多薪資和福利。

一位成員表示，委員會的「主要做法是讓工人獲得更多資訊」，以及藉由訴訟官司拖延收購程序。這種作法不但挑戰共同研究委員會的策略，也使原本就已曠日費時的收購程序拖得更久。某位法律顧問回憶，在 1982 至 1983 年期間，總計在工廠內舉辦了 55 次說明會和討論會，另有一次在大型活動場所舉辦。這全都如異議團體所暗示的，最後醞釀形成共同研究會安排的單一結局：1983 年 9 月收購案的最後表決。

異議團體的三次訴訟及上訴全都敗北，他們卻自認在政治議題上獲得勝利。在葛萊格利對畢許 (Gregory v. Bish) 一案導致收購案的投票權擴大，被資遣的勞工有權被召回工廠參加投票。另一案包曼對畢許 (Bauman v. Bish) 則達到要求麥肯錫更公開揭露資料的宣傳目的。第三項吉連對畢許案 (Gilliam v. Bish)

則牽涉新集體協商條款的完全揭露——雖然華特·畢許（Walter Bish），獨立鋼鐵工人工會當時的新主席，以及律師戴夫·羅伯森表示新協定尚未就緒，還不到提供審視的時候。但工會在提起訴訟後就發布一份達30頁的契約修訂提案說明。

其他訴訟——由工人薩頓（Sutton）、布魯諾（Bruno）和達希爾（Dahrer）個別提起——則直指退休金問題的核心，因為這對工會和非工會勞工都有影響。多年來，國內鋼鐵業在特殊經營狀況下，對退休福利一直都接受兩種資格規範：「70/80規則」及「65規則」。這兩種規則有可能提高退休福利，或在工作被裁員時提供退休福利——但只適用於關廠情況。根據70/80規則，受僱者可將年齡加上服務年資以提升其資歷。根據65規則，則整個工廠，甚至某個部門關閉時，屆退休年齡勞工可以獲得全額退休金；因這些狀況而導致就業中斷的受僱人，每月可獲得400美元的停工補助津貼，直至62歲為止。因此，在收購之前已接近退休年齡的威爾頓工人，希望離開該公司——但必須是該工廠的出售在法律上被視同關廠的情況下。由於大約有3,000名員工的年齡和年資符合70/80規則或65規則的退休條件，這項訴訟對新公司脆弱的財務資源是一項嚴重隱憂。然而，所有原告在這些訴訟與上訴官司中同樣全數落敗。

1983年9月，威爾頓員工以七比一的差距通過收購工廠。誠如大多數的企業重組，第一步就是開除原有分廠的總裁。他們決定前執行長應就現場勞資關係不佳負責，而且一般認為他過度執著於威爾頓傳統上偏保守的行銷策略。新董事會挑選俄

亥俄州瓦倫（Warren）的科伯韋爾鋼鐵公司（Copperweld Steel Company）前執行長羅伯·朗赫德（Robert Loughhead）擔任新執行長。朗赫德上任後立即推動「參與式」管理風格，大致延續威爾頓收購活動的精神，並符合當時全國重工業界邁向合作式的勞工－管理階層生產委員會的趨勢。朗赫德的另一項創新措施是招募生產工人，對潛在客戶從事商務拜訪。他甚至設了一支熱線電話，專門處理工人申訴。

儘管有了新的管理風格、工人主導的 ESOP，以及削減勞動成本的共識，工會仍需面對 1980 年代常見的各種就業議題的艱難協商。誠如戴夫·羅伯森所言，由於工作分類並未改變，仍有許多「薪資擠壓」（salary compression）的狀況。此外，工作規則也依舊是最敏感的談判領域。威爾頓勞工深知鋼鐵業到處都在裁員，而根據他們採納的麥肯錫報告書，他們必須繼續比競爭對手削減更多成本。因此，工作規則的變動更須戒慎小心。根據 1984-1989 年的集體協商條款，如果管理階層廢除一份有四名在職者的職務時，必須提供工人提早退休的機會。工會有權就工作規則的改變要求交付仲裁。不過，這些規則以及如 70/80 規則等全國性規範雖保持不變，工會卻沒把握在員工人數或職務廢除等議題的廠內談判上獲勝。實際上，自 1980 年以來，工會也未曾在工作規則變更案件上贏得任何一次仲裁。

威爾頓勞工面對的另一個重要問題，是推動現代化的資本投資。一般而言，威爾頓管理團隊計畫在頭五年盡量節省營運支出，以便每年投資 1 億美元（在國家鋼鐵經營的末期，對威爾頓

的投資每年只有 3,400 萬美元）。該公司必須採購符合聯邦汙染防治規定的新設備，並將熱軋鋼廠現代化（光這項就得花費 2.25 億美元）。此外，為了與伯利恆鋼鐵和內陸鋼鐵的現代化計畫抗衡，威爾頓最初還打算花 2.5 億美元添置第二具連鑄機。但當羅伯·朗赫德於 1987 年下台，由赫伯·艾利許（Herbert Elish）繼任後，新執行長決定升級機齡 20 年的舊鑄機，省下 80% 的經費。另一項決定則關係到是否重新啟用威爾頓焦化廠（如此可恢復至少 300 個工作機會）還是要從海外進口較廉價的焦炭。

威爾頓的重要目標之一是建立股本基礎，藉以吸引未來貸款，並提供 ESOP 投資報酬率。麥肯錫預測必要的股本或淨值是 2 億美元。然而當該公司淨值於 1988 年達到 2.5 億美元時，50% 利潤分享的協議開始生效。每位工人的平均紅利達 9,000 美元，管理階層認為在亟需資本支出的情況下，這種程度的利潤分享實在不合理。綜合這些因素，加上公司有義務買回工人可能有意換現的股權，導致艾利許管理團隊出其不意地提議變更 ESOP 條件。艾利許執行長自 1984 年起便擔任董事會的外部董事，他堅持停買新連鑄機來減少資本支出，也建議將利潤分享比例降至 33%，並將 20% 的股權於公開金融市場發售。最後，管理階層希望以遇缺不補的方式裁減工廠現行 8,000 名員工的 12%。

這類經營問題如資本支出、行銷，以及開發足以和塑膠及鋁製品競爭的靈活產品線等議題，現在成了勞工—管理階層協商的重點。這些議題將身為投資人的勞工與工廠緊緊相連。然而身為受僱者，勞工並未享有永久的工作保障，對管理決策也缺乏控制

權。任何意圖解決該公司經濟問題的嘗試，都讓它與私人市場力量的關係更緊密。尤其該公司一直都很依賴金融市場，而拉扎德也持續擔任公司顧問。

這些外部顧問全都讓威爾頓的勞工知道給予金融社群「保證」的重要性。對於鋼鐵工業持續投資及繼續犧牲的效力，卻沒有任何保證。

新威爾頓公司能否維持滿足放款銀行的營運資本並不致滅頂？

管理團隊是否會利用其日常營運控制權開除工人，或破壞這些工人身為生產者和工資賺取者的權益，藉以滿足他們身為資本投資者的利益？

工人是否會提出明知可能嚇走金融機構的要求？

如果威爾頓最後營運失敗，工人的退休金會如何？

如果工人逐步出脫大部分的 ESOP 股份，將會對勞工—管理階層的合作關係及生產力會帶來什麼影響？

在區域脈絡裡，西維吉尼亞（飽受煤礦、玻璃和化學工業裁員之苦）會不會因州內最大僱主威爾頓裁員而被壓垮？

新鋼鐵地景

1983 年威爾頓收購案付諸表決時，薪資折讓已成為業界常規，也沒有任何其他規劃中的勞工收購案件。兩年之內，國家集

團公司幾乎完全自鋼鐵製造設施撤資；大湖鋼鐵廠主要是由日本人經營。而此時，美國鋼鐵公司及威爾頓公司都從海外進口鋼板半成品。這些狀況顯示美國鋼鐵製造業者的自主性已極為有限。

然而，威爾頓的結局尚稱圓滿，在勞工自行擁有下，該公司第一年獲利相當可觀。威爾頓成了僅次於美國鋼鐵，業界獲利第二的鋼鐵公司。1985年達到提升淨值至1億美元的目標——開始分配年獲利的33%。在那之後，該公司年年獲利，淨值於1988年達到2.5億美元。⁴⁹

威爾頓的獲利與國家鋼鐵的失敗形成對比。國家集團在1983和1985兩年確實獲利，後者主要歸功於石油和天然氣投資（由於收購了二疊紀〔Permian〕公司）。然而，此後的多角投資策略——先是金融服務，接著是石油和天然氣，最後則是藥品批發經銷——已導致獲利縮減到零，債台高築。霍華·洛夫此時已不是董事長，但還是公司執行長，而一位與洛夫沒什麼關係的外部董事——西屋公司（Westinghouse）的前董事長——成了所有企業決策最嚴厲的「內部」批判者。國家集團一直都是最受矚目的潛在收購目標，但所有企業收購者都堅持該公司必須出售國家鋼鐵，他們認為國家鋼鐵是個吃光利潤的無底洞。龐大的壓力導致1990年該集團將更多股權轉移給日本NKK。⁵⁰

對外部顧問而言，威爾頓收購案對事業有拉抬作用。威爾頓的新董事會包括工會律師戴夫·羅伯森及拉扎德顧問尤金·凱林。威奇法爾律師事務所方面，威爾頓收購案的承辦律師獲得升遷，成為事務所合夥人。《機構投資人》（*Institutional*

Investor) 雜誌於 1983 年 12 月評選威爾頓收購案為「年度最佳交易」。偉達公關公司 (Hill & Knowlton) 則將朗赫德領導下的勞工—管理階層方案評選為全國最佳計畫之一。

威爾頓勞工並未注意到工廠生活有任何重大改變，尤其是在工作現場的參與方面，他們認為自己已實現戴夫·羅伯森描述的至高目標。首先，他們並未損失退休金。第二，他們的住宅價值並未下跌。第三，勞工收購計畫讓他們的家人能守在一起。重要的是，這些成就都與這些勞工的**消費者**角色有關。然而到了第一個五年期勞動契約結束時，威爾頓勞工仍然放棄自己生產者的權益，來滿足身為投資者的要求。但一如管理階層很可能會做的，只要區分勞工獲得五年薪資折讓補償的短期利益，以及公司和社區存活的長期利益和補償，這種行為也算是合乎情理。要維持僱用水準，就得保持公司在金融市場的生存能力。就此而言，勞工必須遵循全球金融機構的領導，這些機構擔任金主和董事會成員，成為威爾頓公司策略密不可分的一環。

值得注意的是，無論在拯救鋼鐵廠或地方社區上，聯邦政府都未曾扮演工具性角色。從一開始，威爾頓的顧問就有意迴避聯邦政府的直接干預。洛克斐勒州長於國家鋼鐵決定撤資後，確實發揮了支持作用。他之所以願意協助，可能是他本身的民主黨色彩，也可能是他有意角逐美國參議院席位。他很快便安排在州首府與威爾頓代表會面，與會的地區民選官員承諾提供所有必要協助。然而，無論是這些官員或該州的國會代表，包括參議院民主黨領袖羅伯·拜爾 (Robert Byrd)，最後都沒真正幫上忙。當

然，那時主政的保守共和黨雷根政府，除了在1984年終於支持鋼鐵進口限額，並明確要求資本投入於現代化，其基本態度還是希望財務困難的產業應服膺「市場」法則。換言之，政府認為某些企業應該倒閉。

除了進口限額，威爾頓也獲得三項無需政府直接撥款的補助。西維吉尼亞經濟發展局（West Virginia Economic Development Agency）制定特殊法規並經州議會通過，允許威爾頓以ESOP提撥金額扣抵租稅。這項立法每年替威爾頓省下50萬美元稅金。西維吉尼亞州藉由這些租稅優惠，補助勞工收購新公司股權。另外，聯邦環境保護局（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下的區域空氣品質管制委員會（Air Control Board）特准威爾頓延後購置新的污染防治設備，並依據較寬鬆的「污染泡」（bubble）公式計算該工廠的有害物質排放量。社區以呼吸髒空氣為代價資助工廠營運，就威爾頓的歷史而言，這種權衡不算特別。最後，不同於楊斯鎮的申請失敗，威爾頓成功申請到聯邦政府「都市發展行動補助」計畫（UDAG）及經濟發展局（EDA）的小額補助金。

不論是楊斯鎮或威爾頓，都未曾（即使是在理論上）出現將工業地景轉型為消費地景的討論；也從未提議嘗試發展服務業以彌補製造業工作的減少。這不是因為當地社區不需要鋼鐵提供的工作機會或資本。然而在需求孔急的各家工廠中，威爾頓因財務顧問的卓越成就脫穎而出。他們成功建立了工會在金融機構心目中的可靠度。

還有四項挽救威爾頓的重要因素。首先，國家鋼鐵董事長已準備將工廠售給員工，無疑是受到楊斯鎮案及當時美國工業流行的槓桿收購影響。與美國鋼鐵不同，國家鋼鐵急需資金。再說，霍華·洛夫也不介意留下另一個競爭對手，因為他不僅打算關閉工廠，還要完全退出鋼鐵工業。總而言之，根據其管理顧問的提案及當時的情況，他判斷威爾頓勞工是可靠的買家。

西維吉尼亞州州長也自始就支持勞工收購，進而促成了ESOP方案的合法化。威爾頓擁有獨立的工會組織也是個重要因素，這防止了勞工收購對整個鋼鐵業產生直接後果。威爾頓收購案確實對美國鋼鐵工人聯合會帶來壓力，迫使其改變對勞工收購的反對立場，但威爾頓不屬於該聯合會，因而不會在聯合會內部形成先例。最後，誠如李·艾科卡（Lee Iacocca）在克萊斯勒紆困案中所為，威爾頓勞工刻意放大了犧牲的美德。整體而言，他們是熊彼得眼中的企業家。

威爾頓收購案顯示，任何層次的權力，即便是自決的權力，其取得通常都必須以放棄自主為代價。在一個受到市場力量限制的資本主義經濟中，唯有當勞工和地方社區更直接屈服於金融控制下的市場時，鋼鐵城的地方才有生存的可能。當然，歷史上向來沒有任何鋼鐵城能在外來力量的影響下完全自主：鋼鐵城替全國市場從事生產，並透過紐約的銀行償還貸款。然而，威爾頓的案例說明這個地方的生存取決於它對市場力量的服從。

全球市場持續拆散以鋼鐵為基礎的經濟權力地景。威爾頓ESOP生效後的第一年，對進口量的唯一限制僅限於另一波自願

性限額。1989年，國會和布希政府只允許這類限額規定再延長兩年半。此時威爾頓對在大型鋼鐵業裡競爭，採取更積極的財務策略並加速現代化腳步。USX 鋼鐵廠每年投入研發的經費以國際標準來看只算普通，但仍高過其他美國鋼鐵公司。不過，在大股東卡爾·伊坎（Carl C. Icahn）的強大壓力下（伊坎於1986年曾威脅要接管公司），USX 告訴金融圈他們最終的計畫是賣掉鋼鐵公司。在這種情況下，業界集體協商的全國基礎開始毀壞。個別公司的管理團隊判斷，他們能透過地方性的勞資協議取得更強而有力的交易。

102

毫無意外，鋼鐵工業代表的象徵地景也逐漸消逝。距威爾頓僅60哩的匹茲堡，一座煉鋼工人澆灌金屬樣態的霓虹燈招牌，長期以來都是當地的地標，現在熄燈了，因為這個城市已不再澆灌鋼鐵。鋼鐵製造業者也不再是最大雇主：匹茲堡大學才是。⁵² 鋼鐵城市現在是個不同的地方。都市再開發計畫必須仰賴擁有工廠和不動產的大企業主聯盟，他們造就出以服務業為主的新地景。然而在威爾頓，鋼鐵城似乎還是原來的那個老地方。既未去工業化、也不屬於後工業社會，威爾頓只不過變成較不明顯、也較不自主的經濟權力地景。

第 5 章

汽車城的鋼鐵鎮

底特律生產性勞動的權力

底特律不是個頂有趣的地方。大煙囪。黑煙。

——賈利古柏對瑪琳黛德麗說，《欲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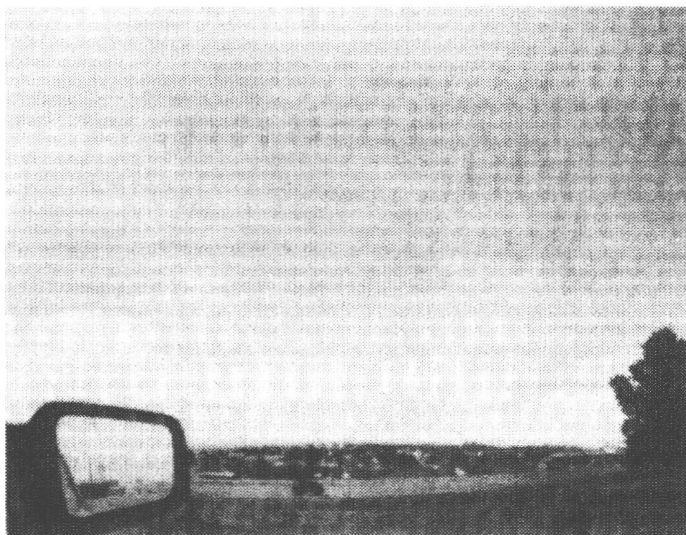
(Gary Cooper Marlene Dietrich, *Desire*, 1936)

一般而言，現在賺很多錢的人不生產東西，生產東西的人賺不了很多錢。

——大衛·賀伯斯坦，《最後審判》

(David Halberstam, *The Reckoning*, 1986)

威爾頓鋼鐵廠的勞工收購有其特質：公司城裡的溫馴工會與靈巧的投資銀行家。然而底特律麥克路斯鋼鐵廠（McLouth Steel）的復甦，卻發生在截然不同的地方性地景裡。麥克路斯工廠比威爾頓小，由私人掌控，並有美國鋼鐵工人聯合會（USW）的強大組織。它是美國最現代的整合式鋼鐵廠之一。其周邊城市底特律，不論是規模及社會和經濟的多樣性，都大過威爾頓。它也仰賴在財務上比鋼鐵業精明，而且與國際生產關係密切的美國汽車工業。



凱薩琳·雷蒙德（Catherine Redmond），《午後光線：同時與序列》（*Afternoon Light: Simultaneous and Sequential*）（1987）。72X84 英寸帆布油畫。俄亥俄州楊斯鎮巴特勒美國藝術研究所（Butler Institute of American Art）收藏。

但自 1970 年代初期以來，進口車蜂擁而至，加上無法迎合消費需求的品質變化，使汽車城底特律陷入混亂。周期性的裁員惡化成為大規模失業，幸運的遭解雇汽車工人則在城裡開計程車。明尼亞波利市的達頓公司（Dayton Company of Minneapolis）在 1969 年收購大型百貨公司哈德遜（J. L. Hudson），1983 年歇業，任由市中心商場關門棄置。由於缺乏預期中的買家，許多房屋若非空蕩無人，就是已遭拆除。負擔得起的人搬離了該區，尤其是在那看不到鋼鐵及汽車業前景的年輕人。底特律猶如美國大城市版的威爾頓。

除了一般性撤資外，重建市中心、啟動大型都市更新計畫，似乎都是不切實際的做法。儘管城市的公司財富與權力支持這些努力，卻無法帶來城市需要的街頭交通和小生意創業。福特汽車公司（Ford Motor Company）資助文藝復興中心（Renaissance Center）的銀色玻璃高塔，通用汽車（General Motors）令中城的屋主遷離家園，以便興建飯店、辦公室及購物中心建築群；施特羅啤酒公司（Stroh Brewery）則在1904年帕克－戴維斯（Parke-Davis）製藥工廠這個指定的歷史地標水岸區，開發名為河流廣場（River Place）的辦公室、購物及表演藝術複合體。柯爾曼·楊（Coleman Young）市長蓋了市區的會議中心和運動場。他還試圖令城市選民接受合法的博弈賭場，但失敗了。到了1980年代晚期，務實估計下，底特律的失業率達36%，相形之下，都會區為12%，全國失業率則是6-7%。¹

這座城市著名的工業郊區始於下游，穿過城市邊界附近一處地區，那是1950年代底特律唯一種族融合的娛樂區。它們的名字等於美國煙囪工廠的生產史。包括迪爾伯恩——福特擁有的整合式紅河鋼鐵廠（Rouge Steel）的位址；伊科斯（Ecorse）——大湖鋼鐵廠所在地；特倫頓（Trenton）是麥克路斯鋼鐵廠生產熱軋鋼的設施（包括鹼性氧氣轉爐和連鑄機）及辦公室設址所在；直布羅陀（Gibraltar）則是麥克路斯鋼鐵廠的某些粗鋼在裝運出貨前浸泡、退火鍛燒、切割，或加工為冷軋鋼卷的地方。

順著底特律河延展，大煙囪、雙曲線型水泥高塔和發電廠交替出現。個別廠址可能延伸達半哩長，天空襯托下的金屬之

106 城，有著黑漆漆的煙囪、塔樓、階梯和管線。大量資本投資形塑了地景，但風土依舊由強大工會和民主黨市政當局所組成。它們代表生產性勞工的組織化力量，承襲自 1940 年代因戰時動員及二次大戰後消費財製造業激增而產生的汽車工業與工會的和解。下游風土的構成也包含了擁有自宅的白人家戶（儘管有許多來自南方鄉間的黑人勞工加入了城市汽車產業），他們是第一次及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從偏遠農村地區或阿帕拉契山區招募的藍領家庭，也是 19 世紀歐洲移民的後裔。當然，還有汽車。核心城市的林蔭大道迅速拓寬為公路，紀念汽車城的奠基者（費雪高速公路〔Fisher Freeway〕、克萊斯勒高速公路、埃茲爾·福特高速公路〔Edsel Ford Freeway〕）和他們的產品。在下游各處社區，人人開車前往各地。街道上分布著購物中心和加油站；距離以哩程計算，而非以街區衡量。許多鋼鐵廠勞工家庭使用兩輛車，還有一輛休旅車可以開去釣魚或到密西根州上半島（Upper Peninsula）的度假小屋。不像其他美國郊區，這裡多數汽車是美國貨。在這裡，汽車不僅是交通工具：汽車就是工作。

底特律及其近郊的整體社會—空間結構都仰賴汽車。生產、消費和荒廢的變動地景，反映了單一產業的區域性支配，這個產業本身則仰賴三大公司的決策。早在 1939 年，這些公司便開始將其生產從底特律分散到全美各地。結果，底特律市的汽車就業成長速度，比全國其他地方或中西部鄉村地帶都來得慢。即便在 1960-1978 年間汽車製造商鴻圖大展時，也沒有增加底特律的生產工作。²

對於汽車工業的依賴，不只受到底特律的社會—空間結構所調節，也由連結通用汽車和麥克路斯的供應商網絡所中介。隨著國內汽車製造商從美國當地的生產撤資，他們對於買入的鋼鐵品質和價格亦漸趨嚴格。1977 年後，通用汽車削減往常的訂單，麥克路斯便損失半數銷售額。如同其他鋼鐵供應商，麥克路斯必須與進口鋼鐵、跨區域外包、進口汽車，以及替代車體用鋼的塑膠製品競爭。美國與日本汽車製造商的合資企業只不過升高了競爭，因為它們傾向於偏袒日本供應商。³ 在這種情況下，汽車、鋼鐵及下游工業社群裡的生產性勞動力量黯然失色。像巴斯夫（BASF）和費爾斯通鋼鐵（Firestone Steel）這種大廠都歇業了。美國鋼鐵工人聯合會的 29 區，與 400 家下游工廠有合約，於 1979 至 1986 年失去近半數會員。麥克路斯的生意也衰退了。

1981-82 年間，麥克路斯鋼鐵公司受債權人所逼而破產。不同於威爾頓，該公司在聯邦破產法庭的一場冗長戰役期間重組。一位獨立企業家在最後一刻取得鋼鐵公司，使麥克路斯在新管理體制下重展新局。然而，再度不同於威爾頓的是生產落後、士氣低落，新業主沒能使工廠好轉。1987 年，公司透過勞工收購股權方式而獲救。勞工讓步、管理動員和產品多樣化等威爾頓策略，也出現在下游地區。但這一次，麥克路斯透過非比尋常的州政府和工會介入而獲救：換句話說，這是地景的創造性破壞。

小麥克路斯

跟威爾頓一樣，麥克路斯鋼鐵產品公司是個小公司，卻以納稅者和雇主的身分，在當地地景裡格外突出。該公司占有國內鋼鐵業 1%-2%，以及平板鋼 3%-4% 的市場占有率。麥克路斯是全國第 11 大鋼鐵廠，2,000 名員工每天生產 2,000 至 3,000 噸鋼。勞工薪水很高，多數是男性，而且主要是白人；1962 年才僱用第一位黑人勞工。⁴

雖然麥克路斯於 1956-1983 年間為公營事業，在《財星》（*Fortune*）500 大名單裡有一席之地（稱為麥克路斯鋼鐵公司），但麥克路斯規模總是太小，無法納入美國鋼鐵工人聯合會與大鋼鐵廠每三年一次的協商模式。然而，作為一個「我也是」的公司，麥克路斯傳統上以全國集體協議為基礎，然後附加更高的時薪、更多附加福利及更寬鬆的工作規定。儘管有類似威爾頓的優良條件，麥克路斯的勞工仍經常表達不滿。1970 年代初期開始，對抗性的勞工—管理關係歷史，帶來了怠工和自發性罷工（wildcat strikes）的企業名聲。

1981 年，美國金融圈的擔保債權人試圖透過貸款的技術性違約，迫使該公司歇業。當時，彼此競爭的鋼鐵公司，其經理與聯合鋼鐵工會勞工領袖之間的共識，就是要讓麥克路斯停擺。競爭者——包括鄰近的大湖區鋼鐵廠——注意到面對逐漸縮小的世界市場，勢必得關廠和抑制產能。勞工領袖擔心，如果麥克路斯以讓步和歸還福利的方式倖存，會在業界創下危險的先例。然而，

麥克路斯的勞工三心二意。他們在舉目所見的經濟危機中害怕失業，卻不信任公司的管理階層，痛恨刪減薪資和福利的提議。直到管理階層真的申請第 11 章破產保護，工人才相信公司會倒閉。

其實從 1970 年代中期開始，麥克路斯就經營不善。從工會角度看來，勞工與管理者之間惡劣的現場關係，只是更凸出「笨手笨腳」、吝嗇且反覆無常的高階經理人面貌，以及一連串不當的投資決策。管理者也不遑多讓，他們對公司在新鋼鐵市場裡的位置缺乏遠見。破產訴訟期間，擔保債權人對於管理階層將稀缺的現金拿去養公司位於上州的主管度假會所的鹿，感到相當震驚，但這只是冰山一角。管理階層堅持認為麥克路斯的垮台是外部因素使然：鋼鐵與汽車業的危機、進口競爭以及沉重債務。然而，外界則歸咎於內部因素。持這種批評觀點的有擔保債權人、商業報刊與該公司的拉扎德投資銀行家，後者乃出於擔保債權人的資產清算要求於 1982 年三月受雇。

有個問題是公司在 1970 年代晚期投資上游整合工廠，誤信鐵礦和焦炭價格會飆高。反之，比起在開放市場購買原料，公司為了艾恩頓（Iron-ton）與新波士頓焦炭公司（New Boston Coke companies），以及帝國礦業合資公司（Empire Mining Partnership）的所有權付出更多代價。公司為了收購焦炭廠而使用 6,000 萬美元貸款，加重財務重擔，而令這些設施達到聯邦環境標準的花費也超出公司的負擔能力。另一個問題來自對現代化的非必要投資。麥克路斯以其早期創新（鹼性氧氣煉鋼法、連鑄機、單垛退火爐，以及美國工業第一個全自動熱軋機與不銹鋼

109 板生產線)而飛黃騰達，但1970年代晚期，它設於特倫頓廠的氬-氧-脫碳(Argon-Oxygen-Decarburizing)工序並未充分利用。公司也沒能發揮它的電腦控制設備所容許的生產彈性。

麥克路斯還過度依賴汽車工業。當公司與通用汽車的供應商關係從其銷售總額的一半降到三分之一，超過七成產量仍以各種形式銷往汽車業。這種受限的顧客基礎，使麥克路斯無法在1979年汽車訂單減少時彌補銷售量。當其產品無法達到汽車製造商的標準時，也無法使公司獲利。

此外，麥克路斯管理階層在會計核算程序上，有草率甚至是詐欺之嫌。利用權益會計(equity accounting)將麥克路斯盈利裡的朱厄爾煤炭與焦炭公司(Jewell Coal and Coke Company)的利潤囊括進來的作法，於1981年遭到證券交易委員會調查和起訴。麥克路斯也因虛報貨物運送而遭控告。

再者，麥克路斯蒙受1960-1970年代美國鋼鐵業典型的散漫分散化策略之苦。試圖多角化經營使麥克路斯管理部門對不知如何利用的三家貨運公司負起重擔，尤其在聯邦解除管制後(這些公司在1982年破產重組期間出售)。

1976年至1982年間，公司裁減近2,000個工作，達到半數勞動力，導致下游地區的一般經濟危機。其1976年獲利為1,080萬美元，才剛好超過銷售額的2%(是威爾頓獲利率的兩倍)，在業界被視為「微不足道的利潤」。然而相較於威爾頓，一般認為麥克路斯有現代化設施，是合適的接管標的。至少在1979年鋼鐵與汽車危機以前，它都還是可行的選項。1977年虧損1,500

萬美元，利潤蒸發，1978 和 1979 年恢復正常水準後卻猛然跌落。1980 和 1981 年，公司虧損近一億美元，長期債務達 1 億 6,600 萬美元。

1950 年代起，麥克路斯擁有三個不同的廠址：唐納德·麥克路斯（Donald McLouth）於 1934 年成立的底特律原廠，現在擁有現代的不銹鋼生產線；1948 年至 1954 年間建於底特律河旁沼地的大特倫頓廠；以及 1955 年完工的直布羅陀廠，這是另一座河岸新建工廠。不過，若沒有新的融資，這些工廠就是有問題的資產。在結構上，該公司已耗盡其第一代設備的優勢，但因規模太小，無法大量投資於研發。

使麥克路斯於 1950 年代得以投資先進科技的「天使」財力依然雄厚，但已無法獲其資助。早年，麥克路斯拿通用汽車的錢購置鹼性氧氣轉爐。通用買了 2,500 萬美金的麥克路斯特別股，以資助一座底特律地區的現代廠房，使其能跟大湖鋼鐵競爭通用汽車訂單。麥克路斯因而有意扮演價格和品質的主導者。然而 1970 年代末期，心懷全球的通用汽車已無興趣替麥克路斯脫困，儘管通用於 1981 年底透過麥克路斯的一名律師，寄送了 1,300 萬美元支票給擔保債權人，替公司爭取一點時間。

整體而論，麥克路斯跟通用汽車的對手福特汽車一樣，蒙受相同的管理症候之苦。正如大衛·賀伯斯坦（David Halberstam）描述 1979 年的汽車製造商，「成本失控、產品沒品質，它們已喪失了吸引力」。⁶所有重要的商業徵兆都顯示，麥克路斯該倒了。

當地勞動市場受盡裁員、關廠和失業之苦。1982年1月，密西根大學有關麥克路斯可能關廠的漣漪效應研究發現，關廠停工的代價可能使州損失14,645個工作（包括麥克路斯及其供應商）、個人收入每年損失2億7,800萬美元，州與地方每年稅收損失2,500萬美元。屆時，16%的州失業率約莫是全國平均值的兩倍。麥克路斯廠址所在下游區的各市政當局尤其恐慌，因為這裡是該公司貢獻主要稅捐及大多數勞工的生活所在。由於麥克路斯拖欠稅款，河景市（Riverview）1981年的教育稅捐低於預算數的42%，如果麥克路斯關廠，恐怕就得結束教育系統。特倫頓市長威脅要中斷麥克路斯的供水。就連底特律愛迪生（Detroit Edison）電力公司都有理由憤怒與擔憂。麥克路斯申請第11章破產保護時，虧欠底特律愛迪生1,500萬美金，而它每周100萬美元的能源開銷，使其成為該公用事業的第三大主顧。繼工會退休基金之後，底特律愛迪生與密西根聯合天然氣公司（Michigan Consolidated Gas）是麥克路斯最大的無擔保債權人。

在規模漸縮的產業裡，麥克路斯和威爾頓同為小型鋼鐵廠，結構上有著類似之處，但兩家公司及其地方脈絡間的鮮明對比，影響了它們的生存機會。麥克路斯不只財務狀況比威爾頓慘淡，進入破產訴訟的方式也使該公司的未來黯淡無光。麥克路斯被決意清算資產的擔保債權人推入破產程序，而沒有像國家鋼鐵這種尋求威爾頓相對廉價出路的情願賣方。為了維持特倫頓和直布羅陀兩廠的營運跟它們討價還價，使麥克路斯喪失談條件的籌碼。再者，麥克路斯的強悍勞工受制於美國鋼鐵工人聯合會的地方

史，以及昔日對管理階層的不滿。可以預期他們會抗拒威爾頓收購案的兩個最重要元素：犧牲，還有與資方合作。

底特律地區及整個密西根州複雜的產業政治經濟，其影響不太能確定。下游地區顯然苦於惡劣的去工業化情勢，而且利害攸關甚鉅，州政府被迫扮演工具性角色。一旦1981年擔保債權人將公司推入破產法庭，聯邦破產法即限制了州政府的介入能力。但自1986年以來的第二次重組條件，以及一位能影響工業政策的州長連任，使州政府比較容易有所行動。密西根州商業部規避「紓困」的文化和制度障礙，扮演關鍵的「促進」角色。

但這並不保證成功。如果根據該公司一名律師表示，勞工讓步使第一次重組在鋼鐵業裡顯得「獨特」，那麼財務副總會說，第二次勞工收購的重組是個「奇蹟」。

破產重組，1981-82年

某個意義上，麥克路斯的破產重組根源於1950年代初期，大約是特倫頓廠興建的同一時期。對於為了公司的破產和未來而爭鬥的四大對手來說，這段時期在他們的生命史很重要，因為這正是他們展開生涯的年代：

米爾頓·狄納（Milton Deaner）於1981年接任執行長，試圖整頓麥克路斯管理階層，原先在拉丁美洲任職於一家興建鋼鐵廠的公司，而其建造的工廠日後將跟美國鋼鐵業者競爭；

哈利·萊斯特（Harry Lester）於 1979 年獲選為美國鋼鐵工人聯合會下游區的理事（director），他出身西維吉尼亞州的一個煤礦家庭，後來遷到底特律，在麥克路斯擔任機關車工程師（locomotive engineer）；

詹姆斯·圖倫（James Toren）是保誠保險公司（Prudential Insurance）代表，率領擔保債權人對麥克路斯發起攻擊，發展出日後協助保誠斷絕與麻煩公司關係的財務專業；以及

唐仲英（Cyrus Tang）^[1]由於想擁有一座鋼鐵廠，於 1982 年買下麥克路斯廠房及存貨。他從上海移民到芝加哥，任職於坦普爾鋼鐵（Temple Steel）的沖壓廠。

在戰後重工業的擴張中市場及利己主義世界裡接受社會化，這些男人知道鋼鐵廠裡的製造有何價值。但他們對於 1970 年代的鋼鐵和汽車業危機也有親身認識。身為破產程序裡的對手，財務代表、勞工領袖、白手起家的企業家，還有鋼鐵廠經理人，演繹了這種重組類型的極限。破產確認了金融機構在美國產業裡的

[1] 唐仲英於 1930 年生於江蘇省吳江市盛澤鎮。為避日本侵華戰亂，他隨父親遷至重慶，後轉香港。1950 年，唐仲英自港赴美求學。之後白手起家，涉足多種行業，於 1960 年起建廠，1964 年獨資創建第一家鋼鐵服務中心——國際物資公司。1980 年，唐仲英在美國已擁有 30 多家企業，形成唐氏工業集團。1982 年，他收購麥克路斯鋼鐵廠，使唐氏工業集團躋身年銷售額逾 10 億美元的私營企業。1999 年，唐氏工業集團被「富比世」（*Forbes*）雜誌排名為全美私人公司第 157 位。資料來源：唐氏基金會，<http://www.tangfoundation.org.cn/>。

主導權力，在協商或危機之後的管理上，限制了州政府運用聯邦法律的角色，並防止工會採取創新的領導角色。⁷

隨著麥克路斯連兩年虧損增加，該公司的 10 位擔保債權人在整個 1981 年一再發布棄權證書，拖延貸款清償期限。^{*}他們認為米爾頓·狄納有一半機會讓公司起死回生，而且知道通用汽車支持他。然而在 1981 年 11 月 30 日的會議上，麥克路斯的審計師建議董事會就破產徵詢專業意見。兩天後，全體擔保債權人在銀行煽動下提出技術性貸款違約。諷刺的是，引發這項違約的是麥克路斯這邊的行動，他們想湊足現金支付營運成本。根據的 1981 年 3 月債權人施加的條件，為了重組他們握有的 1 億 6,600 萬美元長期債務，公司必須維持 1 億 750 萬美元的有形資本淨值。該淨值大多出自房地產和設備，包括底特律母廠、特倫多的 320 英畝廠房與直布羅陀的 850 英畝廠房，拉扎德銀行稍後估算，合計有 1 億 5,100 萬美元的帳面價值。然而 1981 年 10 月，公司將底特律的不銹鋼廠以 2,350 萬美元賣給瓊斯與拉弗林鋼鐵公司（Jones & Laughlin），使其資本淨值低於債權人所要求的門檻。⁸

113

* 這些有擔保的貸方，包括美國保誠保險公司、紐約大都會人壽保險公司（Metropolitan Life Insurance Company of New York）、紐約互助壽險公司（Mutual Life Insurance Company of New York）、底特律國家銀行（National Bank of Detroit）、底特律銀行與信託公司（Detroit Bank and Trust Company）、底特律國家實業銀行（Manufacturers National Bank of Detroit）、漢華實業信託銀行（Manufacturers Hanover Trust Company）、亞美利信託公司（AmeriTrust Company），以及哈里斯信託儲蓄銀行（Harris Trust and Saving Bank）。

收到違約通知一周後，管理階層申請第 11 章破產保護。勞工和供應商都未獲事先通知。結果，美國鋼鐵工人聯合會的地方工會震驚不已。有些工人有 20 至 25 年的工廠年資，眼睜睜看著退休金或工會「30 退出」的優退條件化為泡影。麥克路斯聘自底特律迪金森萊特事務所（Dickinson Wright, Moon, Van Dusen & Freeman）的公司律師試圖使全體債權人冷靜下來，但有擔保的貸方似乎是唯一有計畫的人。他們的策略是清算公司、排除股東和「無擔保者」（包括工會），才能取得麥克路斯的全部資產。

金融機構使債權人之間無法合作，並視麥克路斯的兩個工會為賤民。第 11 章申請訴訟後，雖然美國鋼鐵工人聯合會（基於公司的 1,600 萬美元退休金承諾），在旋即召開的破產法庭聽證會上，獲選加入債權人委員會，擔保債權人卻拒絕與工會代表溝通。甚至工會代表團飛到紐約參加 1982 年 6 月的債權人會議時，擔保債權人在熱烈爭論後才讓他們進入會議室。擔保債權人也不會同時跟勞工和資方溝通（破產法庭最後允許幾個重要的無擔保債權人加入擴大的 17 人債權人委員會；無擔保債權人也獲准組織他們自己的非正式團體）。

工會隨即與麥克路斯管理階層協商薪資讓步。這項動作令人詫異，不只因他們騷動不安的歷史，還因整個 1981 年高階主管處理勞工讓步時的前後不一致。管理階層最後撤回減薪要求，卻詭異地以陷入困境的公司全面加薪告終。這無法使勞工相信有犧牲的必要。不過，持續整個 12 月的勞資協商正式批准了一年期

的讓步協議，減薪 10% 及取消某些附加福利與退休福利。與管理

階層針對更多讓步及變更工作規定的協商，於新的年度裡持續進行，直到1982年11月與唐仲英簽訂另一個勞動契約為止。

1982年的頭幾個月，有一連串與債權人的「停機」協議。這些就是讓麥克路斯能經營工廠到1982年3月（之後到5月）的30天債務延期。管理階層向擔保債權人爭取盡可能維持工廠營運，至少讓手邊的原料加工成更具價值的鋼鐵。額外的經濟因素則減弱了擔保債權人要「關掉鼓風爐」的明確意圖。首先，一旦停止運轉後要重新啟動鼓風爐，以及按照聯邦環境管制規定停止運轉，都所費不貲。停工後公司也必須支付退休金和保險義務，這可能高達每名工人六萬美元。而且，結清無資金準備的債務，會使公司與華盛頓特區的退休金福利擔保公司（Pension Benefit Guaranty Corporation）產生衝突。

麥克路斯此時的主要問題是如何維繫生產水準與步調。工人士氣消沉，一點都不想工作，但連鑄機依然需要穩定的鋼材流量。工廠產出越少，賺得越少。在這個節骨眼上，擔保債權人敦促公司聘雇投資銀行家探尋潛在的資產買家。在他們推薦下，管理階層雇用紐約的拉扎德銀行，後者派出一組不同於威爾頓收購案的合夥人。底特律的公司律師也從紐約下百老匯（lower Broadway）引介專攻破產訴訟的「精品律師事務所」。紐約的律師記得麥克路斯案的工作經驗很奇特，因為「沒有客戶」。不像差不多同一段時間，威爾頓有勞工和管理階層的聯合研究委員會來與全國鋼鐵協商收購公司，麥克路斯這裡沒人能對公司的未來負責。

缺乏內部領導的明顯證據是經理人開始離棄公司。紐約來的破產律師設計出自詡巧妙的解決之道——主管激勵津貼計畫——阻止他們潰逃。這項暫時性措施持續到6月初，屆時第二次停機協議將到期。公司實際上按經理人的薪酬比例支付津貼，花了一大筆錢才讓他們留任。喬治·伍茲（George Woods）法官在破產法院上認為這是「勒索」，美國鋼鐵工人聯合會的區理事哈利·萊斯特稱為「金手銬」，但法官、萊斯特和擔保債權人都接受，70萬美金的支付總額是麥克路斯留住管理階層的唯一辦法。而且，法官將同額的款項判給美國鋼鐵工人聯合會地區工會，後者將這筆錢用於一周帶薪假期及原本遭取消的某些退休津貼。

拉扎德雖已為潛在買家備妥公司招股章程，破產聽證會卻仍持續進行。像焦煤廠與主管噴射機這類資產，都是拍賣品。然而會議繼續進行，試圖獲得債權人、地方民選官員和華府聯邦當局支持公司的存續。密西根州參議員唐納德·李格（Donald Riegle）懇求擔保債權人讓麥克路斯繼續營運，甚至遊說潛在買家。不過聯邦政府並不支持。

1980年，隆納·雷根向下游區發表含糊不清的演講，藉以表達對美國產業的支持。但他保守的共和黨政府堅決反對紓困有問題的公司。1982年3月，勞工部長雷蒙·多諾萬（Raymond Donovan）視察下游區時，一名憤怒的麥克路斯鋼鐵廠工人妻子質疑他。多諾萬告訴工會代表團，他們在「病入膏肓的工廠停工後，全都會過得更好」。一個月後，工會在華府遊行示威。工會與商務部長馬爾孔·鮑德里奇（Malcolm Baldrige）會晤，談論

他們懸而未決的經濟發展局貸款後，他們讀到鮑德里奇在《紐約時報》的回應：「不會有紓困貸款。」美國鋼鐵工人聯合會代表團也沒能獲邀參加兩名密西根州民主黨參議員安排的同雷根總統的會面。根據工會的說法，雷根取消了會面，因為他斷定他們只會利用這個機會指責他的政府。

既無聯邦支持，也看不到潛在買家，美國鋼鐵工人聯合會的地區理事哈利·萊斯特提出新策略。何不模仿威爾頓及鋼鐵界之外的公司，建立員工持股計畫（ESOP）來經營麥克路斯？沒人覺得這個提案吸引人。擔保債權人不把萊斯特的想法當一回事。至於 29 區（萊斯特曾在此以「不妥協」的政見競選過 1979 年理事）的工人則對他們能得到的東西心存懷疑。然而員工持股計畫的最主要對手，出現在美國鋼鐵工人聯合會的全國地區理事委員會內部。他們擔心這會創下員工持股計畫的勞工妥協先例，而且不同於比較進步的美國汽車工人聯合會（UAW），美國鋼鐵工人聯合會對勞工所有權不感興趣。

萊斯特還記得，那場美國鋼鐵工人聯合會執委會的會議是他經歷過最糟的經驗（最後允許他去協商員工持股計畫）。好幾名地區理事催促他讓工廠破產，因為他如果不這麼做，往後會有一大堆麻煩。他們還認為讓步的代價太高。但萊斯特辯稱麥克路斯公司規模太小，不會在全國協商立下先例，藉此說服他們幫忙資助麥克路斯員工持股計畫的可行性研究（事實上，美國鋼鐵公司的主要勞工協商員從不讓美國鋼鐵工人聯合會忘記，它曾允許成員在麥克路斯協商比其他公司還低的薪資）。值得注意的是，

萊斯特的立場獲得國際鋼鐵工人聯合會主席勞埃德·麥克布萊德（Lloyd McBride）支持，後者競選主席一職時獲得萊斯特強力支持，以對抗唱反調的艾德·薩德洛斯基（Ed Sadlowski）。

雖然工廠所在的兩個地方工會喜歡以員工持股計畫顧全就業的想法，但沒有門路取得資金收購工廠。他們也不想接受員工持股計畫所牽涉的犧牲，因為員工持股計畫可行性研究建議削減生產工人的時薪，從美金 18 元（歷經兩次連續 10% 刪減的水平）降到 15 元。擔保債權人最終拒絕員工持股計畫。但哈利·萊斯特相信，他們能利用可行性研究的估算結果，引誘 1982 年 7 月突然現身成為買家的唐仲英。

唐仲英買下麥克路斯的動機，跟宣稱尋找其「神祕東方」議價風格的其他人一樣令人費解。不過，他已擁有中西部鋼鐵服務中心帝國，麥克路斯的產品可以供應分銷點所需。擔保債權人和拉扎德一開始都質疑唐仲英的財務能力，卻都因唐氏工業集團每年 2 億至 3 億美元的營收、唐仲英在大陸伊利諾伊銀行（Continental Illinois，且不受該銀行最後發生的財務危機影響）的信貸額度，以及唐仲英芝加哥律師的議價風格而被說服。無論如何，唐仲英是由通用汽車主管向米爾頓·狄納執行長推薦。1981 年破產破局時，他表達有意收購最後由瓊斯和勞克林鋼鐵公司取得的不銹鋼廠。⁹

在破產的狀況下，唐仲英能以十分優惠的條件收購麥克路斯。他選擇性地取得公司的最佳部分，藉以組成切實可行的企業。前任公司律師說，唐仲英僅以現金 3,000 萬美元多

一點的「跳樓價」買下存貨，另拿出收益償付債券（income debenture）票據，就支付了工廠設備和資產的 4,650 萬美元收購價的大部分。這張債券票據將由新公司的最終利潤來清償。這使新麥克路斯（現在稱為麥克路斯鋼鐵產品公司）在償付本金或利息以前，得以支付運轉和維護、擴大庫存及應收帳款。收購價其餘部分則是抵押這些資產本身以獲得貸款。

協同兩名次要合夥人，包括供應麥克路斯的焦炭公司老闆，唐仲英只支付了工廠淨值的一小部分。他並未取得舊公司債務或付錢給股東。他也沒把錢轉給擔保債權人，後者一旦接受唐仲英，就得同意延展現在已降到大約 5,000 萬美元的長期債務。唐仲英的 3,000 萬美元現金直接投入作為新公司營運資金。唐仲英也有辦法降低新麥克路斯的成本結構。他的律師與直布羅陀市談定財產稅打六折，每年省下 300 至 400 萬元。新公司承繼舊麥克路斯的稅賦遞延抵減（tax carryforward），可藉以減少聯邦稅。此外，重組的債務降低了利息支出。舊公司的企業律師指出，在申請第 11 章以前，麥克路斯在鋼鐵業的債息支付是最高的。

但薪資和福利仍占成本結構的最大宗，而工會整個夏天也持續與唐仲英爭論讓步事宜。接近退休的資深工人提出要有特殊考慮。因為退休金是以他們最後一年的薪資為計算基礎，他們若接受工資讓步，就有降低退休金給付的風險。為了爭取較高的工資和福利，美國鋼鐵工人聯合會地方工會主席一度提議退回唐仲英已與地區理事達成的讓步——包含 15% 的股權和稅前利潤的員工持股計畫折衷方案。然而，離員工持股計畫只差臨門一腳，萊斯

特卻否決了這些權利的出讓。

118

為了回報，唐仲英提供生產工人每小時 50 美分的獎勵，但工會視為汙辱。他於是提議只在一間廠房實行該獎勵，工會卻認為不切實際而拒絕。同時，唐仲英也取消中階管理人員的退休金體系，導致跟他們的火爆會議。士氣和生產雙雙低迷不振，以致萊斯特在要求唐仲英參加 9 月的會議時，提醒這位新主人他正把自己趕出工廠。唐仲英回應：「我是有錢人，我大可關廠。」

值得注意的是，工人是唯一仍有強烈不滿的對手。擔保債權人多少確定他們的貸款能獲得償付。其中一位破產律師認為，破產專家、投資銀行家與前任企業律師進行好幾個月的協商，最後達成「十分圓滿的結果」。卡在一連串對峙中的整個夏季過後，唐仲英和萊斯特最後達成工人讓步協議。1982 年 11 月 14 日簽訂了新勞動契約，三天後，唐仲英完成了收購公司的交易。

生產工人新的每小時勞動總成本是美金 18 元，比唐仲英議價時提出的 14 元還高。生活費調整 (COLA)^[2] 延遲到 1985 年才給付，牙醫和眼科保險方案則停止，並取消三天的帶薪假期。就像在威爾頓和整個產業一樣，還有兩個爭議領域：工作規則和維修工作外包。雖然許多勞工大聲抱怨契約，但根據執行長米爾頓·狄納的說法，大多數麥克路斯工人確實支持這項交易。不過，他們或許是沉默的多數，因為他們無從介入讓步協商。

^[2] COLA (Cost of Living Adjustment)，即為了避免通貨膨脹影響而加薪或提升社會安全與福利支出。

狄納對於 1983 和 1984 年間麥克路斯的成功機會抱持樂觀。但即使一年有五億美元的銷售額，而且唐仲英致力於現代化計畫，公司還是破產了。為了資助五年資本投資計畫的一小部分，1983 年 8 月經濟發展局批准了 1,500 萬美元的貸款保證。這些資金用於更換鼓風爐內襯、建造鐵礦脫硫設備、整修連鑄機、替換退火設施、改進熱軋機控制系統，以及其他小型項目。

舊麥克路斯早在五年前（即 1978 年）就提出最初的貸款保證申請，當時卡特政府的經濟發展局對陷入困境的公司很寬厚。當時，經濟發展局在申請者確實找到借款人之前，會與申請者進行非正式協商。這些貸款有三至四成的高違約率，加以雷根政府對經濟發展局採消極態度——1980 年之後每年預算都遭刪減——使新麥克路斯更難取得貸款保證。然而，一名密西根州國會議員再次居間調停。經濟發展局回應眾議員約翰·丁傑爾（John Dingell）幕僚所表達的關切，核准麥克路斯的申請。發展局照例取得優先於全體債權人的地位。吉姆·托倫（Jim Toren）和其他財務代表並未欣然接受擔保債權人的順位改變。除了堅持有資產擔保的貸款優先於擔保債權人的權益，經濟發展局還強加三項條件於公司：鎖定廉價的鐵礦供應、確保穩定的市占率，以及維持勞資關係和睦。

管理階層現在加緊努力行銷。公司擴張銷售人員，增添 75 名新客戶。它也指望銷往唐仲英服務中心的銷售額，從占產量 2~3% 提升到 10%。1983 年，狄納樂觀的提到要掌握「有意義的市場」。但這些銷售額中，有些是靠削價競爭和偷工減料達成。

儘管唐仲英承諾現代化而投資 7,000 至 8,000 萬美元，產量或生產力卻都沒有提升。巴西鋼板半成品的使用成果不如預期，在幾個獲利的年度後，麥克路斯又陷入昏昏欲睡。

更換鼓風爐內襯一直是個花錢的項目。迷你型換襯要價超過 1,500 萬美金；全尺寸換襯費用則為三倍。狄納對這些花費及攀高的能源成本心裡有數，於是在費率較低的夜間運轉熱軋機以便降低電費。

公司的許多問題還是跟勞工有關。儘管新勞動契約將生產勞工的每小時總勞動成本從美金 23 元降到 18 元，一般勞工則從 12 元降到 8 元，但工作規則和安全條件的爭論持續不歇。工人懷疑管理人員是否全心接受新的參與式風格，或是否公平對待勞方。在密切注意麥克路斯工作生活品質計畫的顧問眼中，管理人員尤其是公司的「弱點」。不過，狄納身為執行長的表現也不一致。勞工一般認為他對管理階層太好，但如果工廠裡有事情觸怒他，他就會給工人寫封憤怒的信出氣。

商業損失、生產力低落及惡劣的勞資關係，迫使米爾頓·狄納離職，但工人的不滿還是持續升高。勞工讓步使公司熬過破產並獲得一名新主人。但勞工的生產（畢竟這是工人的基本角色）失利，證實新鋼鐵公司沒能力開發生產性勞動的綿延力量。

勞工所有權，1987-88 年

到了 1986 年，麥克路斯已歷經連續兩年的商業損失，並再

度拖欠地方稅金。經理和熟練技術工的離職潮展開，有些人應徵馬自達（Mazda）於1987年在平岩（Flat Rock）開業的新工廠。最糟的是，鋼鐵廠無法達到麥克羅斯收支平衡所需的生產水平——一天約3,000噸——因為工人開始減速。到了這個時候，勞工不再信任管理階層的能力。他們也不相信唐仲英維持鋼鐵廠運轉的承諾。工人質疑唐仲英保證在麥克羅斯和他的其餘公司業務之間「保持獨立」距離的承諾。他們懷疑他以人為低價購買麥克羅斯的鋼鐵，並運往他自己的服務中心。他們也懷疑他是否真的投資了允諾的8,000萬美元於資本改良。

哈利·萊斯特十分擔心工廠的存活，而採取前所未見的行動。1981年以來，他致力維持麥克羅斯的營運，無論要付出多少勞工讓步的代價。但萊斯特相信麥克羅斯的主要問題在於管理。他批評公司的管理人員是從其他鋼鐵公司「退隱」，並且從事「鄉村俱樂部式管理」。因此在1986年，州長詹姆士·布蘭查德（James Blanchard）競選連任前不久，萊斯特跟他懇談麥克羅斯及其2,000份工作的未來。接下來幾個月，哈利·萊斯特說服州長，州政府必須插手麥克羅斯的生存。由於布蘭查德在11月選舉完成前無法採取行動，萊斯特開始跟麥克羅斯的兩個主要鐵礦和焦煤供應商接觸：克利夫蘭－克利夫斯公司（Cleveland-Cliffs Inc.）及麋鹿河資源公司（Elk River Resources，太陽石油〔Sun Oil〕的分公司）。剛開始，這些公司主管對鋼鐵工人聯合會領袖的接觸感到驚訝，但萊斯特的懇求和論點最後贏得他們的支持，也就是他們應該直接參與麥克羅斯的內部事務。

121

布蘭查德州長暗中允諾密西根商業部及其部長道格·羅斯（Doug Ross）會予以協助。羅斯是出身底特律的前任州參議員，曾與哈利·萊斯特及美國鋼鐵工人聯合會於競選期間結盟，時間可上溯到甘迺迪時代，他當時是開始對政治感興趣的青年。萊斯特明確承諾，如果商業預測結果不佳，他就不會為難州長繼續維持工廠運轉。工會在這個信賴基礎上發展了雙重策略：以勞工所有權取代唐仲英，創造出更能回應市場和地方的管理階層。

然而沒幾個行動者能在扮演他們的角色上靠得住。強烈依賴麥克路斯訂單的供應商，在指引公司該做什麼上小心翼翼。麥克路斯的管理階層曾向州商業部請求資金挹注，但後者決定不向陷入困境的公司「砸錢」。密西根州政府的其他部門也不回應勞工的請求。實際控制政府基金的州財政部長羅伯特·鮑曼（Robert Bowman），要求哈利·萊斯特「做好分內工作」，以新的讓步安排使勞工各就其位。再者，企業情勢對萊斯特與布蘭查德州長的協議不是好兆頭。1986年底受雇研究該公司的管理顧問德勤·羅斯（Touche Ross），不相信麥克路斯能在持續缺乏重大商業計畫的情況下存活。當時，勞工正從事未經許可的自發性罷工。

密西根商業部官員認為麥克路斯的成敗取決於「態度」。不像汽車業的分段生產線，他們喜歡將整合式鋼鐵廠解釋為像人體一般運作；單一心跳驅動整個工廠的生產過程。假如能增進心跳，也就是態度，產量就會提高，公司的生存機會就大增。這種看法是他們願意實施有限救援行動的根源。道格·羅斯特別許下了特殊承諾。如同哈利·萊斯特，他私下決定不讓麥克路

斯倒閉。然而，與西維吉尼亞煤礦工人之子相較之下，道格·羅斯自認是 1960 年代樂觀主義最後的擁護者之一。約翰·甘迺迪與林登·強森（Lyndon Johnson）向他的世代表明，活力充沛、態度堅定的政府將無往不利、完成各種目標。他心裡的目標不是 1979-1984 年討論的「工業政策」，因為沃特·蒙代爾（Walter Mondale）在該年總統大選的決定性挫敗，將這個選項從政治議程中淘汰。道格·羅斯不贊成政府直接控制，甚或取得陷困產業的股權。相反的，他誓言要運用他的充沛幹勁及他能指揮的幕僚進入鋼鐵廠來激發勞工，並主持管理階層、工會和供應商的「圓桌座談」，直到他們達成拯救公司的協議。這或許並未損及他的使命感，因為羅斯考慮重返民選官員生涯，競選更高階的職位。

122

羅斯及其幕僚發函給麥克路斯的雇員，敦促他們「齊心協力」，並請教有何明確的抱怨。他們認為勞工習慣把自己當成管理階層的受害者，以致無法採取建設性的行動。然而出其不意的是，他們收到公司 2,000 名工人及雇員的 259 封詳盡回覆。多達幾十名工人抱怨，工廠其他人工作時濫用藥物或酗酒，危及工安。相同數量的人要求加強管理階層和工會間的互信合作。有 24 名勞工的建言則聚焦於設備應該有更好的預防性維修。其他個別意見則對生產過程提出具體的改善建議。

與密西根商業部的初衷相反，它確實對麥克路斯投入若干資金。商業部聘請德勤·羅斯從事管理研究，並發展一套商業計畫（聘用德勤·羅斯花了 20 萬美元，商業部付了一半；另一半由美國鋼鐵工人聯合會和公司支付）。商業部也說服密西根勞工部資

助30萬元，用於研究工廠的社會關係。這項研究最後確認了勞工蒙受了排山倒海、自我挫敗的恐懼。在道格·羅斯看來，工人就跟足球隊底特律之獅（Detroit Lions）一樣，永遠在足球聯盟墊底。羅斯在由他開啟、與工廠工人的每周會面中使用這個類比，嘗試逆轉心理。

5個月內，到1987年4月止，產量增加了，哈利·萊斯特、麥克路斯供應商，以及商業部組成的圓桌座談，擬定了他們希望執行的交易條件。這些條件比「態度」來得重要。首先，公司財務必須重組，將未償債務轉變為資產淨值。該措施將使公司獲得新資本挹注。其次，必須改善勞資關係。不過，第三，依哈利·萊斯特之見，重組的必要條件是從唐仲英手中取得公司所有權。

123

唐仲英事實上是個缺席老闆。日常營運仍由管理階層決策，但公司的未來卻不是由唐仲英決定，而是由代表地方政府（包括好幾位下游區市政府官員）、地方工會及麥克路斯供應商的「統合主義」（corporatist）圓桌協商決定。供應商和工會其實都捲入得更深。克利夫蘭—克利夫斯公司與鋼鐵工人聯合會總部，各從他們的組織出借一名管理分析師到麥克路斯上班，以籌備商業計畫。面對這種直接介入和虧損連連，唐仲英逐漸決定交出所有權。不過，唐仲英希望同時選擇他的談判夥伴與撤出步調。

他與哈利·萊斯特的討論主要是對抗性的，尤其是這名地區勞工領袖威脅要徹底調查唐仲英產業的財務，另一名在場者還記得他要「揭穿公司的面紗」。唐仲英顯然寧可應付道格·羅斯和密西根州，而非萊斯特和美國鋼鐵工人聯合會。1987年初，唐仲

英告訴羅斯放手去做，「拿走公司」，但協商還是拖到隔年。

勞工再度成為重組的基石。1986年7月，（第二個）新勞動契約雖已推出，員工持股計畫卻仍要求更多財務讓步以降低成本。但麥肯錫（McKinsey）在威爾頓的重要發現，在麥克路斯更顯得關係重大：為了吸引金融機構，員工必須表現出願意犧牲的確切證據。員工持股計畫的支持者主張，勞工所有權將使現狀改觀，新的工資讓步將提高生產力。不是每個必須讓步的人都同意這點。

在哈利·萊斯特和工作不穩定的壓力下，筋疲力竭的勞工接受了另一項10%的工資讓步，以換取員工持股計畫中的85%員工所有權。唐仲英及其合夥人持有13%的股份。勞工也獲保證能維持原有的退休金體系，儘管這點終究要由公司和退休金福利擔保公司來協商。

麥克路斯或美國鋼鐵工人聯合會執委會，都沒放棄他們於1982年表現出對員工所有權的抵制。對勞工而言，新的讓步（即便有了員工持股計畫）「如蓖麻油般」每下愈況。但萊斯特辯稱，員工持股計畫是萬無一失的局勢。假如鋼鐵廠關閉，工人只好面臨失業，而失業反正是他們在唐仲英當家時早已面對的問題。但另一方面，如果工廠繼續經營且獲利，他們「可以荷包滿滿地離開」。不僅能以生產力獎金或最終分紅等方式，收回他們的工資讓步，他們還能在5或10年內將手中持股賣回給公司，而這時他們當中已有不少人在麥克路斯服滿退休年資。因此，新舊集體協商形式的結合——全國性的鋼鐵工人聯合會規則和該工廠

的員工持股計畫條件——最終將能保障工人的利益。

萊斯特面對的是由各地區理事組成，跟 1982 年一樣持懷疑態度的執行委員會。在先前的破產危機裡，委員會告誡他若嘗試以讓步方式拯救麥克路斯，將使他付出工會生涯的代價。他們試圖使他了解，當他第一個五年任期屆滿，他絕對贏不了地區理事的連任選舉。然而 1987 年這回執行委員會比較願意支持。同樣有鋼鐵工人聯合會主席勞埃德·麥克布萊德當靠山，萊斯特獲得委員會同意，留給麥克路斯一條生路。會議過後，新勞動契約終於在 1987 年秋天獲得批准。

夏季期間，決定性的協議開始重組債務，並且發展商業計畫。這些都是公司基於特殊壓力下的作為，因為它最近喪失了營運資金來源。事實上，這就是 1986 年管理部門接觸密西根商業部背後直接理由。給麥克路斯營運資本放款 1 億 3,000 萬美元的金融機構，決定將其商業貸款業務賣給克利夫蘭的亞美利信托（AmeriTrust of Cleveland），條件是亞美利信托能退回一定數額問題貸款，即一般認為無法在一年內回收的款項。麥克路斯的貸款就是其中之一。

擔保債權人的長期欠款，已減少到相對少量的 1,100 萬美金。不過，密西根州財政部長鮑勃·鮑曼（Bob Bowman）在所有財務重組完成前，很謹慎地拒絕涉入其中。鮑曼也要求麥克路斯聘請投資銀行家，以便提供相對於金融機構的信譽。透過他與麥克路斯的供應商關係，1987 年 7 月公司聘請紐約市謝爾森雷曼赫頓公司（Shearson Lehman Hutton）的財務重組團隊。謝爾森

被要求擬定管理階層尚未策劃出來、令人期盼已久的商業計畫。這項計畫將提交給潛在的貸方。

不出所料，謝爾森的投資銀行家發覺麥克路斯「還沒完全成熟」，其中一名銀行家這麼說。失敗主義採取的形式是「州政府必須協助麥克路斯的強烈觀點」。此外，如同在威爾頓，「對紐約金融類型有著深切的文化反感」。由於猜疑投資銀行家拉扎德在公司破產危機期間沒幫上任何忙，更加重了不信任（不同於威爾頓的個案，拉扎德的代表確實是基於麥克路斯會失敗的假設來行事）。然而，就算管理階層和鋼鐵工人聯合會這方並不情願，州政府仍堅持他們必須與謝爾森充分合作。不同於拉扎德，謝爾森不認為麥克路斯「是個出局者」。謝爾森的三人團隊在特倫頓工廠花了很多時間。他們尤其重視勞工。他們運用標準化的重組模型，企圖針對麥克路斯「說個故事」，以便吸引潛在的放款人。劇情包括現金流預測、納稅義務及有利可圖的結果等重要元素，前提是公司能成為公有（亦即，資產淨值可以藉由在股票市場出售股份而轉變為公眾所有）。

謝爾森團隊也試圖替公司購買時間。供應商被他們的表演說服，加上仍舊得依賴麥克路斯的生意，於是同意只要公司持續以現時匯票（current bills）支付，他們就凍結過去的債務。地方稅務當局和退休金福利擔保公司（PBGC）也願意跟進。持有收益償付債券的金融機構和一位麥克路斯的貿易債權人則大為抗拒。值得注意的是，謝爾森拖延與 1982 年執意關廠的擔保債權人的會議，直到其他債權人都同意其條件才展開。此時有

地方銀行 NBD 的協助，謝爾森說服擔保債權人接受公司負債延遲三至五年。這時的擔保債權人已是不太一樣的團體。吉姆·托倫（Jim Toren）已從保誠保險公司退休，漢華實業信託銀行（Manufacturers Hanover）更會吵鬧的代表則不再參與其中。

依照謝爾森的意見，麥克路斯說服 1 億 3,000 萬美元營運資本債務的持有者將它轉換為優先股，以便化債務為股權。公司也從事逆向股票分割（reverse stock split），將十股舊股轉換為一股普通新股，並發給員工持股計畫信托足夠的股權，以包括 85% 的資產淨值。為了替額外的營運資本提供現金，謝爾森跟專門從事陷困企業高風險借貸的國會金融公司（Congress Financial Corporation）（位於費城的控股銀行公司的子公司），協商 6,000 萬美元的新循環信貸。花了將近一年時間才達成這些協議。1988 年 5 月結束最後談判。

重組後的麥克路斯，有了比以往更具平等主義及統合主義的營運基礎。因此，它不僅與其他美國公司形成對比，也與勞工收購的威爾頓鋼鐵大為不同。主要差異在於麥克路斯員工持股計畫的股權分配，這個社會權力的重要指標，同時以工資和工作時間為基礎。如同麥克路斯的其他一切事務，這個分配架構反映了艱困的談判過程。如同在威爾頓，管理階層主張完全基於工資的階層式分配，鋼鐵工人聯合會卻堅持要求納入個人實際工作的時數。然而，與希望完全按年資來配股的資深勞工不同，工會堅持以時數和工資為基準的折衷方案。在哈利·萊斯特看來，這是在勞方與管理階層、在經驗與生產力之間最公平的權衡。不同於威

爾頓運用「平等犧牲」的規範，彌補所有權分配的社會差異，麥克路斯的方案強化公司裡的社會差異。在我們看來，哈利·萊斯特有意運用**市場**手段加強對**地方**的承諾。

麥克路斯的員工持股計畫與威爾頓計畫的對比，也在於它避免利潤共享的分配機制。麥克路斯的員工持股計畫以占生產力提升分額的形式來分紅。萊斯特估計這些安排將使工人的工作時間更短，而且獲得比他們在工資讓步中所放棄者更多的報酬。給員工持股計畫股東的生產力紅利，也假定能創造出「自我引導的勞工」。雖然萊斯特贊同這種觀點，但也承認在員工持股計畫下，監督者會發現積極進取的勞工「挺可怕的」。

在這個新體制下，麥克路斯比 1982 年更努力發展參與式管理。經理人依然全神貫注於財務和營運問題，但他們現在致力在勞資關係裡保持一致性和團隊合作。然而在某種程度上，這個方向依循由大鋼鐵製造商（包括伯利恆鋼鐵、內陸鋼鐵、國家鋼鐵、LTV），甚至由麥克路斯的供應商克利夫蘭－克利夫斯公司發起的溫和參與式管理風格。1988 年 7 月，麥克路斯從它最親近的競爭者大湖鋼鐵廠聘請一位新執行長。諷刺的是，他是 1982 年敦促哈利·萊斯特放手讓麥克路斯破產的地方鋼鐵主管。

新董事會將支持重組過程的工會、地方政府和供應商的統合主義式參與加以制度化。員工持股計畫的頭 15 年間，員工－所有者只擁有穿越式表決權（pass through voting right）。但是董事會包含 4 個債權人席位（第一次分配裡，包括克利夫蘭－克利夫斯、麋鹿河及底特律愛迪生）；哈利·萊斯特親自挑選的 3 個鋼

鐵工人聯合會代表席位（包括前汽車工人聯合會主席道格拉斯·弗雷澤〔Douglas Fraser〕、鋼鐵工人聯合會員工持股計畫律師及萊斯特本人）；薪資勞工投票表決的一個席位（他們選了下游區韋恩郡〔Wayne County〕的財務主管，其配偶是麥克路斯雇員）；兩個公眾席位（密西根商業部部長道格·羅斯與國家鋼鐵的前主席）；以及執行長。這些董事希望成為「有實務經驗的董事會」。值得注意的是，他們認為最大的挑戰是安排工廠未來資本改良的融資。唐仲英投資了7,000萬或8,000萬美元購置或升級設備，但這些成本持續引起重大關切。麥克路斯的議程包括升級連鑄機、替氧氣轉爐換襯，並為潛在主顧安裝新的精軋設備。我們知道這些運作都十分昂貴。

在勞工這邊，麥克路斯的讓步也促成重大變革。現在公司擁有鋼鐵業裡每小時約2.5美元的最低總勞動成本。新勞動契約將工廠縮小了一成，使勞工數量低於2,000人。此外，新規定最後建立了彈性工作團隊，可相互替換的員工能接受各種任務要求。雖然哈利·萊斯特聽到的工會成員批評，就屬抱怨這種彈性化最多，但這是麥克路斯最接近新興全產業規範的場域。生產性勞工的希望深切仰賴哈利·萊斯特。在缺乏強有力的地方領袖挑戰下，身為鋼鐵工人聯合會地區理事及董事會成員的萊斯特，握有很大的權力。

到了1987年中，在員工持股計畫和勞動契約進入最後決定之前，鋼鐵業的處境起了變化。多虧1984年制定的產能縮減和進口配額，麥克路斯和大湖鋼鐵公司才能銷售它們產出的所有鋼

鐵。威爾頓、伯利恆和美國鋼鐵（USX 公司的鋼鐵部門），打算將改良的鋼罐賣給飲料業。國內鋼鐵需求增加，改變了股市裡疲軟的鋼鐵公司股票交易。近年來每當公司宣布要投資於資本改良，股票市值就傾向下跌的伯利恆鋼鐵，賣掉了整批新發行的股票。包括伯利恆和美國鋼鐵在內的**最大鋼鐵製造商**，從其鋼鐵營運中有了實質獲利。

這看似水漲船高、雨露均霑，其實反映出在一個小得多的鋼鐵業裡，持續運用著大相逕庭的策略。巨大且多角化的USX陸續關廠，削減了39%的產能和50%的工作。伯利恆繼續利用既有科技趨動更高的效能。小型軋鋼機公司紐柯（Nucor）砸下重金，投資製造薄鋼的先進科技，還跟一家日本鋼鐵製造商在阿肯色州建立合資企業。¹⁰

麥克路斯仍因高勞動周轉率而失血，單是1987年就失去400名支薪雇員裡的80人。但連續四個月生產力提升的結果，是付給勞工現金紅利。看來，麥克路斯即將藉生產性勞動而再度存活。

麥克路斯是新權力地景？

一如拉扎德投資銀行家教給威爾頓百姓的，員工持股計畫並非反資本主義的革命。但它確實代表經濟所有權的物質變革與社會角色的象徵變化。如同現在承擔公司財務績效主要風險的核心勞動力，他們也將風險負擔的形式從受薪勞動轉變為投資。當耐久財的和具轉型能力的產業，勞工保住工作後頂多能承擔雙重負

擔。他們不僅必須處理他們工作中更多的自動化操作與「自我引導」，還得拿他們的退休金來直接投資並降低薪資水準，以便支撐他們的工作。

因此，勞工收購代表以未來作抵押。除了英國盧卡斯航空（Lucas Aerospace）的罕見實驗外，勞工收購仍舊是獨特的美國經驗，利用世界上最多樣化的金融機構，支持最富裕的退休金體系。可是，當公司無法從私人市場或州政府募集新資金時，勞工收購就是公司的最後手段。它們只能充當為了更新產業而募集資金的暫時解答。不過，當企業接管和垃圾債券沒落，員工持股計畫作為一種可為社會所接受的方式，在強化勞動生產力和集資兩方面頗獲金融社群青睞。¹¹

員工持股計畫和經濟發展局貸款保證，雙雙陷入市場判準下進退維谷。可能因失業而一貧如洗的勞工還是「有錢」買工廠。同樣地，如一名經濟發展局官員所言，如果公司「有錢」償還貸款，一開始就不需要申請貸款保證。而且假如公司過於「窮困」而無法成為好的信貸保險對象，它肯定會違約。事實上，麥克路斯是唯一沒有拖欠經濟發展局貸款保證的公司，這項保證是根據1978年小型鋼鐵製造商專案核發。被視為信貸風險更佳的大公司，像LTV和惠靈—匹茲堡，最後都提出11章破產保護申請。相形之下，使麥克路斯獨樹一幟的要素，除了它的現代廠房和底特律區位外，是地方風土對公司的支持。研究者針對1970年代勞工所有權的研究發現了某些成功要素，麥克路斯和威爾頓都誇大了這些要素，但這現在都發生在縮減規模的產業、激烈的全球

競爭，以及勞動讓步的脈絡中。¹²

雖然每個潛在的關廠，都會引發穿透地方商業和政治社群的震動，麥克路斯卻在它的企業律師、地方銀行及密西根商業部這方激起了真實的承諾。每個行動者都各自決定不讓公司倒閉，他們在此共識下合作無間。在鋼鐵工人聯合會地方工會外頭指導工會策略的哈利·萊斯特協調勞工，猶如戴夫·羅伯森（Dave Robertson）在威爾頓的作為。萊斯特將地方工會的基進傳統轉變為企業動員手段。因此，威爾頓馴服的公司工會看來不會是決定性因素。然而重要的是，「企業家的」地方力量不會橫遭市場制度阻擋的情勢。

許多參與重建麥克路斯和威爾頓的玩家（尤其是來自金融社群者），均強調勞工必須展現出「犧牲的意願」。但有兩項額外因素同等重要。金融機構代表必須真正承諾投入維護公司的存活並據以行動。這種程度的承諾顯現在威爾頓的所有外聘顧問，以及麥克路斯的第二次重組。但這種承諾在麥克路斯申請第11章破產重組期間顯然缺席了。另一個要素是沒有既不出售、也不維持工廠營運的大企業形式的障礙。這是個重要對比，一邊是威爾頓和麥克路斯，另一邊是楊斯鎮、拉克萬納（Lackawanna）和艾倫伍德鋼鐵（Alan Wood Steel）。

即使依照這些標準，1982年麥克路斯的存活純屬僥倖。擔保債權人以其操控的一切金融力量攻擊公司。他們實在看不到小型、獨立擁有的國產鋼鐵廠有未來可言。沒人料得到他們無法使公司停工。儘管舊東家有種種無能，股票也掌握在「孤兒寡母」

手上，加上「笨手笨腳」或「鄉村俱樂部」式的管理，麥克路斯仍設法保留了地方凌駕市場力量的自主性。1982年哈利·萊斯特不太可能在不同的地方地景中做到這種地步——像南芝加哥、水牛城，或賓州的康舍霍肯〔Conshohocken〕——這些地方的大型鋼鐵廠掌控了勞動市場。

此外，不同於威爾頓，仰賴重工業的政治經濟集團有助於麥克路斯的生存。1982年公司破產重組期間，鋼鐵工人聯合會第29區所代表的其他11家工廠，提出第11章破產保護申請。五年後，員工持股計畫協商期間，底特律最大的工具機製造商斯奈德工具與模具公司（Snyder Tool and Die）停工。勞工和社區都沒有動員起來拯救這座工廠。允許風土改變且存活的麥克路斯生產性勞動，究竟是優點、還是缺點？

麥克路斯得救的方式，抵觸了美國鋼鐵工業的對抗性歷史，以及熊彼得式的個人企業家傳統。1950年代至1970年代，通用汽車對待麥克路斯的方式宛如一家日本產業銀行。它對鋼鐵製造商的財務承諾，容許麥克路斯長期投資於新科技。通用將麥克路斯排除於供應商依賴網絡，麥克路斯自己的供應商協同工會的督促，迫使公司重組。這令我們想起日本供應商與日本政府間的強大社會網絡。密西根州也因強迫勞工與管理階層尋求共識，而表現得像日本通產省（MITI）或歐洲國家的中央政府。然而跟這些外國政府不同的是，密西根州官員並未扮演明確或界定清楚的制度角色。而且不同於私人金融機構，他們因私人利益而行動，但並非為了眼前的利潤。他們即興演出其角色的市場文化，是利用

而非摧毀地方規範。

對所有聽起來有外國味道的創新而言，這些安排反映美國經濟行動者市場文化典型的「內化統合主義」。畢竟哈利·萊斯特答應密西根州長不會令他難堪。州財政部長鮑勃·鮑曼的工作和人脈促進了與金融社群的合作，也仰仗萊斯特約束工會。萊斯特與密西根商業部長也有長期的政治結盟。施壓從事二次重組的原料供應商也仰賴公司。區域產業越是縮減，社會連帶就越緊密。那些倡議透過勞工所有權或地方控制來對付產業撤資的人，並未預見這些變化。

然而從長遠角度來看，經濟權力的地方地景，不能指望由汽車和鋼鐵生產來重構。檢視威爾頓及底特律下游區周邊的就業變化，確認了服務業工作成長及女性勞動力的全國趨勢，尤其是在健康照顧、學校與零售業方面。世代與家戶變遷反映了這些轉變。譬如，在一名麥克路斯鋼鐵工人的家庭裡，男人在三代裡經歷了向下流動。40多歲的丈夫是工會活躍分子，他的父親也是技術熟練的工人；兒子則是一位年輕的鋼鐵工人，於1980年遭解雇。但妻子有個公共部門的行政工作，女兒則在附近的零售商店工作。這是麥克路斯及許多其他製造業公司裡的典型家戶，工資與福利讓步及解雇，將更多妻子和女兒送進勞動力。更多這類型工作將在去工業化的未來地景中創造出來。¹³

底特律都會區預計將成為分隔地景。假如像麥克路斯這種公司要靠生產力和新科技的基礎生存，唯一的辦法是持續再訓練老化的員工（由州政府補助），並大幅刪減新聘人員。提供通向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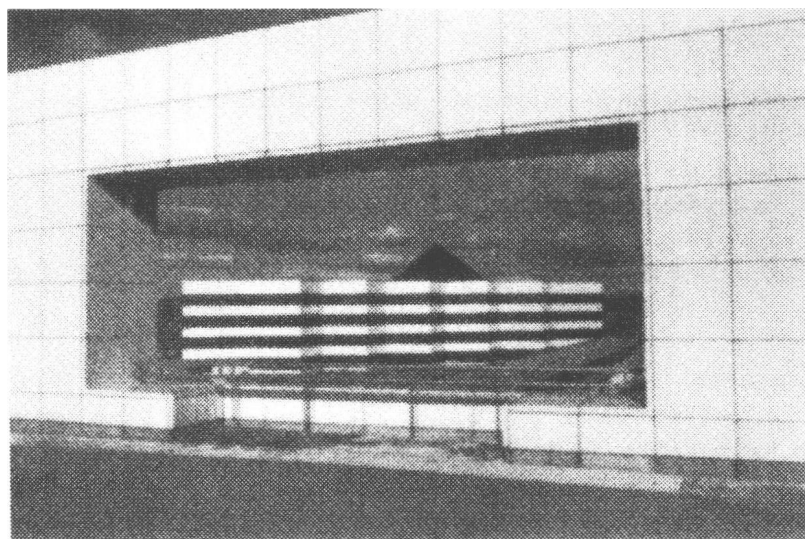
動市場的管道，代代相傳的鋼鐵和汽車工作社區網絡已經打破。非正式的地方風土已被如電腦識能和正式技能這類資格的官僚控制取代。但在能適應這些新規範的生產性勞動裡，風土會生存下去。確實，底特律下游區及其他密西根郊區與鄉鎮的高度自動化產業升級，保存了白種藍領的風土，卻令底特律內城主要是非裔美國人的貧困風土持續付出代價。在大湖區，尤其像底特律這種湖濱城市，黑人男性生產勞工比起任何其他勞工類別，更可能因停工和自動化而遭替代，也較不可能從高科技產業的工作成長中獲利。¹⁴

不過，即便是下游區，地景也是分隔的。麥克路斯正在考量將超過直布羅陀廠址半數的 500 英畝，賣給打算興建像內港（Inner Harbor）這種觀光兼娛樂建築群的巴爾的摩不動產開發商。附近已有另一座遊艇設施——古德里奇公司（B. F. Goodrich）的一座舊廠房被改建為小艇碼頭。沿河鐵道運輸也在幾年前結束，但是對下游區產業發展極度重要的水濱，暫時由兩種截然不同的經濟地景共享：工業年代的鋼鐵廠與後工業的娛樂船塢。

維持位於費爾萊恩（Fairlane）與奧克蘭郡的其他底特律郊區的企業辦公室與購物中心典型地景，也會造成問題。在工作成長與新建設的表面下，藏著最終過度開發的議題。隨著更多黑人中產階級搬到郊區，這個議題將變本加厲。譬如，迪爾伯的工業郊區因福特汽車公司的隔離主義城鎮規劃政策，導致與種族多樣性長期隔絕。然而 1980 年代的費爾伯恩（Fairborn）遭遇一場由

全國有色人種促進會（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提起的訴訟，訴求進入市立公園這類公共地方的平等近用權。在北部，奧克蘭郡的黑人居民已持續成長。相較於更多從事重複性生產工作的黑人而言，保存麥克路斯這種鋼鐵廠，或是更高度自動化的汽車製造廠，可以替相對少數已在這類工廠工作的黑人留住工作。但底特律的其他黑人居民無法獲得適當的經濟基礎，推動自己的郊區化。風土所仰賴且長期存在的經濟與社會制度已然消逝。

133



貝聿銘，IBM 設施，索莫斯（Somers），紐約（1989）。感謝 IBM 允許刊登相片。

第6章

工廠與購物中心

威切斯特郡的權力與均質性

大自然輕撫的康乃狄克州赤郡（Cheshire）城，安頓於滿布壯觀老樹、鄉間花卉、連串瀑布和蓊鬱草地的起伏山巒間。現在這裡是布魯明岱爾郵寄有限公司的新行政辦公室和分銷中心所在地，赤郡迷人的寧靜之美，果真令我們飄飄然……。

這座城市歷史豐饒，始於1712年的銅礦開採僅屬其一。今日，該城除了是從單人機械廠到大企業各種產業落腳處，也是紐哈芬（New Haven）和哈特佛（Hartford）通勤者的郊區。

——布魯明岱爾百貨公司，耶誕節型錄，1987

底特律和多數美國其他大城周圍的分隔地景，顯示城市及其郊區的意義有了大逆轉。直到晚近，我們才將城市設想為經濟的心臟地帶，其龐大財富滋養了周邊顯然是附屬性的區域文化。城市有煙囪；郊區有大片住宅開發。城市有豪華辦公大樓；郊區有緩慢的通勤火車。城市有提供原創表演的戲院和音樂廳；郊區有大眾文化衍生的購物中心與汽車電影院。社會空間的分化重複形

136 隨機能 (form following function) 的模式，「郊區化」被視為源自城市生產性功能的消費形式。然而更重要的是，城市總是金援郊區：城市銀行投資建造高速公路與購物中心；城市辦公室的工作則支付郊區房屋貸款。城市「社會問題」的集中，推動所有負擔得起搬遷的人往外遷入郊區。即使在最浮誇的文化再現裡，也從未想像郊區會與城市競爭，成為生產性財富的來源、經濟權力的地景。

威切斯特郡 (Westchester) 的遼闊草原和綿延山巒，塑造了沿哈德遜河到康乃狄克州的紐約市北部邊界，是美國主要企業總部據點之一。美國獨立戰爭前，英國移民墾植了威切斯特郡。19世紀末，仍由他們子孫擁有的哈德遜河谷不動產，吸引了城市買家——威廉·洛克菲勒 (William Rockefeller)、小約翰·洛克菲勒 (John D. Rockefeller, Jr.)、傑依·顧爾德 (Jay Gould) ——建造鍍金時代 (Gilded Age) 的別墅、馬場與鄉村俱樂部，這不但是國家菁英，也是都市菁英的消費地景。大蕭條初期，威切斯特郡還有「四分之三」未受都市或工業發展「染指」。但在1950年至1985年間，許多企業總部和其他辦公室沿紐約州塔里頓 (Tarrytown) 和康乃狄克州格林威治 (Greenwich) 之間的跨威切斯特高速公路興建，這段公路稱為「白金哩」 (platinum mile)¹ (見圖 6.1)。

威切斯特郡的創造性破壞反映一系列的常見因素。一開始是去工業化，亦即威切斯特郡南部城鎮的製造業衰退或被接管，卻無法吸引新產業。這些因素也包括企業辦公室分散到紐約市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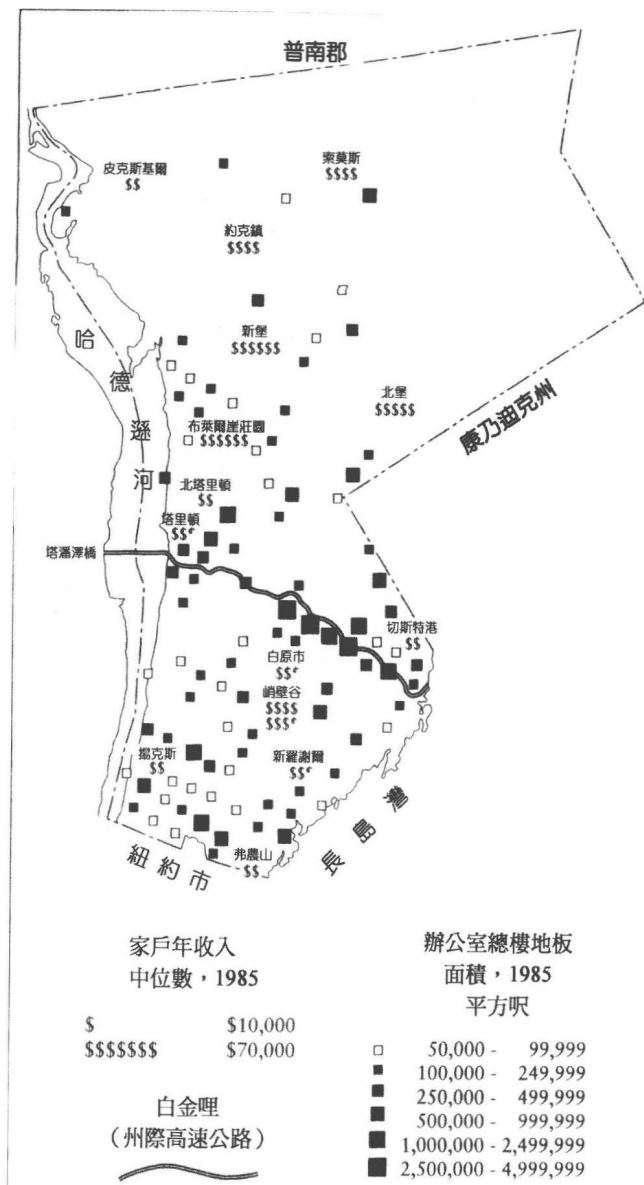


圖 6.1 威切斯特郡商業發展與家戶年收入中位數
(威切斯特郡規劃局，1986 年)

外，遷到像「白金哩」沿途的郊區域鎮和鄉村。這與近年來因市中心勞力與辦公空間的高昂成本、稅法變革及併購而加速企業功能重組有關。這一切的發生大都獨立於威切斯特郡。但土地使用分區法令和都市規劃所引導的不動產開發，總是暗指當地以地方為基礎菁英的隱匿之手。因此，威切斯特郡的地景也反映了公私經濟權力的全郡協調。這些創造性破壞過程的產物就是原型消費地景。然而相較於先前的郊區地景，消費空間和企業辦公室並存，後者以資金支持且將特殊的中上階級住宅地產開發模式脈絡化。威切斯特郡被整合進跨國服務業經濟，也提供一個視角，涉及在新權力地景中維持傳統社會階級和種族區分。

138

如果我們只看去工業化和企業總部區位，威切斯特郡的創造性破壞看來可能只是市場力量或總體經濟趨勢的縮影。然而，創造出如此明顯均質化地景的能力，也呈現了對地方擁有強大勢力的當地行動者刻意且長期的努力。20世紀初，威切斯特郡的土地菁英體認到，具社會均質性的土地開發有排除工業用途的高風險。二次大戰後，他們創造的環境正好迎合荷包滿滿的企業領導人的財務與組織策略。如同19世紀許多英國和美國資產階級郊區的居民，威切斯特郡逐漸成長的富裕消費者，有意嘗試將較低階級排除在他們的優雅之境。²

威切斯特郡也代表我們一系列5個20世紀地景的中點。原來根據工廠城鎮生產及鄉村住宅消費而組織的威切斯特郡，將其現代成長奠基於提供日益增長的中上產階級得以享用的新消費地景。該郡的地景有部分是回顧19世紀的郊區，別墅主人在鄉村俱

樂部、林蔭道及自家地產的庭園裡消費「自然」。但威切斯特郡也前瞻更為擁擠的 20 世紀郊區地景，屋主、購物者和企業員工在商業中心、停車場和辦公室裡消費「文化」。經濟發展策略導致有趣的弔詭。儘管視覺均質性很容易維繫，社會均質性的建構卻持續引發問題。

郊區地景

至少一百年來，「都市化」既包括城市的穩定成長，也涉及經濟活動同步往城市外圍郊區分散。1850 年代以降，工廠開始從最發達的都市核心，外移到郊區邊緣尚未建設的農地。自 1910 年起，工業郊區最終形成一種分散化的聚集，成為一種獨特的美國社會—空間形式。不像早先歐洲的類似情況，美國工業郊區在不同地景中獲得最佳發展。美國企業往往選擇將廠房遷至空間寬敞的自然環境，令它們林木蒼鬱的「院區」，擁有跟郊外住宅居民選擇的田園風光相同的品質。然而 1925 年後，地方公路營造商和大地主與州議員結盟，替道路建設提供資金，貨車運輸變得稀鬆平常。一旦美國國會規劃全國公路系統，則幾乎所有新工業建設都會在郊區展開。³

139

便宜的土地、運輸和成長空間：這些就是郊區天命的根源。替代選項是都市擁塞、高稅金和勞工衝突，地方隨時間而施加於市場力量上的一切阻礙。到了 20 世紀初，對奠基於地方和市場——亦即經營土地與利用勞工——的企業家而言，美國舊城代

表高度專業化，以及多少有所限制的社會—空間結構。舊地鐵系統——尤其是在紐約——截至 1910 年已擴張到獲利極限。這情況限制了發展更多地鐵線路的可能，而更多地鐵線意味替密集的工商業發展開闢更多城市地區。因此，想靠地方謀利的大地主，鎖定能支付最高租金、位居核心地段的投機性辦公室開發。由於不動產的投機，都市土地的高昂價位令匯集大片土地變得困難，也使建造新工廠在實際上成為不可能。

廉價運輸和良好通訊的同步發展，使全球尺度上的時間得以消滅空間，也敞開郊區以供各種用途。同樣的，資本集中於更少的企業手中，也使辦公室就業聚集於少數大城市，同時將連結這些城市及周邊住宅郊區的鐵路線迷宮合理化。在這種宏大背景下，展開地方地主的財務策略。有先見之明的土地菁英會嘗試駕馭公共權力來促進其私人投機利益。他們會在任何環境下發展並控制城鎮規劃機構。但是在郊區，他們也仰賴傳統上城鎮與鄉村的政治片斷化以獲取行動空間。村鎮政府往往無力對抗大規模開發計畫（例如住宅、道路與區域購物中心）。然而，除了這些小地方單位，全郡尺度的相對開放鄉間，提供開發商及土地菁英建造新權力地景的機會。⁴

不過在 1920 年代，開闢美國郊區以供中產階級居住的住宅開發，於大蕭條時期走進了死胡同。地方土地菁英想繼續開發，試圖合併他們的利益與聯邦政府的利益。結果自 1930 年代起，聯邦大力資助郊區開發，使密集的空間重組迎合社會均質化的規範。1933 年以降，聯邦制住宅所有權方案一貫低估核心城市價

值，卻偏愛郊區。同時，聯邦指導方針心照不宣地將公共住宅讓給內城，卻替郊區保留有公共補助的私人住宅開發。聯邦機構將非白人家庭排除於政府抵押貸款及抵押擔保等補助之外。他們還為種族契約背書，禁止白人郊區屋主賣房給非白人。當聯邦住宅管理局（Federal Housing Authority, FHA）指導地方員工如何衡量地區品質時，會強調「經濟穩定」和「防止敵對利益」。這些成認是用來拒絕城市社會異質性（尤其種族）的代稱。⁵

同樣的，二次大戰後，白人勞工階級與中產階級家戶湧入許多郊區——包括威切斯特郡——的浪潮，受到城鎮土地使用分區法令嚴格控制，這些法令偏袒較大塊的土地，賦予開發商拒絕可能買家的法律自由。然而，在美國大部分其餘地方，開放郊區以供大規模住宅開發，則是從空間上界定新的市場文化。郊區的社會—空間模式，典型上乃錨定於戰後時期的地方與市場安排。此外，大規模郊區化替戰前的消費不足問題提供了總體經濟的解答。買一棟房子，至少一輛汽車，以及家庭設備，遂將家戶整合入大量生產及消費的全國地景。事實上，二次戰後有85%的新美國住宅蓋在郊區。⁶

均質性是權力的地景

儘管郊區土地有異質的用途，物質地景與象徵地景卻強化了均質的意象。在建成環境裡，專供消費的郊區空間總量（包括新住宅與公立學校、鄉村俱樂部與購物中心），以及興建這些設施

前所未有的規模，創造出一種與城市的多重消費及生產地景形成對比的單一物質地景。再者，白人居民的壓倒性現身，以及新郊區住宅所有權局限於負擔得起住在那裡的社會階級，象徵城市富裕與荒蕪分裂的地景消失了。

由許多在大企業裡擔任管理職位的新郊區屋主，其地理與社會上的雙重流動性，也界定郊區的象徵地景。他們的流動性反映由全國性內部勞動市場支撐的全國企業組織的成長。要從這些內部勞動市場竄起，往往必須在企業的不同部門間調動，因而需要在國內各區域之間移動。一本有關 1950 年代的暢銷書，將郊區企業員工——「組織人」，形容為「離家的男人」。⁷

雖然組織人的個性幾乎完全由其工作塑造，但他和妻子也是「新郊區」的社會棟樑。他們或許成長於城市或小鎮，但移居郊區代表社會階級的晉升，而由於有如此多人同時升級，遂支撐了一整個世代的結構性流動，並超越社會階級這個觀念。換言之，企業郊區社會均質的物質地景，呈現出無階級的中產階級意象。這就是大多數人會跟戰後郊區發展聯想在一起的象徵地景。

若這種地景果真以權力地景為特色，則這種權力無疑是美國個人造就自身命運的權力。然而，郊區的持續發展證明大規模官僚經濟力量的存在。郊區發展源於大型房地產開發商與金融機構、聯邦政府，以及全國企業的努力。他們的經濟力量不僅創造了企業郊區，還有「企業購物中心」和「企業帶」（corporate strips）。標準化建築與「去中心」的社會生活雖然危害不小，商業帶和購物中心卻仍是重要的臨界空間（liminal space）。它們

既是公共的、也是私人的——私人擁有，但為公眾使用而興建。它們既是集體的、也是個人的——用於現代狩獵採集的集體儀式，但也是個人欲望的所在。再者，它們是位於家庭、汽車和地方商店的私密性，與連鎖商店、品牌和都市多樣性的非個人性混雜之間的臨界空間。此外，購物中心既是物質的、也是象徵的：它們將物質形式賦予消費的象徵地景。購物中心掩飾了個人選擇過程裡的經濟力量集中化，而其意象引誘男男女女堅信均質的大眾消費地景。⁸

然而在這種意象底下，郊區均質性反映了三種重疊的創造性破壞過程：去縉紳化（de-gentrification）、去工業化，以及企業辦公室的遷址。

在去縉紳化過程中，開發商創造現代郊區的方式，是從較富裕且通常是社會名流的前居民那取得地產。隨著時間過去，購買郊區住屋的「土地仕紳」，比先前的居民擁有更小的土地和更標準化的住宅設計。這不必然影響郊區住屋的經濟價值，它們與通貨膨脹和對社會均質性的追求並駕齊驅。

1880 年至 1900 年間，當紐約市金融家向殖民菁英後裔購買房地產，威切斯特郡首度經歷了去縉紳化。鍍金時代的暴發戶擁有強大的經濟勢力。例如，地產主傑依·顧爾德擁有紐約中央鐵路公司，所以他能隨手攔下一列通行的火車，前往他在城市裡的辦公室。然而這個階級的社會聲望，沒有獨立戰爭前的舊家庭那麼顯赫。1920 年代末發生了另一波去縉紳化，這時的開發模式轉變為在相對狹小的土地上興建大型住宅。因為有了

汽車，這類住宅大多坐落於遠離火車站的威切斯特郡深處。新居民不是像洛克菲勒那麼富裕的社會名流，但他們絕非勞工階級。1930年，威切斯特郡居民在銀行金融業工作的比例，幾乎跟紐約市一樣。⁹ 這段期間住宅開發商保存了威切斯特郡綠草如茵的地景。在高收入住宅社區，像布隆斯維爾（Bronxville）、峭壁谷（Scarsdale）與晚禮服庭園（Tuxedo Park），開發商依循自然地形、保留樹木，修建蜿蜒的道路，而且只出售大片的土地。例如1880年代威廉·凡杜澤·勞倫斯（William Van Duzer Lawrence）開發布隆斯維爾，就提供多種風格的大型住宅——都鐸式（Tudor）、羅馬復興式（Romanesque Revival）、義大利風（Italianate）——這是早期的「後現代」行銷決策。

1950年代，戰前郊區仕紳哀悼他們郊區生活方式的終結，因為建在四分之一畝地上的「廉價建材」住宅，侵占他們的馬場、樹林和高爾夫球俱樂部。小威廉·懷特（William H. Whyte, Jr.）在《組織人》的一個註腳裡講述了一對夫妻的趣聞，他們賣掉賓州東部一些地產給開發商，後者替鄰近的伯利恆鋼鐵廠經理蓋了大片住宅。這對夫妻後來批評伯利恆鋼鐵的董事長（他們的密友）雇了缺乏美學品味的經理，太太們講話時還帶著中西部的鼻音。

1950年代的去縉紳化，也替威切斯特郡同時帶來令人渴望和不受歡迎的改變。一方面，二次大戰後聯合國總部設於紐約市（建於小約翰·洛克菲勒購置並贈予該世界組織的土地上），許多聯合國大使在威切斯特郡置產。這無疑讓有些房屋免於衰敗、

拖欠地產稅，以及貪婪開發商造成的破壞。但另一方面，1950 年代早期，相對富裕的中產階級社區開始擴張，連同企業辦公室從紐約市遷移至此，令許多舊仕紳驚慌失措。隨著最感委屈的居民往北遷至普南郡（Putnam County），儘管擴大了稅基，郡裡仍組成一個直言不諱的反開發團體。去縉紳化的意見嚴重分歧，以致一名當地作家以不能當真的「斯洛波維亞（Slobovia）即將來臨的危機」作標題，警告威切斯特郡的社會分裂。¹⁰

舊郊區的另一種創造性破壞過程是**去工業化**。不過，不像底特律的下游郊區，多數人將威切斯特郡的去工業化視為值得嚮往的轉變，因為「過時的」工業將由新服務業工作取代。再者，大多數工業被隔離在威切斯特郡南部城鎮。最直接遭受工業工作喪失衝擊的是當地少數族裔和藍領人口。這也不是個劇烈變動的過程。在幾乎整個 20 世紀裡，威切斯特的地方工業一直陸續關閉。雖然 1899 年以後，該郡製造業工作持續成長，促進南部城鎮繁榮的輕工業卻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逐漸消逝。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該郡與工業的關聯度甚至更低。1940 年代晚期，威切斯特郡獲得紐約州新設工廠價值的最小分額，低於曼哈頓獲得的新工業投資。1942 年至 1951 年間，郡內主要工業部門的製造業，工作大多急遽減少，但服務業和營造業工作一片榮景。金屬製造業幾乎喪失半數工作，伐木業工作減少 25%，運輸設備製造業則少了 20% 的勞工。不過與此同時，營造業工作成長超過 200%，金融工作增加 500%，商業服務的就業擴張超過 600%。如果這是個去工業化的案例，那麼這顯然是幾乎所有人都贊許的個案。¹¹

1960年代期間，去工業化與去縉紳化持續重繪地景，帶來弔詭的後果。一方面，製造業就業機會急速下降，來自勞工階級家戶的住宅壓力（尤其是住在南部城市的非裔美人），開始影響鄰近的住宅區。另一方面，儘管企業辦公室與企業居民湧入，提高從阿蒙克（Armonk）到峭壁谷的鄉村與城鎮稅基，卻也使猶太人和少數族裔主管遷入盎格魯撒克遜白人新教徒（WASP）的處女地。弔詭與否，創造性破壞的效果必然會迎合以地方和以市場為根據地的企業主。服務部門的擴張則餵養了不動產開發的貪婪胃口。

這些變遷過程微妙改變了威切斯特郡的象徵地景。新居民和企業活動造成的去縉紳化，使威切斯特的社會異質性比以往任何時刻都高。譬如直到1960年，共和黨的登記投票人數遠遠超過民主黨，共和黨鐵定能在所有選舉中勝選。但到了1968年，威切斯特郡登記的共和黨人數相對於民主黨，僅達二比一。民主黨的候選人開始贏得地方公職，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的選票在1960年至1984年間穩定成長。

可是，去工業化以空間同質性的效果，抵銷了這種社會異質性。1950年以後，隨著傳統工業衰退和公共住宅開始興建，大多數工業勞工階級，尤其是黑人和西班牙裔，越來越往南部城鎮和舊製造業中心聚集。同時，企業辦公室的遷址，將菁英住宅區轉變為富裕的商業郊區。這些郊區現在有雙重優勢。上層階級居民和高社會地位白領雇員的結合，使他們保持均質的時髦闊氣形象。為經濟所苦的南部城鎮的同質性，則相對反映他們低下階級

居民和藍領勞工的集中。到了 1980 年代，經濟力量將威切斯特郡分割為兩個均質地景：基於消費的富裕地景與基於工業生產的荒廢地景。¹³

因此，我們可以從三個重疊的經濟視角，檢視威切斯特郡的均質地景：去工業化、企業遷址和去縉紳化或不動產開發。每個視角都反映了結構變遷和個人行動的後果，同時生產出「自然的」和社會建構的地景。

去工業化：從 OTIS 升降機到 IBM

直到最近，威切斯特都是紐約州的主要工業勢力之一。1909 年，它的工業生產緊追著紐約和伊利湖（Erie）各郡（伊利湖環繞著工業城市水牛城）。晚至 1954 年，威切斯特的工業就業僅次於紐約、伊利湖，與長島上的拿索（Nassau）郡。這段期間，揚克斯市（Yonkers）一直是威切斯特的重要工業中心。不過自 1970 年代，揚克斯就深受工廠關閉、財務危機，以及地方民選官員面臨經濟衰退時的亂無章法所苦。

揚克斯擁有威切斯特郡規劃者深惡痛絕的荒廢地景。這令他們想起布朗克斯（Bronx），某些揚克斯市的白種居民當初就是逃離自那裡的衰敗。此外，1980 年代期間，揚克斯市議會決定違抗聯邦法庭廢除公共住宅及公立學校種族隔離的命令。不過，從 17 世紀到 20 世紀初，揚克斯支持朝氣蓬勃的製造業經濟。在城市的密集生產與威切斯特郡擁有土地菁英的非勞動地景之間，當

地的勞工階級社區代表了中間立場。

早期工業家只利用哈德遜河與鋸木廠河（Saw Mill river）的豐沛水力驅動木材廠及糖廠，下一代工廠主則更具企業家精神。他們開發新產品與生產這些產品的新技術以致富，也時常賠錢。事實上，19世紀末揚克斯工廠主生涯投射出的正是工業企業家形象。例如約翰·華林（John Waring）的家族製造了令揚克斯聞名的一種毛帽，也開發出生產毛帽的製帽機。1880年代擁有一座地毯工廠的亞歷山大·史密斯（Alexander Smith）是城裡最大的屋主，他發明比著名的麻州比奇洛（Bigelow）織布機更好的動力織布機，製造織錦、絨毛和艾克斯敏斯特地毯（Axminster）。該城最著名的企業家查理斯·奧提斯（Charles Otis），從簡單的保險栓改良開發出乘客升降機，1852年在揚克斯建立奧提斯升降梯公司。比利時移民里歐·貝克蘭德（Leo Bakeland）在他的揚克斯實驗室裡發明酚醛樹脂（Bakelite）；這種塑膠在20世紀廣泛用於收音機、馬桶座和武器系統。¹⁴

發明與工業相互強化成長，有兩個力量來源：實力堅強的地方銀行與蒸汽，兩者都由城市工業菁英掌控。1900年左右，它們看來必定像會永享無止盡的成長。然而回想起來，這個城市的工業未來有其限度。除了火災和破產的尋常數目，還有揚克斯最大的幾間公司傾向於壟斷技術創新和銀行貸款。這可能強化他們的產業——釀酒、機械、毛毯紡織與印刷——卻很可能是限制其他產業才獲得的發展。此外，許多揚克斯公司仰賴地方市場。這使它們在面臨紐約市較大公司的競爭時顯得脆弱。¹⁵

查理斯·奧提斯於 1860 年代辭世時，奧提斯升降機公司只僱了 8 至 10 個人，價值只有 5,000 美元。該公司在內戰後的建設榮景中生意興隆，卻在 1873 年大蕭條中喪失半數資本。但十年後，成功已確保無虞。公司在揚克斯的工廠僱用 350 人，現場裝配方面另僱了同樣多人。美國的工業與都市擴張提供對奧提斯產品的需求。1854 年，公司只建造 5 或 6 台升降梯；1883 年工廠則生產 600 台，包括與其他建築機械連結的液壓、蒸氣和「輸送帶」升降梯。商業成功強化它在地方社區的地位。「整體來看」，1886 年出版威切斯特郡史的作者說道，「奧提斯兄弟多年來都是揚克斯及全郡商業、社會和宗教生活的有力人士」。¹⁶

147

奧提斯升降機藉由發展新科技和擴張市場而持續成長。1920 年代的建築榮景提高升降機的銷量，興建更高大樓的趨勢則要求更精密的產品。百貨公司的成長與分店也增加了需求，奧提斯則以更安全、流線型的電扶梯回應市場。此外，在 1940 年代，公寓和辦公大樓業主試圖以自助升降廂取代電梯操作員以削減經常費用，奧提斯就開發了新型自動科技。¹⁷自從 1889 年艾菲爾鐵塔裝設奧提斯電梯，該公司就為其產品找到了全球市場。奧提斯最後建立了海外工廠。到了 1980 年代，歐洲奧提斯在全法國 24 個據點擁有超過 5,000 名員工，大多數位於巴黎的工業郊區。在北美洲，生產則在好幾個區域性地點進行。¹⁸

雖然奧提斯在其歷史上培育了其他公司，本身卻於 1975 年被更大的聯合科技公司掌控。聯合科技先以 2,760 億美金收購公司 70% 的已發行股票，然後使出低劣手段令奧提斯成為其全面

掌控的子公司。當時，奧提斯已是世界上最大的升降梯和電扶梯製造商，每年建造並裝設 20,000 具新設備。延續 1883 年設下的模式，奧提斯將核心業務等量齊觀地集中於製造和服務合約。作為聯合科技的一部分，奧提斯享有某些優勢。雖然聯合科技的主要業務是建造飛機和引擎，但該公司於 1978 年併購幾家電子公司，令奧提斯得以運用微處理器發展更具彈性的升降機科技。1980 年代初期，聯合科技的營造系統部門，包括奧提斯、開利空調（Carrier Air Conditioning）和某些較小的單位，占該企業 138 億美金營業額的四分之一及約五億元營業淨利的三分之一。¹⁹

從 1852 年至 1976 年，揚克斯獲益於奧提斯升降機公司的持續擴張。好幾個世代的揚克斯居民都在奧提斯工廠工作。經理可能招募自當地居民和外來者，但生產勞工主要來自城市西區的傳統愛爾蘭和義大利勞工階級鄰里。1970 年代初期，這批勞動力透過平權措施（affirmative action）而於種族上整合，提供有工會保障的工作給非裔美國居民。當管理階層於 1968 年要求市政府協助擴張新廠房時，四層樓的磚造母廠裡僱用約 1,300 名當地居民。奧提斯操縱了地方工廠與地方社區之間的關係。城市則渴望留住它少數僅存的大型產業雇主。地方官員湊出一筆美金 1,390 萬元的公共開發基金，部分來自聯邦與州政府，部分由揚克斯市提供。聯邦與州的基金用於取得且核准位於衰敗市區和火車站中間、與最初的奧提斯工廠相鄰的九英畝基地。市政府將該處 60 間商家和幾百個家庭遷離安置，然後以十分之一的價格將土地賣給奧提斯。奧提斯支付 539,000 美元給市政府，承諾花費 852,000

美元改善基地。公司總共花了1,000萬美元新建廠房，自1976年起營運。就在此時，聯合科技接管了奧提斯。²⁰

六年後，奧提斯資方宣布關閉揚克斯的新廠。雇用人數已從1,300縮減為375人，但管理階層並未要求減薪，也沒事先通知，而且不考慮與奧提斯員工的集體談判代理者「國際電子工人工會」（International Union of Electrical Workers）協商。這些年間，歷任揚克斯市長雖然對聯合科技或奧提斯的擴張都不熱衷——馬汀內里（Angelo Martinelli）市長擁有的印刷廠必須從奧提斯的廠址遷出——市政府卻決心保留奧提斯的工作。市府官員堅持，晚近對該廠的公共投資使他們有資格期待這間工廠延長年限，這麼做並不過分。工會和前任市長都沒採取主動，1974至79年擔任市長的馬汀內里，與1982至87年的另一位市長，則試圖與奧提斯管理階層協商。在1982年11月正式宣布停工前幾個月，資方斷然拒絕市長的提議，並且否認他們有關廠的打算。

芝加哥與麻州新貝德弗德（New Bedford）的當地官員，也面臨工廠在投入公共基金後關閉的情況，一如他們的做法，揚克斯市試圖控告聯合科技違約。但是並沒有正式合約保證工廠的壽命，而且市政經理人甚至曾簽署文件，表明聯合科技已完成都市更新補助款的所有條款。市府律師尋找其他法律策略，檢視都市更新計畫條款，以確認市政府能否限制聯合科技將廠房租給其他公司。這些律師加入一個奧提斯特別小組，由住宅暨都市發展局（HUD）及紐約州立都市開發公司代表、私部門從事公益服務的企業律師，還有郡政府與市長辦公室的成員組成（截至

1982年，郡政府及市府官員都是民主黨人士，傾向採政府行動主義）。

為了公開宣傳，馬汀內里市長率領示威者車隊，到康乃狄克州哈特佛市（Hartford）的聯合科技公司總部，並在揚克斯工廠外圍舉辦燭光監守。他還要求州議會制定工廠關閉必須事先通知的法案，比美國國會最終通過類似法律還早了六年。儘管有新聞界的同情報導，以及針對接受公共補助後必須留駐城鎮的公司責任，法律教授發表了一些支持聲明，市政府仍未成功將奧提斯工廠留在揚克斯。市府官員甚至連官司都沒贏，無法收回做為都市開發補助款一部分而放棄的房地產稅收；那場訴訟因技術細節而遭駁回。州或聯邦政府的更高階民選官員，也沒有在奧提斯一案中協助揚克斯市政府。

無論如何，就利用都市發展基金以促進製造業而言，揚克斯市在威切斯特郡城鎮中都是獨樹一格。1960年代中期，自威切斯特郡首府白原市（White Plains）實施大規模商業區重建以來，幾乎所有都市更新基金都用於興建辦公場所。但揚克斯市別無選擇。威切斯特郡的工業建設相對稀少。1960年代以降，所有新建辦公室的最大分額並未分配至該郡南方，而是位於該郡中部白原市內外。與這座喧囂城市及其周邊的購物中心相反，僅幾哩之遙的揚克斯市中心，卻四散著商業空屋。揚克斯市唯一的吸引力，似乎是馬汀內里市長向《紐約時報》讚美的、可食用的族裔遺產：猶太糕餅（kugelach）〔譯按：原文拼錯，應為rugelach〕、義大利圓錐糕點（sfogliatelle）、波蘭復活節麵

包，以及法國奶油蛋糕（Napoleons）。

揚克斯部分地區令人聯想起鏽帶（Rust Belt）^[1]的荒廢地景，而奧提斯關廠的背後原因依舊不明。奧提斯早在1973年就已做出逐步撤離工廠的決定，甚至早於擴張的完成。1972年的經濟衰退和1973年的石油危機，導致辦公室建設衰退，自然降低了對新奧提斯產品的需求。但是其他奧提斯工廠並未停工，1982年以後，經理們也從揚克斯調任到加拿大安大略省（Ontario）和印第安納州布魯明頓（Bloomington）的工廠。也有可能是管理階層犯了滔天大錯，擬定倉卒而過時的擴張計畫。一方面，供升降機裝置使用的微處理器技術，或許尚未整合入新的揚克斯工廠。另一方面，公司可能在開始興建後，決定將大部分生產過程自動化。或者，進口外國製造的升降機零件，可能比在揚克斯製造還便宜。大約同一時間，1984年，奧提斯向全國勞工關係委員會（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Board）解釋，由於重大的商業變遷，它要結束在新澤西州的研發活動，將這些活動遷移至位於康乃狄克州的辦公室，卻沒跟代表新澤西州雇員的工會協商。²²

此外，這段期間，聯合科技在執行長葛瑞（Harry Gray）推動下，致力於野心勃勃的擴張併購計畫。揚克斯的新奧提斯工廠可能受到母公司財務壓力影響，包括導致聯合科技在康乃狄克

[1] 鏽帶（Rust Belt）指美國東北部和中西部大湖區以鋼鐵和汽車等工業為主的地帶，1970年代以後經歷去工業化（裁員、關廠、遷移）而導致的蕭條衰敗景象。

州的普惠 (Pratt & Whitney) 工廠裁員的飛機工業問題。無論如何，整個奧提斯子公司安然無恙，揚克斯的工廠關閉才三年，公司就同意在中國設立新廠。

值得注意的是，揚克斯市跟威切斯特郡所有舊工業城鎮的處境相同。它們的製造業工廠既遠離使用新科技的小型新公司，也孤立於考慮全球的遙遠母公司。舊工業中心全都失去最後的大工業雇主，面臨空廠房或轉型為新住宅地產。當管理階層於 1985 年關閉切斯特港 (Port Chester) 最初的 Life Savers^[2] 工廠時，歸咎於警覺熱量的美國人對硬甜糖的需求減少。然而它卻在密西根州、波多黎各和紐約州北部較新的 Life Savers 工廠裡持續生產。不過，相較於未使用的奧提斯工廠，Life Savers 的母公司那比斯可 (Nabisco)，將 1920 年的切斯特港工廠賣給康乃狄克州一名不動產開發商。他將工廠改成住宅公寓，保留「漂浮」於工廠立面閃閃發亮、17 呎長的 Life Savers 糖捲金屬複製品。²³

哈德遜河畔的北塔里頓 (North Tarrytown)，麥斯威爾公司 (Maxwell Company) 於 1900 年成立現存最古老的通用汽車裝配廠，預定於 1982 年關廠。關廠將導致 4,000 名員工離職，等於該鎮半數人口。跟揚克斯一樣，大部分勞動力都追隨父母及祖父母進入工廠。該鎮及汽車廠都是由義大利、斯拉夫與西班牙族裔

^[2] Life Savers 是一種糖果品牌，也指一種環形薄荷糖，是巧克力製造商 Clarence Cran 於 1912 年發明，是比巧克力耐熱的「夏天糖果」。因為薄荷糖看來像個小救生圈，故稱為 Life Savers。資料來源：<http://inventors.about.com/library/inventors/blifesavers.htm>。

社區組成。此外，由於其西班牙裔社區是威切斯特郡裡規模最大者，而吸引了沒證件的中美洲難民。北塔里頓已經苦於一連串內城問題：過度擁擠的住宅和監獄，以及低技術工作不足。

通用汽車公司將關廠決定歸因於新車銷售減少，但地方成本似乎也很重要。這些成本包括支付 170 萬美元興建一間新車體烤漆工廠，以避免違反聯邦環境規定、並建設昂貴的公用設施，以及資助道路或鐵路改良，以確保使用聯合鐵路的哈德遜河鐵道運送汽車所需的淨空。在這個案例中，地方與州政府採取了有效的行動。他們的振作顯然源自揚克斯市奧提斯的關廠、威切斯特郡缺乏能夠吸收通用汽車勞動力的其他工業雇主，以及 1973 年北塔里頓工廠停工長達 22 個月的回憶。歷經三年談判，結果是給予通用汽車公司一套補貼計畫，令人回想起威爾頓和麥克路斯鋼鐵廠的情況。紐約州降低電費、建造鐵道淨空，並且壓低地產稅。當地的工業發展機關向通用公司買下該廠址，然後以每年一美元的名義租金租給通用汽車公司。此外，鎮政府接受以租金代替地產稅，並將其等同於工業發展機關為支付興建通用汽車新烤漆廠而發行公債的年利率。美國商業部也將當地機場局部指定為免稅區，替通用汽車省下一年近 200 萬美元的零件進口稅。

保衛北塔里頓工業工作的努力，導致明顯的反諷結果。聯邦政府設立自由貿易區，從而有利於汽車工業的對外採購策略。在政府這方面，馬里歐·庫歐莫（Mario Cuomo）州長提供通用汽車安大略湖發電廠的廉價核能，儘管他在長島休漢姆（Shoreham）為阻止核電廠啟用而苦戰。而且，以不動產的角

度來看，保存威切斯特郡的工業廠址，當然遠遠比不上將它們轉變為商業與住宅地產的經濟價值。²⁴ 不過，與揚克斯的奧提斯經驗相比，北塔里頓的安排很成功。簽署協議兩年後，汽車廠的勞動力提升到 4,500 人，通用汽車還同意在北塔里頓生產新型小貨車，確保當地整個 1990 年代的工作。不同於揚克斯，地方和州政府機關都能與通用汽車達成交易。而且不像在奧提斯，美國汽車工人聯合會（UAW）勞工表現出如同威爾頓勞工的工會－管理階層合作精神。一個結合工會與管理階層的團體，遊說通用汽車在北塔里頓製造小貨車，而汽車工人聯合會的地方分會則跟鋼鐵工人聯合會的麥克洛斯分會一樣，接受彈性團隊的新工作規則。

奧提斯關廠未以新工廠的空置廢棄收場令人意外。奧提斯廠址轉變為利用紐約暨紐澤西港務局（Port Authority of New York and New Jersey）的特殊資源來建造運輸設備的工廠，港務局是監督該區域大型機場和大眾運輸系統的大型公共機構^[3]。然而，這項介入雖使一個 20 世紀初期的大型地方產業復甦，捲入其中的卻是日本公司。替未來的製造業承租人修復廠房，並在廠址設置一條新鐵道後，港務局將部分廠房租給川崎（Kawasaki）與日昭（Nissho）的合資企業，於 1986 年開始生產新造及翻修的火車車廂。港務局也獲得 25 萬美元聯邦補助金，用於重新訓練因關廠而

[3] 紐約暨紐澤西港務局負責規劃、興建、營運和維護該區域的貿易和運輸網絡，其所屬設施包括美國最忙碌的機場、海港、PATH 軌道捷運系統、紐約和紐澤西之間的 6 條隧道與橋梁、曼哈頓巴士總站，以及世界貿易中心。參見 <http://www.panynj.gov/port-authority-ny-nj.html>。

失業的當地勞工。

這個工業復興的經驗很有限。它不是全州或甚至是地方工業政策的結果。港務局的努力僅限於該廠址，而其影響力取決於採購預算。日本人被勸服設址於揚克斯，原因只是港務局於設備招標上強加的條件，基本上要求得標者必須在該區域裡生產這些設備。鮮少當地機構能有這種影響力。港務局對工業的關注也反映前任執行長的個人決策。在不同主事者、更嚴重的財務限制，以及該區域其餘地區的其他類型開發或方案的急迫計畫下，為工業用途而重新開發奧提斯廠址一事，將失去優先順位。²⁵

一般而言，揚克斯的製造業經濟還苦於其他制度性限制。一方面，大多數郡裡的工業地產（包括揚克斯）充當商業空間比生產場所有更高的經濟價值。另一方面，紐約州的經濟發展政策偏向大公司，而非揚克斯市常見的中小型企業。²⁶ 這些因素使空間無法持續用於工業生產。無論如何，1954 年至 1975 年間，威切斯特郡許多工業設施消失無蹤，令其經濟基礎全然改觀。

153

1955 年，郡內 37 家主要私部門雇主裡，有 20 家製造業工廠名列其中。除了奧提斯和通用汽車，當地工業還包括兩家擁有多間工廠的乳品業和三家糕餅業、健康器材與電器用品的多工廠製造商、全世界最大的螺帽螺栓工廠、兩家電線電纜工廠，以及好幾家小型工業。大多數製造業活動集中於揚克斯。然而在此同時，威切斯特郡已是好幾家企業的總部所在。較老的企業包括奧提斯、Life Savers 和讀者文摘協會。但是 1950 年至 1955 年間，大型的全國與國際公司也將新企業總部設於該郡，

像通用食品（General Foods）、雀巢（Nestlé）、標準真空石油公司（Standard-Vacuum Oil Company）和通用電氣（General Electric）。它們都立即成為主要雇主。美國電話電報公司（AT&T）的長途線部門大約於此時遷入白原市的新大樓，也是個大雇主。²⁷

往後 10 年，沒有出現新的大工業雇主。1960 年代，郡裡出現最大的新企業是 IBM，它開拓幾個不同的辦公處所和研發地點，位於大部分尚未開發的該郡中北部。

IBM 有 10,400 個員工，是 1975 年威切斯特郡最大的私部門雇主。公部門雇主緊跟在後，包括聯邦（6,900）、州（4,100）及其他（32,500）單位。這些數量又超越一系列的服務業和辦公室及少數製造業工作：紐約電話公司（4,010 名員工）、通用食品企業總部（3,200）、AT&T 長途線部門（2,800）、讀者文摘協會（2,500）、聯合愛迪生公司（Consolidated Edison）（2,400）、北塔里頓通用汽車裝配廠（2,200）、聯合碳化物公司（Union Carbide）研究單位（1,600）、泰克尼康儀器公司（Technicon Instruments）工廠及辦公室（1,400）、揚克斯市奧提斯升降機工廠與企業辦公室（1,350）、百事公司（Pepsico）企業總部（1,350）、郡信託公司（1,330）、賓州中央運輸公司（Penn Central Transportation）（1,280）、揚克斯賽車公司（1,060）、瑞士汽巴—嘉基（Ciba-Geigy）製藥公司辦事處（1,050）、威切斯特岩地報（Westchester Rockland Newspapers）（1,025），以及格里森保全服務公司（Gleason

Security Services) (1,000)。其餘大型製造業的員工大多在 500 至 1,000 人之間。²⁸

1975 年後，這些轉變更為明顯。至 1988 年，威切斯特郡最大的雇主是 IBM (13,000 名員工)、郡政府 (8,000)，AT&T 長途線部門 (4,064)、北塔里頓通用汽車裝配廠 (4,000)、美國郵政管理局 (3,700)、紐約電話公司 (3,300)、通用食品企業總部 (2,740)、紐約電話公司的前身 NYNEX (2,700)、揚克斯市學區 (2,484)、讀者文摘協會 (2,307)、聯合愛迪生公司 (2,300)、揚克斯市 (2,000)、百事公司企業總部 (1,811)、紐約銀行 (1,596)、羅斯福美國退伍軍人管理局醫院 (the Franklin D. Roosevelt Veterans' Administration Hospital) (1,530)、北地鐵通勤鐵路公司 (Metro North Commuter Railroad Company) (1,422)、新羅謝爾醫院醫學中心 (New Rochelle Hospital Medical Center) (1,290)、瑞士汽巴—嘉基辦公處 (1,217)、泰克尼康儀器公司工廠及辦公室 (1,200)。²⁹

值得注意的是，自從二次大戰後，沒有大型私人部門雇主遷址至該郡的工業區。除了 IBM 的廠辦位址較分散外，所有企業總部、銀行和公用事業，都聚集於白原市內外的郡中央地帶。因此可以想見，揚克斯主要將其居民勞力輸出到威切斯特郡其他地區的服務業。這標誌出地景上的巨大變遷。³⁰

企業遷址：IBM及更多公司

誠如工業經濟的企業重組改變了郊區地景，它也反映了企業辦公室的分散化和再集中化。越來越多《財星》（*Fortune*）500大公司將企業總部從紐約市遷移到郊區的辦公園區。紐約市依然是企業總部中心，尤其是金融公司，但紐澤西州北部卑爾根郡（Bergen）和密德塞克斯郡（Middlesex），還有沿著白金哩而連結紐約州與康乃狄克州的威切斯特—費爾菲爾德（Fairfield）郡，都興建了新的辦公設施。³¹

155

全美的新建辦公大樓大致遵循半世紀以前製造商設定的分散化模式。大都市中心——紐約、芝加哥、達拉斯、休斯頓——在市中心區保留大部分商業服務。然而到了1960年代，越來越多辦公室甚至企業總部興建於郊區。在波士頓、匹茲堡、洛杉磯、費城、底特律，以及有廣大郊區人口的其他城市，郊區辦公室的工作要多過中心商業區。直到1970年代，郊區辦公室成長的程度才開始引起注意。那時，郊區域鎮相當稀少的預算面臨出乎意料的成長成本：交通壅塞、供水遞減與不合用的垃圾處理設備。但企業服務的增加持續吸引高所得白領就業、更多交通和某些商業設施。這些全都增益了新郊區地景。³²

研究1950年代紐約市金融部門的經濟學家，已注意到金融公司的移動潛力。相較於假定華爾街永不停息或不會疏散到郊區的學者，《貨幣大都會：紐約區金融活動區位研究》（*Money Metropolis: A Locational Study of Financial Activities in the New*

York Region) 的作者預期，外部經濟終究會說服大型辦公室遷離核心城市。這些研究者關注從華爾街遷移到曼哈頓中城的金融公司。但他們否認傳統因素——無論是對城市的情感依附，或是企業菁英的面對面互動——長期而言會比經濟成本還重要。他們寫道：「事實依舊是，慣性和傳統能令公司留在金融區，只因它們沒有遷移到其他地方的強烈理由。……一旦那些理由明確現身，無論有多麼感傷，轉變最後都會發生。它可能採取於主要金融區以外興建大型分公司的形式，甚至創造第二個『企業總部』辦公室。因此，情感同經濟妥協了。」³³

1960年代末期，將電腦引進每間大中型辦公室的科技革命，直接影響威切斯特郡的地景。電腦促使企業活動的分散化規模更大、速度更快，超越最敏銳的經濟學家所能想像。電腦也支持IBM的擴張。1960年代期間，這間電腦製造商變得更龐大，也改變其企業策略，銷售而非出租互動式資料處理的新機器。這兩項改變增加該公司在地理上連結其設備的需求。這又引導IBM成為威切斯特郡最大的多辦公處所開發商。³⁴

像IBM這種企業區位，仰賴的不僅是可以取得廉價土地。這種區位也回應了將製造部門與企業總部、行銷人員及研發部門區隔的企業重組；公路及規劃的公共投資；以及準備遷進辦公園區的私人開發商。此外，企業策略利用中產階級內部的社會和文化分化，這些分化從大蕭條之前以降就沒有如此充分展現過。男性專業人士尋求大城市附近但不在城市裡的新家庭住宅。技術人員和工程師則有可能待在大學週邊。高中或大學畢業的中產階級女

性往往只是兼職，或工作到她們有了小孩為止。然而，從另一個觀點來看，企業遷離城市與追求郊區住宅所有權的文化價值平行發展，亦即對自然的視覺消費與社會排斥性。跟許多居民一樣，企業主管也希望他們的工作場所遠離都市的荒蕪、種族和族裔紛雜的勞動力，以及髒亂但昂貴的空間。

1951年，通用食品公司首次大規模將企業總部搬遷到威切斯特郡。然而，通用食品的主管早在1937年就開始思考搬離紐約市。它們鄰近中央車站的辦公室苦於「髒亂、灰塵、噪音與不斷惡化的交通壅塞問題造成的不安」。但由於面對面商業互動、大量勞動力來源及銀行業務往來，他們其實不願意離開紐約市。不過威切斯特郡相對提供「卓越的」銀行、學校、教堂和休閒娛樂設施。簡言之，對於和平時期的白領勞動力而言，「這整個區域就是一個美國家庭社區，是夢寐以求的生活所在」。³⁵

但在威切斯特郡替員工提供住房十分昂貴。即使1950年通用食品和許多其他公司都遷入了，但郡規劃師指出，那裡有半數居民買不起那的新宅。威切斯特郡也沒有大量公寓樓房，除了南北通勤列車外也無其他大眾運輸。不過，全郡規劃官員還是支持企業遷址。「如果遷到本郡的趨勢持續下去」，指出缺少負擔得起的住宅的同一份規劃文件提到，「威切斯特可能會變成知名的林中辦公室，一如〔康乃狄克〕哈特佛的保險業，或紐澤西州聯合市（Union）與哈德遜郡（Hudson counties）的煉油業」。同樣的，1961年版的《這是威切斯特》（*This Is Westchester*）讚揚「園林型工廠的暴風雪〔帶來〕……技術及人才，重新定居於

威切斯特郡」。這裡不再有任何反開發的憤怒了。³⁶

為了引導新的發展模式，1950年成立了威切斯特郡協會，這是與大企業及紐約市區域規劃協會（Regional Plan Association）關係密切的私部門商業團體。不同於公部門的威切斯特郡規畫局，威切斯特郡協會掌握土地使用決策的主導角色，從而掌控變遷的重要根源。此外，不同於傳統的威切斯特商會，威切斯特郡協會一開始就代表大企業。因此，全郡的規劃偏向低估構成地方經濟基礎的小型當地公司的利益。

雖然 1950 年代有某些企業執行長住在威切斯特郡，或像康乃狄克州格林威治這類專屬近郊，但他們的多數員工住在紐約市。在這個時期遷往威切斯特的許多公司，提供員工隨同搬離城市的誘因，例如補助抵押借款，提供往返紐約的每日公車服務。IBM 並未支付現金給員工，但在 1961 年許多部門遷移後，多數員工都搬到了威切斯特。IBM 的家庭擔保方案協助遷移的員工賣掉舊屋、購置新房。在通用食品，1954 年企業總部遷往威切斯特郡後，大多數員工則從紐約市通勤。但通用食品董事長住在布隆斯維爾。³⁷

企業社群內部對於遷址威切斯特五味雜陳，從多數早期搬遷者的臨時模式可見端倪。每間公司最終在威切斯特郡落腳前都猶豫不決。*

* 通用食品的一位前名譽董事長說道，公司遷址威切斯特後，也應該派車回紐約市搬運無形的東西：城市品質、人類接觸、公平與容忍。這位住在郡

通用食品無法在中央車站附近找到合適的辦公空間。至1944年，公司在公園大道250號的企業總部外另租辦公室，位於麥迪遜大道的兩棟大樓。它預期戰後會持續成長，並抱怨（在電腦網絡和傳真機出現前的時代）因必須在多個辦公處所間傳送文件而「嚴重降低工作效率」。通用食品為了尋找未開發的辦公位址而「竭力找遍了都會區邊緣地帶」，但紐澤西和拿梭郡（Nassau County）一帶則因過度工業化而不予考慮。它顯然也拒絕了中央車站以北的公園大道，雖然其他公司已遷至該地區的新企業辦公室。1950年或1951年，它終於買下白原市的44英畝土地，宣布將替其遍及美國100個城鎮的工廠，建造全新的「神經中樞」。1954年搬遷完成時，該公司年度報告宣稱其為年度主要商務開發之一。以曼哈頓中城的值錢地皮交換威切斯特郡的廉價土地，無疑是一項有利可圖的地產交易。

通用食品的新企業辦公室賞心悅目、傲然獨立，孤絕於山脊上。員工感覺愉快且舒適自在。三棟樓的低矮辦公室建築群因約翰·丁克羅（John Dinkeloo）和凱文·羅奇（Kevin Roche）的超炫美白與誇張的現代設計，成為報紙和建築評論的報導焦點。不過，建築師其實嚴格受限於白原市的城鎮規劃法，建築物限高三層。通用食品的1,500名員工中，有1,200人選擇隨工作搬到威切斯特。有些人是被公司提供的六個月試用期和額外津貼勸服。

裡的董事長退休後，搖身一變成為紐約市經濟發展委員會主席；此時，他才說通用食品搬到郊區真是個錯誤。

1980 年代中期，通用食品已在郡裡成立四個不同的據點。白原市最初的企業總部更新改裝為分區總部，1983 年通用食品另外興建新企業總部，就在被菲利浦莫里斯公司（Philip Morris）^[4]收購前一年。同樣的，它委託從事最具現代感的建築設計。新企業總部設址於接近康乃狄克州邊界、富裕的黑麥溪村（village of Rye Brook）。1957 年通用食品還在哈德遜河邊蓋了一棟新科技中心，並將中央實驗室從紐澤西州的霍伯肯（Hoboken），即麥斯威爾食品母廠發源地，遷至威切斯特。這次不像 1930 年代，沒有引起多重處所無效率的抱怨。企業重組和電腦化使分離的設施更為可行，特別是每間公司都各自主宰了郊區地景的一部分。

159

雖然通用食品是第一間在威切斯特興建企業總部的大企業，但 IBM 對威切斯特郡社會－空間結構的影響力最龐大。IBM 最後在威切斯特郡擁有的員工數是通用食品的 3 至 5 倍，並在全郡興建了更多的企業園區。1955 年，通用食品搬進白原市一年後，IBM 在附近的阿蒙克（Armonk）購置了一大片地產，靠近康乃狄克州邊界，以供未來開發之用。企業總部儘管還留在曼哈頓，公司在 1957 年仍將研究中心從達奇斯郡（Dutchess County）的波基普西（Poughkeepsie）南遷至威切斯特郡北部的奧西寧（Ossining）與科特蘭（Cortlandt）的租用設施。這代表 IBM 刻意將其研究活動和生產工廠分開。

同一時期，IBM 將資料處理部門總部遷至白原市的租用辦公空間。該部門囊括大部分 IBM 大型商務產品的開發、製造和行銷。當時，這是整個企業的主要焦點（同時，白原市是威切斯特

郡規劃師針對密集都市更新的討論焦點）。

1959年IBM重組資料處理部門，劃分為產品開發、製造與行銷三個獨立部門。此後不久，IBM宣布它終於要在幾年前購置的阿蒙克地產上蓋大樓。這裡將成為新設立的資料系統和一般產品部門的企業總部所在。重組後的資料處理部門留在白原市，現在僅負責公司大型商業產品線的行銷與服務。

1961年，IBM的研究單位也有象徵性的遷移，從威切斯特北部的租用空間，搬到公司位於約克鎮高地（Yorktown Heights）的新湯瑪斯華生研究中心（Thomas J. Watson Research Center）。新研究中心以IBM的創立者命名，並由知名現代派建築師耶洛·沙利南（Eero Saarinen）^[4]設計。跟通用食品企業總部一樣，這棟研究中心也在報章和建築雜誌上廣受評論，因為它有一座日式花園、三層樓高的天然石材立面，以及八個足球場大的樓地板空間。這棟樓裡的700名男女僱員，將近一半是專業科學家。

1961年，IBM開始實驗威切斯特郡是否為可行的企業總部。好幾百名企業總部員工從曼哈頓麥迪遜大道590號的IBM大樓，包括華生的董事會總裁暨主席辦公室，重新安置於華生研究中心。同年稍晚，儘管幾乎所有人都必須逆向往郊區通

^[4] 耶洛·沙利南（1910~1961），美籍芬蘭裔建築師。設計風格簡單、遼闊、弓狀結構弧線，如機械般的理性主義。參見http://en.wikipedia.org/wiki/Eero_Saarinen。

勤，IBM 選擇了阿蒙克做為新企業總部位址。阿蒙克地產的原始規劃轉變為適應企業總部的運作。從 25 萬平方英尺重新設計為 42 萬平方英尺，1964 年落成的新企業總部以 S.O.M. 建築事務所 (Skidmore, Owings and Merrill) 的建築，以及野口勇 (Noguchi) 設計的雕塑花園為特色。為了供原預定遷至阿蒙克的部門企業總部使用，IBM 購買位於哈里森 (Harrison) 的前標準真空企業大樓 (Standard Vacuum Company Building)。

從 1960 年代起，通用食品和 IBM 便只在紐約市維持區域銷售辦公室，聯合碳化物公司 (Union Carbide Corporation) 的搬遷決定反而猶豫不決。二次大戰後，一如通用食品與 IBM，聯合碳化物公司在威切斯特購置龐大地產。不過，它也在曼哈頓中央車站以北的公園大道興建新企業總部，IBM 和通用食品卻遠離這個地區。聯合碳化物公司只將研發部門遷到威切斯特。然而，到了 1970 年代末，它出售公園大道的大樓，在離威切斯特郡不遠的康乃狄克州丹伯里 (Danbury) 蓋了棟新企業總部。

如果搬遷到白原市或阿蒙克，在 1950 年代似乎是個不錯的企業策略，二十年後，正逢紐約市財務危機期間，遠離紐約而遷往北威切斯特或康乃狄克州，更是受到重視的考慮。1968 年，奧林公司 (Olin Corporation) 遷往康乃狄克州費爾菲爾德郡，隨後是 1970 年的美國製罐公司 (American Can Corporation) (後來更名為 Primerica)。1970 年代期間，《財星》500 大企業中超過 25 家公司將企業總部遷至康乃狄克州丹伯里和斯坦福 (Stamford) 之間，費爾菲爾德郡的狹長地帶。³⁸

161 IBM 列出遷址郊區的三大理由：為員工創造更好的工作環境、令通勤更加便捷並替員工提供更多同家人相處的休閒時光。不過，一如我們所指出的，在企業遷址前，大多數 IBM 員工並不住在威切斯特郡。那裡的新住宅也很昂貴。像 IBM 這種公司會發展郊區策略，顯然有其他理由。

尤其是在餐廳和購物中心遍布威切斯特—費爾菲爾德區域之前，極少有便利設施會令公司員工分心。因此，比起都市，郊區企業辦公室對員工施展了更大的社會和空間控制，特別是員工整天都耗在公司園區裡。例如 1970 年從紐約市遷到斯坦福的 GTE 公司與 1979 年遷址的勝家（Singer），其業務主管愉快地報告，員工比起在城市時更早抵達公司、更晚離開公司。他們也在公司自助餐館度過午餐時間，每星期六還來工作。「誰在發薪名單上，」GTE 董事會主席說「我們就要獨占他們的時間。」³⁹公司財產和資本市場的變革也暗示往郊區的遷移。二次大戰後，郊區辦公室開發的蓬勃，同時伴隨許多大企業的現金儲備增加，以及大型金融機構在核心城市之外尋找投資計畫。戰後企業擴張期間，主要經濟活動就是購買郊區土地。選擇郊區辦公室的另一項理由是提高企業安全。孤立且有如公園的郊區環境，很容易防衛和保護。

郊區辦公室區位也促進了象徵地景。準備成長的公司，如 1950 年的通用食品或十年後的 IBM，希望製造對空間的劇烈衝擊來向市場展示權力。建築在實現這種欲望的過程中擔任要角。正如 1950 年以後某些企業在曼哈頓中城建築高樓，其他人選擇興

建低樓層的園區環境。郊區（甚至威切斯特郡）有較低的稅賦、土地價值和建設成本，使公司對其投資握有更大的象徵性影響。它們創造新穎、更易控制的權力地景。

勞動力的成本和品質越來越重要。早在 1950 年代，通用食品就報告，在威切斯特必須面試以填補職缺的申請人數，遠比在紐約市少。1970 年代，德士古（Texaco）將企業總部從紐約市遷到威切斯特，咸認是要尋找受過教育但溫馴的白人中產階級女性事務員勞動力。美國其他地區的研究者則指出有全國性的企業遷移現象，離開都市少數族裔或外國出生的員工。⁴⁰

162

不過，威切斯特和費爾菲爾德缺乏負擔得起的住宅，持續構成招募郊區勞動力的問題。1987 年，威切斯特郡中位數年收入略高於 38,000 美元的家庭，只負擔得起中位數房屋價格的 42%。事實上，該區域許多房屋通常售價在 30 萬到 300 萬元之間。IBM 從遠至費爾菲爾德郡南部與岩地郡（Rockland）等地招募其威切斯特員工，NYNEX 則有令員工往南通勤至白原市上班的難題。過去二十年來，威切斯特郡協會執行的年度企業調查中，威切斯特郡所有主要企業的執行長都報告其勞動力住得很遠。⁴¹

時間一久，企業在威切斯特郡發展出自己的社會－空間節點，促進且正當化總部辦公室的分散化。檢視這種新經濟權力地景的一種方式，是從固著於其區位的供應商網絡的逐步發展來看。另一種方式是聚焦在富裕住宅郊區或企業執行長自己居住的郊區，對他們的吸引力。不過，既然企業持續遷移至郊區會轉變地景，就涉及了菁英內部凝聚力的基本社會過程。企業藉由董事

會成員重疊的方式，發展出以空間為基礎的社會網絡。除了勞動因素和外部經濟，這些高階的企業間紐帶使社會—空間結構具有連貫性。⁴²

雖然涉身其中的人數很少，而且除了反映地理選擇，也是個人或社會的選擇，但總部位於威切斯特郡的企業董事會，企業紐帶的發展與時俱進，更甚於在一般企業部門原因下預期會有的關係。事實上，隨著 1955 年至 1985 年威切斯特郡企業總部的增加，企業之間的連鎖董事職位，以及在各董事會之間「遷徙」的董事人數，也隨之增長（見圖 6.2）。儘管此時很難宣稱是 1955 年通用食品董事會和通用電子的紐帶，說服雙方遷入威切斯特郡，但到了 1975 年，已遷至此地的企業總部董事會之間發展出一些紐帶。IBM 在這個網絡中扮演要角一點也不令人驚訝。

1970 年代的 IBM 執行長凱瑞（Frank T. Cary），1985 年成為百事和德士古的董事會成員。此外，1975 年，IBM 董事會也與紐約電話董事會連結，一如聯合碳化物、通用食品和 AT&T。大型企業董事會成員往往以成長機器（growth machine）^[5]的方式與地方公用事業連結。但在威切斯特郡，連鎖的董事職位也連結

^[5] 「成長機器」（growth machine）為美國學者 Harvey Molotch 提出的概念，首見於〈城市是個成長機器〉（"The City as a Growth Machine", 1976）一文。這概念是指與地方發展利害攸關的行動者或群體，如地主、地方政客、地方報紙、銀行、公用事業，以及其他擁有地產的企業主，結合起來運用各種資源和人脈來影響政策，試圖振興城市經濟成長，以維持地產價值和相關利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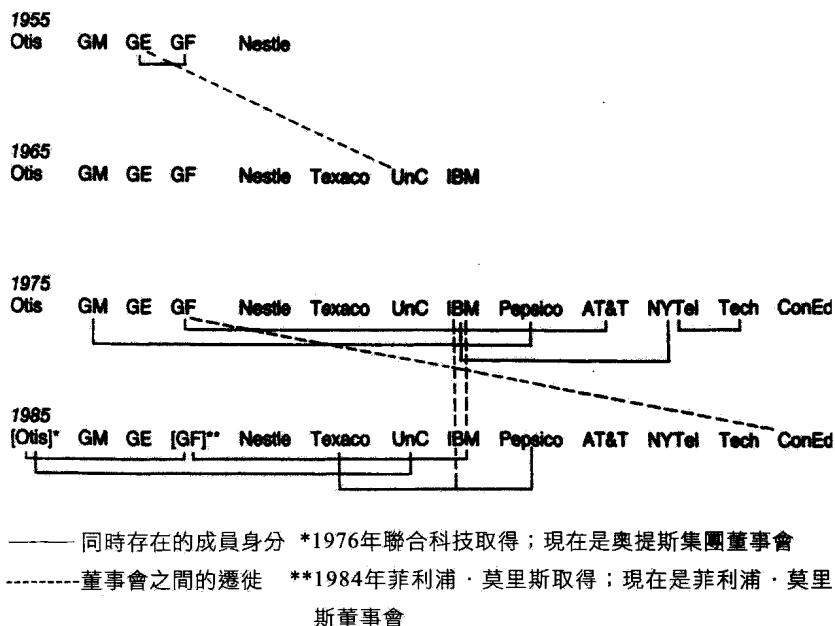


圖 6.2 1955-85 年，威切斯特郡大型企業主重疊的董事會成員。

企業：AT&T、聯合愛迪生公司（ConEd）、IBM、通用電子（GE）、通用食品（GF）、通用汽車（GM）、雀巢（Nestle）、紐約電話（NYTel）、奧提斯升降機（Otis）、百事（Pepsico）、泰克尼康儀器（Tech）、德士古（Texaco）、聯合碳化物（UnC）（資料來自威切斯特郡協會、穆迪工業手冊〔Moody's Industrials〕及標準普爾〔Standard and Poor's〕）。

了唯一共同點是座落於威切斯特郡的企業。聯合科技執行長葛瑞擔任聯合科技子公司奧提斯集團的董事，1985年也是聯合碳化物的董事。同一年，花旗銀行的約翰·叡德（John S. Reed）亦為奧提斯董事成員，也擔任現在屬於菲利浦莫里斯公司的通用食品董事。

企業領袖在規劃該郡的未來上，扮演了不成比例的要角。他們不僅因董事會重疊而聚集，還因為是威切斯特郡協會（WCA）的成員，而使他們的領導地位在此獲得確保，甚至是必要的。WCA從最大型的企業中招募執行長，主持這個組織與提出區域規劃建議的各種專門小組。隨著如IBM、通用食品及聯合碳化物這樣的「地方行動者」進駐，威切斯特的企業規劃遭受布局全球的公司滲透。目前為止，這些全球行動者很滿意他們的區位。評選威切斯特郡為「卓越」企業區位的執行長比例，於1976至1984年間成長為兩倍。直到當時，他們可能遷離威切斯特郡的主要理由，是從其目前區位往外擴張。然而，自1984年起逐漸增加的併購案與公司重組，包括請求破產保護，意味對橫跨白金哩的「公司足跡」產生強大威脅。⁴³

威切斯特的公司正當性，驅動了開發更多上層階級不動產的市場。儘管這與為其勞動力確保住宅的雇主需求，以及輕工業和倉儲業老闆的要求有所衝突，但它仍是以地方為基礎的菁英主要的焦點。

不動產開發：郡規劃師的隱匿之手

當代能保存吸引早期居民社會或空間品質的地域十分罕見。不過，威切斯特郡與郊區擴張及都市荒蕪都形成強烈的對比。這處地景綿延的視覺均質性，反映出某種維持高房地產價值規劃的精心承諾。這些規劃至少保障威切斯特郡在其舊工業城鎮以外地

區的社會均質性。不像許多其他地方，威切斯特郡明顯違反郊區不會規劃自身發展的想法。它也因為郡規劃師正中目標的精確度而顯得格外突出。

要不是有這些規劃師，威切斯特郡新舊地景間的連續程度，看起來就真像是天意。一份 1955 年規劃局的出版品，列舉以下特質做為該郡的主要住宅吸引力：

- 綠樹草地如茵。
- 破敗工廠零星。
- 沒幾個貧民窟。
- 小孩的好地方。
- 易抵達曼哈頓。
- 林蔭大道開車好心情。
- 學校卓越非凡。
- 商店幾乎販售所有東西。
- 政府既廉潔又進步。
- 市民積極關注本郡未來。
- 適宜呼吸的空氣。⁴⁴

過了三十年，在與企業總部區位有關的狂熱成長期之後，由威切斯特郡協會主掌的一個規劃團隊，即威切斯特 2000 指導委員會擬定的「該保留的價值」名單裡，這些品質再度列名榜首。想到威切斯特，委員會成員描繪的圖像是：

每英畝六至八間住宅的典型郊區鄰里；綠樹草地如茵。

外觀先進的教室。

北威切斯特的鄉村風光……

狹長的哈德遜河景觀。

白原市徹底清掃的無塗鴉街道。

村莊街道上的購物者從慈善贊助的烘培食品桌上採購……。

盛裝打扮的人群參加夏季饗宴（Summerfare）〔百事公司贊助的本地學院校園年度音樂節〕。

歷史保存，如菲利普斯莊園（Philipse Manor）^[6]……。

新羅謝爾（New Rochelle）^[7]市中心的人群交融。⁴⁵

19世紀末，紐約市金融家遷入哈德遜河谷的地產時，私部門主導威切斯特郡的規畫。權貴居民加入當地及全郡規劃單位的共和黨政治「機器」，致力於持續的公共教育和立法。他們宣傳土地使用分區法的經濟和美學好處，強調若不強制施行會有可怕後果；也推動發展基礎設施，像保存威切斯特郡湖泊的水壩與水庫、公路和公園，以提升房地產價值。他們協同區域規劃協會進

[6] 菲利普斯莊園廳州立史蹟（Philipse Manor Hall State Historic Site），乃位於紐約州揚克斯的歷史住宅博物館，是威切斯特最古老望族的建築。

[7] 新羅謝爾地處紐約州東南部，是1688年逃離法國天主教大屠殺的新教徒難民定居區。許多定居者是來自法國拉羅謝爾（La Rochelle）的工匠與手藝師，該地因此命名為新羅謝爾。

行作業，後者是個私人組織，旨在研究紐約都會區的整體發展並發布建議。這項合作行動由於洛克菲勒家族對兩個規劃單位的強力支持而深受影響。該家族的興趣反映了保護其在整個區域握有的房地產價值的欲望。

共和黨「大老」威廉·渥德（William Ward）從世紀之交至 1933 年治理了威切斯特郡，在他治下，主要基礎設施的營建不但與住宅建設榮景同步展開，而且有利於後者發展。雖然大部分開發也跟 1880 年至 1900 年間，威切斯特南部的工業發展同步發生，但公私部門規劃努力鮮明的長期目標，並非鼓勵製造業，而是提升土地價值。⁴⁷ 威切斯特萌生正式規劃可溯及 1900 年至 1910 年，當時特別組織了一個委員會，檢視興築布隆克斯河林蔭大道（Bronx River Parkway）的提案。這個土地與政治菁英的早期集團，在下水道、公路和公園等基礎設施上有共同利益。有好幾年，基礎設施都保有作為開發策略焦點及未來規劃組織核心的重要地位。基礎設施的公私聯合規劃，形成威切斯特郡自然地勢與社會建構地景間的基本連結。

如同當代紐約市的「權力捐客」羅伯特·摩西（Robert Moses），威切斯特的公園和公路的興建者，以具有實質自主性的方式塑造未來的發展。即便 1930 年代成立民選的郡長辦公室，威切斯特郡公園委員會依舊獨立於任何公共機構。事實上，摩西深受布隆克斯河林蔭大道規劃的影響。1922 年，他盤算著穿越長島建造一條公路，他讀到一篇報紙報導，描述為了仍在興築中的威切斯特郡道路而開發出獨特景觀。為了成為「美國最美麗

的道路」，布隆克斯河林蔭大道在主要車道上方建造穿越道，以排除交通號誌和交錯的交通。林蔭大道設計者還以石磚覆蓋上方橋樑來搭配景色，並美化車道兩旁的景觀。在美學上，他們將 19 世紀郊區開發商的「自然」地景延伸至汽車時代。⁴⁸

事實上，這條道路替所有威切斯特郡主要交通幹道建立了標準。儘管提供了悠閒開車穿越地景、風景如畫的經驗，但彎曲的道路及狹窄的路幅，無論對成群的通勤者或週日駕駛而言都很危險。這些道路因而限制了威切斯特郡的出入。羅伯特·摩西在這點上也學到教訓。再者，跟摩西一樣，威切斯特的規劃者制定了支撐郊區驚人成長的公共權力原則。他們挾握有建設全郡地景經濟資源者的「非政治」利益，推翻地方民選官員的在地利益。⁴⁹

設計布隆克斯河林蔭大道後，威切斯特的有力人士開始表現出對正式全郡規劃的偏好。威切斯特郡大地主正確預期高收入家戶對郊區住宅需求增加，並希望防堵奧提斯和通用汽車所在地的揚克斯與北塔里頓擴張工業，為了通過 1920 年首件土地使用分區法律而施壓。六年後，在區域規劃協會人員力促下，同樣這組公私利益聯盟成立了威切斯特郡規畫聯盟（Westchester County Planning Federation）。在這些年間，紐約市的大地主也同區域規劃協會一起發展土地使用分區法令，並研究土地使用模式。區域規劃協會仰賴土地使用分區及公路建設，來協調區域經濟基礎的發展。五十年後，區域規劃協會的一項出版品指出，「比起該區域任何其他郡，威切斯特的開發更密切遵循了區域規劃協會建議的模式。」⁵⁰

為了管理這種同質的土地使用，私人利益試圖透過鐵路模式來控制公共政策。19 世紀以來，鐵路線的興築顯示了公私聯盟的實際利益。私人擁有的鐵路線促成開發，但對鐵路興築的直接公共投資，則提升業主在鐵道兩側擁有的土地價值。跟鐵路一樣，1890 年至 1930 年間，威切斯特郡公園及林蔭大道的開發，也直接影響了土地價值。就像城鎮沿著鐵道兩側發展，各地林蔭大道沿線加油站與休息站特許權的出售，也提升威切斯特郡的收益。這項現金收入減輕了地主的稅負，他們肯定相信，該郡野心勃勃的公路建造計畫花費會對他們的稅單有所影響。一份 1932 年的區域規劃協會出版品總結道，雖然該計畫「不過幾年前還在猶豫中展開」，卻旋即成為都會區「就經濟觀點而言最重要的事業之一。」即使威切斯特郡當局於 1921 年至 1931 年的土地取得費用超過 6,200 萬美元，但公路興建提升該郡的土地價值，從 1921 年的不足 7 億美元，到 1929 年已將近 17 億美元。⁵¹

規劃者十分重視維持地景的美學和遊憩品質，因其提升了威切斯特郡未開發區的地產價值。為此，他們強調「大規模工業與相對高成本的住宅、休憩及供水的混合，極不理想」，並且力主保存自然地形。大蕭條時，規劃者「決定只推薦對主導性的居住用途而言，有其必要且緊密相關的工業擴張。」⁵²

威切斯特郡早期的基礎設施提案，不見得都很快獲得接納。為了方便高階主管旅行而興建小機場雖得到支持，但將河濱大道（Riverside Drive）從曼哈頓延伸至北威切斯特的計畫討論，卻拖到了 1937 年。這項提議在政治上遭受揚克斯和其他哈德遜河

城鎮的小工廠質疑。它也苦於既有鐵路線造成的興建問題。當哈德遜河林蔭大道（Hudson River Parkway）終於築成時，呈現規劃者被迫接受的修改，也從未成為他們期望的高速公路。⁵³

二次大戰後，另一項令親成長倡議者意見嚴重分歧的議題，涉及新聯合國總部於威切斯特郡北部的選址。本章先前提到聯合國於曼哈頓設址，是對威切斯特郡地主菁英的恩賜。然而，就跟幾年後隨之而來的企業總部一樣，聯合國成為土地菁英的爭論焦點。1945年後，這個世界組織要尋覓永久居所時，選址委員會考慮美國大城市如費城、舊金山和紐約等。但委員會成員選擇郊區位址，規定該位址必須距任何大城市 25 至 80 哩。這就排除了兩個紐約市位置：整個曼哈頓與 1939 年皇后區法拉盛（Flushing）的世界博覽會場址。當威切斯特郡居民獲知有三個郡內地點列入考慮時，他們的反應不是狂喜、就是盛怒。

歡迎聯合國計畫的人士之一是奧圖·克格爾（Otto E. Koegel），他是一名富裕的律師，在相互競爭的位址之一，北部城鎮索莫斯（Somers）附近的花崗岩泉（Granite Springs）擁有 1,200 畝農場。克格爾宣稱支持進步的國際事業，反對原子能。他主張將聯合國總部蓋在花崗岩泉，有助於世界和平，又替北威切斯特帶來經濟成長。其他地方支持者包括索莫斯附近的有錢大地主、不動產仲介和商會。憤怒的地方反對者、包括因聯合國建案而須遷離家園的 1,300 個家庭、生計中斷的果農，以及童軍團和教會等組織。1946 年，當聯合國選址委員會將選擇縮小到五個——三個位於北威切斯特，兩個在費爾菲爾德郡——索莫斯

市民舉行了長達六個多月的「拯救家園」抗議大會。然而到了 9 月，市民收到協助遷移的承諾後，大部分地方團體態度從反對轉為歡迎。克格爾主持一個由郡長背書，將聯合國引進威切斯特的全郡委員會，並將他的農場捐給聯合國。

這一切地方動員，突然因為 1946 年 12 月紐約市報刊的一則宣布而陡然縮減。這則報導指出，小約翰·洛克菲勒稍早決定以 850 萬美元收購開發商威廉·齊肯多夫 (William Zeckendorf) 合併的曼哈頓一處東河基地，並捐獻給聯合國。如果聯合國不接受洛克菲勒的提議，他誓言會將他位於波康堤可山莊 (Pocantico Hills) 的威切斯特地產捐給這個世界組織。在聯合國已經接受東河的位址後，他才宣布後面的提議，這點引起支持索莫斯區位者，尤其是克格爾的懷疑。⁵⁴

這對威切斯特郡，或僅對洛克菲勒家族而言，是個毫無損失的局面？很顯然的，洛克菲勒對高層進行遊說以確保聯合國設址東河。世界組織占據中城這麼大一塊要地，爭取洛克菲勒中心租戶的商業競爭就減緩了。無論如何，這看似最後一回洛克菲勒家族的曼哈頓商業地產利益，牴觸了他們威切斯特郡地主鄰居的欲望。下一個十年，小洛克菲勒的兒子大衛·洛克菲勒，大通曼哈頓銀行 (Chase Manhattan Bank) 總裁，身兼威切斯特郡規劃委員會成員，積極鼓吹在威切斯特開發企業總部。

即便在洛克菲勒家族並未直接染指的案例裡，也拉出了「地方人士」和企業菁英之間的戰線。百事公司於 1967 年計畫在哈里森鎮波卻斯 (Purchase) 的舊馬球場興建新企業總部，翻轉了

反對力量。在這個案例中，直接承受企業開發負面衝擊的最鄰近居民是大地主。低收入鎮民的住所遠離百事公司的位址。結果，地主動員阻擋百事公司取得興建辦公室所需的土地使用變更。同時，低收入居民與民選官員則支持荷包滿滿的企業納稅人光臨。地主想方設法反對百事公司的計畫。但百事扮演受迫害者，訴諸公眾支持，並聘請尼克森總統的華爾街法律事務所馬奇羅斯葛利（Mudge Rose & Guthrie）。百事最後獲勝。⁵⁵

171 只要不是緊臨而居，威切斯特的地方菁英通常喜歡吸引付費人群的購物中心、新林蔭大道，以及像揚克斯跑馬場這樣的活動中心。相較於其他居民針對交通阻塞和噪音汙染的持續反對，主導規劃過程的大地主捍衛這些計畫，因為它們提高了土地價值。因此，以地方為根據的菁英熱烈訴說購物中心如何促進整合性的社會生活：「它將……使年輕已婚婦女能夠組裝她的春天衣櫃，不必改變停車位就能替她女兒安排扁桃腺切除術。」事實上，這個發展策略整合了土地菁英的地產投資與中產階級的個人化大眾消費投資。⁵⁶

不過，到了 1950 年代中期，威切斯特郡規劃者承認該郡處於成長的「兩難困境」。他們自問，持續的商業發展能否提高稅基或稅率。他們不確定更多開發是否遲早會使威切斯特郡的生活變得不舒適，並令該郡土地缺乏進一步開發的價值。規劃者顯示他們深知若無法控制均質性所要付出的成本。

大體而言，這種控制有賴於城鎮的土地使用分區法律，該法掌控了成長的限度與美學。我們在通用食品的案例裡看見，土

地使用分區限制所有商業建設的高度及密度，塑造出後來極富影響力的園區式企業總部。威切斯特郡大部分城鎮和村莊的土地使用分區，也要求相當大片的基地——「密集建造」區裡的最小規模是 7,500 至 10,000 平方英尺。這基本上就排除了小企業及中低收入戶在該郡大部分地區建築的**合法**可能性。毫不意外的，這種公共權力的運用導致「新近移入的工業受限且極具選擇性的特質」。換言之，公共權力塑造商業發展的視覺與社會均質性。⁵⁷

到了 1971 年，威切斯特郡已擁有新權力地景，規劃者也有沾沾自喜的理由。本郡居民受雇於郡內工作的百分比持續增加。1959 年至 1967 年間，比例增加到將近 80%。而且，這些工作的社會地位持續提升。專業、技術與管理工作的成長速度比文書工作還快。到了 2000 年，郡規劃師認為，威切斯特有超過半數辦公室工作都是企業總部員工。規劃者希望這種高階工作的持續成長，能產生兩項社會—空間發展的附帶效果。它將能穩定企業主管偏好的相對高技術年輕祕書的當地勞動力來源。而且，它也能穩定南部城市的市中心區，以對抗來自購物中心的商業競爭。⁵⁸

郡規劃師向來憂心市中心區的未來，因為它們對全郡的後工業式開發構成威脅。早在 1950 年，規劃文件便顯示揚克斯、弗農山（Mount Vernon）與切斯特港的市區有不符標準的住宅集中。規劃者問道，究竟該支援市區的既有使用方式——製造業與勞工階級住宅——來對抗貧窮和種族歧視，還是提供住在市區的窮人與少數族群更好的教育，並在他們現居地區之外建造補貼住宅，讓他們「融入主流」比較好。比揚克斯廢除種族隔離的衝突

至少早了十五年，威切斯特郡規劃師面臨如何在不危及土地價值的情況下，協助窮人並重建市中心區的兩難。⁵⁹

一如城市，都市更新計畫也提供城郊市中心區再開發的工具。正如都市土地菁英利用 1949 年住宅法案（Housing Act）提供的補助金來更新市區商業中心，1950 年代早期的威切斯特菁英也將都市更新計畫轉向郡政府所在地白原市的商業再開發。他們的選擇多少與幾家大企業挑選白原市做為總部位址的決定一致。白原市確實有大量少數族裔與種族人口。不過，因為它不像揚克斯是重工業城，沒有強大的製造業利益。再者，它位於郡中心地帶，遠離布隆克斯（Bronx）。此外，白原市也沒有像扎根於揚克斯的那種沉重的都市政治機器。白原市擁有大片喪失經濟價值的製造業土地和建築物，對於新權力地景的建造可說幾無障礙。

白原市的都市更新始於 1954 年，最初是個新市中心區計畫。1965 年聯邦政府基金核准通過，次年取得土地。郡規劃師預計拆除 130 英畝土地上的房屋、商店、倉庫和閣樓，取而代之的是大塊土地上的現代辦公大樓，並且拓寬街道以利行車。這一切需要將占全市家戶一成的 1,700 個家庭，大多數重新安置於補貼住宅。只有 170 個家庭有能力自行安置於白原市非由公共補助的住宅。值得注意的是，大部分其他家戶都被送往揚克斯與弗農山，增加那些城鎮裡貧窮和弱勢居民的數量。⁶⁰

白原市相對從公私投資的協同流入中獲利。市區再開發花費超過 6,700 萬美元聯邦都市更新基金、來自紐約州的 2,200 萬美元，以及 100 萬美元社區發展補助金。都市更新期間，公私部門

之間，以及地方、州和聯邦政府機構間的重要聯絡工作，都由紐約州長尼爾森·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負責，他還一邊留意波康堤可山莊地產的家族利益。不太符合常規的是，他的副州長馬爾孔·威爾森（Malcolm Wilson）也是威切斯特郡人。

1970 年代發展出另一項總體規劃，以便主導至 2000 年止的白原市土地使用。同樣由聯邦基金提供資金，顧問群花了六年時間草擬總體規劃，並在與商業社群的會議中微調。此案的聯繫工作則由威切斯特郡協會負責。這項新總體規劃告訴開發商，威切斯特郡的政治和土地菁英仍然支持白原市做為該郡商業中心。它也顯示規劃者的動手控制策略不會間斷。在企業擴張期間，選擇性的規劃不斷進行，導致地產價值持續增加。1965 年至 1981 年間，白原市都市更新地區地產的估價，從 980 萬美元漲到 5,130 萬美元，增長超過 400%。許多新辦公室、商店和旅館群聚於白原市，以致城鎮規劃師無意再吸引新計畫。⁶¹

白原市的發展模式已證明對菁英非常成功，卻跟揚克斯、弗農山和切斯特港的發展模式形成強烈對比。這些市中心區的新住宅往往由公共補助，商業開發的相關機構不是規劃局或企業團體，而是較低階的社區發展與工業開發機構。這些市府機構人員認為，揚克斯、弗農山與切斯特港缺乏企業成長的「正確美學」。社會、族裔和種族團體混雜，違背本郡其他地區的均質意象。⁶²

1950 年代中期以來，規劃者聲稱他們想要有負擔得起的住宅、減少交通阻塞，以及全郡尺度的規劃權。⁶³ 然而，至今只有

規劃權完全實現，而過去八十年來規劃所支持的發展模式卻建立在相反的目標上。更高的土地價值使住宅更加負擔不起。更多辦公大樓和工作帶來更多交通阻塞。這注定是永遠使規劃者抓狂的「成長兩難」。此外，威切斯特郡的規劃採用源於經濟體裡其他地區的去工業化與企業遷址策略。經濟權力地景能否比這些策略撐得久——或能憑藉主要地方行動者的全球利益而成功發展——則提出了額外但未獲注意的兩難困局。

後工業郊區地景？

在威切斯特郡，地主與企業菁英間有不尋常的廣泛聚合。市場的經濟強健反映地方強大的社會與文化價值。但是，在以地方和以市場為基礎的經濟價值間有嚴重矛盾，這意味運作至今的「成長機器」的限制。

1900年起，威切斯特發展模式的構想和正當化，都源於由大型金融利益主導的親成長聯盟。雖然它們的多數企業活動焦點放在紐約市金融市場，但這些公司也是財貨和服務的全球生產者，以及威切斯特郡的地產所有者。簡言之，它們的利益架接了各種地理尺度。將企業辦公室遷至威切斯特郡不僅反映特定地方的吸引力，也是將當地地景再開發為全球市場之社會—空間過程的重要聲明。

一如上層和中上階級居民，全球投資客也被均質性所吸引。他們同時利用自然的視覺均質性，以及郊區地景裡中上階級文化

的社會均質性。此外，1950 年以後選擇投資威切斯特郡的企業，找到一個相對開放的社會—空間結構，與城市多重決定的地景形成對比。郊區提供企業能輕易蹂躪「足跡」的地景。尤其是，企業地產所有者可以在重建勞動力的同時重組空間。而且，當地的土地菁英與政治菁英都歡迎他們。不像城市裡的不動產利益、政客和工會，郊區菁英容易接納企業規劃。威切斯特郡既是企業的市場，又是地主和政治菁英的地方，從而將新郊區市場正當化。

175

然而，支持這種地景的創造性破壞，反映了成長與衰退的分隔模式。一方面，仍然陷於低身分地位、種族隔離的均質性舊風土中的地方社區——尤其是揚克斯——積蘊著社會壓力。另一方面，已遭富裕的企業雇員和開發商擠爆的住宅市場持續累積著經濟壓力。威切斯特大部分的新辦公建築，還是出現在擁有最高中位數家戶收入的地區，鞏固社會和空間的不平等。

本章附圖所描繪威切斯特郡最新的 IBM 設施延續了這種模式。1970 年代晚期，IBM 於索莫斯購置 640 英畝土地。到了 1980 年代中期，額外的土地購置使總數多達 750 英畝。這時候，該公司決定在往來 IBM 與威切斯特郡、達奇斯郡及普南郡的各種設施最便利的索莫斯興建大樓，將它在威切斯特租用和擁有的 11 處不同地點的業務整併。整併也吻合精簡成本的企業目標，這在 1985 年以後日趨激烈的電腦產業競爭中格外重要。然而，原本只為總部員工規劃、由建築師貝聿銘 (I. M. Pei) 設計的索莫斯建築群，後來卻是為公司商業線及部門總部所有員工而開發。因此，當 1989 年索莫斯的位址啟用，即為 IBM 製造與開發活動

的高度整合提供辦公室和電腦空間。這擴大了企業在索莫斯的影響力。像索莫斯這種城鎮面臨的許多社會壓力，正是由 IBM 與當地規劃師偏好的發展模式引起。新企業辦公室抬高土地價值，卻因此很難吸引中產和中低階級勞動力來此從事辦公室和服務業工作。威切斯特郡的開發因而撕裂了市場與地方。地方與商業菁英應該運用其經濟權力創造更多、還是更少社會均質性？*

176 威切斯特郡的企業主管反對不顧商業環境的後工業發展利益均霑政策。他們承認替勞動力提供能負擔的住宅很重要，卻拒絕支持租金管制法或公部門的住宅營建補助。就他們透過威切斯特郡協會來影響規劃而言，他們保存了威切斯特珍貴的均質性。⁶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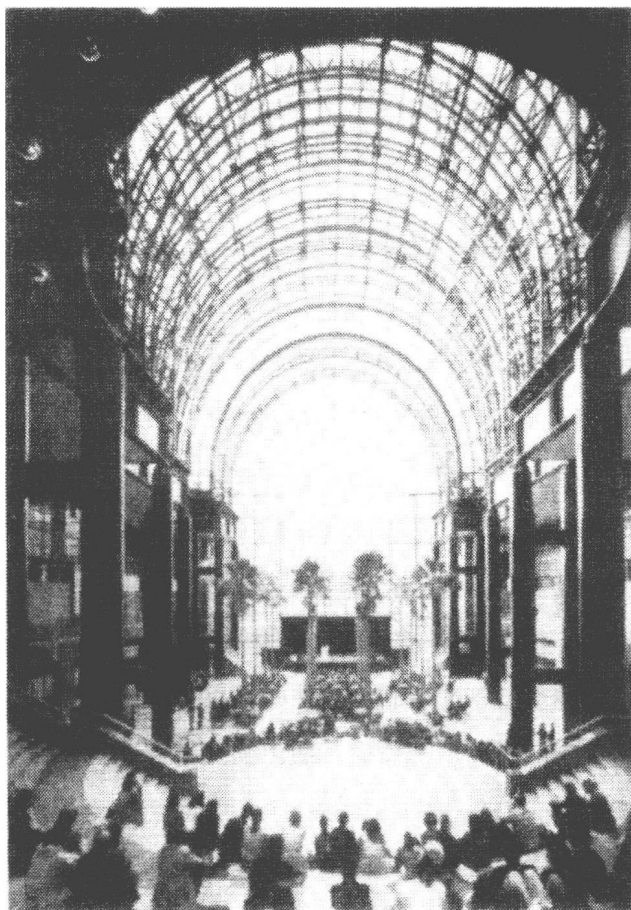
即使在「最佳」情況下，威切斯特也顯示郊區的後工業發展創造出不均等的利益流動。許多人的一項特殊負擔，是服務業工資和土地價值增長之間的落差。威切斯特郡的住宅價格遠遠超過中位數收入，大部分新屋實際上是「買不起」。但是，新服務業的工資率實際上拉低了全郡平均工資。本郡擴張最快的工作類別不是高階主管或經理，而是時薪 5 至 7 美元的事務職位——與威切斯特郊區生活風格所需的收入相去甚遠。諷刺的是，往返紐約市通勤工作的威切斯特居民，一般而言比在威切斯特工作的郊區鄰人擁有薪資更高的較佳工作。⁶⁵

* 飛奔的土地價值也造成富裕居民生活不便，無論是要將馬兒關在自家土地上或在威切斯特郡尋找馬場，都更不容易了（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3, 1989）。

去工業化與企業分散化提高多數威切斯特郡地產價值而迎合菁英利益。但它們也造成南部城市的失業和顯而易見的苦難。1980 年代，富裕的企業雇員和專業者受到揚克斯較好的老房屋吸引，他們發現該地區的地產價值——依照他們的認定——遭到低度社會整合的威脅。別具意義的是，相較於高度宣傳動員反對整合的勞工階級與中低階級白人居民，住在揚克斯的企業菁英成立支持種族和社會階級整合的社區團體。在這個案例中，市場的文化價值與地方的文化價值恰成對比。

企業合併與收購的文化也威脅著地方。1980 年代期間，德士古被罰 30 億美元以解決與賓州石油（Pennzoil）的爭端，因為它收購了另一家賓州石油早先爭取的石油公司。支付卡爾·伊卡恩（Carl Icahn）和其他股東以避免遭接管的額外支出，迫使德士古出售資產並重組管理階層。這些財務壓力可能影響了其威切斯特郡的企業總部區位。同樣的，通用食品在遭菲利浦莫里斯收購後，於 1989 年的另一樁收購案中與卡夫食品（Kraft）合併；這個新部門卡夫通用食品（Kraft General Foods），在伊利諾州擁有企業總部。

隨著企業總部分散到整個郊區，經濟權力地景也於地理上擴散，但趨勢尚未逆轉。威切斯特郡後工業經濟的選擇性富裕，反映了獲得當地機構協助推動的撤資與去工業化的結構趨勢。南部城鎮以生產為基礎的文化，隱沒於中上階級的消費文化中。危險的是，視覺秩序的均質性掩蓋了服務業經濟裡跨國企業合併的反覆無常。



西撒·培利 (Cesar Pelli)^[8]，冬園，世界金融中心，紐約市 (1988)。Peter Aaron/ESTO版權所有。感謝美國奧林匹亞與約克公司 (Olympia & York Companies) 提供照片。

^[8] 阿根廷建築師，設計一些世界上最高的建築物和其他主要城市地標。他的設計以弧形立面及金屬元素聞名。資料來源：http://en.wikipedia.org/wiki/C%C3%A9sar_Pelli。

第 7 章

縉紳化、料理與評論階層 權力與中心市區

感謝上蒼，我想這是最後一年的新潮料理。這不是食物；這是地景，是做出來裱框，而不是拿來吃的。

——安德莉·普曼（Andree Putman），室內設計師
《紐約時報》，1987年12月31日

她是曼哈頓的藝術指導，顯然意指是某種設計師……。對克拉莫（Kramer）而言，這暗示難以言喻的迷人生活。美人們在光滑白牆與玻璃磚的辦公室裡……一種 MTV 辦公室……來回跳動，錄製新浪潮音樂……裝飾著金黃木料、黃銅、間接照明，以及楔形圖案毛玻璃的餐廳裡的絕妙午餐和晚宴。……酒杯蘑菇烘烤的鵝鶉，有甜馬鈴薯鋪盤和一圈燉蒲公英葉襯底。……他可以一覽無遺。

——湯姆·渥夫，《虛榮的篝火》
（Tom Wolfe, *The Bonfire of the Vanities*）

中心城市以外經濟權力的擴散，不是近年來創造新權力地景的唯一過程。每個成長與衰退的時刻——美國製造業衰退與服務業成長——也深深刻印在中心的建成環境裡。不均等投資的興衰起伏，「解放」出某些創造性破壞的空間，將其他空間推向更稠密、更高大、更新穎、更昂貴的建築。市中心（downtown）更甚於其他地景，替結構變遷與商業周期提供明確評論。市中心是現代城市的主要形象與中心性（centrality）意象，也是經濟與文化價值矛盾鬥爭的場所。同時，市中心替開發與撤資的象徵性斷裂賦予了物質形式。

就像臥房郊區現在卻長出雨後春筍般的企業高樓，許多美國城市的市中心也經歷了意義翻轉，挑戰過去五十年來大部分的社會與空間預設。然而，跟多數郊區不同，市中心不是處女地。市中心既有密集建築、又有歷史層次，是使經濟權力的文化霸權對立於社會多樣性之另類形象的「都市叢林」。市中心的每個片段都自成一處連貫地景，不主張代表整體市中心，卻對其他地方提出評論。少數族裔聚居區、金融區、百貨公司、市政府、貧民區：每一個都單獨呈現了自主發展，但作為整體，它們具有單一地景的特質，而其價值隨著視角變化而改變。

從「市郊」（uptown）觀點來看，市中心是市場商業和市場文化、高樓建築、「白人」工作的白天體制。然而，以天際線來看——就像我們晚近進入城市的常見方式，經由機場或高速公路時所見——市中心就是城市本身的同義詞。無論是物質地景或象徵再現，市中心正當化了中心的權力主張。去工業化、企業分散

化和不動產開發，都要為市中心近來的創造性破壞負責。然而，不像在威切斯特郡，它們的互動不是為了建造一個外觀不同以往的新地景，而是要施加一種新觀點。它們在文化權力的基礎上，將市中心片段化的風土整合為連貫的地景。這一回，創造性破壞的過程也連結生產與消費的新組織，核心權力的重組。

城市意象總是糾纏於市中心的地理中心性與其經濟權力的集中（或喪失）關係中。無論是建築學，或社會學與地理學等基本都市學科，定義城市者往往假設中心性是社會控制的空間典範。這點似乎只獲得支持縉紳化（gentrification）的社會權力確認，而縉紳化就是指 1970 年代起，將中心城市處於經濟邊緣與勞工階級的地區轉變為中產階級住宅區。

中心性是權力的地景

整個 20 世紀，有關現代城市的書寫，強調的是中心性與權力之間緊繃的協調關係。正統生態區位學家認為，空間集中是不成問題的社會事實，都市評論家卻視之為弔詭和矛盾的根源。

本世紀前三分之一時期的地理學家發展中地理論（central-place theory），解釋都市與區域支配的空間模式。這個理論以規模、密度和經濟功能檢視城市，描繪相當均勻分布、從中央核心向外輻射出去的空間層級。中地理論家傾向忽略社會過程，除非是城市間的市場或準市場交易，它們塑造且重塑功能支配的結構。他們也不解釋中央權力的社會不平等。相對的，1920 年代芝

加哥學派的都市社會學家，從象徵權力和物質剝奪的角度，透過圖象而界定中心城市。他們對城市——尤其是芝加哥市——的經驗研究，並置社會底層與制高點的民族誌報告。芝加哥社會學家描繪出一整組的「都市類型」，各自置身於其「生態」環境：這些群體越是偏離被人接受的社會規範，就越接近城市的文化和地理中心，同時越遠離經濟權力。但是，文化與權力——簡言之，都市狀態（urbanism）——是從中心輻射出來的。

芝加哥的地形學引導這些社會學家將地景與風土（vernacular）的對比視覺化，成為一系列的同心圓。在坐擁高租金和便利設施的市中心區，以及富裕的郊區宅邸，兩個均質地景之間，是黑人帶（Black Belt）、小西西里、中國城、德意志區、猶太聚居區、牲畜飼養場、工廠、出租公寓和鐵軌等區段化的風土。隨著資本向外遷離，我們現在可以說，市中心堡壘週圍是風土地帶，而中心力求在一段距離外加以控制。¹

都市史學家路易斯·孟福（Lewis Mumford）在大蕭條與二次世界大戰後的著述，透露出對中心性矛盾的更多理解。如同芝加哥學派，他不區分現代城市裡的都市狀態和資本主義，也不分辨集中於現代城市的社會權力，以及經濟系統的集中化權力。孟福展現對城市生活擁塞與過度活躍的蔑視，雷同於芝加哥學派承繼自齊美爾（Georg Simmel）德國社會學的輕蔑，「喪失形式、失去自主，日常活動的持續挫折和煩擾，更別提大故障和堵塞了」。然而，他批判「致力追求利潤而非滿足生活需求的經濟擴張」，鄙視「新城市意象，那個持久不衰擴大胃納的意象，消耗

擴張中工業和農業生產的產出，回應著持續教化宣傳的壓力」。新科技提供克服這種貪婪的可能性。但孟福發現，經濟權力同時是市中心多樣性和乖僻任性的來源：它是生產與消費的機器，休閒樂趣與社會控制彼此扣連。因此，孟福遭遇了他認為「史無前例」的中心性權力。「雖然大都會的容器已經爆滿，但制度性的磁鐵仍保有它們多數的原初吸引力」。²

孟福的折衷觀點提示了未來的城市生態學與基進視角的輪廓。1950年代以降，城市研究的一個主流取向是都市生態學，它強調即使是居民走避且製造業遠離的時刻，中心還是有從周邊區域汲取權力的能力。生態學家將郊區化視為個人的逃離過程，沒見到中心權力的複雜衰減——透過投資於郊區、邊緣區域與海外。他們也無視於支配當時真正城市中心的地景與風土間的意識形態鬥爭。一方面，中心的物質地景片斷化為相當狹小的上流階級市中心，以及少數族裔居住的遼闊、荒廢、低租金的內城。另一方面，象徵地景將位於城市生產核心的工作市中心的公共世界，與郊區家庭、小孩和家戶消費的私人世界區隔開來。³

這些意識形態分歧令基進社會批評家甚為關切。他們描繪1973年以來的「都市鬥爭」，不僅指涉對城市居民完整性的特定日常攻擊，還指涉現代資本主義體系中經濟與文化價值的普遍瓦解。都市住宅與勞動市場的斷層線，明顯影響地方的社會制度，包括家庭、性別、種族與社區。許多都市鬥爭都涉及空間的使用。如果城市是市場經濟的社會—空間基底，那麼城市空間結構的生產方式，便會持續摧毀並再造整個經濟與政治系統的社會不

平等。中心性本身不是個議題。但透過財產權與租金、土地使用分區法令、運輸系統，以及其他更具象徵性的控制形式，建構於空間裡的社會排除和階層，則意味中心位置不只是人造物。跟郊區一樣，中心性是精心構築的地景。⁴

主導性的經濟制度，藉由生產法國社會學家昂希·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所謂的「抽象空間」，切割出它們在中心的標記。這個空間由資本投資、企業總部，以及聲譽卓著的政府計畫所描劃和界定。它們粗暴地主宰城市，將世人熟知的「積累搖籃、財富位址、歷史主體、歷史空間中心」撕裂拆散。跟孟福一樣，列斐伏爾將中心城市視為群眾與商業、景觀與行動的歷史濃縮。他於 1970 年代的著述強調，城市經濟權力集中底下的張力：「那些聲稱『都市空間性』的人，也訴說著中心與中心性，無論是既存或潛在的、飽和的、破碎的、遭攻擊的；這就是一種辯證的中心性。」⁵

雖然中心的矛盾根植於經濟與政治權力的積累，對列斐伏爾而言，主要的矛盾則是都市空間的片斷化（fragmentation）。1970 年代以前，大部分市中心區的狀態是既專殊又無聊，既隔離又均質。⁶ 但是比較鮮明的經濟解讀，則直接將中心都市空間的成長與衰退，與資本積累過程連結。誠如大衛·哈維（David Harvey）時常描述的，透過都市形式和空間而操作的經濟價值，同時造成創造和破壞的壓力。城市地理中心的經濟價值永遠可能位居最高。然而，這些價值往往被銀行、政府機關、停車場這類「非生產性」用途吸收，不是迎合、就是迴避土地菁英的昂貴需

求。因此，在哈維看來，對於中心的粗暴使用並不決定其價值；相反的，用途會隨價值變化而定。當中心的投資回收低於其他地區的報酬率，新建設和高階承租人就會搬到郊區。中心資本經濟價值的週期性衰退，導致中心被暫時拋棄，不再是權力地景。⁷

投資的地理操作，與資本的社會和空間集中同步進行。一方面，越來越少掌握投資資本的經濟行動者，會將投資集中少數幾個特定空間群聚。另一方面，他們將投資匯聚於城市中心，則反映其社會權力的集中。然而，直到1970年代中期，市中心依舊是社會使用和經濟價值的拼湊。它包括過去資本投資的沉殿聚集、對抗經濟價值損失而成為持有模式的大片空地——往往獲得公共補助的都市更新支持——以及供本地人、落魄者及傳統族裔之用的低租金區。這些全都排除在經濟權力地景之外。

184

市中心地景

聚集和排除、權力與風土的辯證，沒有比在曼哈頓與布魯克林之間，沿曼哈頓橋跨越東河的高架地鐵車廂裡所見更為鮮明的了。曼哈頓橋橫跨兩個市中心：曾是獨立城市中心的布魯克林市中心區，以及紐約市中心在1898年合併布魯克林的曼哈頓市中心區。從外觀上看，它們是全然不同的地景和風土景象。

在曼哈頓橋的曼哈頓端，面對自由女神像，鋼鐵、水泥與玻璃的高塔，創造出20世紀金融的多層次全景。1913年完工之際為當時世界最高摩天樓的伍爾沃斯大樓（Woolworth Building），

其新哥德式尖塔雅緻地指向 1960 年代期間，為華爾街全球擴張而建的世界貿易中心的龐大現代盒子。這些建築接著遭到世界金融中心與砲臺公園市（Battery Park City）的大型後現代建築物，在中間高度上左右夾擊，它們裝飾用的復折式屋頂和鋸齒邊，填塞雲朵和天空的剩餘地帶。

隨著地鐵從地底奔馳而出，較小型的建築物隱約出現在前景。1880 年代為義大利人與猶太人而建的中國城紅磚廉價公寓，證實依然有活躍的移民現身。中國人經營的服飾店窗戶敞開，高度與列車一般，下方的街道散布著販賣綠色包心菜和青蔥、紫皮茄子和柳橙的攤販。在高架鐵道與跨越街道張掛的紅字橫幅間，淡漠而不協調的是第一中國長老教會（First Chinese Presbyterian Church）的灰白色方石立面。

185

中景所見則是曼哈頓工作水岸的最早遺跡。曾經是魚商的碼頭辦公室，晚近成為黎明前流連的地方，像迎合岸邊批發魚貨市場顧客所好的甜心餐館（Sweet's Restaurant）和馬虎路易餐廳（Sloppy Louie's），這些在謝莫洪排屋（Schermerhorn Row）上色彩柔和的 18 世紀建築，部分已「修復」，但多數閒置，等著與水岸區商業重生搭配的新商店和餐館進駐。從曼哈頓橋中央看去，就像玩具屋。

面朝南街海港（South Street Seaport）的紅磚購物中心，這些商業時代遺跡因華爾街的巨獸而顯得矮小。夜晚，因兼差工人和清潔員而照亮的窗戶，使曼哈頓市中心建築物就像巨大的電子棋盤般，襯著黑暗背景而以華燈穿孔。

水岸的布魯克林端，有龐大的磚造空倉庫及幾間沿著碼頭色彩明亮的棚屋把守。相較於曼哈頓固有的經濟權力地景，這座「跨河城市」的入口，以寫著「布魯克林行得通！」的紅白藍告示為標誌。在這裡，東河拍打著勾勒出舊碼頭痕跡的腐爛樹墩。空曠的河濱街上是12層樓的雄偉鐘塔，統轄一棟大型閣樓建築，已更新為紐約州勞工部辦公室。鐘塔旁的建築還有「史威尼製造公司／鍍製品……五金」的油漆字樣。隨著地鐵奔馳過商業閣樓街區，往後方掃視呈現一塊巨大的屋頂招牌，預告這個地區轉變為「地標型水岸商業區」的未來。不久，我們就會在布魯克林水岸發現曼哈頓市中心區的複製品，一個外移的權力中心形象。*

空間會改變，所以大衛·哈維所謂的「中心性假設」並非事實。它是個社會過程，是集中化的經濟與政治權力的空間施展，是使用與價值之間成問題的關係。⁹然而，中心性也揭示了一種文化過程。如果建築可以抽繹出權力，那麼市中心區闊氣、密集且高聳的建築形式，便體現了資本投資的不斷伸展，以及投資決策權威的龐大集中。市中心的摩天大樓也區分了過去與現在。其垂直性取代早期水平的市民理想，迫使地景和視角改變。¹⁰在摩天樓腳下，中心的鋪路石對「文明」及其衰退提出控訴。隨著時

186

* 這些文字一寫就，《紐約時報》社論便宣布，「紐約市的中心商業區終於橫跨東河抵達布魯克林市中心，這是全體紐約客之福」（March 19, 1988）。這篇社論繼續恭賀地方民選官員，在新的公私合夥都會科技（Metrotech）開發中，將離布魯克林水岸不遠的大塊空地租給保全產業的電腦操作分公司。

間過往，從斧鑿石塊變成柏油路，從光滑平順到電車軌道，再到道路洞坑，街道擁有市中心創造性破壞的記憶。

市中心在事實上及形象上，都是對客觀成就及地方情感依附的集體記憶。它標示出最古老的持續定居環圈（儘管北美城市相對年輕），與建造每個時代最高建築的地方。中心性同時是與歷史的空間連接，還有與經濟及政治權力的暫時連結。個人占據這處地景裡的特殊地方。對某些人而言，市中心代表家族企業或家族財產的連貫性。這種情況裡的中心可能意味著置身權貴家族的成員身分，他們支持城市的大型文化機構，而且通常擁有最多的都市土地。其他人則僅僅渴望享受汲取中心的財富。在這種情形下，中心性可能發揮驚人的力量。約翰·伯格（John Berger）寫道：「資本主義歷史上，曼哈頓是替那些因過度期望而遭受詛咒的人保留的島嶼。」¹¹

1960年代晚期與1970年代初期以來，投資者對這處煉獄表現出明顯的興趣移轉。不只曼哈頓，還有費城、芝加哥、波士頓及許多較小型城市的市中心，都因商業地產開發與聯排住宅（townhouse）、公寓和閣樓的新住屋所有權而重構。此外，市中心成為創造力的朝聖地。這不是指舊波西米亞邊緣地帶的倖存，而是指其規模擴張，透過與大型文化機構合作而於某些市中心區更加鞏固並遭到文化創新行銷的殖民。縉紳化是這個社會一空間重組的一部分。縉紳化引發人員與投資往市中心移動，既是脫離傳統中產階級，也是對權力的渴望。縉紳化是一種挪用市中心的中心性，並透過消費中心性提高其經濟與文化價值的努力。

縉紳化之為市場與地方

縉紳化在幾種意義上指涉深刻的空間重構。首先，它意指往往以**內城**為代價的**市中心**實質地區擴張，更微妙地暗示從市中心**文化**權力的地理中心往外擴散。最後，看似重申純粹**地方**認同的縉紳化過程，就**國際**市場文化而言，代表市中心的社會轉變。

人們通常以狹隘得多的意思理解縉紳化。它不僅指涉住宅，尤其是專業和管理職務中產階級成員的住宅選擇，通常還從個人主義角度來描述這種選擇。但構成縉紳化之特殊空間過程的微小事件與個人決策，滋養了更大的社會變遷。每個鄰里的縉紳化經驗都有自己的一段故事，每個市中心都有其「再活化的」南區（South End，位於波士頓）、優質山莊（Quality Hill，位於堪薩斯市）或鵝島（Goose Island，位於芝加哥）。與地形、既存建築物甚至既有居民無關，縉紳化持續的集體努力，乃是為了各種新都市中產階級而占用中心。^{*}

將縉紳者視為「都市先鋒」的觀念，可稱得上是中產階級占用的意識形態辯護。猶如19世紀白人定居者強迫美國原住民遷離

* 對所有新的私部門資本投資，包括縉紳化而言，種族造成最嚴重的阻礙。1970年代期間，當住宅價格持續攀升，供給卻跟不上需求步伐時，白人縉紳者變得「更敢於」搬進非白人鄰里，或對這類居住地點所要求的安全及服務成本較能容忍。唯有在縉紳化有取代有色人種的風險時，尤其是在哈林區，才有機會動員加以反對。即便如此，如同工業遷移的情況，受害者若非被買斷，就是獲准購置新建築，在此指改良的既有住宅。

188 他們的傳統土地，縉紳者、開發商和新商業用途也清理了市中心原有人口的「邊境」。¹² 符合邏輯的是，這種占用同企業服務業工作與設施的在地擴張步調一致。雖然有些工作分散到郊區，城市整體經濟則轉移到金融、娛樂、觀光、通訊及其商務供應者。然而，無論企業擴張或縉紳化，都未能改變都市經濟衰退、中位數家戶收入減少，以及收入不平等的普遍趨勢。縉紳化促成地景與風土的新式並置，反而使不平等更顯而易見，創造出「衰敗海洋中的更新島嶼」。¹³

1945 年以來（或更精確的說，1929 年以來），對中心住宅的再投資有賴資本撤資，提供了「可縉紳化的」既存建築物。不過，這也反映對這類既存建築物的需求是受文化轉變的塑造。這又呈現出一種「反身性的」消費，其基礎是較高的教育程度，以及與此相關的高級文化與時髦風格消費者的擴張：這些消費者是潛在的縉紳者。¹⁴

縉紳化的私人—市場投資有效接管了清理中心的角色，當時正值都市更新的公共計畫耗盡聯邦基金，而其支持者也脫離所有種族群體和社會階級。再者，縉紳者通常使用非機構性的資金來源，包括繼承、家庭借款、個人儲蓄，以及他們自身翻新工作的血汗產權（sweat equity）。因此，縉紳化造成的轉變既表現於市中心開發模式——從公共到私人部門、從宏大計畫到小規模計畫、從新建設到修復更新——也涉及投資資金的來源。

同時，中心城市的整體政治經濟也產生變化，這是去工業化和週期性資產貶值的長期結構性過程的結果。1880 年代以來，大

型製造業遷出中心，認為多樓層的建築安排和擁塞街道在功能上已經過時。製造商仰賴生產過程、貨運和汽車通勤的水平配置，因而偏好位於郊區的新式綠地工廠。郊區土地價格、稅金和薪資也是一大誘因。但還留在中心的小型製造商，往往聚集於市中心的 19 世紀閣樓建築，租金低廉有如時代錯置。雖然 1960 年代期間，它們經歷海外生產與進口滲透競爭的嚴重打擊，但是像服飾製作和印刷這種位居中心的事業，仍繼續在靠近消費者、競爭者及供應商的低租金群聚區旺盛發展。在紐約，它們也受惠於大眾捷運路線，連結曼哈頓市中心及中城，與低薪、通常是移民與少數族裔勞工居住的偏遠勞工階級地區。

儘管擁有經濟活力，以及與市中心區的歷史聯繫，這些製造商仍面臨巨大的生活壓力。土地菁英、民選官員和不動產開發商共組的成長機器，視為他們為闖入者。他們在社會上顯得過時的風土氣息，構成市中心經濟權力地景擴張的阻礙。1960 年代期間，一方面有都市更新計畫，同時另一方面有郊區新辦公室的建設，許多城市行政機構訴諸改革派市長，與企業和銀行利益組成新聯盟。譬如，紐約市長約翰·林賽（John Lindsay）為了往更有利的金融部門（包括不動產開發商）方向發展，而擺脫市政府與小企業及工會的新政聯盟。自林賽以來，紐約市長都支持成長機器，明顯聚焦於整個曼哈頓市中心的服務部門擴張。¹⁵

假使企業有坐落於市中心的需求或渴望，這時候的地產價格相當低廉。雖然「租隙」（rent gap）反映中心地區週期性的經濟貶值，有些私部門機構——主要是銀行與保險公司、外商公

司辦公室，以及金融服務業——還是為了象徵價值而堅守市中心區位。¹⁶但市中心從未完全排除「高檔」使用。為數不多的權貴家庭總是居住在波士頓後灣（Back Bay）和燈塔山（Beacon Hill），以及費城的社會山（Society Hill）及里頓豪斯廣場（Rittenhouse Square）。¹⁷像這類從未喪失經濟與文化價值的小地區，成了中心「再活化」的跳板。

擁有市中心土地的權貴，一面注意再開發的契約，一面留意他們在地產價值引導提升經濟價值的新開發模式上占有的理想地位。他們也控制大規模土地用途移轉所需的投資資金來源、市政當局授權，以及文化正當性，因為他們塑造了銀行政策、城市規劃委員會和地方歷史協會。紐約或許是個特例，因為曼哈頓市中心坐擁地產的權貴（現在住在上城或郊區），至1973年為止只要求新的建築物和公路建設。

然而在費城，社會山的上層階級居民及其銀行與市府夥伴，於1950年代晚期展開協調一致的努力，致力於以保存為基礎的再活化。從艾爾弗瑞斯巷（Elfreth's Alley）的房屋參訪開始，他們接著為清理附近鄰里和新商業建設而尋求政府補助。20年後，適逢獨立宣言200週年紀念，他們靠近德拉瓦水岸（Delaware waterfront）的市中心居住飛地，週遭是一大片供歷史保存、觀光、保險與金融公司的新辦公室，以及並非純屬巧合的附近皇后村（Queen Viallage）縉紳化的專用地區。移徙的則是包括製造商在內的小公司與勞工階級居民，尤其是以義大利和波多黎各裔為主。¹⁸

相對的，在曼哈頓市中心，約自 1970 年代起，低租金和「社會上過時」用途的移徙，就是文化政治的一環。尤其是曼哈頓市中心地景，是由藝術家與歷史保存者聯盟這方的非預期勝利所塑造。藝術家組織起來，捍衛文化生產者在低租金製造業閣樓裡建立生活與工作的地區，並抗議成長聯盟拆毀這些地區。基於他們對紐約市的經濟貢獻，他們也主張在專供製造業使用的建築物裡居住與工作的合法權利。1960 年代以降，非傳統形式的藝術與表演確實吸引更多付費公眾。他們逐漸往市中心閣樓集中，將這些空間與市中心藝術經濟聯繫起來。

藝術生產者、製造商與房地產開發商之間持續到 1973 年的市中心空間競逐中，藝術家以勝利者之姿出線。但他們如果缺乏有力的結盟，就無法贏取閣樓居住權。他們的政治策略不僅仰賴逐漸成長的藝術家群聚的可見性，也取決於某些地主和政治菁英成員的贊助，他們原本可能支持成長聯盟。基於歷史保存的文化價值和藝術經濟升高的市場價值，曼哈頓市中心的閣樓從輕工業轉型為文化區。我們以後見之明知道，這個過程與縉紳化平行發展。¹⁹ 曼哈頓市中心「閣樓生活」的正當性，標誌了地景的象徵變化與物質變遷。藉由明顯「從底層」釋放出的投資流動，清除了像製造業這種「過時」用途，市中心空間需要視覺的、感官的，甚至是概念上的重新定位。正如市中心的新開發模式反映了新生產組織，許多縉紳者的文化實踐也跟新消費組織息息相關。

剛開始，縉紳者對修復及保存歷史風格的愛好，是對十幾年來公共資助的都市更新和私人商業再開發，聯手摧毀大部分

城市建築遺產所反映出的真實沮喪。舉例來說，《失落紐約》（*Lost New York*）攝影展（1963）與書籍（1967）記錄鍍金時代（Gilded Age）至二次大戰期間，主導曼哈頓市中心的美麗石造、磚石及鑄鐵建築。隨著市中心商業往北擴展，這些建築物在連續的再開發時期裡多數遭到拆除。破壞有好長一段時間意味著改進。但是，1960年代初期賓州車站（Pennsylvania Station），這個大時代鐵路終點站的高聳玻璃圓頂，被庸俗的辦公室建築取代，其破壞卻使眾人同感的集體時代感喪失戲劇化。²⁰

為《失落波士頓》、《失落芝加哥》與《失落倫敦》策劃的攝影展，顯示出對都市再開發採取燒耕破壞策略的普遍不滿。批判觀點從美學到社會學不一而足。記者珍·雅各（Jane Jacobs）的家庭搬進格林威治村最古老的住宅與工業混合區，她主張保留老建築，因為它們促進了社會多樣性。她將又小又舊的建築物及低廉租金連結上鄰里街道生活、專門的低價店鋪，以及新穎有趣的經濟活動：換言之，就是市中心的社會價值。再者，社會學家赫伯特·甘斯（Herbert Gans）與馬克·弗萊德（Marc Fried）的研究指出，對市中心居民而言，即便是實質衰敗的內城社區，也會有補償性的社會價值。²¹

中心的新住宅費用攀高和效益漸減，與這些發展中的感受同步進行。同時，性別平等和家戶獨立的新模式，減弱了住宅須鄰近好學校、超市與鄰里商店的舊需求，至少對沒有小孩或念得起私立學校的家庭而言是如此。儘管他們負擔不起公園大道，或打死也不願意住在上東區，但高教育程度的中上階級居民以中心的

社會和美學品質來評價它。同樣受良好教育的較低收入居民，尤其是選擇文化職業和獨居的人，包括許多女性與同性戀者，則看重中心的群聚特質。市中心「過時」地區相對低廉的既存建築，同時為男女群體提供新文化消費的機會。²²

新中產階級居民傾向購買市中心 19 世紀建造的房子。他們煞費苦心恢復建築細節，這些細節原已遭多層油漆覆蓋，因反覆修繕和重新隔間而變得模糊，還常因飽經無數翻新而失落不見。當「縉紳者」在 1960 年代早期湧進倫敦內城鄰里，英國社會學家露絲·葛拉斯（Ruth Glass）率先注意到他們的現身。新居民沒有上層階級的收入，但顯然比他們的勞工階級鄰居更富裕、教育程度更高。這些鄰居難以理解是什麼吸引他們到市中心附近破敗地區的老舊房屋。然而，此後縉紳者此後就遍布於所有高度工業化世界的舊城市，導致他們的文化偏好被納入鄰里更新和城市規劃的官方規範中。²³

就其歷史結構和較小尺度的完整性而言，縉紳化看似一種試圖重新捕捉地方價值的再發現。對中心老建築物的美學與社會歷史的賞識，顯現出某種文化感性與優雅，超越戰後從眾且平庸的郊區精神。此外，搬到市中心尋找社會多樣性，宣示了自由主義式的容忍，卻似乎與內城的「白人外逃」和撤資相矛盾。立基於文化資本（而非經濟資本）所建構的社會空間或習性（habitus），縉紳化顯然調解了兩組矛盾——地景與風土、市場與地方。一方面，縉紳者從傳統上用以觀看風景的美學及歷史觀點，看待都市風土破舊的建成環境。另一方面，他們著眼於文化

而非經濟價值而要求保存老建築，有助於建立一個販賣地方特色的市場。²⁴

然而，市中心的性質轉變，縉紳化也隨之改變。1980年代初期以降，對舊建築的關切是縉紳化的標記，結合了眾多的新建設。金融區附近住商整合的建設計畫，例如倫敦碼頭區（Docklands）及紐約砲臺公園市，利用了偏愛縉紳者「開拓」的舊建築物與市中心多樣性的品味。然而，由於它的成功，我們不再知道縉紳化主要的究竟是一種社會、美學，還是空間現象。

193

小規模不動產開發商慢慢察覺到，提供以地方為基礎的商品深具商機。將布魯克林市中心附近種族混雜鄰里的新哥德式天主教神學院，改裝為豪華公寓的房屋開發商說：「你找到一處明顯易見、有聲望的建築，建造精美，最好是戰前的產物。」「你發現它位於有些問題的鄰里，但接近公園、大學、良好的交通運輸，這些是能吸引中產階級進來的條件。差不多在你要完工時，周遭其他建築物就開始整修了。」²⁵

市中心閣樓區域形成專門的房地產市場，因為它們具有特殊品質。它們與藝術家的關連直接賦予居家閣樓（living loft）真實文化消費的靈光（aura）。假如藝術家是「全職休閒專家，是描繪且刺激其他兼職消費者感官期待的美學技師」，那麼藝術家的閣樓及週遭地區，就是新穎的反身性消費的完美地點。²⁶

市場不是地景與風土競逐市中心空間的唯一仲裁者。²⁷ 關鍵要素是既有使用者（如勞工階級居民和小型製造商）的社會價值，他們對中心的權利主張，敵不過潛在縉紳者的文化價值。縉

紳化結合對空間的經濟主張，以及賦予歷史保存主義者和藝術生產者優先性的文化宣稱。在這種觀點下，「歷史」建物唯有在被視為美學論述（像是建築和藝術史）一部分而加以解釋、分析和理解的時候，對它的鑑賞才能獲取最高價值。這種建築物正確地「歸屬於」某種人，他們擁有資源可以找尋原始的建築計畫，並參照建築師的職業生涯脈絡研究他們的房子。他們屬於復原紅木嵌板細工，購買 19 世紀水龍頭複製品的居民，而不是那些偏愛鋁製牆板的居民。

縉紳者將自己連繫上歷史的能力，使他們獲得「取回」市中心以供自己使用的資格。反正他們大多數人不會因當地勞工階級酒吧轉變為「懷舊風情」酒吧及「法式」小酒館而哀悼。透過既存的建築，他們認同一群早期的建商，而非既有的低階級人口；認同 20 世紀初期百貨公司的「女仕一條街」（Ladies' Mile）^[1]，而非取代它們的折扣商店。

主要由於縉紳者致力修復和教育，原本注定毀棄的族裔聚居區和勞工階級鄰里的都市風土，被重新視為英國喬治王朝風格（Georgian）、維多利亞風格（Victorian）或早期工業地景，而判定具有保存價值。「在這種新觀點下，〔縉紳化的鄰里〕不是一個單純地方，而是當代內城的單調乏味現實與該地區過往的想像重建之間的文化振盪」。²⁸

[1] 「女仕一條街」指 19 世紀後半葉廣受歡迎的主要購物街區：百老匯與第六大道。參見 <http://www.emporis.com/en/wm/zo/?id=100258>。

相較於低社會地位居民提出的可負擔性主張，對於都市空間的文化主張提出新的正當標準。值得注意的是，文化價值現在與經濟價值相關。透過對居家閣樓和縉紳化的需求，大地主、開發商和民選地方官員認識到，他們可以提供文化消費來提升中心的經濟價值。^{*}

在無數個案中，國家的介入強化縉紳化「市場力量」背後的文化主張。新的土地使用分區法律驅逐了製造商，令他們被迫遷離中心。此外，1981年以來，美國稅法提供稅額扣抵給歷史建物修復。儘管1986年最高扣抵額降低、評選資格也趨嚴，但稅改法案仍替歷史保存保留了補貼獎勵。現在，每個城市都有「地標」建築和地區的認證程序，卻傾向於讓負擔得起維護其歷史風格的人專用。但在認定地標超越實際用途而成為恢復中心經濟價值的策略時——1980年代中期的紐約市顯然就是如此——地方政府卻能換檔，轉而攻擊歷史保存這個觀念本身。²⁹

195 縉紳化獲得的最大支持不是來自特別補助款，而是國家賦予都市空間文化主張的實質及象徵正當性。這種認可將文化生產者標示為都市成長的象徵。店面藝廊和「法式」餐館成為特定鄰里

* 然而，若投資新計畫具體可行，中心的經濟主張便會優先於文化主張。香港歷史保存運動的徹底失敗，則是證明這項法則的例外。「『在紐約、倫敦、巴黎或羅馬，不容發生任何〔毀壞〕情事，』大衛·羅素（David Russell）說，他是建築師，也是香港這處殖民地遺產協會（Heritage Society）的創立者，該協會在接連輸掉三場重大保存戰役後，於五年前解散。」（*New York Times*, March 31, 1988）。

縉紳化的前哨和媒介，擁有最高比例藝術家勞動力的城市，也具有最高比例的市中心縉紳化與公寓改裝。³⁰

不過，縉紳化的美學吸引力既具選擇性，也有可塑性。它能被抽象成文化消費物件，而該物件與其原初產地的市中心區只有淡薄的關係。波麗歐乳製品公司（Pollio Dairy Products Corporation）大量行銷的新品牌「新鮮」乳酪塊廣告寫道：「你曾須到義大利區的 *latticini*〔乳製品〕商店買新鮮的莫澤雷勒乾酪（mozzarella）。店主每日製作這款美味白乳酪，放在淡鹽水桶中保持新鮮。」重點是，再也不必到市中心族裔鄰里消費他們的遺產；國際貿易和大眾配銷就能複製歷史性的「真實」產品。這則廣告繼續說：「為了掌握新鮮莫澤雷勒乾酪的纖細、手工的本質，Polly-O 使用義大利進口的的方法與設備。我們甚至在水裡包裝每份白乳酪（Fior di Latte），以保濕潤新鮮長達 25 天。」超市開始販售新鮮莫澤雷勒乾酪後，就不需要 *latticini* 了。

因此，消費的組織對市中心有弔詭的影響。地方的文化價值起初被視為獨一無二，最後卻抽象化為市場文化。

市中心即臨界空間

在中心資本再投資的新時代裡，市中心區浮現成為關鍵的臨界空間。在制度面，市中心再開發橫跨公私權力。視覺上，再開發過程將區段化的風土消滅或混入權力地景中。1970 年代以降，市中心在圖象上描繪出社會控制形式，我們曾指認其為創造性破

壞的一部分內在地景。除了無限的權力感，這一切還包括陷阱和片斷化。市中心區中介資本流動與公共政策發動的社會轉型。

權力於中心的重申，乃藉由狹窄的街道及核心區的歷史性聚集功能，反映出不均等經濟價值的拼貼式社會用途，以及整體來說，建成環境的密度，使市場得以概括高度特殊化的地方產物，並經由更大的市場文化來傳播。市中心是都市生態學所描述之命運的反諷摘述，但卻是在變動的經濟中展開。

縉紳化的經驗顯示，新的市中心市場是分階段成形。首先，我們發現空間使用的改變：從專注於物質生產的製造商和勞工階級，轉變為耗費相當精力於文化生產及消費的專業、管理與服務階級。然後，我們發現視角的改變，或人與空間的關係改變。他們看待空間的方式，將都市風土及其低租金地區的多樣性，重塑為具美學或歷史同質性的地景。最後，我們見到空間性質本身的變化。市中心變得更大且更昂貴，新建設加入舊建築的行列，而其社會意義從「時新」轉變為易於接近，卻因此顯得「過時」。在這個「時新」與「過時」的臨界點上，市中心空間對某些最初的縉紳者而言變得過於昂貴。

這種社會－空間再結構在風土地標的終結與重塑上的影響清晰可見，包括自助餐館之死與各式各樣的市中心俱樂部誕生。

曼哈頓貝爾摩爾自助餐館（Belmore Cafeteria）的85歲店主菲利浦·西格爾（Philip Siegel）於1986年逝世，明確標誌市中心自助餐館年代的終結。在西格爾的大半輩子裡，自助餐館不只是一種餐廳類型，裡頭採用厚重瓷杯的咖啡，要價比一份報紙還

便宜。更重要的是，自助餐館是低廉的市中心公共空間。

1929年，西格爾先生買下公園南道和28街交口的這間自助餐館。歷經多年，他把用餐區的座位從100個擴展到500個，1970年代晚期，他設置了時髦的軌道投射燈，還在窗前擺設盆栽。

他從沒放下貝爾摩爾的口號——「紐約最棒的餐廳」——他也從不放棄那個發給每位進門顧客小型票券的旋轉門。

直到1981年西格爾先生關閉貝爾摩爾，賣掉房屋改建公寓大樓為止，貝爾摩爾周間一天約服務5,000人。它特別受計程車司機、學生和有固定收入的老人歡迎。電影「計程車司機」(*Taxi Driver*)就在此地拍攝。³¹

197

然而自1960年代起，市中心自助餐館就跟多數市中心製造商一樣，在社會上變得過時。它們消失不表示對供餐迅速且不浮誇的便宜食物不再有需求。完全不是如此：比克福德(Bickford's)和霍恩與霍達特(Horn and Hardart's)餐館只是被麥當勞和披薩店取代。但相較於自助餐館的常客，像是以撒·辛格(Issac Bashevis Singer)^[2]經常描述的閒混、空想、為他們

[2] 以撒·辛格(1902-1991)是波蘭出生的猶太裔美國作家，以短篇故事著稱，是意第緒文學運動的主導人物，1978年獲諾貝爾文學獎。

的盤中物爭辯，速食店顧客則被訓練成將餐廳視為用餐的市場，而非地方。這些是高租金、高容量、販售高度標準化食物的專營店。它們跟不拘小節、缺乏新奇經驗的自助餐館大異其趣。熟悉感是由制度脈絡而非社會互動所提供：重要的是消費的形式，而非消費的文化活動。

新經濟價值使保存自助餐館文化價值的代價過於昂貴。到底是誰遭遺棄而哀悼這項損失？由於改建公寓大樓令許多常客遷離他們的公寓和工作場所，菲利浦·西格爾餐館的倖存者四散於整個大都會區，或退隱到佛羅里達。隨著市中心擴展其經濟權力地景，風土地標也失去意義而消聲匿跡。³²

物質地景的改變伴隨市中心被看待方式的變化。從公共部門機構零星監督的混亂空間——如監獄、法院和公共住宅區——裡，浮現一種更新的草根觀點，將市中心視為文化創新育成中心。新象徵地景的特徵不僅是藝廊，也有市中心夜店和中央鐵路車站。它們自身就是臨界空間，橫跨夜晚與白天，上流社會與底層世界，文化紀念碑與商業。它們也是市中心臨界地帶的地標。

《村聲》（*Village Voice*）雜誌記者麥可·穆斯托（Michael Musto）記錄了1980年代期間，市中心臨界性的生與死。³³ 1980年代初期，東村、俱樂部與地下網絡確實發揮過作用，當時它們「吸引一群形象鮮明的歐洲人、市中心居民和有錢小孩，真正混雜在巴斯比·柏克利（Busby Berkeley）^[3]風格的主題變

[3] 巴斯比·柏克利（1895-1976）是好萊塢電影導演兼音樂編舞者，以精緻

化中」。然而，一旦紛雜的整體被視為「通往更大事物的踏腳石」，風土景觀就結束了。當然，市中心俱樂部常客引人注目的懶散與非法藥物消費，「以及某些門房的勢利眼」，使這種景觀一點也不「質樸宜人」。然而，市中心以少許的經濟成本提供了「閃耀魅力、創新和渾然天成的才華」。市中心居民是仰賴政府藝術補貼、繼承財富、新服務業、非正式部門（包括藥物），以及名人報酬維生的人。

1980年代的「三個熱門俱樂部」——地區（Area）、聚光燈（Limelight）和舞場（Danceteria），第一個「〔逝於〕自然死亡」；第二個靠沒那麼多藝術素養的顧客存活下來，第三個「對昂貴的辦公室空間〔讓〕步」。穆斯托斷定，「市中心衰亡的最大因素是曼哈頓的高居住成本」。^{*}「碰巧身為不動產開發商的寄生蟲」剝奪且破壞了市中心景觀。但其實是聚焦於文化價值的觀點轉變，令潛在投資客得以進入市中心，抬高了地產價值。「現在，你讓城郊進入市中心，而華爾街到了城郊」，一間新「衝浪主題」餐廳的業主兼設計師對穆斯托說，「但這就是讓城市成長的東西。」

音樂劇聞名，常包含複雜幾何圖案，展現如萬花筒般的奇幻圖形。參見 http://en.wikipedia.org/wiki/Busby_Berkeley。

* 儘管後來確認愛滋病破壞了市中心的藝術與設計社群，穆斯托還是主張市中心俱樂部的性場景獲得重生（"Wild in the Clubs," *Village Voice*, December 20, 1988）。隨後幾年，另一份地方報紙宣稱，紐約夜店日漸擴散但少了刺激，既過於昂貴，市府的管制又太嚴格（"For Night Crawlers, A City's Glamour, Excitement Fading?" *New York Observer*, December 11, 1989）。

俱樂部生命週期顯示，地產投資如何令都市風土脫離臨界性而轉變為權力地景。市中心轉由房地產投機客、機構投資者及國際消費要人塑造的另一種市場文化接管，取代以疏離態度評論市場文化的藝術家、有錢小孩和文學移民。依穆斯托之見，房地產市場毀滅了鄰里、藝術家社群、他眼中的市中心地方。³⁴然而，麥可·穆斯托認定的「市中心之死」，卻奠定了中心權力擴張中的組織場域的主調。藉由標準化及複製源於中心的文化形式，還有吸引新國際投資，市中心臨界空間中介了中心與權力之間的辯證張力。當新資本、用途與都市形式推翻且埋葬了市中心景觀的獨特風土時，市中心的角色運作「最佳」。反之，當舊工業結構根深柢固，購物無法取代企業重組的失業和所得損失，而都市風土仍然於結構及制度上鑲嵌於市區核心時，這種動力的運作可謂「最糟」。³⁵

1975年以降，藝術家社群與企業服務業的雙雙擴張，使曼哈頓市中心成為商業與文化之間臨界的化身。然而中心權力地景的重申，不斷遭到都市風土再起的考驗，尤其是男女遊民現身。無家可歸是地景製造者的常見問題。在1860年代末興建中央公園以前，必須將占居者從沼澤地中間的棚屋移走。多年後，大蕭條期間，遊民在河濱公園建造貧民窟。同樣的，1980年後，遊民人口擴張，從包厘街（Bowery）^[4]市中心往中城的港務局巴士總站

[4] 包厘街指紐約曼哈頓南部的一條老街及附近鄰里，北接東村、南近中國城、東臨下東區、西至小義大利。1970年代歷經衰退，充斥廉價旅館和

擴散。公園、街道、地鐵站，和幾乎所有市中心的公共空間，都突顯了市場經濟裡臨界性的矛盾特質：公共空間能否讓**每個人**和**任何人**挪用，或者該界定為專供私人開發之用？

1980年代多數時候，中央車站持續重繪著體面人士與遊民、地景與風土的邊界。出入站大廳的亮藍色金星圓頂下，通勤者和辦公室職員分享合理的權力地景。售票亭、店鋪、報攤與飲食攤充斥於廣闊的白色大理石地板，午餐時間，音樂系學生演奏著室內音樂。遊民睡在樓下靠近鐵軌的隧道迷宮中。他們也遍布候車室和廁所。這些領域劃分的不穩定停戰狀態，受市政府與紐約公民自由聯盟（New York Civil Liberties Union）監管。有個協議是每晚凌晨一點須將車站大門上鎖，以免更多男女遊民半夜湧入車站。到了1987年，公眾要求商業公共空間與遊民睡覺區要有更清楚的劃分。北都會通勤鐵路，即擁有中央車站的準公共當局，發展出一項更新車站的建築計畫。北都會總裁這麼說：「我們讓中央車站重拾宏偉壯觀（put the grand back in Grand Central）。」

該年稍晚，紐約市政府加強將遊民從迷人的商業和住宅區驅離。考慮到他們當中最虛弱者的安全，而將他們從公共街道遷入公立醫院和庇護所。然而遷移的關鍵是地理性的：遊民只是被遷出市中心區的公共空間。此外，市中心的界定方式比一般人認定的市中心範圍還要大上許多。遊民掃蕩不僅影響市中心權力的傳

統地景，如華爾街、中城和上東區，還將中心性的所在擴展到晚近由縉紳化取得權利的那些曼哈頓地區。中心權力的組織性場域因此從西 110 街和東 96 街，往下延伸到曼哈頓島南端。遊民議題戲劇性地凸顯「公共空間」不再無條件對公眾開放的事實。³⁶

1980 年代市中心企業投資的回返，不僅改變中心面貌，也使中心變大。在芝加哥，芝加哥學派描繪的地圖在 1920 年代左右不再適用。知名的歷史中心商業區環圈（Loop）規模增長了四倍。新「超級環圈」包括豪華公寓、辦公閣樓、夜店、時尚餐廳、藝廊，以及高級購物區的延伸，密西根大道便是以此聞名。³⁷擴張的結果使「市中心」這個概念不再有地理界限。³⁸當記者要求歌手瑪丹娜指名她最喜愛的曼哈頓市中心商店時，她提到某家位於上西區的店鋪。事實上，商店的分店及複製消除了「到市中心」尋找特殊商品的必要。而像「白乳酪」那樣的大量產銷，使消費地點對每個人都一樣方便。市中心現在成了一個流動空間，而其抽取的文化價值注入消費財，使購物成為重要的社會經驗。誠如《紐約》雜誌為曼哈頓市中心製作的兩期專刊裡所稱：「市中心是反映於藝術世界、小說、餐廳、時尚及人們生活方式的一種風格、感受和心態。」³⁹

儘管縉紳化與市中心擴張尚未「整合」城市的中心，但它們已克服傳統的分隔。一方面，混合使用讓老舊的時空阻礙顯得過時（即多數人傍晚過後避免逗留的貧民區與工業區、同志酒吧與祕密生活的娛樂區，以及廉價商店的俗麗街道），令市中心成為備受矚目、日以繼夜的消費地景。另一方面，市中心空間密集生

產的感官機會——穆斯托的俱樂部、前衛藝術、《燈紅酒綠大城市》（*Bright Light, Big City*）裡傳遞的出爐麵包香味——將市中心的社會意義從生產轉變為消費。^{*}「就某種意義而言，我們重新定義了中心城市的功能」，芝加哥城市規劃局長這麼說，「城市總是銀行、政府、教育與醫療照護的中心，而且越來越是如此。現在我們還加上住宅，這令人群重返街頭，並想像城市一天開放18個小時的可能。」將市中心重建為臨界空間，提升了經濟價值。當穆迪投資者服務公司（Moody's Investor Service）將芝加哥的公債評等升級為A時，印證了城市行政的財務節約，「以及市中心開發和某些鄰里的縉紳化」。經濟與文化價值間產生綜效（synergy）的跡象，沒有比這還明顯的了。⁴⁰

然而麥可·穆斯托白紙黑字宣稱「市中心」已死。⁴¹他這麼說的意思，只是要表明當前結構性轉變的特徵：投資國際化、社會意義從生產轉移到消費，以及就此例而言，從文化價值到經濟價值的萃取。「市中心之死」也強調生產和消費的空間組織差異。生產單位在顧客與供應商的群聚（cluster）中運作得最好。在歷史上，這些群聚賦予市中心獨特的多樣性和創新氛圍。但消

* 小說《燈紅酒綠大城市》（*Bright Light, Big City*）提出這種轉變的具體課題。侵擾敘述者的窮人與不適應者，只是充當消費對象——在街上賣他勞力士假錶的小販，存在於小報頭版標題的紐約外區的母親。同樣的，小說結局，他從正卸貨的烘培店貨物的卡車司機那裡，拿到賦予他新生的新鮮麵包，他認為司機是「有家室的男人」，而且家在「城市外頭某處」。多數情況下，生產這個麵包的烘培店也位居城市外頭，尤其是在曼哈頓之外。

費單位越來越擴散、普及、標準化和複製。分散化削弱了消費空間的權力；要恢復其特殊意義，需要的是有意識的行動。

在這些條件下，權力與中心性辯證的中介，有賴於文化生產及消費的評論階層（critical infrastructure）^[5]。就此，我想到的是生產、消費，同時評價著有市場基礎新文化產品的男男女女。他們像藝術家既批評又建構一種新市場文化。他們的「圈內」觀點開啟了新消費空間。他們提升市場價值，即使在他們拚命想保存地方價值的時候也不例外。

202

評論階層

縉紳化將較老的城市帶進以文化資本為根基的新消費組織。這種消費組織一個有趣的面向是它的空間特殊性：消費市場（俱樂部、住宅）依附於聲稱為獨一無二的地方。它也提供廣泛的多樣性，以及24小時隨時供應的商品和服務。因此，它強化空間聚集並帶來兼職工作。新產品和新消費實踐需要能處理文化資本的勞動力。藝術家、演員和研究生往往被動員來填補這些角色。既

[5]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一般譯為「關鍵基礎設施」，通常是指對社會與經濟體運作十分基本的資產或建設，像供水、電力、天然氣、石油、公衛、運輸系統、金融服務、保安、糧食生產運銷等。不過，作者在這裡的用法是指有利於市中心的文化生產暨消費的各種評論的產製者，他們構成一個特殊群體或階層。換言之，作者採納英文 critical 一詞的另一種涵義，即批評或評論。因此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在此譯為「評論階層」。

不卑微、亦非專業的餐廳服務生與精品店銷售員，向潛在消費者詮釋文化產品。他們協助建構了消費經驗。⁴²

對於受大學教育的世代而言，現在方便可得的各式商品，要求更仔細考慮、**反身性**的消費。我們在第三章提過，這項要求在某些領域如何經由建築師和設計師而中介。不過，漸趨選擇性的消費，更廣泛受到那些交流新消費產品和服務資訊的人所中介。這些男女扮演好幾種重要的社會角色。他們在特定城市裡形成明顯可見的縉紳化先鋒。他們任職於市中心經濟仰賴的出版、餐廳、廣告與文化機構等新興服務業。他們憑藉創意產品，尤其是他們的評論，提供促進高級消費的美學批評。他們替市中心的轉型提供評論階層。⁴³

不可否認，評論階層取決於消費者需求的更廣大基礎。食物券、失業和最低薪資的叢結之外是另一個世界，人們在那裡為了閱讀而吃喝、為了吃喝而閱讀。當提供低薪家庭營養飲食益發困難之際，豐足富裕、充斥選擇的消費者，卻日漸專注於新消費方式，以及如何從中選擇的新焦慮。

羅素·貝克（Russell Baker）的報紙專欄記載「近來高價飲食消費成為全國風尚」的行為改變。他寫道：從那時起，

203

要遇到令人滿意的晚餐對話，機會渺茫，因為你的同伴——他的成長經驗就跟你一樣，認為沙拉醬上的純正橄欖油才是精緻美食的本質——經常打斷對話，以便對食物品評一番。

對話愉快轉向美味的離婚醜聞，這時，先等一下！有人因萵苣而發怒。萵苣沒有像頂級萵苣該有的脆嫩。

這又提醒另一個人回想起曾經嚐過的最美味萵苣。⁴⁴

不僅品味改變，生產品味的方式也轉變，說明了反身性消費的興起。縉紳化的美學及感官面向，反映救贖、批判距離和驚訝的「歐威爾式」（Orwellian）規範，也要求從個人協議到非個人仲裁的中介轉變。

譬如，伊迪絲·華頓（Edith Wharton）的小說《歡樂之家》（*The House of Mirth*）裡的人物薛爾頓（Selden），「從〔他在蒙地卡羅的上層階級紐約朋友那裡的〕娛樂中學到，有許多如果不吃午餐就會錯過某物，或吃午餐會失去某物的地方；因此，在尊奉飲食儀式的地點，飲食實際上成了次要考量」。鍍金年代（Gilded Age）末期，食物品質顯然附屬於消費的社會空間。「『當然，你在 Terrace 餐廳可以嚐到絕品——但那看起來會像是你待在那兒的唯一理由：不認識任何人的美國人總是奔向美食。而且貝特夏（Beltshire）女公爵最近開始光臨 Bécassin's 了。』布萊太太熱切地提出總結」。⁴⁶

雖然對「美食」的品味不能彌補「你認識誰」，它在今日還是取代了基於個人網絡和社會位置的階層。在大量生產和大量銷售的文化裡，對「真實事物」的品味成為社會區分的策略。然而，真實事物指涉兩種很不一樣的產品。它指的是提供過往真實性的商品與顯示新設計獨特性的商品。

今日的文化消費依循許多中介者的引導：藝術家、初級消費者和設計師，他們詮釋欲望，指點消費者把懂得消費等同於懂得生活；新服務業的製片者迎合精疲力竭的消費者，「他渴望以手工棉織品來調和廉價印花棉布」。⁴⁷ 這種渴望經由並置極其老舊（「歷史的」）與現代感十足（「最先進」）的產品而獲得滿足。一如縉紳化鄰里是集體記憶的寶庫，它也是個人化、高科技家戶消費的所在。新觀光區的崛起反映類似的組合。我們在白天參觀古色古香的地景，像是具貴族氣派的鄉間宅邸和生態博物館，到了晚上在鄉間旅館以美好的（「法國」）食物讓自己感受安逸舒適。重點不在於這些吸引力的存在，而是因我們渴望它們而在單一實踐中結合兩者。「我的首次美國之旅後」，米蘭設計師艾托瑞·索特莎斯（Ettore Sottsass）平靜地回顧，「我了解到新消費主義文化不是解答。反之，我要讓消費者察覺到他正在消費」。視角轉變是評論階層的主要產物。⁴⁸

評論階層解決了位於新消費組織底層的三個矛盾。他們透過產品——如縉紳化住宅或新潮料理的文化消費對象——中介了真實性與設計的對立。他們既生產、也消費城市，因而還鼓勵將難以名狀的區段化風土，重新看待為連貫的權力地景。最後，他們透過勞動——部分自我供應和自僱、部分志願活動、部分受薪工作——協助將建成環境裡特定地方的性質，轉變為販售形形色色消費產品的市場。批判的生產者在新消費組織中扮演關鍵角色。

新式區域觀光的成長一如縉紳化，奠基於重新捕捉過往的經驗，透露這種消費組織如何衍生自生產和消費需求的轉變。從地

方產業撤資，令舊生產位址原封不動，而非促使其現代化。一旦這些舊地方人口減少、衰敗，脫離生產組織，它們就呈現出「崇高」的動人靈光。基於古怪或樂趣的理由，全新感受的地方特質催生出新的市場。舊紡織工廠成為生態博物館；鄉村宅邸旅館和旅店取代了當地的萬豪酒店（Marriott's）或豪生酒店（Howard Johnson）。這些需求轉變導致某些既成觀光區衰落，以及其他觀光區域的新流行。譬如，新英格蘭的舊工業內陸（或許除了麻薩諸塞州伯克夏郡〔Berkshire County〕北部以外）和未開發的大西洋岸，都成為經濟上可行的觀光區。某種程度上，該區域的商業可行性反映了閒置工廠和停擺水岸的納入人造文化地景，也代表將較少開發的海岸區重新視為自然的趨勢。同樣的，在英國，「這個潮流有部分造訪海邊的漸增趨勢，但大多數不是去那種〔大眾〕文化主宰自然的『組織化』度假勝地，而是去相對『未遭破壞的』（即比較自然的）海岸線。」⁴⁹

由於撤資和新開發同步進行，觀光客可以看到工業歷史「活生生的全貌」，並對照他們自己的日常環境。活古蹟以一百年前在巴黎、羅馬與雅典的相同方式，吸引今日到訪維吉尼亞州威廉斯堡（Williamsburg）、或羅德島新港市（Newport, Rhode Island）的遊客。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6]觀察到美國人

[6] 亨利·詹姆斯（1843-1916）為美國19世紀寫實主義文學的重要作家。他是牧師老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 Sr.）之子，哲學家與心理學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與日記作者艾利斯·詹姆斯（Alice James）的手足，主要以描繪美國人與歐洲及歐洲人相遇的系列小說聞名。他從

在羅馬各景點間匆忙趕路，他認為這必然是因羅馬建築和生活風格——遍布街頭的藝術——創造了一個大型娛樂區。但今天我們看到活古蹟激發出的是需要求助旅遊指南的一般觀光。如藝術史家芭芭拉·諾伐克（Barbara Novak）所稱，「義大利是」，簡言之，「**教導**過往的博物館」。⁵⁰

類似的教導特質瀰漫於隨縉紳化「時機成熟」而出現的新觀光區和都市鄰里。但今天的指南是由評論階層提供。那些「發現」鄰里文化價值的志願者，協助組織舊鄰里的徒步參訪行程。餐廳評論指點出個人憑自己在城鎮遠端絕對找不到的小酒館。

莎斯基亞·莎森（Saskia Sassen）在她紐約市低薪移民勞工研究中指出，縉紳化的新消費實踐是勞力密集的。⁵¹ 她指出，英國保姆要照顧雙薪家庭的小孩，薩爾瓦多女傭打掃他們的公寓；衣索比亞或海地的出租車服務司機，深夜將一對辛勤工作的夫妻送回家；多明尼加家庭工替昂貴的第七大道設計師手織毛衣；送貨小弟來自當地的中國餐館；維持水果攤 24 小時營業的是韓國果菜商家庭。然而同等重要的是評論階層的勞工。他們不僅是高級文化的藝術家和表演者，也是服務業組織裡的勞動力。他們是博物館館長、企業藝術收藏家顧問與藝廊職員。他們在當地美食店裡販售乳酪。他們是餐廳大廚和店主，也是餐廳服務生。他們也是餐廳評論家，其評論被熱切當成替代性文化消費來閱讀。⁵²

206

故事裡某個角色的觀點來寫作的手法，使他可以探索與意識及感知有關的議題。參考 http://en.wikipedia.org/wiki/Henry_James。

縉紳化與料理

美食（Gourmet food）——具體來說，超越需求層次，過去被稱為美食學（gastronomy）的反身性消費——顯示一種在結構上類似縉紳化的深刻品鑑力消費組織。

在新「法式」餐廳裡製作美食的勞動力，闡述新興服務業導向的都市居民的社會階級層級。雖然他們可能製作出比1950至1960年代廣受歡迎的「大陸」菜單更道地的法式料理，但這些餐廳還是與真正的法國企業形成對比，後者通常由法國人擁有，並根據傳統專業標準經營。最底層的法國雇員會從餐廳管理的見習開始，低技術、多半是移民的受雇者則充當餐廳雜役，有時候是廚師。廚房，甚至是較次要的服務站，傳統上是學徒和主廚的領域，由大學畢業生及擁有烹飪學校學位者任職。與法國不同，成員通常是從中產階級招募，他們需要餐廳經驗以展開主廚生涯或自行創業。新「法式」餐館的服務生則從評論階層中招募。許多低度就業的演員、藝術家和作家進入餐廳兼職，至少在洛杉磯與曼哈頓，現在的僱用過程近似於選角。⁵³

隨著餐廳食物的實際消費，另一組生產者滿足替代性消費的需求。1970年代與1980年代開始發行的專業雜誌，迅速發展的「美食家」報刊評論迎合了縉紳者的知識好奇心。多年來，這些雜誌已變得更專業、更重視「道地」原料、廚師經歷及食物產區（有些如加州的酒鄉，已開發成為觀光區）。同時，為了放在咖啡桌上展示而出版的許多商業圖書，特色為環繞著異

國風情主題而組織的壽司、葡萄或起司的美味照片（亞歷山大·柯柏恩〔Alexander Cockburn〕曾經稱這種文類是「胃的色情書刊」）。

當然，這些替代性消費形式與舊有的溝通媒介有關，尤其是報章雜誌和電視。我們不能低估1950年代與1960年代，伊莉莎白·大衛（Elizabeth David）與珍·格里格森（Jane Grigson）在英國報紙上的飲食寫作、1970年代期間，茱莉亞·柴爾德（Julia Child）的美國電視法國料理系列，以及1970年代以來，日報出版的「家庭」、「風格」與「週末」副刊的教導效應。然而，越來越多美食的替代消費抽取、而非複製料理的文化價值：今天有許多中上階級的電視烹飪節目迷從來不進廚房。⁵⁴ 美食餐廳消費者涵蓋的範圍，跟參與縉紳化的人相同。新「法式」餐廳吸引懂得食物的有錢美食家，也吸引懂得地方的中產階級冒牌貨。因此，擁有「四星」料理的餐廳，跟那些只有時尚、流行或「主題」菜單的餐館同步增加。

此外，縉紳者的三種主要類型，類似於光顧美食商店的消費者。縉紳者若非試圖重獲舊族裔特質的前都市居民、高階文化消費的追求者，就是小型的房地產投資客。同樣的，折扣美食店的區域連鎖店長說：「我們有三種顧客混在一起。」「在產品銷售地區成長且熟知產品的人、想替自己建立較高生活品質的人，以及獵取便宜貨的人。」⁵⁵

這些初步觀察指出，跟縉紳化一樣，我們無法以人口變遷、為了社會區分而追求地位財貨，或市場區隔的經濟，來適當解釋

美食消費的社會組織。如今，美食有許多種形式。在針對大眾市場的現成菜餚與傳統法式烹調間，還有新潮料理地景。一如市中心地景，新潮料理表現了社會－空間權力的根本重構。它也反映中心權力地景的變遷，亦即經典法式料理的生產與消費。

208

料理地景

1972年，《紐約時報》周日雜誌部門的讀者，首度受邀深度參訪保羅·博古斯（Paul Bocuse）^[7]的里昂餐廳（Lyonnais restaurant）。《法國食物》（*The Food of France*）的美國作者威佛利·路特（Waverley Root）^[8]這種等級的權威，替《時報》讀者描述博古斯延續父親的傳統家庭企業而一手打造的餐廳。通過路特的描述，讀者可以品嚐博古斯的招牌菜烤乾酪狼鱸（*loup en croute*）。他也寫到主廚和他太太對常光顧的「當地居民」的關注。⁵⁶就在路特使這位區域主廚成為《紐約時報》讀者家喻戶曉的名字15年後，博古斯加入美食消費的新全球性組織。他跟

[7] 博古斯為20世紀最優秀的法國大廚之一，是首位被封為米其林三星主廚的廚師。他也是第一位從廚房走進公共生活的廚師，四處旅遊推廣法式料理、開餐館、設立烹飪機構，並從事其他商業活動。他以首創並推行清淡的新潮料理聞名。新潮料理就是比傳統經典料理簡單且低熱量，強調高品質的新鮮原料。參見http://en.wikipedia.org/wiki/Paul_Bocuse。

[8] 威佛利·路特（Waverley Root, 1903-1982）是美國著名記者兼美食作家，擔任《芝加哥論壇報》和《華盛頓郵報》的巴黎通訊員，撰寫多本飲食文化專書。

其他兩位「三星」法國主廚一起，入主位於佛羅里達迪士尼未來世界（Epcot Center）的230席法式餐廳，承租自迪士尼世界。法式餐廳主廚率領200名員工，一天供應2,000到4,000名遊客餐飲，許多人是來自世界各地的觀光客。⁵⁷

中間十年，隨著博古斯及其他法式料理創新者飛抵紐約在慈善餐會烹調晚宴，或到東京從事為期一週的烹飪示範，《紐約時報》的讀者也獲款待而知悉他們不時提出的觀點。這些大廚也出版圖解食譜，傳播新穎而「簡化的」料理和呈現方式。正如食物本身，這些食譜既繁複又奢華。例如博古斯在未來世界的主廚合夥人之一羅傑·維吉（Roger Vergé），出版在概念上強調樸實無華的蔬菜食譜，其依照季節安排的彩色照片卻極盡感官之滿足。然而關鍵材料和準備程序，卻超出多數美國讀者所能企及者。

料理作為新文化消費形式的全球擴展，有重要的經濟影響力。其一，主廚遠征全世界，除了推廣一般的法國料理產品，也提升他們餐廳的經濟價值。在另一個層次，他們透過擴展專業主廚的社會及企業劇碼，建立了料理作為新服務體制的經濟價值。不僅他們自己核發證照的安排及食譜皆成效斐然，巴黎烹飪學校吸引不斷增加且持續光臨的顧客，尤其是美國和日本顧客。此外，在法國料理的職業結構內部，目前最好的學徒見習期是將法國年輕廚師帶往北美及東南亞的大飯店，而非周遊法國各省。保羅·博古斯這個世代主廚的經驗，顯示經典法式料理產生結構性轉變的程度。一方面，法國的頂尖烹飪職業現在跟全球而非區域性的文化權力相關。另一方面，相對少數的新潮料理主廚的個人

化、簽名式產品，反映文化權力的新集中化。

重要的是要記得，全球霸權性「法式料理」的準備風格和原料基礎，實際上根植於地方烹飪傳統。稱為法蘭西島（Île-de-France）的巴黎周邊地區，是塑造法式料理及法國政治文化的地方。正如法蘭西島的地方權貴於歷史上將其統治施予法國其他區域，他們建立的宮廷也強加其料理於法國其餘地方。如威佛利·路特指出的，直到當前，發源於法蘭西島的國家奶油基礎料理，代表全國文化的標準，即使它與基於橄欖油和豬油的其他區域料理（及農業生態）共存。⁵⁸

在軍事與政治統治導致的料理擴張外，我們還必須添上社會與文化權力的強大影響力。世界上的偉大料理都在某個時刻藉由採納或模仿宮廷規範而擴散。因此，從歷史上來看，歐洲與亞洲的「烹飪文化」都有賴於社會階層。地方的烹調（cooking）風格如果透過區域間或國際傳播，以及奠基於市場的農業生產等方式來挪用食物，通常會轉變成為料理（cuisine）。除了貴族需求的最初核心，這也需要各式各樣的社會菁英，而且是對食物消費持有探究和美學（反身性）態度的菁英。

1973年之後，新潮料理的消費擴張，不是經由軍事統治或文化模仿，而是透過市場力量。里昂餐廳（Lyon）的主廚，是著名但基本上是家庭、區域性烹調傳統的繼承者，先前已就地製作極佳的食物。然而，到了1970年代，全球經濟再結構產生了更廣泛的菁英，他們對於博古斯世代提供的經典料理，有反身性消費的興趣。全世界的人都將他們的廚房視為全球文化的主要場景。

結果，里昂區域的「新潮」烹調變成了國際規範。

這種變遷過程事實上標誌出一項結構性轉變。跟縉紳化一樣，新潮料理——尤其是美國所從事者——仰賴基於市場的農業生產的新供應、區域間與國際性的新鮮食物配銷系統、消費者需求的變化，以及最重要的是將區段化的風土烹調傳統融合成為均質的烹飪權力地景。在這個過程中，經典料理起了巨大變革。

料理最先總是隱含一組嚴格的規則。以廚房階層為基準的繁複食物準備程序，同時搭配反映一般社會階層的精緻飲食禮節。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威佛利·路特在巴黎的美國記者友人兼饕客同伴李伯林（A. J. Liebling），有個絕佳的描述。李伯林針對他與法國美食家、有點虛弱的米蘭德（M. Mirande）共享難忘晚宴的陳述，天真但諷刺地總結了經典料理受限於規則的特性。李伯林寫道：鱒魚之後，

我和米蘭德吃了兩份肉食，因為我們無法事先決定我們喜好的菜色。我們吃了普羅旺斯燉牛肉（*daube provençale*），因為我們忠於中產階級料理，然後是 *pintadous*——小雌珠雞，簡單的溫火烘烤——搭配當年最早的蘆筍，以顯示我們對經典料理的忠誠。我們喝紅葡萄酒〔即波爾多葡萄酒〕配這兩道菜：柏圖斯（*Pétrus*）配燉肉，白馬（*Cheval Blanc*）配珠雞。米蘭德說，他的醫師不建議喝勃艮第葡萄酒（*Burgundies*）。⁶⁰

料理的規則確立，將外在的區域或社會分化——例如，「家常風格」的中產階級料理與法蘭西島「經典」料理之間，波爾多與勃艮第之間，家庭主婦烹調（「女性料理〔la cuisine des femmes〕」）與專業男主廚創作之間——納入了內部文化分化。料理的範疇接著成為文化儀式的基礎。里昂大廚從事的新潮料理，就是以重新安排這種內部分化而起家。但全球經濟再結構的過程將所有傳統、儀式性的限制棄置一旁。哪種原料跟什麼東西搭配、上菜順序、菜餚的美學均衡、對外在（例如營養）因素的全新注重：新潮料理似乎打破所有既定規則。這種斷裂在支持創新美式料理的消費組織裡更明顯。

在美國，以及法國與義大利，拋開冷凍及其他保存食物的科技先進方法，回歸新鮮產品，被視為追求烹飪「真實性」的一部分。因為消費者願意為特殊品味付費，區域生產和全國配送系統於焉改變。保羅·博古斯於1980年代到訪美國時說：「我1967年第一次到這裡時，遍尋不著新鮮山蘿蔔或龍蒿，現在你可以在超市買到這類食材。」此外，對本地供應來源的追尋，提升了區域烹調傳統的文化價值。1880年至1940年大量工業化期間，開發並實施了新食物生產科技，全國網絡也將食物配送程序標準化後，這些傳統大多已經消亡。但是1980年代的新供應來源不僅反映小規模區域農業的復興。它們也仰賴進口的擴張與當地農民嘗試新農業科技的意願。⁶¹

新產品使消費者能夠從種類繁多，借自古代地方傳統與久遠料理的菜單中做選擇。譬如底特律的倫敦牛排館（London Chop

House) 主廚提供顧客的餐點，像芥菜烤鮭魚，「將以進口橄欖油與甜醋調味的原生鮭魚、香蒲與芥菜拌在一起」。甚至使用簡單食物更證明了戲劇性的創新。「〔這裡〕本來是標準中西部烹調的地方」，堪薩斯市一名餐廳顧問證實，「人們現在熱衷新鮮烤魚」。⁶²

正如廚房的產品和禮節改變了，專業廚師的社會生產也轉變了。新美國廚師在進入餐廳廚房前，擁有大學訓練和可觀的旅遊經驗。在曼哈頓，他們如果達到主管廚師或糕點總廚等級，一年可賺上 10 萬美金。相較於訓練正牌法國大廚的傳統正式學徒體制，這些條件簡直是天差地別。

有關法國訓練出身與新美國廚師的近期討論所顯露的爭議，闡明了廚師的社會生產斷裂，儘管他們都在紐約高級餐館工作。美國廚師說如果她要，她可以做出日本料理，尚－雅各·何修 (Jean-Jacques Rachou) 則聲稱她或許可以模仿，但她「不會真的做對」。身為雅緻的拉克特巴斯克餐廳 (La Côte Basque) 總廚兼業主的何修，道地料理反映經典傳統的延續：完全可預料的對期待的滿足、柔和的個性、嚴謹訓練的整體結果。他說：現在你看，

我花十年才成為助理廚師。今天烹飪機構出來的年輕廚師，一年半載後就是助理廚師。你給他們負責任的機會；他們待在這裡夠久，學會我的系統。然後他們出走，成為其他地方的廚師。這很正常。然後他們學習另

一套系統，接著開業或自己當主廚。而且他們稱自己做的是美國菜，但那不是。（那它是什麼？）法國菜。⁶³

儘管美國和法國廚師聲稱，既然「沒有舊美國料理，……就不可能有任何新美國料理」。但女主廚卻認為，美國料理就等於挪用和創新。「我認為我們不應該自我設限。」她說，「我們何不擷取各方精華，然後加以改造？以前又不是沒做過。我們只是再往前跨一步，期盼發展出令人驚艷的料理。」這確實召喚了最初的料理觀念，即帝國中心挪用各種地方傳統的最佳元素。

新美國料理，正如緬甸化，建立在區段化風土傳統的挪用與顛覆上。一方面，地方醬料（墨西哥紅番椒〔poblano chilis〕，燻魚）被納入中心的新「經典」料理中。另一方面，新區域料理在商業餐館而非家裡發展出來；而且它使地方元素附屬於文化權力的配方（食譜）。洛杉磯和紐約是新美國料理的兩個中心。在這兩個地方，琳瑯滿目而不協調的餐廳菜單是挪用風土的明顯結果。典型的菜單可能將知名或再度流行的料理元素——如卡津（Cajun）與克里歐（Creole）^[9]——混合來自遙遠海岸的地方產品（例如馬里蘭蟹餅、維吉尼亞火腿、奧勒岡或密西根的野菇、明尼蘇達野生稻）。它也可能綜合地方烹調與新命名的區域

[9] 卡津指法裔路易斯安那州人或相關的文化形式，如音樂、語言和多香料飲食等。克里歐指定居於西印度群島或西班牙語系美洲的白人移民後裔，或移居美國南方各州的法國人與西班牙人後裔，以及他們的文化傳統。

料理。這種料理不再是「德墨料理」(Tex-Mex)，而是新墨西哥、德州與亞利桑那的「西南部」料理。同樣的，當芝加哥的餐廳販售義大利芝麻菜(arugula)與山羊乳酪、鮮蔬和野味時，就建構出了「中西部」料理。

有時候，烹調的結果比較是挑釁，而非美味。「跟我一起用餐的人，無法決定哪個比較糟」，布萊恩·米勒(Bryan Miller)在評論曼哈頓的美式餐廳時寫道，

所謂辣味自製鱈魚香腸，嚐起來像一本袖珍書，或是「乾醃維吉尼亞火腿玉米肉餅」，一堆太鹹的玉米糊，都會讓費城人熱淚盈眶。遇到唯一能吃的開胃菜是只比烤雞多了藍乳酪醬與辣醬的水牛城雞翅及炭烤野菇。⁶⁴

中心挪用的另一個反諷後果不是風土料理的重製，而是全新創造。往往被視為德墨料理發源地的德州，創造出成為全國風潮的區域性紅番椒烹飪比賽。這些比賽中，口味的新現代標準，像嫩度和肉的品質，比起涉及胡椒粉和調味香料的傳統地方判準更受重視。此外，烹飪表演技巧的風格及創意料理的名稱，至少跟能吃的產品一樣重要。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烹飪比賽的參賽者並非當地人才；他們來自全美各地。烹飪比賽本身也不是地方節慶。它們比較像替當地社群贊助的其他活動吸引人潮的項目。⁶⁵

阿蘭·杜圖爾尼耶(Alain Ducourner)是巴黎一間大飯店(grand restaurant)的主廚兼店主，他的生涯顯示，相同的結構

性轉變過程正改變法國的烹飪權力地景。杜圖爾尼耶起初是一間舒適的鄰里餐館的**出資人**，該店以他法國西南部家鄉的加斯孔菜（Gascon cuisine）為特色。加斯孔餐廳（Au Trou Gascon）位於巴黎市中心之外的第12區。由於杜圖爾尼耶料理的嚴謹品質、帶到巴黎的道地食材與他對裝潢的重視，使這家店獲得餐廳評論家注意。杜圖爾尼耶的原創「區域」劇碼，結合「他著名的加斯孔菜帕斯提拉〔pastilla，一個北非字眼〕——精緻可口，內包鴿肉、肥鵝肝醬、松子與甘藍菜嬰的大餡餅——以及印度香料調味填塞的兔臀肉（cul de lapereau）、他祖母的醋味鵝肝鴨肉片（escalopes de foie gras de canard au vinaigre），與漂亮的甘藍菜烤鮭魚」。而其成功取決於吸引非當地的顧客。「他要防止週日前來午餐的〔巴黎〕當地顧客——一名老婦人跟她的捲毛狗占去一張桌子，沒點酒，只有半瓶礦泉水」。

過了十年，並獲得好幾顆米其林星之後，杜圖爾尼耶除了加斯孔餐廳，還擁有一間連鎖酒吧。當時，他在巴黎市中心最貴的地段開了一間豪華大飯店。特色菜單就是「正宗西南部料理」，葡萄酒價格比加斯孔餐廳貴25%，而顧客則一如老闆衷心所願，是國際性的。阿蘭·杜圖爾尼耶繪製了新烹飪權力地景。⁶⁶

消費地景

縉紳化與新料理，都代表1970年代發展出的新消費組織。兩者都意味著新經濟權力地景，這種地景又奠基於資本投資的變

遷模式，以及投資、生產與消費之間的新關係。新國際分工、更大的貿易與更多旅行、將傳統活動從地方社區中抽離或移除：這一切全球經濟的後果，使經驗的新範圍和品質成為可能。在此同時，區域與地方認同的舊有根源消失，則使其他經驗變得貧瘠，導致對真實性和個體化的新追尋。

文化價值的生產與消費轉變，創造新的社會—空間意義。對文化權力的渴望，首先清除社會上過時且區段化的風土地景。但這個過程有賴於觀點的移轉，而這又緊緊於新文化中介者群體的社會生產。他們使風土能夠像地景一般被感知、理解和消費——但隨後則以更密集的方式加以挪用、行銷和交換。這個群體在兩個意義上可說是評論階層。一方面，他們的中介對空間和經濟再結構的社會過程是**關鍵的**（critical），這種過程尤其會顯現於先進工業社會中心的現代城市。另一方面，他們的勞動生產出**評論**（critique），使人們更加意識到消費，並且區分了反身性的消費者和其他社會群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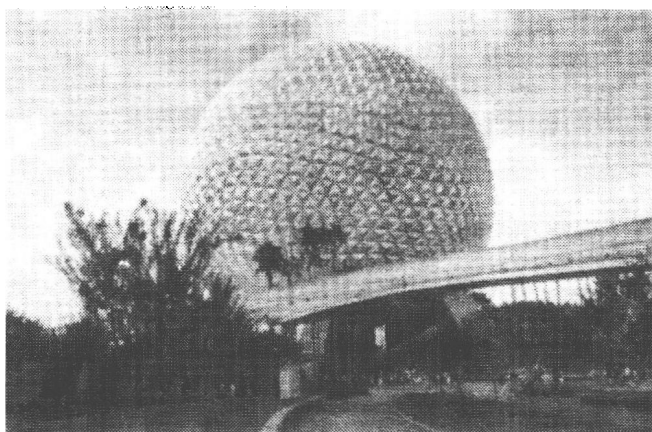
215

評論階層的成員生產了教導稜鏡（didactic prism），文化價值藉此而得到賞識。他們從事穿越破舊鄰里的徒步旅程，指出破敗中的藝術和歷史元素。他們光顧餐廳、寫文章評論餐點，並拿來跟他們集體經驗裡的綜合菜單相比。透過這些活動，評論階層替觀看和消費地方的價值，建立並統貫出一種新視角，但在此同時，他們也確立了地方的市場價值。就這個觀點看，縉紳化——如同料理——正是從**地方界定**（place-defining）轉變為一種**市場界定**（market-defining）的過程。

諷刺的是，無論地景或菜單，關鍵要素都能取代。主廚祖母的燉肉或印度香料、鮭魚子醬佐馬鈴薯鬆餅、墨西哥薄餅裹肥鵝肝醬：這有什麼關係，只要每種元素都是烹飪地景的「道地」部分？縉紳化也一樣，文化權力的均質視覺標準挪用，優先於社會性的社群。「我們到達一個地步」縉紳化的曼哈頓上西區，一個地方社區委員會主席說，「年輕的中產階級家庭再也回不來了。即便我們無法留下居民，我們仍堅持嘗試保全**地方的外觀**」。⁶⁷

有關市場權力對地方的衝擊，沒有比這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控訴了。

「市中心之死」顯示中心性有其矛盾。對開發商而言，中心性是個地理空間；對縉紳者來說，它是建成環境。但對於在社會上或經濟上遭驅離舊城的居民來說，中心性是他們的區段化風土與連貫的權力地景間的鬥爭。



明日世界，迪士尼世界，佛羅里達（1990），William Simon攝影

第8章

迪士尼世界

立面的權力 / 權力的立面

那就是魅力——十分荒謬古怪，但很快樂地遇上了印象的重要提示，絲絨般的空氣、奢華的植物、棕櫚樹、柑橘、仙人掌、建築的噴泉、裝飾過度的地方紀念物、廉價又愜意的異國風味，就像感覺到人們宴飲吃喝，就在背景裡，多數是露天的，充斥怪異的事物與華麗的光芒——我們宛如置身那不勒斯或熱那亞的某處角落。

——亨利·詹姆斯，〈佛羅里達〉

《美國風景》（*The American Scene*, 1907）

現代城市的中心性（centrality）意象，被位於兩岸端點陽光帶的權力地景由內而外翻轉。沒有傳統的中心或市區，像洛杉磯和邁阿密這種城市能看到的只是片斷。密集的房地產開發並未生產出常見的垂直天際線。反之，海岸、高速公路和運河突然出現於郊區風格住宅（如牧場式住宅、海濱住宅、別墅、平房〔bungalow〕）、孤立的辦公大樓，以及低矮工業園區的密集群簇之間。在這種群簇化的擴散裡，「城市」和「鄉村」的差異並不大。

空間承受來自建成環境的投資壓力，既會擴張、也會收縮。集體空間形式擴展而包含相對缺乏結構的洛杉磯和邁阿密，以及逐漸結構化的郊外地區（南加州的橘郡、佛羅里達的羅德岱堡—棕櫚灘〔Fort Lauderdale-Palm Beach〕）。但這些形式也個別化且拆解成為特殊的旅程：沒人能宣稱擁有整個洛杉磯或邁阿密的經驗。穿越這些城市的汽車移動令某些人覺得刺激或憂慮不安，因為根據現代主義的期望，建築形式和都市認同之間少有連結。在邁阿密，根據建築師麥可·索金（Michael Sorkin）的看法：「聚落的模式顯然完全受制於地景。很清楚地，這是無法以熟悉的都市範疇清單來掌握的地帶，而必須以更廣闊的領域感來掌握。」¹

始於 1920 年代，而且有著自 1970 年代承認「權力移轉」到陽光帶以來的更大壓力，當代城市的物質地景確實需要比現代主義提供的更廣的一組範疇。自然與人造物在洛杉磯或邁阿密建成環境中的動態互動，迫使我們將都市發展視覺化為一組多重而分散的過程，並承認建築中衍生（derivation）凌駕原創性的強大力量。再者，從許多私人轄區中塑造出一個都市，挑戰了公共空間作為社會生活組織原則的首要地位。還有，從一開始，洛杉磯和邁阿密就是從服務業而非製造業經濟成長的，從 19 世紀的根源猛烈扭轉出其權力地景。這必然是我們對後現代都市狀態的意象。但建設歷經了很久的時間。棕櫚樹、高速公路上奔馳的汽車、熱烈的火鶴粉紅，以及令人目眩的白色別墅：這是二次大戰後選擇的象徵，以及從《照著做》（*Play It as It Lays*）到《零下的激

情》（*Less than Zero*）持續延伸出來的異化。這是雷蒙·錢德勒（Raymond Chandler）的世界遭到華德·迪士尼的世界殖民，無權無勢者的幻想，神奇地投射到有權有勢者開發的地景上。

地景和風土間的後現代綜效，是由亨利·詹姆斯很久以前戲謔地稱為「旅館文明」的明顯虛構所構築。當他於1907年見到棕櫚灘昂貴的度假建築時，詹姆斯稱其為「一點也沒有獅身人面像蹤影的尼羅河」，是一套「昂貴的複製品……猶如要讓在科摩湖（Lake of Como）、伯羅梅安島（Borromean Islands）令人難以忘懷的別墅蒙羞一般」。「速成版波托菲諾（Portofino）」，麥可·索金在八十年後同樣對邁阿密昂貴的別墅感到憤怒。在洛杉磯，比較善良的雷納·班漢（Reyner Banham）於1960年代發現「速成建築和速成城鎮景觀」。「大部分建築物是在它們那塊土地上第一棟且唯一的結構體，」他寫道，「它們表現出十幾種不同風格，大部分是進口的，受到利用，然後在鮮活的記憶裡遭毀壞。」²不可能從像紐約、芝加哥或舊金山等現代城市的角度來看待這種地景。

在當今的建成環境裡，消費地景的舞台道具特質——索金在邁阿密發現的「速成版波托菲諾」，詹姆斯在柯摩湖注意到的、華麗宛如「歌劇」般場景的小別墅和夾竹桃——在社會想像裡有更新穎獨特的根源。這種地景是由忠實傳遞、但也更抽象化的電子影像建造，是由既反映又退縮的建築立面（*facade*）構成，是為了大眾休閒消費而重新創造建成環境的迪士尼樂園（Disney land），是一整套的溝通，詹姆斯在美國稱為「共同平均值的精

心培植……將每樣事物都化約成一種得體適當的平均狀態」。這是要求接收者（而非提供者）須更具想像力的地景。³

像邁阿密和洛杉磯這類城市的整個地景，於視覺上投射出**市場與地方**之間的臨界性（liminality）。常見的社會控制形式——警察、雇主、企業菁英——鑲嵌在有趣的建築，與像汽車這種個別化消費手段裡。雖然洛杉磯與邁阿密是真實的城市，卻是興建於夢景、集體幻想和立面的權力之上。這種地景顯然是為了視覺消費而生產。再者，它的生產也頗為自覺。誠如詹姆斯的懷疑，觀看這種地景的最佳地方正是陽光帶的端點，那裡的區域認同最不偏向「南方」與「西部」，因而是最明顯的社會建構。

畢竟，邁阿密在這個世紀就重新開發了三次。1920年代從沼澤地發展成在社會、族裔和族群上全然屬於南方的度假勝地，邁阿密的意圖與其更具排他性的鄰居棕櫚灘沒什麼不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第二個邁阿密由邁阿密海灘壟斷，發展成中產階級北方人較廉價的度假區，主要是少數族裔，最後是猶太人；邁阿密提供了比卡茨基爾（Catskills）的社會性營地更具異國風味且更加個別化的休閒消費。1960年代起，在卡斯楚革命後，新一波古巴放逐者和其他中美洲移民使內城在種族與族群上隔離的人口膨脹。到了1980年代，他們在企業和政治組織上繞過本地黑人人口，將邁阿密地區建造成一個拉丁裔都會區，是卡拉卡斯（Caracas）和里約熱內盧的附庸，以及哈瓦那的替代出路。族裔的招募和拉丁資本在第三個邁阿密創造一個全球交換的微宇宙。雖然這座城市總是有一個服務業經濟，但比起對銀行、武器交易

和非法毒品貿易的外國投資，旅館變得較不重要。⁴

洛杉磯在這個世紀大約也重新開發了三次。透過賽璐珞奇想的視覺化，洛杉磯最初是現身在無數西部默片裡成為背景和外景。這個戰前的夢幻之都被創造成電影製作的生產空間，而電影跟觀光業一樣是大眾休閒產業。但洛杉磯的創造，也源於將沙漠和山丘改造為可供電影產業以外的技術和非技術移民勞工居住，像石油和天然氣提煉廠、汽車生產和輕工業的勞工。最早的洛杉磯人混合東歐猶太人、亞裔、墨西哥裔、非裔美國人、奧克拉荷馬人與最主要的中西部人。第二個洛杉磯的發明，始於 1940 年，反映港口、機場與大型工會化工廠裡，軍事與工業活動所需的新勞動力。這是中產階級富裕和社會流動的洛杉磯，是個美國夢。然而就像邁阿密，大部分在這個時期被吸引到城市裡的人口，在第三個洛杉磯成長的時候都被繞過了。

新的洛杉磯同時去中心化和再中心化，在市中心擁有一個連貫的地景，由新的亞洲移民和主要鎖定銀行和金融服務的外國投資所興建。但它也有個近郊，美國公司的製造業分廠在這裡正快速關閉，取代工會勞工或降低其價格，還有其他工業郊區的電子業和成衣工廠，甚至在經濟衰退時期都還持續成長。這些郊區由高科技產業群簇整合，但依照種族和性別而在工作上隔離，並且有種族和階級方面的居住社區隔離。⁵

地景的持續再發明提供一種「無拘無束」資本的敘事。它替全球經濟的變動地景提供一種社會地理。洛杉磯和邁阿密的真實歷史雖描繪了美國經濟結構性變遷的過程，這些城市作為空間隱

喻卻更耐人尋味。我們深受洛杉磯和邁阿密吸引，原因是認為它們向我們展現了未來。它們的高速公路、它們的「去中心化」、它們對私人休閒的「蒙多公寓」（Mondo Condo）式追求：這是未來的模樣。這些城市會令人驚訝，是因為它們擁有從地景中抽象出欲望影像並透過風土反映回去的獨特能力。正如同它們展現立面誘引想像的力量，它們也呈現全球企業權力的立面。

沒有單一影像會如同鋼鐵廠象徵公司城或市中心象徵現代城市，象徵洛杉磯或邁阿密這種後現代城市。「沒有天際線」，一位反諷的作詞家這麼說洛杉磯。作為替代，我們透過操弄影像和現實的視覺消費模式看到這些地景。地景的視覺消費依賴可回溯許多年的自然與人造物互動。18世紀末期，「幻影劇場」（Eidophusikon）——以硬紙板切割、用光線與聲音構成——創造出倫敦、鄉間和海岸的景象。19世紀，透景畫（dioramas）和全景畫（panoramas）操弄光線，於銀幕上塑造半透明影像（經常是城市街道的影像）。它們的20世紀後裔是好萊塢電影，擴展觀眾凌駕黑暗的力量，同時強化影像對觀者的掌控。在大蕭條和二次大戰的靜態攝影盛行期之後，電子媒體完成影像轉變為權力的轉型。無線電視打破公共與私人、在地與全球、客廳與世界之間一切既有的阻礙，直到觀眾本身（而非影像）成為產品。⁶

視覺消費裡對幻想的馴化，脫離不了經濟權力的集中化結構。誠如早期國家權力利用人造燈光照亮公共空間——街道，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索尼（Sony）和迪士尼公司則透過電子影像照亮家裡的私人空間。隨著生產手段的大幅集中與消費

手段的廣闊分散，這些影像的傳播成為一種控制知識和想像的方式，是企業對科技的社會控制形式和權力的象徵表現。

幻想做為一種權力地景

華德·迪士尼贏得好萊塢動畫產業奠基者的名聲，但他真正的天分是將舊有的集體娛樂形式——遊樂園，轉變為權力地景。迪士尼終其一生想創造自己的遊樂園。但要建造這種遊戲場，他所想的不僅是驚險之旅或鄉村市集：他想把美國小鎮的風土人情投射成社會和諧的景象。迪士尼說：「迪士尼樂園的想法很簡單。那是個讓人們發現快樂與知識的地方。」但最近一篇探討迪士尼的文章指出：「事實上，簡單的是迪士尼樂園的表象，而非想法。」⁷

222

當迪士尼開始籌畫迪士尼樂園，亦即最後於1955年建於加州橘郡的原型主題樂園時，表象還是引起這位偉大動畫家的關切。迪士尼僱了兩名建築師，但他們的藍圖未能準確掌握他心中的想法，他隨即放棄，要他工作室裡的一位動畫師根據他自己的詳細說明繪製建築設計。迪士尼的獨特視野奠基於對美國地景的高度選擇性消費。迪士尼樂園以一座城堡和鐵路車站為定錨，激起在南加州風土建築裡可以發現的居家生活和非法移動的幻想。城堡和車站由「美國大街」以軸線連結，大街是古色古香的商業立面集成。迪士尼記得他於一次大戰前在密蘇里州馬瑟林（Marceline）童年時期的風土建築，這種實體模型則在實際上將

此理想化。然而迪士尼沒有快樂的童年。身為一位在工廠工作和總是以失敗告終的小生意間漂移的、失望的空想家之子，迪士尼設計迪士尼樂園的做法是從風土民俗中抽出安全的許諾。

迪士尼的幻想同時恢復和發明集體記憶。「這是真正的大街應有的模樣」，一位迪士尼樂園規劃師或「意象師」（*imagineer*）說道。另一位指出：「我們創造的是一種『迪士尼現實主義』，帶點烏托邦的性質，我們仔細透過規劃，排除所有負面、不想要的元素，納進正面元素。」⁸ 迪士尼樂園的成功奠基於這種全面化的意象製作，將無權無勢者的集體欲望投射成企業權力地景。依照這種做法，它很類似大眾消費社會的創造。迪士尼的設計也包含一種純粹好萊塢建構的戲劇元素，迪士尼樂園有五種不同特色布景的遊樂園，以不同主題組織：探險世界、迷你世界（*Lilliputian Land*）、夢幻世界、邊疆世界與假期世界。這獨特的組合借用來自嘉年華、兒童文學和美國歷史的母題。

223

迪士尼樂園與當時的主流幻想地景大異其趣，這種差異最戲劇化的呈現，是在 1953 年一場遊樂園業主對該項計畫的預覽會議中，迪士尼未能引發熱情。他們批評可供搭乘的遊樂設施數量很少，卻有大量無法產生收益的開放空間，而且主題樂園需要持續且昂貴的維護。⁹ 依他們之見，迪士尼樂園永遠無法成為成功的商業冒險。他們反對——如果他們當時使用目前很流行的字眼「概念」——認為迪士尼樂園是過度自覺且不夠踏實的概念，無法成為遊樂園。但從我們的觀點看來，他們無法理解迪士尼樂園是個視覺消費的理想對象，一種社會權力的地景。雖然有他們的

批評，迪士尼樂園卻從開幕那天起就在商業上極為成功。

迪士尼樂園提供多向度的美國地景拼貼。圍繞一個主題而組織的遊戲場，讓消費者首度有機會同時觀看好幾種不同地景——有些是想像的歷史再造、有些則純屬想像。由於要讓個別遊客有各式各樣的選擇，使迪士尼樂園不同於歷史性環景及重建的綠野村（Greenfield Village）和殖民時期的威廉斯堡（Colonial Williamsburg），後兩者是穿著傳統服飾的演員重現早年的日常活動。再者，迪士尼樂園沒有教育的虛飾。它只是說個故事，提供空間和時間的選擇性消費作為娛樂。這是「肉腸」（wienie），華德·迪士尼和遊樂園業主都如此稱呼吸引顧客參加付費活動的誘餌。

迪士尼樂園的遊客付費參加各種娛樂經驗，這些經驗由不同主題的敘事串聯。這又替迪士尼工作室每週電視系列節目的不同片段提供一套敘事。結合敘事和系列化的期待，迪士尼公司的每樣視覺產品都輸入到其他產品。雖然商業副產品不是新發明，但這項商業化是單一公司贊助商底下最廣泛的一種。迪士尼事業的成長也涉及大社會裡的重要變遷過程：最顯著的是嬰兒潮的人口成長、電視普及與家庭消費增加。再者，它也對橘郡和觀光產業的貢獻良多。迪士尼的成功正逢郊區擴張和人口轉移到西南部、服務部門成長和休閒活動熱潮（包括娛樂用地和旅行的銷售）。誠如真實地景反映這個國家藉由分割和大量興建而產生密集、未經計畫的發展，迪士尼樂園的想像地景則反映立基於視覺消費的大眾傳播的成長。

雖然這種娛樂邀請人們逃離現代世界，但它也仰賴現代社會典型的經濟權力集中化。迪士尼樂園的消費是服務部門複合體的一環，涉及汽車和飛機、高速公路、標準化旅館、電影及電視。再者，迪士尼樂園的社會生產牽涉一家大型企業——迪士尼公司——現身於娛樂「創造」、房地產開發和興建，以及產品特許經銷權。在這些意義上，迪士尼樂園暗示現代美國市場上臨界性的社會與經濟潛能。

迪士尼的第二個遊樂園迪士尼世界（Disney World）靠近佛羅里達的奧蘭多（Orlando），其構想奠基於有點不一樣的模型。這裡的核心是個誘惑人們邁向新烏托邦風土的「肉腸」，那是個未來想像的地景。「明日世界（EPCOT [the Experimental Prototype Community of Tomorrow]）將會是明日城市該有的樣貌」華德·迪士尼這麼說。

它將是一座發揮服務功能以照料人們的城市。它將是經過規劃、受到控制的社區，是美國工業和研究、學校、文化與教育機會的展示櫥窗。明日世界裡沒有地主，因而也沒有投票控制權。沒有貧民區，因為我們不容許它發展。人們將以租屋取代購買，租金合宜。不會有退休人員。每個人都必須獲得雇用。¹⁰

這種願景部分反映了迪士尼的童年經驗，他是有好幾次不成功職涯和失敗事業的男人之子。它也回應了大蕭條時期社會動盪

的持續重要性。明日世界是保守的烏托邦，一開始就結合娛樂價值和社會控制的母題。

但是，明日世界並非完全按照迪士尼的原始構想興建。首先，公司於 1966 年認定興建住宅社區會牽涉太多法律責任。替代決議是讓理想社區成為臨時性的避風港，易言之就是度假區。另一項問題是缺乏可用的科技興建迪士尼和他的意象師構想的明日世界。最大的幾間美國企業雖然簽約成為展覽贊助商以提升企業形象，但在迪士尼自己的展示館裡建造景點的自動化科技，對迪士尼公司來說太昂貴了。例如，迪士尼於 1950 年代晚期設計的總統廳是自動化的歷史透景畫，由機器人「扮演」歷任總統，但直到二十年後公司才有能力興建。明日世界本身直到 1982 年才開放，成為佛羅里達迪士尼世界的一部分。¹¹

迪士尼世界的想像地景在其最接近的多媒體先驅上做了引人注目的改良，即 1893 年芝加哥的世界哥倫布博覽會（World's Columbia Exposition）和 1939 年紐約法拉盛草地（Flushing Meadows）的世界博覽會（World's Fair）。這兩場世界博覽會都以四種景點為號召，而迪士尼世界後來都予以整合，臻至完美境界：遊樂園和搭乘設施、風土建築的布景式再現、先進科技與特別建造的理想都市社區。

兩場世界博覽會的遊樂設施，是經過現代科技更新的傳統露天遊樂場設備。摩天輪是專為 1893 年世界哥倫布博覽會而發明（這是美國針對法國艾菲爾鐵塔工程成就的回應），而參觀 1939 年世界博覽會的遊客，則搭乘移動椅穿越其中一座展覽館。比起

1893年博覽會的其他特色，芝加哥遊樂園的設施都更為突出，而1939年博覽會最受歡迎的部分也是具特色的嘉年華景點。

兩場博覽會都以代表適當風土建築的舞台布景，將外國「民俗」文化搬上劇場表演，以便展現它們的全球焦點。1893年的形式是一系列的「村落」，如「開羅街」，以有道德爭議的女舞者小埃及（Little Egypt）為號召。1939年的博覽會也有類似的世界櫥窗，就在1940年從國際主義撤退，關注美洲自己的俗民（亦即族裔）文化之前。

兩場世界博覽會也以先進科技的展示為號召。1893年，新機器是當成個別物質產品來展示；然而到了1939年，科技進步的意象則從工業生產中抽離，納入博覽會的地景。一方面，科技進步的納入是作為一種敘事，亦即明日的世界（World of Tomorrow），這讓各種展覽有了連貫性。另一方面，科技也應用於展示本身的機械化，令視覺消費更輕易。將科技展示的效果戲劇化，並提供遊客一種在週邊移動的工具。

兩場世界博覽會的第四項特色，是一個理想的都市社區，將地景設計的社會控制，映繪於未經計畫的社會上。1893年的博覽會委託著名建築師設計一個龐大的「白色城市」，包含超過兩百間以公共為主的新古典主義建築物，旨在以布雜藝術（Beaux Arts）^[1]的專業建築一致性，對照擴張中美國城市的混亂成長。

[1] 布雜藝術（Beaux Arts）源於巴黎布雜藝術學院（École des Beaux-Arts）的古典裝飾風格，即新古典主義的建築風格。

1939 年的博覽會將這個概念從紀念性轉移到私人建築，興建一處理想的住宅社區——明日之鎮，與蕭條年代的實際住宅市場形成對比。這些房屋旨在展現科技如何替一般美國人生產具吸引力的住宅。¹²

1939 年世界博覽會的明日世界，已包含 EPCOT 的特殊地景將仰賴的基本元素。科學和技術的未來派願景縮小以供居家消費，並組織成為分離的付費活動。這些都獲得大型企業生產者像通用汽車（General Motors）、奇異電器（General Electric）、伊斯曼柯達（Eastman Kodak）和美國電報電話公司（AT&T）的贊助。它們的展覽館和 1893 年芝加哥博覽會和更早的國際博覽會一樣呈現先進產品，但 1939 年博覽會的創新之舉是聚焦於過程而非生產。1939 年世界博覽會的展示是互動式的，納入遊客成為消費過程的參與者。他們不僅觀看展示，也碰觸展品，詢問示範者相關問題，以及最重要的是在展品週遭移動。生產的機械化是當時失業的主要原因，但這個地景上的機械化卻中介了視覺消費的過程。意味深長的是《商業週刊》（*Business Week*）針對博覽會而寫的一篇評論，評斷生產消費財的公司比那些工業財的生產者更有效率。¹³ 國際商業機器（IBM）透過刻意挑選的視覺展示，使它的事務機器更能吸引參觀者。IBM 在環型展場中心凸顯它最新的電子會計、薪資名單和分類機器，卻以大體上忽略工業主題的大量國際畫作展示環繞這些自動設備。這些畫作是在公司總裁湯瑪斯·沃特森（Thomas J. Watson）的建議下，為世界博覽會的 IBM 科學與藝術館特別購買。¹⁴

1939 年的世界博覽會與迪士尼世界共享三個一般主題：個別展覽或主題公園的高價門票、混合進步與消費主義販賣企業形象，以及「因為能夠控制而得以享受的新幻想世界」地景。這些主題毫無意外地彼此相關。將市場經濟的社會控制映繪於風土意象需要大公司的資源。企業贊助者和從企業世界招募的執行委員會，事實上是將1939年的博覽會規劃為一項商業冒險。但與迪士尼世界最後的成功相反，1939年的世界博覽會是場商業災難。¹⁵

迪士尼世界也更大且更昂貴。它於南佛羅里達沼澤區占地 28,000 英畝，每天吸引超過 150,000 名遊客，使用了 20,000 個地面停車空間。直到 1989 年，三天的入場「通行證」要價 85 元美金，比起 1939 年世界博覽會一個家庭可能花費的 7 元美金高出很多——儘管對大蕭條期間許多家庭而言過於昂貴，但這個價格還包括了餐點。

奧蘭多的奇幻主題公園（尼莫船長、加勒比海盜、太空山）旁還有觀光導向的建築立面（法國艾菲爾鐵塔、義大利聖馬可廣場），販賣食物和紀念品。所以，保羅·博古斯（Paul Bocuse）在迪士尼世界的餐廳擴張 1893 年世界哥倫布博覽會的國際文化村。再者，許多科技展示代表與 1939 年興建展覽館相同的企業贊助者。它們的展品包括地球號太空船（貝爾電話贊助）、能源宇宙（埃克森石油）、移動世界（奇異電器）、想像之旅（伊斯曼柯達），以及我們的土地（卡夫食品〔Kraft Food Products〕）。這裡提供的未來學研究，再度成為企業策略的櫥窗。就像 1939 年，進步被視為一種企業產品（一如隆納·雷

根於 1950 年代說過的，他當時是奇異電器劇場的電視主持人，「進步是我們最重要的產品」）。像是大蕭條和能源危機等社會問題並未遭受忽略。但它們被描述為可以透過企業研究和發展決策（裨益於消費者的決策）而獲得最佳解決。¹⁶

迪士尼世界的載人器，在對消費的社會控制策略上使用複雜科技。1939 年，規劃師和展覽者無法控制參觀博覽會的遊客交通。然而，在迪士尼世界，由太陽能驅動的「旅遊劇場車」每次運送 60 位遊客穿越展示的聲光和氣味，實際上讓公眾被影像擄獲。消費的感覺變得更強烈，但也更曖昧，所以參觀迪士尼世界的遊客雖覺得他們可以控制科技，但也受到控制。迪士尼世界裡的移動是從某個封閉性劇場環境到另一個劇場環境的移動，資訊混合成一種隱含的消費籲求：感覺！驚奇！購買！

然而，迪士尼世界旅館的娛樂建築若對比主題樂園的舞台布景可就相形見絀。迪士尼世界的神奇王國（Magic Kingdom）包含 10 間度假旅館，有 5,700 個房間、1,190 個露營地、580 個分時銷售的假期別墅、還有 3 個會議中心。布納維斯塔湖（Lake Buena Vista）和華德迪士尼世界村（Walter Disney World Village）另外提供 7 間旅館，有 3,500 個房間。雖然奧蘭多建築群於 1960 年代完工，新旅館則持續興建。從 1988 年到 1990 年興建了三間超大型旅館：佛州豪園酒店（Grand Floridian）是「維多利亞」主題旅館，有 900 個房間；海豚旅館和天鵝旅館合計有 2,300 個房間和 200,000 平方英尺會議中心。海豚和天鵝旅館構成了容納 10,000 人的臨時居住社區，讓迪士尼公司成為美國西南部

最大的旅館與會議中心開發商。

迪士尼世界最新的旅館本身就是主題樂園。海豚與天鵝旅館由後現代建築師麥可·葛瑞夫（Michael Graves）設計，看起來就像葛瑞夫的其他作品——強烈的赤陶土立面、淡彩色與有趣的裝飾——與迪士尼動畫卡通的生產價值共鳴。「沒有任何其他商業計畫可以和葛瑞夫的設計媲美」，旅館建築群的開發商約翰·提須曼（John Tishman）這麼說（與大都會人壽和一間日本營造與地產開發公司青木企業合夥）。「這是一棟迪士尼建築，就像舞台布景般有趣好玩」。這個舞台布景圍繞著獨特的動物主題而組織。一間旅館的屋頂上有五層高的海豚；另一間上頭則有巨型天鵝。葛瑞夫選擇這些動物，說要當作自然的經典象徵（亦即，佛羅里達的水岸風土），但它們也象徵迪士尼工作室人造物（如米奇與米妮、布魯托、唐老鴨）的商標地景。「它們具有整個迪士尼經驗散發的溫暖特質。」葛瑞夫說。換言之，它們展現了權力的友善面孔。¹⁷

229

水的主題也宣稱要挪用南佛羅里達的風土。所以，海豚旅館凸顯從立面流洩下來的瀑布，進入一連串巨大蛤殼，最後流入一個貝殼型游泳池，底下有四隻大型雕塑海豚支撐。旅館外牆覆蓋波浪和香蕉葉圖案，有著「熱帶」藍綠色和珊瑚色（這是葛瑞夫的簽名色）。華德迪士尼公司董事會主席麥可·艾斯納（Michael Eisner）說：「我們希望創造出獨特的地方感。」

但是，這種地方感並非迪士尼所獨有——也不是路易十四所獨有，這個來源是另一位與該計畫有關的建築師提議的點子。海

豚與天鵝神祕地召喚亨利·詹姆斯很久以前在棕櫚灘於「海洋和叢林間的長條土地上」的所見。詹姆斯描述一處地景，那裡「成群的旅館，尤其是出類拔萃的那一對，聳立且吐露它們的天分。其中一棟比較龐大的、更盛氣凌人而無畏的」，很可能是26層的海豚旅館，「確實是個奇蹟，當然會以沒完沒了滿布高塔、尖頂、山形牆和旗幟的天際線，來自我宣告是全世界同類中最巨大者」。這是真正視覺消費的想像地景：「只有旅館世界能在這種陰影下茁壯成長。」¹⁸

旅館文明在市場經濟的結構轉型中攸關重大，因為它提供一種想像地景，是為了基於居家消費的集體生活而做的原型設計。它在友善的立面背後掩飾全球性但集中化的、使這種消費得以可能的經濟權力。詹姆斯描述的伯羅梅安別墅仿製品，現在則是海豚與天鵝旅館；我們的共同文化由米老鼠和紅鶴構成。「很顯然，這裡有政治意涵」達特羅（E. L. Doctorow）觀察到這種衍生性市場文化裡蘊含的社會控制。

迪士尼樂園提倡的是種給大眾的簡化、速記文化的技巧，是不必動腦的興奮感，就像電擊，同時堅持接受者與其國家歷史、語言及文學要有豐富的心理關聯。在即將來臨的、人口過多世界中受到嚴密管制的大眾時代裡，這種技巧可能會有極大用處，可以代替教育並在最後當作經驗的替代品。換言之，迪士尼的象徵決定了消費者想像的限度。¹⁹

230 然而，目前迪士尼的想像地景運用共同文化的象徵，達到顯著的經濟效果。1982年 EPCOT 開幕，讓迪士尼公司回到華爾街聚光燈下，翻轉前幾年下跌的股價。再者，隨著公司的多角化經營進入新娛樂領域（例如生產供成人觀賞的電影，以及在迪士尼世界和米高梅〔MGM〕合作，包括電影生產設施和一座好萊塢主題樂園），迪士尼獲得商業媒體的熱烈評論。授權協議不斷增長，因為米奇和米妮的特質確保「迪士尼可以擴張到任何消費領域」。²⁰

然而迪士尼主要是以地景創造者獲得讚揚。華德從大街和遊樂場（Midway）的風土中抽離出無權無勢者的欲望，然後將其投射成大眾視覺消費地景的原始能力，映繪出一種後現代社會的新風土影像。這同時影響真實地景和我們觀看地景的視角。一方面，迪士尼樂園和迪士尼世界呈現一種奠基於受操縱的集體記憶和消費的想像地景，我們在像費紐爾中心（Faneuil Hall）、內港（Inner Harbor）和南街海港（South Street Seaport）等市區購物中心裡也能找到。早在1963年，這些購物中心的開發商約翰·勞斯（James Rouse），就在哈佛大學的一場研討會裡讚美迪士尼是都市規劃師。另一方面，迪士尼樂園和迪士尼世界刺激整個環繞觀光與房地產開發的區域服務部門活動複合體。難怪，華德·迪士尼被《洛杉磯》雜誌於1986年4月指名為「改變洛杉磯的25人」之一。迪士尼樂園和迪士尼世界同樣塑造觀看真實地景的視角。「如果天堂沒有很像迪士尼」，是《時代》於1986年6月16日一篇有關主題樂園的年度「美國最佳」文章的標題。迪士

尼世界於1988年5月號的《美國嬰兒》（*American Baby*）被指名為「改變美國嬰兒的50個觀念」之一。

雷納·班漢將迪士尼地景的底層結構，聯繫上洛杉磯的成群電影製片廠。幻想被呈現為公共建築，電影製片廠最終「抬高到文化紀念物的地位，而且現在構成了觀光遊覽的根基」。班漢指出，視覺消費經濟的強健特質也影響各公司，紛紛提供參觀其製片廠的導覽，並為了遊客而圍繞他們主要的消費者產品興建主題樂園。這個循環由位於迪士尼世界的迪士尼一米高梅電影製片廠完成，推出「前所未見且將永遠持續的好萊塢」。²¹

231

這種舞台布景的地景是自然與人造物、市場與地方之間的臨界空間。它中介於生產者與消費者，是具有真實經濟效果的文化客體。事實上，迪士尼地景成為一個模型，據以建立文化產品的經濟價值與消費者產品的文化價值。誠如位於亞特蘭大企業總部的「可口可樂世界」（World of Coca Cola）博物館，將既有的消費者產品安置於一個換新其文化正當性的敘事架構中，藝術博物館也以說故事的策略取代它們引發「博物館疲勞」的百科全書式展示。迪士尼世界的敘事無所不在。反諷的是，迪士尼市場導向的地景激發了強烈的地方感。²²

除了滋養消費者市場之間的綜效，自覺的地方感也受到高度渴求。滑雪勝地結合常年的高山度假建築和借自迪士尼幻想的娛樂設施：「威爾（Vail，指城鎮而非高山）總是令我想起一間精緻旅館和迪士尼樂園間的交會。」這是寫給《紐約時報雜誌》編輯的一封信裡提到的，「沒有汽車，人們穿著有趣的服飾，娛樂

的基礎是炫耀和編造」。再者，高級住宅開發借取迪士尼對大街風土的抽象化：「規劃界最新的觀念是19世紀城鎮。」後來成為歷史衍生性重建的成功城鎮規劃師的邁阿密建築師安德列斯·杜安尼（Andres Duany）說道：「那是真正能賣錢的東西。」²³

藉由設計排除衝突並納入舒適，服務業的社會意象是個烏托邦之夢。它的生產非常自覺地不要受無家可歸、服務部門工作的微薄薪資（雖然曾出現迪士尼世界員工的罷工）及種族競爭干擾。這種欲望的投射嘲笑現實的意象。「如果你來到這裡〔1989年超級盃前夕黑人鄰里暴動後的邁阿密〕，然後想像這是迪士尼樂園，那不是真實的。」一位著名的美式足球球員這麼說。但是對許多消費者而言，想像地景的自覺生產（self-conscious production）在他們的感受中卻是真實的。而且它正成為真實，因為即使華德·迪士尼從來沒有在EPCOT興建他夢想中的居住社區，1980年代中期開始營運的迪士尼開發公司，卻計畫在迪士尼世界附近興建真正的居住社區。主題樂園的盡頭在哪裡？²⁴

232

為了完成這個想像地景耗費40年。自1893年和1939年的兩場世界博覽會起，大眾娛樂的幻想建築穩定地邁向烏托邦視覺消費，有強大的移動、民粹主義和社會控制的主題。但迪士尼世界從風土中抽離出對安全的欲望，並將其投射成企業權力的連貫地景。大部分參觀迪士尼世界的遊客一如意料是來自中上階級，是雇主而非勞工，而且是白人。來自這種社會基礎的消費者，多數很可能相信他們可以控制歷史和科技，只要他們臣服於引導性的企業之手控制。²⁵

佛列德瑞克·詹明信 (Fredric Jameson) 有關後現代視覺消費地景的看法錯了。迪士尼世界指出建築很重要，並不是因為它是資本主義的象徵，而是因為它是象徵主義的資本。

風土建築裡的幻想

在一本出版於 1939 年，尖銳批評好萊塢的短篇小說裡，納坦尼爾·威斯特 (Nathanael West) 預告像迪士尼世界這樣的地景如果發狂會發生什麼事。《蝗蟲之日》 (*The Day of the Locust*) 的核心是主角塔德·海克特 (Tod Hackett) 繪製的一個舞台布景，呈現燃燒中的洛杉磯，一幅狂暴的末世景象。但是海克特的畫面比較富有特藝色彩 (Technicolor)^[2] 而非悲劇性質：「他希望城市在燃燒時有很盛大的氣氛，看來幾乎非常愉快。放火的人群則是假期的群眾。」舞台布景是真實的洛杉磯城市的隱喻，依照威斯特的觀點，那裡的人們穿著打扮宛如在電影中扮演角色，甚至超級市場都沐浴在繁複的彩色燈光中。但是，這裡自然與文化之間的互動，同時反映洛杉磯茂盛多山的地中海氛圍的人造特質，以及電影產業看似自然的人為技巧。在製片廠後台的舞台布景之間漫步，塔德快速從「繪製帆布和吊掛於吊艇架上的真實小艇構成的一艘郵輪」走到「一個巨大的 40 呎長混凝紙漿造的獅身人面像」，從「沙漠」抵達「一條有木製人行道的西部街

[2] 一種由柯達公司出產的彩色電影攝製系統，這裡是強調色彩繽紛鮮豔。

道」。「丟掉他的雪茄，他通過酒吧的雙開轉門，這棟建築物沒有後側，他發現自己位於巴黎街頭」。²⁶ 這種奇幻意象指出洛杉磯和邁阿密地景的視覺臨界性。迪士尼世界代表宏觀層次的社會控制地景，但風土建築將它縮小到個人化家庭消費的微觀層次。

洛杉磯與邁阿密的「經典」風土建築傳統上採取單戶住宅的形式。山丘上或海濱的個人化宅邸，與內陸的標準化平房之間只有程度上的差別。誠如每間房屋都代表當代市場經濟裡美好生活的一個模組，建築形式則將個人消費抬升到一種文明的形式。雷納·班漢就在第三個洛杉磯開始崛起、邁向全球權力的時刻，描述了這種風土。他在環繞城市的山谷裡無盡的居住飛地、海濱住宅、山麓的奇幻建築，以及高速公路旁極簡主義的玻璃鋼骨住宅中發現它。對班漢而言，就像以前的亨利·詹姆斯和之後的佛列德瑞克·詹明信，這種風土的集體形式，結合度假旅館美好生活的最古老幻想，與人行購物中心形式的最新幻想。在我們的時代，高速公路與住宅所有權提供取用個人和集體消費的民主管道，因此對班漢而言，洛杉磯是今日的理想城市。它「在馴化的鄉間培育和體現偉大資產階級美好生活願景最強大的當前版本」。²⁷

這種馴化是透過：郊區住宅的所有人移出城市與從該郡其他區域移入；成為新市民中心（civic center）的各式各樣購物與商業開發；執行高科技製造業專業化運作的許多小型公司誕生，主要擔任少數幾間跟美國軍方交易的大型企業的承包商。這種發展多數起源於 1920 年代犧牲市中心的洛杉磯郊區成長，隨著第二

次世界大戰後的郊區擴張而持續。在這個程度上，洛杉磯代表郊區蔓延的長期趨勢。但它也代表一種新穎且更密集的發展過程，有助於我們把當前的結構轉型期視覺化。²⁸

班漢在工業與金融權力於環太平洋區鞏固以前，就寫了《洛杉磯：四種生態的建築》（*Los Angeles: The Architecture of Four Ecologies*）。從他的視角來看，洛杉磯注定要繼續以分散化且分歧的方式來建造。所以在1971年，班漢提出結論，當地企業界和慈善家創造一個中心區市民中心的長期努力已經失敗。然而十年後，全球資本進入、企業服務擴張，以及與舊金山競爭哪個城市能掌控太平洋的金融投資，迫使洛杉磯重組空間以同時強化其中心和郊區。²⁹一方面，控制功能群集於市中心區。舊政府大樓（包括市政廳、法院和監獄）被新蓋的摩天大樓、新藝術博物館及其附屬建築、新音樂廳和昂貴的公寓環繞。這項發展呈現了沒有縉紳化情況下的市中心區擴張——這是金融權力在城市中心的純粹主張。然而在此同時，單戶與公寓住宅及購物中心持續在周圍各郡興建，尤其是在橘郡，吸引了更多樣化的企業和金融服務業的商業基礎（及就業）。

再者，這個時期由於土地價格上漲，或對區域文化形式的懷舊，城市「夢幻住宅」（day-dream houses）的獨特風土經過復甦，有廣泛的現代化翻修及一波新建風潮。這些房屋的建築元素「不符文法」的結合、相互「評論」，形成一片後現代地景，洛杉磯的建成環境於是替新經濟權力提供享樂主義的立面。市中心區的新外國投資、郊區的工業投資，還有對夢幻住宅的消費者投

資，與低收入且少數族裔人口漸增的地理區隔，以及針對已遭受青少年幫派脅迫的社區進行警察監控，同時並存。³⁰ 風土建築嘗試解決這種舒適與權力的張力。例如，電影明星的住宅結合「權力，表達於龐大且按慣例很乏味的門面（像守舊的市政廳），與一種雜亂散漫的非正式性（像個輕鬆的德州人〔腳還擱在咖啡桌上〕）」。³¹

從更廣的歷史視角來看，雷納·班漢針對洛杉磯的單戶住宅，區分出四種不同版本的風土。在沿著海灘的「海郊」（Surfurbia），班漢見到自然和人造物之間最不正式且最優雅的妥協。這些是海濱住宅，有簡單、強烈的形式和平坦的表面，它們的空間在室內和戶外之間流動，連結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洛杉磯的現代建築。在山麓地帶，班漢見到了文化或人造物壓倒自然的勝利，有著幻想般的建築，對許多人而言，那是洛杉磯人誇張美國文化支配性主題傾向的縮影。雖然有些人在私人住宅找到這種風土形式，班漢卻在公共空間的幻想建築中發覺其最典型的形式。這些是以漢堡形狀建造的快餐店，是巨大茅舍形狀的玻里尼西亞餐廳，是追尋文化根源的路邊後現代主義先驅。班漢描述了這些誇張傳統建築物特色的折衷方式，尤其是屋頂、木構造及壁爐，「當傳統文化和社會節制已被對移動、富裕、消費者導向社會的偏好推翻且取代後，隨之而來的是建築風格痙攣」³²的一部分。班漢的第三種風土是以極簡主義的現代立方體為代表，以泥灰和水泥建於環繞城市的平原上。這種建築順應成長中人口攀高的期望。以廉價材料在相對狹小的基地

上建造極簡主義的風土建築，建築師提供洛杉磯的消費者一種別墅地景。班漢的第四種風土是由玻璃和鋼骨的現代住宅構成，具有反英雄的、即興式的風味。它們經常是由建築師為了自用而個別化設計的建築，結合謙遜的建造技術和昂貴建材。

任何一種風土建築裡的舒適和權力，都與科技的大量發展和個別挪用密不可分。依班漢之見，人類和機器的協調提供「民主的」管道，以接觸隨大眾消費而浮現的社會角色。購物、通勤、旅遊和「兜風」全都提升，使洛杉磯文化顯得如此樂觀的「移動力的非法快感」，與西方（亦即現代）文化的「官方悲觀主義」相反。³³ 如果這種風土以一種模糊的區域方式界定了洛杉磯的地方感，那麼這種地方大部分衍生自供應個人消費的市場。闡釋這個論點的最佳範例，比起在這個區域裡設計眾多建築物的企業建築師，不如說是法蘭克·蓋瑞（Frank Gehry）獨特的生涯。

自 1954 年擔任建築師工作，蓋瑞的作品就示範了班漢描述的四種建築。他設計簡單的、空間在室內和戶外穿流的海濱住宅，而其平面以奇特角度交錯，呈現功能分區的軌道關係。他曾替藝術家的工作室和住宅建造黏土立方體。他也曾暴露出修繕和新造住宅結構的木料——讓已完工的建築看起來比較像是個過程——而且以肯定不具紀念性的方式使用傳統建材，像玻璃、鋼筋、膠合板、甚至鐵網圍欄。蓋瑞甚至設計幾個魚型的幻想構造（幾盞燈、一間餐廳、某次藝廊「愚蠢建築」展裡的一座監獄）。雖然對建築師而言，魚是個私人象徵，但對觀眾來說卻示範了公共空間裡的奇幻風土。³⁴

蓋瑞在洛杉磯藝術界雖然有很多朋友，但他直到 1980 年代晚期才有所突破，躋身委託案和建築認可的第一流位置。他有許多房屋其實是替藝術家和中上階級顧客設計，而非為富豪業主設計。除了勞斯企業（Rouse Corporation），他也沒有受邀替企業客戶設計公共建築物，而勞斯企業的主管在看過他位於聖塔摩尼卡（Santa Monica）自宅整修的實驗性平面及外露結構後，就放棄了他。蓋瑞也在洛杉磯設計一些博物館裝置與洛杉磯當代藝術博物館的臨時展示大廳，但永久博物館的設計委託案卻繞過他，轉而聘請磯崎新（Arata Isozaki）。

蓋瑞的作品和事業構成典型的洛杉磯風土。由於缺少高階委託案，他被迫以工業科技操作居家消費的形式。他替勞斯企業設計的主結構（而且最後被迫與維多葛魯事務所〔Victor Gruen Associates〕合作）是聖塔摩尼卡購物中心（Santa Monica Place），這是一座用泥灰和鐵網圍籬環繞周界的購物中心。唯有在經歷洛杉磯風土的事業後，蓋瑞才獲得他專業上的聲譽報酬：在華克藝廊（Walker Art Gallery）和惠特尼博物館（Whitney Museum）舉辦的作品回顧展、受邀替紐約市一棟新摩天大樓的封閉性競圖提出設計（稍後因開發商灣區與威斯敦〔Gulf and Western〕公司決定不繼續執行後而撤回）、參與麻州當代藝術博物館（Massachusetts Museum of Contemporary Art）的規劃和接受委任設計華德迪士尼音樂廳（Walter Disney Concert Hall），那是洛杉磯愛樂交響樂團的新家，也是洛杉磯市中心區的核心。除了 2,500 個座位的交響樂廳，以及一處 1,000 個座位的

室內樂表演區，蓋瑞設計一個玻璃門廳——「建築師描述它是一個『城市起居室』」——以及商店、花園和音樂家休息區。³⁵

蓋瑞的所有作品，描繪出界定現代洛杉磯風土建築的臨界並置。蓋瑞住宅的自覺性生產，透過「凸出的」木構造而關注自身。這種住宅在郊區街道的出現令人注意到居家消費。雖然蓋瑞家的一個窗戶讓行人可以看到屋主的花園，但環繞花園的標準盒狀房屋特色是比較傳統、封閉與私人的居家空間。即使位居競逐駕駛人注意力的諸多購物中心之間，聖塔摩尼卡購物中心也是個自覺性生產的戲劇化範例。它以高聳的鐵網圍欄和顯著的招牌宣告自己，與高速公路區隔並從中顯現，並置了想像隱匿的私密性與出於安全之名的公然侵犯性。

蓋瑞的設計曾被拿來跟城市本身做比較，是入口與出口「經過規劃的滲透」，透過相互交錯的平面而片斷化且脫節，顯得像受到「洛杉磯的都市情慾所誘惑」。³⁶在這個城市裡，替競爭性的市場建造單戶住宅，成為一種界定地方的過程。而替個別化消費建造公共空間，也標誌出一個地方。從房地產市場的脈絡來考察，即使是風土建築也成為一種權力地景。

邁阿密擁有不太一樣的歷史風土。然而和洛杉磯一樣，邁阿密的風土也代表公共空間裡的消費私有化。在這裡，地方也是由單戶住宅的自覺性生產來界定。

以海岸和島嶼別墅（邁阿密的原型夢幻住宅）的誇張形式展現的歷史參照，來自想像的西班牙過往，大部分是從當代拉丁美洲進口。如同加州，佛羅里達很少遺留西班牙殖民時期的建築。

所以邁阿密和棕櫚灘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興建的「地中海」風格別墅和旅館，為當代住宅的消費者創造一種歷史性的風土。³⁷

238

艾迪森·密茲納（Addison Mizner）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接受委託建造的度假建築，是替到南佛羅里達過冬的富豪設計的舞台布景。他複製詹姆斯於十年前曾在棕櫚灘觀察到的旅館風景——朦朧的帕拉佐（palazzo）風格裡的輕柔地中海色調——然後將其個別化，呈現於家庭宅邸或住宅群裡。每個風景名勝的別墅，都賦予南佛羅里達風土一種自覺生產的氣息。密茲納在佛羅里達的作品與北方富豪的哥德復興式（Gothic Revival）或都鐸式（Tudor）宅邸沒有實質上的差別，有些還依照他的設計興建。但是密茲納的住宅和鄉村俱樂部位於度假區的空間聚集——在缺乏其他風土的地景裡，對於休閒的抽象化——令人注意到居家消費。為了實現這種風土，密茲納必須找出技術問題和供應問題的解答。他發展出運用木料和石材的新技術，可以承受熱帶氣候，還成立一間公司製作跟別墅的歷史風格相配的仿古家具。在1920年代的土地熱潮裡，密茲納也成為一名地產開發商。1925年，他成立一家公司興建波卡拉頓（Boca Raton），「全世界建築最美麗的遊樂場」。要不是土地熱潮泡沫後這家公司耗盡了資金，密茲納可能會創造出一整個地中海風格的小城市。^{38*}

* 到了1989年，位於波卡拉頓的「密茲納村」整修為一個公寓式度假社區，每間公寓售價275,000美元或更高——在密茲納的時代，這筆錢足以在邁阿密或洛杉磯建造整棟別墅。

在建造度假區的偉大時期裡，邁阿密—棕櫚灘地區發展出類似洛杉磯的風土風格。邁阿密有海濱住宅、別墅與裝飾藝術旅館的海岸幻想建築，以及城市內部泥灰立方體形狀的極簡主義現代住宅。佛羅里達的珊瑚礁雖然比橘郡的平原更難馴服，但自然穩定地被往回推，直到沼澤地拓墾成為觀光景點。然而，即使有幾乎連續不斷的營造，直到 1980 年代，邁阿密產生的著名建築師還是比洛杉磯少（也許炫耀賣弄的楓丹白露旅館〔Fountainbleau Hotel〕設計者除外）。電視警探影集「邁阿密風雲」（Miami Vice）於 1984 年播送以來，每周在片頭字幕背後凸顯的場景，包括一棟由新進的邁阿密公司「ARQ 建築事務所」（Arquitectonica）設計的建築物。這是明智的選擇，因為這棟位於布里克爾街（Brickell Avenue）的亞特蘭提斯（Atlantis）公寓大樓，同時代表風土建築和第三邁阿密的權力地景。

亞特蘭提斯建於舊市中心附近，但也位於海灘，反映了邁阿密作為拉丁中心的國際化，以及拉丁美洲金融資本在邁阿密的再中心化。亞特蘭提斯在營建技術和建築風格上屬於晚期現代。但它具有極度不同於現代主義的有趣裝飾風味，而且替邁阿密的經濟權力提供友善的立面。不像法蘭克·蓋瑞的作品，亞特蘭提斯不會凸顯它的結構。它的結構反而呈現出一個虛空的中心：在第十層和十四層中間切割出一個方形，露出海洋，而且在這個虛空的底部有棵棕櫚樹。這個空洞在效果上遮掩了結構，讓建築物看似在自然前退縮。這是人造物的勝利，一種視覺上的幻覺。從這個觀點看，亞特蘭提斯象徵正在玩耍的邁阿密，一個將愉悅分派

給海灘與天空的個別公寓單位的城市。亞特蘭提斯在度假區和都市建築之間，也在亨利·詹姆斯所見「位於海洋和叢林間、海洋與湖區的長條土地上」的棕櫚灘海濱住宅和新的都會區之間中介斡旋。

ARQ 建築事務所的自覺式生產也成為邁阿密城市觀光指南的合適象徵。誠如「新的高層建築對於邁阿密自許為未來城市的形象有實質貢獻，在這種形象中，加勒比海和北美洲綜合成為一種新事物」，³⁹ 所以新的風土也提示了現代與後現代風格間的臨界性。ARQ 建築事務所的成功可以同法蘭克·蓋瑞風土建築的再現特質比擬，並創造出嘗試個性化其風格的類似美學問題。

ARQ 建築事務所的創辦人，北美洲的羅琳達·史匹爾（Laurinda Spear）和祕魯裔的伯納多·佛特－布瑞西亞（Bernardo Fort-Brescia）自稱現代主義者。他們運用常見的現代營造技術興建高聳、白色的現代方盒子。但這種現代主義是折衷的、感官的、國際性的。他們的專長是獨特的裝飾手法，喚起消費的不法快感：亞特蘭提斯的空洞和彩色條紋；帝國大樓（Imperial）的八層樓「車道穿越式大廳」和波浪型閣樓外牆。其優雅和表面的平坦都可算是後現代。具象的裝飾也可以——像麥可·葛瑞夫在迪士尼世界的旅館——裝飾了一棟他們在亞特蘭大設計的有金魚和瀑布、名為里約（Rio）的購物中心。⁴⁰

重要的是，ARQ 建築事務所在邁阿密創造的風土，與全球權力的其他制度共同運作得很好，尤其是在拉丁美洲。建築評論家約瑟夫·瑞克特（Joseph Rykwert）描述這家公司設計位於利

馬（Lima）的信貸銀行（Banco de Credito）建築，疏離到「令人困惑不安，也許是詩意的」程度，猶如疏離是「刻意尋求的效果」。這間銀行正位於城市的邊緣——一棟聳立山腳的現代結構，它在那有如被自然環繞的人造物的紀念碑。瑞克特發現，這種孤立是每家金融機構尋求安全的典型做法，它們的環境——尤其在拉丁美洲——總被認為有敵意。但是，這種疏離也像邁阿密的水道地景或洛杉磯的夢幻住宅。它代表舒適與權力，但要求有護衛犬、防盜鈴和通行卡的安全系統。它要求與都市的貧民區保持距離。如果這種風土令人有疏離感，那只是因為它是由經濟權力地景所投射。然而，就像法蘭克·蓋瑞的作品，即使ARQ建築事務所的大型計畫也不是紀念性的。信貸銀行結合電腦和安全系統的電子影像，以及為了居家消費而以邁阿密類型色彩設計的辦公室：依佛特－布瑞西亞的說法，「印加文化，」或是裝飾藝術、霓虹、輕柔的地中海粉彩。

這種為市場消費而界定地方感的能力，吸引了房地產開發商。在休斯頓，有個小型開發商聘用ARQ建築事務所設計兩項聯棟住宅計畫，喜歡這個公司風格的原因是它能吸引「他稱為『創新者，典型雅痞』的市場成分」。這些消費者受到ARQ建築事務所設計的自覺性生產吸引：原色飾帶（休斯頓）、角度變化的屋頂最後收束於尖塔、漸變的舷窗尺寸、壁龕和廣場。這個計畫的所有參數都受制於成本，所有建材都是平價的泥灰和木料，但這些住宅卻以非標準化的設計來使自身惹人注目。開發商說：「它以獨特方式界定了目標市場，我們認為它將是我們在〔疲軟〕市

場的競爭優勢……而且……我們喜歡得到一點注意。」⁴¹

風土建築確實令人注意到洛杉磯和邁阿密。房地產開發商和地方菁英尋求以視覺消費為導向的意象，請建築師協助，和它們過去在經濟成長時期所做的一樣。但是建築的景象逐漸透過大眾傳播手段來擴張和複製，從迪士尼的電視節目，到「邁阿密風雲」和亮麗光滑的生活風格雜誌。在這個脈絡下，視覺消費的訴求決定了市場權力：由誰興建什麼樣的形式。在很大的程度上，後現代建築——像法蘭克·蓋瑞和ARQ建築事務所的晚期現代作品——發現它在市場經濟有一席之地，乃是因為它的視覺意象、它的立面，顯示一種可以親近的權力面孔。

241

建築的運動無法比擬為一個經濟發展的階段。但法蘭克·蓋瑞和ARQ建築事務所的晚期現代建築界定了後現代地景：不和諧且不連續、有趣而具有人性。它是在社會—空間重組的時期興建，正當第三洛杉磯與第三邁阿密成為全球經濟權力的中心。建成環境在自然與人造物之間、度假區與城市之間、地方與全球投資之間中介。不過，它傳達出一種地方感。

後現代城市的發展運用如同以往的元素：土地、勞動、資本，以及它們在空間與時間中的配置。但城市現在設計成為一種想像地景，因為這是在一個高度工業化的社會裡，建築師能有所自覺地展望的最後創意邊境。

如果後工業社會實際上是由超工業化系統形成，沒有外界也沒有虛空的空間，計畫和生產能夠致力發展的唯一

處女地是想像的領域，換言之，是由空間敘事和舞台布景構成的領域，是新的感官島嶼……這些是由設計所生產的想像領域。⁴²

亨利·詹姆斯在佛羅里達旅館文明的想像領域中，瞥見了類似的社會意象抽象化。誠如詹姆斯所預見的，當風土映繪於消費地景上時，它就構成了對社會交往的強大控制。

就像迪士尼世界，洛杉磯與邁阿密顯示新的權力地景需要的不是中心性，也不是紀念性。它反而是在視覺上協調公共與私人消費、全球與在地資本、市場與地方之間的張力。然而，這些影像一點也不穩定。這個地景同時掌握了迪士尼世界的安全、甚至純真，還有「邁阿密風雲」瀰漫的內咎感。

幻想的另一面

當「邁阿密風雲」於1984年出現於美國電視上時，它以驚人的說服力將後現代地景傳達給大眾。至少從1970年代中期，區域性差別再度強烈浮現，大眾文化就開始尋找陽光帶經濟權力的意象。新的電視連續劇大部分只採用某個陽光帶地點當作敘事的「掛勾」，並將地方權力掩蓋於區域傳統。德州（「朱門恩怨」〔Dallas〕）、丹佛（「豪門恩怨」〔Dynasty〕）或索諾瑪（Sonoma）（「鷹冠莊園」〔Falcon Crest〕）的權力，是由可以發生在任何地方的、肥皂劇戲仿英雄式的虛假寫實主義來描

繪。相反的，「邁阿密風雲」的目標是要看起來既有自覺又不真實。它的製作水準反映一種具獨特真實、但又奇異地顯得陌生的地景。這個節目具有視覺衝擊性、精心的戲劇籌畫，即使外景拍攝很逼真，卻令「大地色調」刻意缺席，掌握後現代城市脆弱的、綜合性的特質。它也與衍生自其他大眾文化形式的影像有所共鳴。這是個經過藝術層次考慮的真實城市；但它無疑是經濟權力的抽象地景。

「邁阿密風雲」擁有音樂錄影帶般的戲劇外貌，並運用電子合成器主旋律而非對白。就像音樂錄影帶，它仰賴夢幻作為主題和結構。但它將固定套路的音樂錄影帶裡的影像提煉出來，納入一小時的警匪片架構。在這個架構裡，有時候遭詆毀為沒能容許「編劇的演出」，許多劇本有明顯的政治性。那些明顯聚焦於政治主題者，經常預料或緊密追隨新聞標題，通常涉及美國對中美洲反革命游擊戰爭的祕密支持。

這齣影集也必須感謝時尚。正如主要角色的「設計師」服飾風格使他們不同於標準警探片，品牌名稱也散布於情節之中，顯示一種市場文化的消費者視角。「塔伯斯〔Tubbs，主角之一〕穿著 800 美金的 Verri Uomo 雙排扣西裝和黑色絲質襯衫，以及義大利窄領帶。索尼〔Sonny，另一位主角〕有一支金色勞力士，佩帶一把布倫 10-mm 半自動手槍，這把槍太過新穎，以致多數專業武器團隊認為它是實驗性的」。同樣的，一批遭竊貨物是新的普騰電視（protons），而非較尋常的新力或增你智（Zeniths）。⁴³

形式脫離了敘事，點出了「邁阿密風雲」最初為何能贏得獎賞。在第一季，這個影集獲得嚴肅電視評論家的好評，還有15項艾美獎提名。這齣影集的外觀——刻意萃取自邁阿密的風土——以各式各樣消費者產品投射回到整個美國地景，讓這齣影集的製作人很害怕走入一家連鎖店。「第一年我們試圖找到某種不同東西的優勢——一種熾熱、太陽曝曬的世界」他說，「這就是我為何挑選邁阿密。現在……你進入蒙哥馬利沃德（Montgomery Ward），你見到粉彩。震動的粉彩。」⁴⁴

然而從我們的觀點，「邁阿密風雲」獨特，是因為它映繪了典型的視覺主題於一個由全球企業權力組織的社會上。它結合城市的建成環境、居家消費製造出的環境，與無線電視的想像環境。但是在犯罪類型裡，「邁阿密風雲」幾乎稱不上是原創。自19世紀以來，偵探故事就同時吸引了知識分子和中下階級。跟「邁阿密風雲」一樣，1920年代以來美國最好的偵探小說，故事都發生在罪犯橫行的城市裡。1920年代以降，像雷蒙·錢德勒這樣的作家，在他們的作品裡就四散著特殊產品和製造商的名稱，以品牌名稱取代通稱（例如用「朗生」（Ronson）代表打火機，用「福特」指汽車），以便顯示他們的偵探對文化可說熟門熟路。再者，1950年代以來的無線電視，也替「邁阿密風雲」提供了根柢。「拿《警網雙雄》（*Dragnet*）裡穿緊身衣的搭檔，加上《掃蕩三人組》（*The Mod Squad*）裡時髦的反犯罪態度，以及MTV的節奏和風格，你就完成《邁阿密風雲》的公式了，夥伴。」一名評論家模仿主角索尼的說話語調如此寫道。⁴⁵

高估、鬱悶、恍惚：到了第二季，製作水準的衝擊在影集缺乏戲劇結構下相形見绌，到了第三季，「邁阿密風雲」被批評為拙劣的自我模仿。批評家「閱讀」消費者產品或相互閱讀，以找出挑剔它的新辦法。《滾石》（*Rolling Stone*）的記者說在「青少年存在主義和街角神祕主義」的混合中，甚至沒留下什麼可以模仿的東西：「它很像嘗試製作保鮮膜的影本。」在《紳士》（*Esquire*）裡，詹姆斯·沃爾寇特（James Wolcott）引述約翰·雷納德（John Leonard），後者說這齣影集「超越後現代，進入後讀寫（postliterate）了」。沃爾寇特接著說「邁阿密風雲」是「沒焦點、不穩定，襯著明信片背景的空洞即興演出」。⁴⁶

但這正是批評者和觀眾最初感覺十分刺激的後現代地景。批評者開始鄙視為「邁阿密風雲」缺乏現實感的立面般特質，反映了邁阿密建成環境、拉斯維加斯，或新的亞特蘭大市中心裡，自然和人造物的互動——霓虹燈、高科技、裝飾藝術、虛空的空間。某個程度上，這個節目呈現佛羅里達的海洋與叢林、海灘與塑膠的混雜。但這齣影集也代表一種新的都市現實：「邁阿密的愛德華·霍普（Edward Hopper）^[3]。」一名《滾石》記者在電視播出第一季時大為讚賞。就像明顯的虛構使馬奈（Manet）的《奧林比亞》（*Olympia*）變得「現代」，邁阿密「明信片」般

[3] 愛德華·霍普（Edward Hopper, 1882-1967）為美國知名寫實主義畫家和蝕刻版畫家，作品反映他對美國現代生活的看法。他善於表現某種沉靜時刻，關心畫面幾何設計與人物和環境間的均衡擺置。參見 http://en.wikipedia.org/wiki/Edward_Hopper。

的虛假也令它變得後現代。而且，就像馬奈繪製的巴黎，奧斯曼時代燦爛華麗但更為逼真的城市，「邁阿密風雲裡」所展現的邁阿密也是既熟悉又新奇。⁴⁷

作為我們時代的印象主義，電子影像被當成真實邁阿密的指南。當麥可·索金下飛機，他承認有種親歷其境的「邁阿密風雲」感，租了一輛閃亮的雷鳥汽車，聆聽收音機裡的影集主題曲。當獨白者斯伯丁·葛雷（Spalding Gray）冬天到邁阿密朝聖，想看看新東西時，他很高興有文化上熟悉事物的組合——在雜貨店吃貝果，在當地報紙上讀到「邁阿密風雲」的犯罪故事。索金和葛雷仰賴電子影像提供真實地景所沒有的連貫性。⁴⁸ 即使對評論家而言，電子影像同時也是經驗的紀錄和準備。在這個世界裡，很難追溯哪種文化生產形式是衍生性的，是地景或其影像。再者，影像是透過不同文化媒介而折射。每個媒介都是個立面，反映地景，又從地景中撤回。一方面，「邁阿密風雲」衍生自音樂錄影帶，但另一方面，它提供素材給其他電視節目和雜誌文章。這齣影集成為一個熱門項目，它的明星接受訪問，拍攝地點是旅遊節目的主題，原聲帶則上市銷售。隨著每樣視覺產品跨越文化場域而遷移，它成為經濟價值的來源。這已超越藝術成為商品的現代時期。商品現在是從其他商品衍生而來。在這個意義下，「邁阿密風雲」是一切自覺性文化生產的象徵。

當然，「邁阿密風雲」也是城市的象徵。但這是沒有人從事生產工作的城市，這個城市的工業已被貶到邁阿密河沿岸泥濘滯流的碼頭。在那裡，這些工業沒有公寓和辦公大樓那麼顯眼，

後者則因大西洋和比斯坎灣（Biscayne Bay）而閃爍光芒。在一個陰暗的場景裡，索尼由於憤怒而皺起鼻子，一邊對塔伯斯說：

245

「我就是愛這個工業和死水的氣味！」「邁阿密風雲」是服務部門的邁阿密，這裡是透過「交易」而非工作來賺錢，而且產品採取違禁武器、非法藥品或偽幣等形式。這個城市的警察是唯一誠實的市民，但他們當中有許多人很瘋狂或貪腐，而索尼和塔斯伯每年都發覺，替維護道德秩序提出令人信服的解釋越來越難。他們在這個影集於1989年結束時，符合邏輯地丟掉他們的警徽。^{*}

索尼是個美國英雄，是被迫接受角色的未來拯救者。問他為何要當警察，他說：「我想要讓世界安全一點……對小孩而言。」相反的，塔伯斯來自警察世家；他大哥在紐約的一場古柯鹼交易中被殺，他選擇警察工作來重振家庭榮譽。面對一個官方貪腐的案子，他對他們置身事外的唯一解釋是「我們很酷」。由於真實新聞事件不斷強調邁阿密警察的腐敗，良善公僕的動機持續成為這齣影集的主要祕辛。⁴⁹

索尼與塔伯斯並不是真的與他們追捕的謀殺犯、幫派分子和施虐狂有所不同。他們是臥底探員，因此和罪犯混跡一處。

* 就像邁阿密這個城市，「邁阿密風雲」也在都市再現上有問題。主導性的主角索尼（白人男性）雖然是佛羅里達當地人，從屬性的塔伯斯（黑人男性）卻是最近才從紐約移民過來；儘管塔伯斯後來發行而成為流行音樂的主題曲是「你屬於這個城市」，但那個城市是紐約。再者，當製作人提供一段特殊劇本以供第二季的首映，他們是在紐約拍攝。在另一個節目上接受訪問提到這點時，兩位明星替這個位址辯護，因為「邁阿密風雲」是「一場都市秀」。

索尼的勞力士和法拉利，塔伯斯的義大利西裝和老式凱迪拉克敞篷汽車，都是他們的偽裝。在別人看來是放縱沉溺，對他們卻是工作，但是……他們知道自己與罪犯有共同觀點。對他們而言，比起解釋為何他們是好人，更重要的是擔心他們自己也很邪惡。「真相是，我自己也是個吸毒者」索尼對一名心理學家如此告白。「我迷上了行動」這種認識令他們「鬱悶」。邪惡穿透他們，猶如它滲透到整個文化；這個影集的名稱未能區分警察和社會（像比較常見的「掃蕩三人組」、「FBI」或「檀島警騎」〔Hawaii Five-O〕），並非出於偶然。反之，就像「不夜城」（Naked City），名稱本身就等同都市形式和罪惡：「邁阿密」=「惡行」（Vice）。

這種道德曖昧性不僅屬於都市，也是水門案和越戰之後社會的一部分。不像某位角色曾「在越南服役」作為通過儀式的那些電視節目，「邁阿密風雲」對道德價值有深刻的懷疑。愛國主義是由奧利弗·諾思（Oliver North）、尼加拉瓜反政府游擊隊（Contras）和巴拿馬的諾瑞嘉將軍（General Noriega）界定。忠誠從來不被聯邦緝毒組探員認可。毒品和貪腐不僅名列警察必須處理的都市問題之一；它們**就是**都市問題。應該用於對付這種問題的法律已從內部腐化，被那些負責維護秩序的人削弱。這些基本假設瀰漫於「邁阿密風雲」，讓它同時具備都市犯罪故事固有的專橫犬儒心態，以及一種純真的感受性。

雖然一名評論家不喜歡他在這齣影集見到的殺光無辜受害者的「失敗主義」傾向，而且這些受害者通常在最後的定格畫面

中，在索尼的臂彎裡斷氣，但這種後越戰無所不在的罪行，必然導致難以消滅惡行的無可改變之悲觀主義。除了禪宗般的卡斯提洛（Castillo）中隊長，「邁阿密風雲」裡沒人擁有絕對價值，因此根本不可能有明確收尾的結局。其實，罪犯經常逃逸。這替製作人造成周期性的問題，尤其是在前兩季。罪行可能很醜惡，但「邁阿密風雲」裡無止盡的罪行縫隙，卻與充滿舊式懲罰（「警網雙雄」）或救贖（「FBI」）觀念的警探劇集相反。⁵⁰

罪行與社會其餘部分間黑白區分的道德晦澀，就跟洛杉磯與邁阿密的地景一般古老。在美國 1920 年代的偵探小說裡，特別是達許·漢密特（Dashiell Hammett）的作品，偵探不再像柯南·道爾（Conan Doyle）和愛倫坡（Poe）的主角，是理性思考的典範，而真相（罪行的解答）也不再清楚。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美國偵探小說裡，偵探並沒有比他追蹤的罪犯更有道德，雙方使用的方法通常一樣。再者，罪犯的身分經常一開始就知道，降低對最後解答的期待。這種不確定性移轉到收音機的偵探節目，然後是電視，於是製作人看到他們的任務是在刺激興奮（暴力）和道德判斷（結局）之間協商。然而，到了 1973 年，水門案和越戰周圍的氣氛加深了犯罪節目生產的困局。「犬儒主義、公權力失敗、社會腐敗、罪行獲得回報；這些要如何透過對官方和私人輿論特別敏感的媒介而呈現給閱聽大眾？」⁵¹

然而，比起大部分其他影集冒險，「邁阿密風雲」脫離結局的規範而走得更遠，因此對公眾的反對格外敏感。民調顯示，許多觀眾認同該影集中的高階犯罪魅力，促使這齣影集的製作人

和NBC聯播網否認他們吹捧、美化罪犯。但是這些調查結果的發表，導致更多懲罰被寫入後來的劇情。在調查過後，罪行依然要付出代價，但罪犯亦如是。⁵²

做為 1980 年代的犯罪節目，「邁阿密風雲」聚焦於企業與政府的常態環節——貪腐。道德秩序的維護逆轉舊有的公共和私人空間區分，因為私下的監控變得更重要。19 世紀的臥底探員是在公共空間裡工作，像街道、政治集會和暴動場合，這些地方很可能會有罪案發生。不過，1970 年代後，重大罪行很可能發生於私人空間，發生於總統的橢圓形辦公室、證券交易公司「內部」的談話、遊艇上的派對。這些正是「邁阿密風雲」的場景。

索尼和塔伯斯也揭露某個企業或政府領域的不道德行為，經常意味著另一個領域的非法行徑。在一場戲裡，一位年輕寡婦借款給一名毒販，想發動一場槓桿收購以買下她已逝丈夫的公司，一名角色抱怨這是「金髮女郎的野心」（Blond Ambition），以對約翰·狄恩（John Dean）的水門案回憶錄致敬。高登·利狄（G. Gordon Liddy）是 1972 年潛入民主黨位於水門公寓的全國黨部辦公室的尼克森總統屬下成員之一，於「邁阿密風雲」裡出現兩集，身份是由邁阿密的富裕拉丁美洲裔商人支持的尼加拉瓜游擊隊領袖。劇本裡沒人可以不沾貪腐——甚至包括一名黑人法官和一名足球教練。「出賣」，索尼喃喃地對塔伯斯說「這就是美國夢。」

這種態度描繪了脫離像「警網鐵金鋼」（Kojak）這類於 1970 年代呈現都市寫實主義的影集的範型轉移。在文學界，類

似的轉移發生於 1920 年代，當時 19 世紀由福爾摩斯（Sherlock Holmes）主導的模型被「後現代偵探」推翻。這種新範型有兩項特色。首先，敘事者的瘋狂和自我矛盾現在已普及於社會。對於罪行無所不在且祕密進行的覺察，乃是對**自我**的形上學覺察。其次，偵探的工作不再是解答謎樣的死亡。「在新的形上學偵探故事裡，要解答的是**生活本身**」。

248

值得注意的是，針對「邁阿密風雲」的評論也適用於整個犯罪類型。「偵探小說的麻煩不在於它是道德性的，而在於它是道德主義的；不是它的流行，而在於它的風格化；不在於它缺乏現實感，而是它採納最新的寫實主義，然後加以利用」。⁵⁴「邁阿密風雲」並沒有比邁阿密城市本身還不真實，沒有較不暴力、也沒有比較「平板」。談到它的曖昧性，它也不遜於沒有罪行可以解答、但知道社會裡有東西腐敗的後現代偵探，或是 ARQ 建築事務所同時反映和退縮、掩飾建築結構的立面。

我們並不真正知道邁阿密的地景再現的是什麼結構。人們如何在服務經濟或國際金融中心裡生活，依然沒有全盤的了解。一種以「交易」而非產品來運作的經濟體，其範圍因全球交易的規模而變得更成問題。邁阿密或洛杉磯牽涉毒品貿易的幫派火拼，而古巴流亡者在哥倫比亞供應商和來自黑人、拉丁裔和亞裔街頭幫派的零售者之間擔任中間人，顯得像國際分工的一環。它們比成衣生意還要危險，但同樣容易受到非經濟性威脅和族裔團結的影響。⁵⁵

在「邁阿密風雲」裡，非法經濟活動的邊界相互交錯且融

合。武器和毒品交易離不開白領犯罪和政府掩飾，而且如果每個人都是暗中活動，就沒有辦法可以分辨好人與壞人。「邁阿密風雲」裡的臥底探員在一場與青少年暴徒的街頭打鬥裡出示身分，結果發覺他們面對的是來自「地鐵幫」的臥底同事。

在攝製的五年期間，這個影集面臨了真實的經濟問題。拍攝一集要花上100萬美金，超過預算50萬美元。這不僅是標準一小時聯播網節目成本的兩倍，也是將播映權賣給世界各地所能回收的兩倍。為了降低成本，製作人討論要將拍攝地點移到洛杉磯，那裡是大多數電視製作設備的所在地，包括處理「邁阿密風雲」的設備。但這齣影集的外觀，也就是讓它可以競逐市場占有率的視覺獨特性，卻要求極為詳盡地注意地方的真實細節。製作人的困境使「製造」和「財務」標準再度較量，這是整個社會的典型呈現。⁵⁶

真實「邁阿密風雲」牽涉的經濟曖昧，在真實邁阿密的政治問題那裡獲得迴響。影響整個中美洲的決策是在華盛頓特區完成，而且通常是在邁阿密協調。這種情況使城市裡的拉丁裔菁英與當地有些距離。令這些交易得以運作、經過掩飾但發揮功能的網絡，讓都市理論家的觀念有了特殊意義，此即城市的經濟專門化與其在全球政治經濟階層中的利基之間的連結。自1940年代晚期起，邁阿密在整合環太平洋經濟和加勒比海經濟之間扮演關鍵角色。不過這種經濟的融資來自非法藥品產業和中央情報局，由合法設立於邁阿密專門處理海外交易的銀行掌管，並受到古巴流亡社區裡的當地民選官員保護。邁阿密市建立一個國際銀行的

「企業區」，包括降低設立銀行所需的最初資本額，以及忽視銀行顧客拿裝滿現金的購物袋存款的怪異行徑，並且不查核未申報高達數十億美元現金交易的銀行。不意外的，恐怖主義——對市民和政府官員的死亡威脅——「正好是政治生活的一部分」，前任市長墨利斯·費雷（Maurice Ferre）如是說。⁵⁷

縱使有暴力、道德曖昧和印象主義式的結構，「邁阿密風雲」依然被視為後現代社會的都市寫實主義。這齣影集實際上鼓動新觀光客來邁阿密。「邁阿密成了一個傳奇城市」費雷說。「人們想到邁阿密的方式，就跟他們想到阿爾及爾舊城區（Casba）或卡薩布蘭加（Casablanca），或是舊貝魯特（Beriut）一樣。充滿神祕和危險」一位商會成員說。這些觀光客認為在邁阿密「每間餐廳都是小酒館，每個女人都苗條又美麗，每個男人都精力充沛」。⁵⁸城市的意象反映製作來反映城市的電子影像。即使是真實影像也異常地不太現實。亨利·詹姆斯描寫佛羅里達時，他或許曾經是「邁阿密風雲」的觀眾：

無疑的，你可能安詳地生活在那裡——猶如在充滿絲絨般空氣的虛空裡；你實際上可能懷抱某種想法而住在那裡，如果你能滿足於這個想法是由葡萄柚和柳橙所構成。我承認，柳橙、葡萄柚和絲絨般的空氣會以某種方式構成一場盛宴；但在桌上多施加那麼一點力量，它很快就崩塌了——它的三支或四支桌腳很靠不住地背棄了它。⁵⁹

「邁阿密風雲」描繪了在我們的時代裡，地景如何同時脈絡化虛弱與權力。一方面，洛杉磯與邁阿密抽象化無權無勢者的欲望，並將這些欲望制度化於權力地景中。另一方面，迪士尼世界既再現又塑造了這些欲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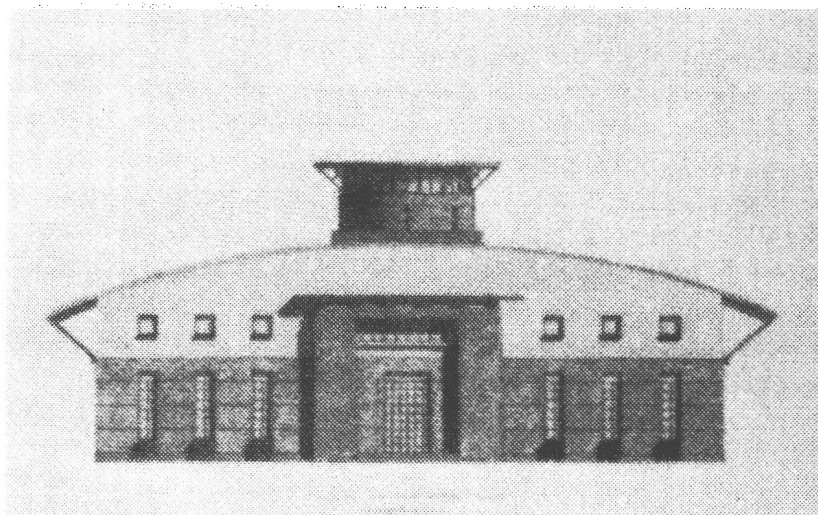
250

跟「邁阿密風雲」一樣，迪士尼世界也苦於財務問題。當迪士尼公司的股票價格於 1980 年代早期跌落時，這家公司引來許多不懷好意的接管提議。華德·迪士尼的兄弟洛伊（Roy）失去對事業的控制，並且與其他親戚爭執公司的前途。索爾·史坦伯格（Saul Steinberg）是位專精於接管的紐約金融家，買下大批股票，並雇用德崇證券（Drexel Burnham Lambert）的垃圾債券發明者和內線交易者麥可·密爾肯（Michael Milken），設計一套財務方案以便完全收購。史坦伯格激起的敵意，以及股票價值的不確定性，引入了其他金融資本。史坦伯格的收購者位置被明尼亞波利的艾文·雅各（Irwin L. Jacobs）和沃斯堡（Fort Worth）的巴斯兄弟（Bass brothers）取代。迪士尼管理階層試圖藉由控制薪資，並在未來三年裡實施減薪 16% 以降低成本；包括迪士尼世界在內的員工訴諸罷工。在這些情況下，巴斯兄弟買下雅各的股份。巴斯兄弟控制將近四分之一股權，任命麥可·艾斯納為迪士尼公司的新董事會主席，而艾斯納著手展開多角化和自動化的企業策略。艾斯納幾乎立即獲得成功。1985 年，有大幅報導指出他拿了薪水和紅利合計 200 萬元美金。公司在 1988-89 年的利潤超過七億美元，迪士尼則融資準備將它的主題樂園擴展到歐洲和日本。⁶⁰

幻想地景的另一面，可能醜惡或公然仰賴全球企業權力。但它持續具有吸引力。「佛羅里達依然擁有令人高興的祕方」亨利·詹姆斯寫道。「這種含糊（vagueness）很溫暖，這種含糊很鮮活，這種含糊很甜美，香味撲鼻、花朵盛開、果實累累；最重要的是，這種含糊是有所自覺且公開承認虛弱的」。⁶¹

幻想的誘惑力量顯示市場經濟根本上苦於一個文化問題：如何解決虛弱和權力間的張力。

結論



麥可·葛瑞夫，工業與勞工歷史中心，楊斯鎮，俄亥俄。西林街（West Wood Street）立面圖（繪於1986年，建於1990年）。

第9章

道德地景

保存楊斯鎮和阿克隆（Akron），以及那裡每個人的標準生活，就會為了少數人利益而阻礙經濟成長。

——Richard D. Utt

副首席經濟學家，美國商會（1981）

我們讓大家買得起錄放影機。

——三星（Samsung）廣告

無論是去工業化或後工業社會，都無法掌握當代市場經濟變化的程度和變異。像美國這樣的先進工業社會，是各種地方的「準連續體」（quasi-continuum），這些地方或多或少整合進入全球經濟，¹ 面對不同程度的利得與損失。工業和金融、管理和勞工之間的權力在根本上的不對稱性，依然未曾改變。但是，經濟復甦的機會現在取決於與金融權力的更直接關係。雖然有些例外的個人與堅定的機構可以逆轉朝向商業失敗的運動，但它們的行動受限於借貸資本的極度重要性、政府和勞工指導角色的欠缺，以及從抽象角度看待經濟的傾向。對試圖現代化工業經濟的任何嘗試而言，具悲劇性的是生產的意欲、投資的方向與欲望的社會化，都已納入消費的組織裡。

這種創造性破壞的短期後果或長期優勢，都不容易看出。那些窺探遙遠未來者，不是預見一個自由消費者的資訊社會，就是依賴的進口商組成的資訊社會。隨著觀點不同，他們投射出一種矽谷般的電腦程式設計師或麥當勞式漢堡廚師的人口。另一方面，那些觀察當前局勢的人，則傾向於看到根植於廉價工資（「勞動力的凱瑪化」〔K-marting of the labor force〕^[1]）和失控金融投機（「賭場資本主義」）的社會兩極化。我們很容易辨認出狄更斯（Charles Dickens）於19世紀城市指認出來，而熊彼得（J. Schumpeter）和博藍尼（K. Polanyi）等經濟學者納入分析的景象：工業地景也是道德秩序。要建立可行的經濟，就需要有一致的道德價值。

成熟工業經濟的轉型也需要協調經濟價值與文化價值的變化。透過機器人學、錄放影機，以及旅行和休閒產業而展開的明顯的經濟再結構，專注於如何替**新的**產品和服務設計新的**經濟**價值的問題。不過，如果這是再結構所暗含的唯一價值變化，那就不會引起混淆。在一個廣泛變遷的時期裡，還有其他三種過程也同等重要：我們如何替新產品和服務找到新的文化價值，我們如何改變賦予舊產品和服務的舊經濟價值，以及我們如何替與舊產品和服務糾結在一起的生產和消費模式協商新的文化價值。自

[1] K-Mart 是美國超市百貨集團，利用低廉勞動力壓低營運成本。不過目前 Wal-Mart（沃爾瑪）後來居上，也壓低進貨成本和使用廉價勞工而成為全球最大零售集團。

1940年代以來，工業經濟的基本文化意義和社會關係——藍領及許多白領工人在公司裡的位置；工會、家戶和社區的網絡；以及基本商品像「鋼鐵」、「電視」、甚至「電腦」的性質，已經從耐久財轉變為可拋棄的財貨。這就是「彈性」在最粗糙意義下的含意。

我們不會在我們週遭漸增的消費地景中找到一致的價值。像購物中心、百貨公司和博物館等機構，促進一種移除商業展示與公共展覽之間區別的臨界性。周圍的環境——城市、企業郊區和奇幻中心——支持自然與文化、市場與愉悅、工作與休閒之間的臨界性，隱藏集中化經濟權力的關鍵角色。人們喜歡消費；他們在購物、比較貨品與談論消費中尋求社會認同。他們在新消費空間中找到戲劇、歷史與變化。然而，隨著他們的生活逐漸遠離物質生產的活動，他們對工業時代發展出的價值失去興趣：經濟平等、勞動組織、社會正義。在此同時，美國降低勞動價值和縮減工業能力的決定，令人更難增進他們以市場為基礎的消費。欲望的社會化朝向無法企及的消費標準，導向一個更大的問題，亦即經濟系統「耗盡道德遺產」的問題。

255

在1968年以劇烈形式出現於大學和都市族裔聚居區、反抗舊文化範疇的暴動，與1973年肇始於加油站的緊縮開支之間，幾位作家展開針對主導性經濟價值的道德檢視。在美國，貝爾（Daniel Bell）呼應熊彼得，感嘆資本主義「超越精神」（transcendent ethos）的喪失。對貝爾而言，一旦新教倫理不再藉由禁欲主義及道德約束來正當化與調和財務收益，社會規範的

水閘就會炸燬。現代性的理性期望尊奉享樂主義，成為當前時刻的終極判準，伴隨喪失約束暗示的一切無政府狀態。²

在英國，佛瑞德·賀希（Fred Hirsch）也注意到資本主義經濟系統和需要的社會建構之間擴大的裂隙。對比於貝爾的道德膿腫裡自我控制的衰微，賀希強調社會胃口與社會匱缺之間的剪刀般運動。他指出，即使有物質生產的擴張和貨品市場的擴展，經濟系統滿足欲望的社會擴張能力卻下降了。一方面，過去用以授予社會地位的「地位財」（如湖濱豪宅），不再是無窮供應。另一方面，當這種財貨商品化之後——也就是可以在市場上自由販售——它們就失去了將人們「安置」於社會結構裡的大部分能力。社會地位並非內蘊於財貨的經濟價值，而在於獲取它們的文化價值，或是已獲得它們的社會群體的文化價值。這令人想起依蒂絲·霍爾頓（Edith Wharton）對於里維耶拉（Riviera）「時尚」餐廳的描述：它們令人嚮往不是因為提供美味的食物，而是因為吸引了上流階級的顧客。在賀希看來，物質滿足和社會化欲望（而非欲望本身）之間的落差，耗盡了資本主義的道德遺產。³

256

前幾章闡明的許多問題——鋼鐵工廠為何關閉？勞工為何虛弱無力？工業過時廢棄的意義是甚麼？——可以用非常直截了當的制度角度來回答。例如，如果金融部門有義務要融資給國內工業，那麼工業經濟就會更強大些。如果土地菁英反對企業遷移到他們的地域，工業就會遭受阻攔而不去選擇新的區位。如果工會超越工業組織所激發的政治文化，勞動力就可以對經濟再結構更為開放。但探查各種地方的情況後，我在這提出的問題是涉及經

濟變遷的社會和文化脈絡的更深刻問題。它們指出抽象化、國際化和社會意義從生產轉移到消費的長期過程，才是美國工業衰退的原因。

抽象化並非 20 世紀的發明。尚·歐格紐認為 16 和 17 世紀「市場意義的歷史轉變」指涉了「商品交換之主導概念裡，具體性的逐漸替代」。這種替代將市場力量從具體產物、地方的個別交易，轉變為市場經濟的抽象過程，以及最後是抽象力量的結果。⁴ 底特律和威爾頓的地景，將抽象化（抽離）聯繫上幾種特定的 20 世紀過程。包括重工業力量從物質生產抽離，以及勞動過程從物質產品抽離。威爾頓和麥克路斯鋼鐵的個案研究指出，這些過程平行於經濟從製造業到服務業，以及從工業到金融資本的結構性轉變。

觀看查理斯·席爾勒、愛爾絲·德瑞格斯 (Elsie Driggs) 及瑪格利特·伯克-懷特 (Margaret Bourke-White) 的鋼鐵工廠和其他工業場址的畫作與照片，我們可以將重工業的變化視角追溯到 20 世紀前三分之一的時期，當時美國這種工業生產正值巔峰。他們的作品對視覺形式而非物質生產的強調，當然不是鋼鐵投資的最終放棄或生產技術的錯誤選擇的原因。但是將重工業轉化為視覺消費對象的視角轉變，預見始於 1920 年代晚期，美國經濟從生產者財貨到消費者財貨的結構性轉移。

在這個脈絡下，文化視角的轉變替經濟視角轉變預先鋪好了道路。儘管大多數人依然在重工業裡工作，而且屈服於其權力的明顯展現，工業的意象越來越偏視覺而非臟腑，是即刻感知而

非歷史鑲嵌，以及相應的越來越非關物質且更為抽象。這個抽象過程導致真實生產者衰微的道德遺產。除了狄亞哥·里維拉（Diego Rivera）的作品和其他蕭條年代的壁畫，美國社會裡的勞工形象變得幾乎不存在。同樣的，工會的力量也脫離了勞動過程。它抽離了車間和工廠，到了更為遙遠的全國集體協商和選舉政治的競技場。

至少從 19 世紀晚期以降，工業經濟已成為一種世界經濟。「以時間消滅空間」當時，是指在全球尺度上的外包。同樣的，美國於 20 世紀中期的工業生產總是與全球系統整合在一起，不論那個全球化是導致或避開危機。⁵但是從 1970 年代的經濟權力轉移開始，自 1920 年代以來受美國輸出的觀念和象徵（包括管理策略）支配的全球文化，有了大幅改變。我們在我稱為後現代權力的兩種地景的強烈對比中，見到了這種文化轉變。國際投資資本流動在結構了洛杉磯與邁阿密、橘郡與奧蘭多物質地景的同時，迪士尼世界和「邁阿密風雲」的象徵地景，則指出文化依賴的歷史模式翻轉。米老鼠和唐老鴨做為文化象徵而出口到全世界，展現了第一世界資本主義的舊霸權，是遮掩先前美國主導下全球系統的帝國關係的笑臉。然而，「邁阿密風雲」裡的毒品文化，說明的卻是遭受第三世界出口品侵蝕的崩潰中霸權。這是幾乎不能遮掩核心國家對環太平洋的資本積累，以及拉丁美洲古柯種植之依賴的鬼臉。

社會意義的主導來源從生產到消費的轉變，至少始於國內及進口消費者財貨於 17 和 18 世紀英國的廣泛流通。這種消費系統

的塑造力量是向上社會移動、階級之間的社會仿效，以及國家富裕；生產系統的提升則源於政府支出、實際的企業投資、給商業投資者的寬鬆信貸、生產新的專殊化財貨與服務的可用勞動，以及國際貿易。⁶

消費在亨利·詹姆斯描述的 1905 年左右的美國社會裡，採取更為明顯的形式，雖然仍很稀薄。詹姆斯也描寫了替換紐約市舊地標的投機性建築榮景，以及一家旅館呈現出一個自我封閉的文明計畫，將植基於貴族義務（noblesse oblige）和貴族文化的穩定世界，轉變為一個不穩定的消費者社會。一個世代後，T 型車的大量生產，以及較高工資和分期付款導致的購買力提升，創造出一個大量消費系統的基礎。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製造業到服務業的經濟轉型，以及標準化消費財生產的同時劇烈擴張，美國最後出現了一個大眾消費社會。

1960 年代起，消費者市場隨著價格和社會地位不同而分化，與文化挪用的差異策略同時並行。在上層階級挪用自然的居住模式後，企業總部也遷移到郊區。最大型的企業自信滿滿的離開城市的權力中心。隨著時間過去，它們的城郊區位發展出一種主觀的正當性，確認它們策略的正確性。相反的，縉紳化藉由挪用文化而非自然，復甦了中上階級對城市的認同。脫離依照種族或階級劃分的舊鄰里，都市專業者訴諸一個並非真正屬於他們的過往。他們的新核心區位令他們與城市其餘人口，以及郊區中產階級區分開來。他們對中心的投資支持新的文化機構，而這些機構最終又確認了他們的選擇。在 20 世紀的城市裡，房地產開發商挪

用自然和文化創造一個中產階級之夢。住家和汽車所有權整合休閒與工作，確證民主的資產階級烏托邦。

今日，文化的調解斡旋乃掌握於關鍵性基礎設施的手上。在現代城市裡較具教導意味，在後現代城市裡則偏向娛樂，批評將經驗的品質聯繫上成本和新穎，將生產聯繫上消費。那些生產批評的人替服務經濟創造出具有象徵重要性的勞動市場。要知道哪些藝術家、俱樂部和藝廊是「時尚的」，以及落實具建築正確性的住家營建形式，需要的基礎設施是相當龐大的作家、評論家，以及專業化但通常是臨時性的服務人員。塑造出觀光經濟需要的是服務員、清潔工、廚師和導遊等恆久的勞動力。迪士尼世界的成功，以及迪士尼世界的勞工訓練和銷售技巧轉移到其他場域，意味了它的意識形態對服務經濟深具重要性。

越來越具反身性的消費模式，需要一種更有自覺的生產方式。由於投資者需要透過生產的分化獲取競爭優勢，他們提升設計的社會地位。設計者、藝術家和建築師同樣強調個人主義和獨創性，以獲得爭取業主和博物館典藏的競爭優勢。這種雙重的競爭特性經常引導設計師尋求「藝術性」的解答——像後現代主義——而非替技術性問題想出新解答。自覺的生產隱藏因經濟權力集中而成為可能的社會控制。想像地景的吸引力，從棕櫚灘的旅館到迪士尼世界的麥可葛瑞夫旅館，來自它們提供真實權力世界的退隱地。它們吸引在視覺消費中歡欣鼓舞的孩童。

這些觀察並不是要主張是消費而非生產驅動了經濟。而是要強調在當代的市場經濟裡，消費的組織就如同生產的組織，對經

濟和社會結構具有重要影響。反諷的是，這個論點因非法藥物消費組織的重要性而獲得凸顯，特別是它接合第三世界的維生生產和洛杉磯、邁阿密與紐約的族裔分工。消費的組織是於經濟體中執行創造性破壞的強大手段。

真實的文化資本

視覺消費的文化策略容許空間和時間的選擇性消費。雖然繙紳化和迪士尼世界是很好的例子，我們還可以注意「新型」觀光業，以備有鄉村景緻和法國料理的居家風格旅館形式，並置了自然與文化。從我們的視角來看，這些旺盛的文化消費策略最有趣之處在於它們如何與服務業經濟接軌。⁷雖然它們肯定操縱象徵，並以象徵謀利，也因此與「象徵資本」有關，不過它們也生產真實的經濟價值。繼續只從象徵角度分析文化資本，就會忽略它與結構轉型的相關性。因此，我翻轉詹明信的斷言「建築是資本主義的象徵」，並指出在先進服務經濟裡，建築是象徵主義的資本。

260

文化消費的策略有賴於新興人口和社會行動者之間的有效需求。但是，誠如這些策略鑲嵌於反身性的、或經過高度中介和個人化的消費，它們也強化了自覺的生產。在供應面，文化消費為自覺的評論階層（以及下層服務人員）創造就業，反之又為其勞動所創造。再者，文化消費藉由提升生產與分配的企業投資（如美食乳酪商店、食品加工器工廠）利潤而有助於資本積累。而且

誠如我們見到的費紐爾中心（Faneuil Hall）和迪士尼樂園，文化消費對房地產開發的資本積累有正面影響。文化產品和服務真正構成了真實資本，只要它們在以市場為基礎的資本循環裡被納入成為商品。

我們可以知道文化產品與服務的經濟重要性，辦法是描述它們在**經濟與文化資本的互動迴路**裡的角色。引用大衛·哈維對馬克思的資本迴路的闡述性運用，很清楚的是，資本在資本主義經濟裡的持續流通，增加了所生產之商品的價值。⁸ 這些增加繼而擴張資本的價值。再者，隨著資本的流通，資本周期性地跨越部門和制度的邊界。投資資本隨報酬率不同，可能於總體上從製造業轉移到金融或服務業，從國內事業轉移到境外計畫，從內城房地產轉移到郊區房地產開發。隨著價值波動變化，資本又會移轉回來，或流通到其他地方。

誠如最近哈維的做法，思考在什麼條件下文化價值的變化會反映經濟價值的變遷，應該很有意思。但更有趣的是探問：文化商品的連續生產、在「經濟」與「文化」迴路間的移動，是否會持續增加投資資本的經濟價值？「文化資本的迴路」可能會提供我們理解當今文化與經濟價值間結構性連結的關鍵。⁹

正如有關都市形式的討論所指出，當建築師的設計在建築專業界被出版、理論化和散播，對投機的房地產開發商就成為更有用的經濟工具。過去幾年，為了這種專業界內部的宣傳，已有大量雜誌和評論創辦，而且有些建築師也出版附圖書籍凸顯他們的計畫。這些不只是大開本的咖啡桌書籍。宣傳擴張了設計師觀念

的文化價值，而且在這個過程裡提升了建築師和他們的建築物兩者的市場價值。^{*}市中心區房地產價值同樣隨著像新潮料理這類新文化實踐的發展而上漲。在這個脈絡下，新潮料理不僅是某些昂貴餐廳的產品或社會實踐，還是一種經過發表、理論化且以專業方式散播的烹調紀律。支撐縉紳化的經濟與文化資本的互動迴路，可以用相當簡單的方式描繪（參見圖9.1）

在城市核心區的老舊聯棟住宅和閣樓的實質基礎設施裡，建築修復提供市場價值的新元素，同時評論既有的新營建模式和發動自己的新模式。在此同時，在服務經濟裡，一組相互關聯的便利設施照顧了聯棟住宅和閣樓居民的地方市場。這些市場的聚集以及文化生產者的相對自主性，創造出一種市中心區「情景」。

這種情景又吸引更多對當地房地產的投資。隨著更多人遷入這個地區，採納創新者的文化價值，他們就創造出對舊式工藝仿製品的更多需求。[§]需求的增加更增進了維多利亞時代文物和印花棉布的大眾市場，最後鼓舞了新雜誌的創辦，以及更多對於這類文化策略的宣傳。當這種策略的擁護者成功挪用核心空間，他們會試圖藉由建立歷史性地標區來保護他們的權利（包括經濟和

* 這種文化資本的迴路反映出歷史和文化的差異。例如在義大利，想要鞏固專業聲望的建築師或設計師，傳統上都透過出版，尤其是發表於他們自己的刊物，以理論家的身分提出宣稱。然而在美國，現代建築師的某個團體甚至出版他們的對話錄音，這種提升價值的方法相當新穎。

§ 我在第七章指出，這種文化策略結合對真實性和優質新設計的需求。在一個過度機械化複製的時代裡，對仿製品的管制確實會是個問題，而這本身就構成主流文化機構提供工藝真實性認證的市場/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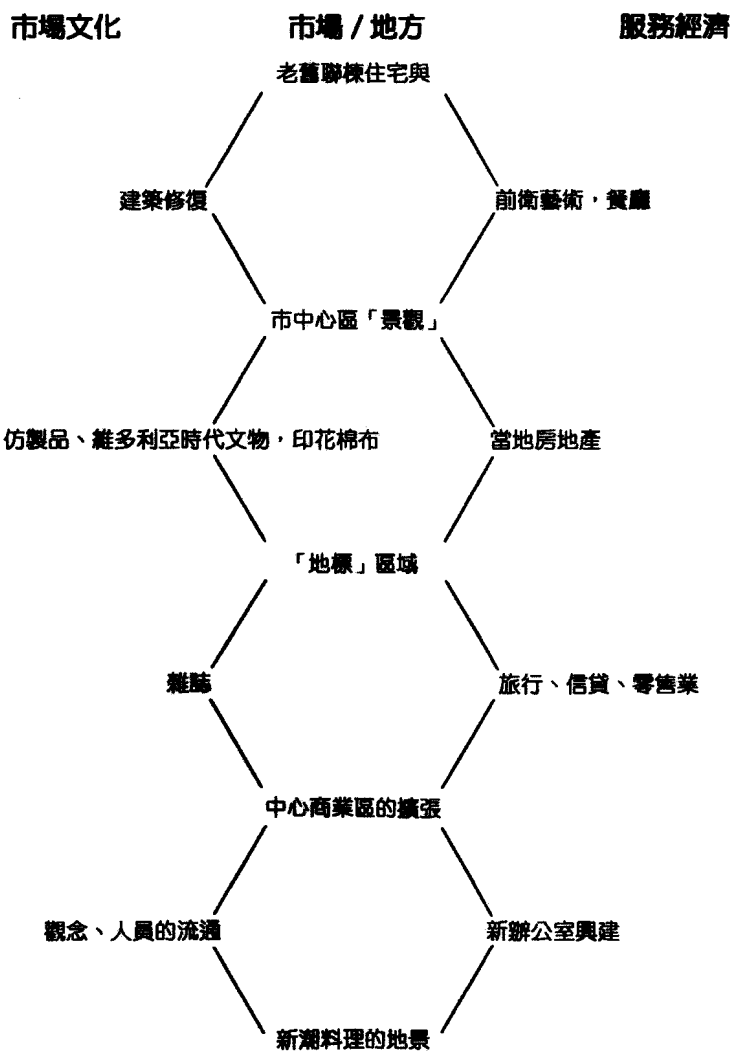


圖 9.1 文化資本迴路：縉紳化

文化價值方面)。一旦地方政府指定這種地區，不符這種文化價值的改變就會被宣告為「不相稱」而予以否決。

設立地標有很大的經濟價值，因為它刺激更多有關歷史保存和建築修復的出版品，也吸引觀光客和購物人潮。現在，這些新經濟價值促使大型開發商藉由興建新辦公室和公寓，著手擴張中心商業區。中心區轉變為相對高檔的購物、居住及企業服務的新市場所在。新的建築物與概念的國際流通；還有裡頭工作的創意、專業與金融人員，擴張了市場與新潮料理的地景。這又促進了市中心區建成環境的經濟價值，增加對老舊聯棟住宅和閣樓的投資壓力。

再者，迪士尼世界是個服務部門和娛樂功能的複合體，同時提升經濟和文化價值。米奇和米妮在各方面都是大眾產品，而在迪士尼世界旅館住宿，或購買受迪士尼世界模型啟發，位於奧蘭多或鄰近的混合使用開發區的住宅或分時公寓（time shares）的人，遠比涉足縉紳化的人還要多。然而，從資本迴路的觀點看，迪士尼世界是一組接合上服務經濟之大量生產系統的文化產品和服務（參見圖9.2）。

這些經濟與文化資本迴路始於真實的舞台布景和電影製片廠，它們於1920年代從紐約遷移到好萊塢，以便降低生產成本。這種夢想氛圍裡的雙重夢想產品的奇幻之地，在洛杉磯內部及周遭啟發它自己的風土建築。這種風土成長為一種市場文化，同時評論和複製了電影裡幻想生產的規範。誠如好萊塢電影成為美國的重要出口品，位於好萊塢的電影工業也促成房地產開發。

隨著好萊塢的一項產品，即動畫卡通，發展成為更大的市場，它也啟發戰後於安納罕（Anaheim）的柑橘園裡興建一種新式遊樂園區。迪士尼樂園在橘郡創造出新服務職業、新住宅和其他類型發展的市場。同時，它也產生更多以米老鼠、唐老鴨等為形象的產品。這些發展激發新的建築設計，納入洛杉磯的奇幻生態中。於雜誌上發表並出現於電視影集後，這又鼓舞了觀光業和零售販賣。同樣的，當 ARQ 事務所的建築物現身於「邁阿密風雲」，以及這家公司的主要人物出現於「今日秀」（The Today Show），就像 1989 年那樣，它們提升了邁阿密作為創意人員工作市場的價值。

意象師和其他人創造凸顯迪士尼角色的電視節目，與更多週邊產品。他們這些勞動果實構成一個市場文化，既評論迪士尼的創造物，也回應對米老鼠和米妮的精準複製品需求。同時，在迪士尼樂園裡尋求更直接經驗的參觀人潮，在服務經濟裡產生更多保全、旅館人員和廚師的工作。

這些市場又引發位於佛羅里達奧蘭多附近一處未充分利用地區裡，更廣大、更複雜的迪士尼世界的發展。作為城郊的多用途新營造複合體，迪士尼世界代表一個具相當規模的市場。但是它擁有更龐大的潛能。一方面，它對大街具社會和諧效果的精巧製作，創造一個評論美國（以及延伸至現代）社會的片斷化市場文化，同時很快成為從佛羅里達海濱到鱈魚角馬士皮公地（Mashpee Commons）的新住宅社區開發模型，兩者都由歷史主義後現代建築師安德列斯·杜安尼（Andres Duany）和伊莉

莎白·普拉特－柴柏克（Elizabeth Plater-Zyberk）設計。另一方面，迪士尼世界巨大的商業成功，創造了對更多出口服務的需求，最著名的是法國和日本的「加盟連鎖」迪士尼主題公園（東京迪士尼樂園是由華德迪士尼公司授權經營；歐洲迪士尼樂園由迪士尼擁有 49% 的股權）。這些又發動了它們自己的區域性經濟和文化資本迴路：開發土地、訓練服務業勞動力、支持電影、錄影帶和電視的生產。

在美國，藉由迪士尼市場而創造的地方，由於 1989 年迪士尼世界兼併米高梅的一處電影布景和好萊塢主題樂園而更形穩固。1990 年，環球影城在附近開張了一處與它競爭的主題樂園。這些都複製了最初的文化資本迴路。

依我們的觀點，文化資本是否構成哈維、列斐伏爾和其他都市政治經濟學者所謂的第一、第二或第三迴路，都無關緊要。但是在當代的市場經濟裡，投資於文化資本將能彌補相同迴路裡其他部分的循環性貶值（例如地方產業和營造環境），顯然符合邏輯。像靠近麥克洛斯的下游區（Downriver）吸引了休閒和娛樂設施投資，儘管還未能彌補汽車和鋼鐵業的結構性撤資。反循環投資也反應相對的報酬率。在這個意義上，對文化商品的大量生產或行銷的投資，是源自於娛樂產業。最後，至少對人口裡占有越來越高比例所得分額的最富裕階層而言，某些目前被視為基本的文化產品或服務的需求缺乏彈性，使得對文化資本的投資更有利可圖。由於對像米老鼠和米妮等受社會接受的文化象徵，需求依然很高，它們的供應透過授權協議、仿製產，與不同文化形式

(電視、電影、玩具、廣告)的複製而擴張。但文化資本的經濟效力可能也是個意象創造的課題。文化投資「篩檢」了服務業的投資。作為文化資本，迪士尼世界同時意味著立面的權力及權力的立面。

文化資本迴路是在真實空間裡形成，它們顯示了先進服務業經濟裡的空間實際上是如何構成。既非完全「生產主義的」、也不僅是「地方性的」，空間是由包含房地產開發、便利設施及服務，與視覺消費的資本迴路所結構，也結構這些迴路。一方面，文化資本和房地產開發間的連結使新經濟結構（如服務經濟、全球金融市場）得以**地域化**。另一方面，作為文化消費地景特定位址的選擇（例如市中心區、橘郡），呈現了這些經濟結構的**地理區位**。再者，建造主題樂園、主題城鎮和其他人造複合體（比如一座亞馬遜雨林），現在成了經濟振興的流行策略。由於無法吸引前台部門或後勤辦公室，某些城市利用廢棄的製造業場址作為它們邁向服務經濟的門道。

雖然雜誌在這個場景裡可能是瑣碎的環節，卻隨著其他大眾傳播手段在發展奠基於文化消費的新資本迴路上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例如，美國運通公司（American Express Company）在1980年代的最後幾年，購買了一些為特定地方市場而編製的「生活風格」雜誌，包括《洛杉磯風格》（*L.A. Style*）和《紐約仕女》（*New York Woman*），以及範圍較廣闊的《美食美酒》（*Food and Wine*）。美國運通的出版策略奠基於一項事實，即它的2,000萬信用卡持用者有七成住在美國的前20大城市。美國

運通董事長說：「我們要他們生活所在城市的雜誌。」「而且廣告端可以與我們的顧客建立關係。」一小群紐約市的富裕房地產開發商，最近同樣在城市裡購買或創辦了報紙。身為個體，他們表現的是一陣奇想、欲望、怪癖。但他們也是文化資本迴路裡的積極行動者，連結大眾傳播、地方服務經濟與房地產開發。¹⁰

文化消費的空間中介，影響社會階級間的利益再分配。我們見到伴隨土地、政治和企業菁英的行動，郊區的視覺均質性是在上層中產階級間鼓勵社會均質性的有用基礎。縉紳者和開發商藉由視覺消費手段而挪用中心空間的能力，具有排除低收入居民的實際效果。在納許維爾外圍建設迪士尼般的奧普里蘭（Opryland）建築群，而非在城市中心的老式大劇院（Grand Ol' Opry）〔譯按，專門現場演奏鄉村音樂〕的原始基地上更新和擴張，拖長市中心區的經濟危機。¹¹這類擴張雖然很可能造成縉紳化和公部門資助的都市更新的那種遷移，但依然剝奪了內城與新服務經濟有關的重要再開發計畫。但這意味了政治經濟施加於文化資本的一項重要限制。文化消費的策略只能補充資本積累的策略，而不能與其產生矛盾。

空間與市場

即使對經濟和文化組織十分重要，空間卻是個概念孤兒。地理學家宣稱對其擁有權利，但傳統上只描述空間，而將理論化拋在一旁。再者，因為空間沒有適當的概念化，超出事物位於何處

這種傳統地理描述的空間書寫，聽來就很「古怪」（spacey）。尤其是在文化社會學家之間，有關空間的寫作大多是文字遊戲，因為他們未能整合傅柯和布希亞的影響，與布勞岱（F. Braudel）的物質興趣。然而，最近有幾位作者的跨學科努力，嘗試將空間從相當模糊或靜態的範疇，轉變為一組動態、具歷史和經濟偶然性的關係。大衛·哈維提到要塑造一種唯物論的歷史地理學，查爾斯·蒂利（Charles Tilly）想寫一種有空間根據的歷史，而愛德華·索雅藉由「地理學の後現代化」指向一種社會決定的空間結構。以社會學來說，安東尼·紀登斯堅持空間和時間具有**結構化**（structuring）特質^[2]，既反映也影響個人和社會制度的價值與行為。¹²

268

在稍早的著作裡，城市作為密集、經濟專殊化與社會分化的空間，我稱它是「資本積累的基底」。¹³ 因為一座城市或任何其他空間反映了這些宏觀層次的經濟力量，比起其**結構化作用**（structuring），它更偏向於**被結構化**（structured）。在這個意義上，城市展現兩種不同類型的空間結構。一方面，它是全球經濟與社會力量的在地化。另一方面，它是世界資本主義秩序裡的

[2] 紀登斯為當代英國著名社會理論家，以「結構化理論」（structuration theory）聞名。他試圖解決社會學有關結構和能動性（agency）間的爭辯，主張結構具有雙元性（duality），亦即結構既是人類行動的限制，也促成（enable）人類行動；再者，人類透過日復一日的例行化實踐而持續複製結構。但這裡所謂時間和空間具有結構化特質，是指時間和空間並非消極被動的人類產物，而是具有塑造人類社會活動的積極作用。

一個節點或區位。但是，空間也結構了人群的感知、互動，以及幸福或絕望、歸屬或異化的感受。這種結構化的性質在建成環境裡可以最清楚地察覺（也最明顯可見），人們在此可以建造家園、對建築形式有所反應，並且創造（或摧毀）具個人或集體意義的地標。空間的結構化能力也顯現於地理區位，決定了鄰近性和便利性、土地價值和典型文化模式（例如南相對於北、都市相對於鄉間、山丘相對於山谷）。空間構成了市場經濟分化的物質形式。

空間也在隱喻層面發揮結構化的作用。因為它們很容易視覺化，空間變遷可以再現和結構社會的定位。空間激起記憶和欲望；它顯示範疇及它們之間的關係。這些考察指出了空間是個重要的**結構化媒介**（structuring medium）。20世紀政治經濟形勢的關鍵結構性轉變，座落於空間的象徵地理（例如陽光帶相對於霜凍帶、洛杉磯與邁阿密），並於探索經濟權力與文化再現之間關係的空間隱喻裡地域化：鋼鐵工業的自主性、生產性勞動的力量、住宅社區的社會均質性、經濟和文化權力的集中化，以及將集中化權力掩藏於感官「弱點」中的能力。由於地景是權力和想像的最重要產物，它也是我們時代的主要文化產物。

空間做為結構化媒介

政治經濟形式

文化形式

區位

象徵地理

在地化

空間隱喻

去工業化和縉紳化是同一個地景形構過程的兩面：遠離基本的生產空間與朝向消費空間移轉。我們通常從局部（亦即在地）的觀點看待這種過程。巴爾的摩瑞德·貝克（Red Baker）的鄰里淹沒於內港的開發中，將製造業到服務業的結構性轉變在地化。曼哈頓中心區、洛杉磯、邁阿密與威切斯特郡都重建或再開發為企業中心，將不同形式的全球金融力量在地化。然而，隨著個別地景的重新塑造，它們呈現的力量在地化，具有積聚的效果。一方面，多國公司、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投資的匯集，以及關注和評論它們現身的文化生產者，重塑城市和地方的世界階層。威切斯特郡成為備受喜愛的企業總部所在地，威爾頓和底特律則走下坡。另一方面，生產和消費地景間的轉變對社會空間結構有深遠的影響。威爾頓、底特律和揚克斯逐漸淡去成為陳舊的風土；曼哈頓中心區和鄰近的內城區則併入權力地景。迪士尼世界的大街濃縮了這個過程。它抽離出陳舊風土的意象，將它納入一種想像性的、更加微妙的經濟權力地景。

空間範疇的快速翻轉——從權力地景到風土，或從風土到權力地景——使我們的時代有種特殊的不穩定性。重要的是得強調這種空間範疇的翻轉，與其說是個人甚至群體移動的產物，不如說是社會與空間分化的經濟與文化策略，其結構性變遷結果。

我曾使用「臨界性」描述這些社會空間轉變的文化中介。在這裡的意思下，臨界性是指朝向任何人的經驗開啟的「無所屬之地」，但無法在缺乏導引下輕易理解。臨界空間界定城市或區域的象徵地理，橫跨且結合主要機構的影響力：公共與私人、文化

與經濟、市場與地方。隨著這種空間的社會意義經由結構變遷和個人行動而重新協商，臨界空間成為廣泛重組的隱喻，而在我們的時代裡，市場透過這種重組而侵蝕地方。在微觀的層次上，臨界性最清楚的反映於權力地景逐漸取代風土的過程。

270

霍斯金 (W. G. Hoskins) 的書《英國地景的創造》(*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Landscape*) 裡引人注意的兩幅插圖，顯示英國鄉村宅邸地景如何在 1650 至 1750 年間逐漸取代農村風土。到了 1709 年，貴族的鄉村宅邸 (劍橋郡的溫波 [Wimpole])，與農民住宅及田野的風土鄉間分離且有所差別，因其擁有精緻的景觀花園、小徑、附屬建築和訪客通往宅邸的正式林蔭道。與其他貴族領地一樣，宅邸原本是鄰接對其所在地擁有傳統權利的村落而建。但在 18 世紀期間，就像其他貴族地主，擁有溫波的家族決定改善該地的外觀。由於舊村落所在地干擾新的景觀配置，村落遭到拆毀，於庭院大門外重建。反之，在同一個時期，另一座鄉村宅邸依辛頓 (Easington) 只有局部與週遭鄉間風土有所區別。它缺少庭院和正式花園；它與村落農舍和一座浴羊槽之間，也沒有圍牆或林蔭道區隔。但是這個家族仍然展開了挪用風土空間的貴族文化策略，建造他們所屬社會階級的典型權力地景。誠如霍斯金所論：「只有三面草地區隔了宅邸和農民地景；但是在教區教堂和大宅之間的關係，以及新植的成排小樹上，還是可以明顯看到秩序的開端。」¹⁴

我們的 20 世紀地景所展現的強烈空間挪用模式也不遑多讓。從 1950 年到 1980 年，威切斯特郡的工業風土經過景觀化而

成為相對均質的企業總部區位，順應了當地的權力地景，由上流與中上階級的半鄉間住宅社區所構成。1970年代至1980年代之間，縉紳化佔用了被視為連貫的地方，將它們從工業「荒地」和「無法接近的」族裔聚居區，轉變為迎合富裕且教育程度高的中產階級、包括評論階層的市場。1980年代期間，奧蘭多／迪士尼世界的城郊地區，原本開發為虛構的主題樂園來迎合短暫的娛樂市場，卻成為真實、永恆地方的核心。

進一步的議程

這裡對經濟權力地景的研究，是其所屬時間和地方的文化產物。如果我在1980年代剛開始研究的時候撰寫，就會是有關去工業化熱烈辯論的一部分。在1980年代中期，它可能是針對雅痞揮舞的文化資本批判。然而在1985年之後寫作，我得以認識到服務業經濟龐大的影響力，也可以冷靜的強調消費的組織。

不過，研究者的社會和地理位置，也不是沒有矛盾。想像在工作了一天之後，你正要離開位於美國運通大樓18層的投資銀行辦公室，那是下曼哈頓世界金融中心裡，一棟新穎而傑出的後現代辦公大樓。你輕踩米黃色地毯，走過室內接待區，牆壁上排列著18世紀紐約港的圖像。電梯迅速將你往下送，通過數字標示的樓層，當你抵達大廳後，經過位於兩張櫃檯的先進電子安全系統。這些櫃檯有親切有禮但十分執著的人員持續值勤。

你和其他雇員一起穿越旋轉門和一扇玻璃門離開大樓：這些

雇員是穿細條紋服裝的年輕白種男性，穿著休閒服飾的更年輕黑人和女性，全都談論著一天裡發生的事情。你加入來自歐本海默（Oppenheimer）與道瓊（Dow Jones）大樓的更多人潮，走封閉的天橋穿越西街，你也一起穿過鋪上紫色地毯的世界貿易中心（World Trade Center）^[3]一號樓大廳。當你進入世界貿易中心的主廳，旁邊有商店、銀行和前往地鐵線的通道，人流已匯集成為一群移動大軍。一大群勞動力正於夜間要解散回家。這時候私人談話已經提高成為隆隆聲；它就像城市的咆哮，但因為在室內大廳而比較安靜。

你走過主廳，前往你的地鐵線。你走下一段階梯，經過一處有四名遊民睡在紙板箱封蓋上的平台，期待回家的旅程很短。

諸位讀者，我曾走過這個經濟權力的地景。

強調經濟的文化，顯示地景更為廣闊、擁有更深的根源，而且仰賴比政府所能控制者更多的相互連結。國家工業政策或地方對於經濟的控制，都無法掌握廣大的政治支持。即使在這些條件下，縉紳化與迪士尼世界都是顯著的未來模型，卻非無可避免。我們探察的地景指出了三種行動者，或可重塑工業資本主義的道德傳承：致力維持技術化勞動力的國家層級公共機構、替家戶經濟需求提供資金和專門技能的金融機構，以及串接技術創新、金

[3] 世界貿易中心為紐約著名的辦公建築群，以110層的雙子大樓為特色，由山崎實（Minoru Yamasaki）設計，於1972年落成。2001年9月11日，由於恐怖分子劫奪民航機攻擊而倒塌。

融專業和物質生產的更具流動性的企業。

西維吉尼亞州威爾頓的歷史，同時顯示地方自主性的力道和弱點。若沒能連結上全球市場，沒有任何傳統產業公司可以存活。由於威爾頓的收購沒有明顯的政府干預，這些連結就必須透過可以汲取新投資泉源的銀行家。別具意義的是，滋養威爾頓的地方支持來自居住或消費社區，而非僅奠基於工作的社區。這點強調我們必須認識到超越工業生產的新動員形式。再者，若沒有連結上在地與全球資本，「拯救」一個地方社區是行不通的。

麥克路斯鋼鐵顯示在工業撤資情況下生產性勞動的弔詭力量。經由遭其主要顧客汽車工業拋棄的生動案例，麥克路斯鋼鐵顯示城市或公司都無法在缺乏生產工作下存活。但是，缺乏來自金融機構的投資，兩度威脅麥克路斯鋼鐵的生存。出差錯的似乎是債權人的政治決策，而非像資金成本或比較利益這類「經濟」因素。這種情境唯有透過替代性的政治壓力才能對抗，在麥克路斯鋼鐵的例子裡，壓力來自工會和州政府。但是其他已經瀰漫空氣中的想法——例如汲取退休基金進入工業投資，或發展出新式的無表決權股票以防止投資客的財務攻擊——也該獲得認真檢視。未鎖定短期利得的潛在投資，雖然經常遭批評為「社會」投資，但麥克路斯鋼鐵的擔保債權人之間的合作應能提醒我們，**一切**投資都發生於社會脈絡中。對於接管交易或投資債券、房地產和高階消費的偏好，顯示特定欲望的社會化。這裡並未顯示投資資本有所缺乏。再者，以正面方式介入麥克路斯鋼鐵的是地方政治、金融和工會菁英的成員，他們無法將投資導引到其他可能關

閉的工廠。在這個案例裡，生產的意願決定投資的方向。

威切斯特郡顯示地方菁英可以補充國際經濟菁英的決策。企業總部的遷址令當地維持高房地產價值的欲望獲得新力量，而這需要壓抑工業生產。支持這項目標的菁英凝聚力，排除這些工業城鎮裡的非白人、非工會勞工與當地民選官員。與麥克路斯和威爾頓相反，引導威切斯特變遷的社會均質之抽象意象，排除既有人口中經濟最弱勢的一群。

縉紳化和迪士尼世界顯示了從消費角度重組空間的其他情景。它們仰賴文化與經濟之間，以及中產階級消費者和全球企業之間的明顯連結。但這些地方地景也遇到了投資、菁英支持和現有人口抵抗所引起的限制。縉紳化和迪士尼世界在任何情況下不是經濟成長的可行情景，還需要進一步檢視。它們意味了金融投資和文化生產的持續互動，而這可能導致兩種方向：服務業的更深刻社會根源與企業對視覺想像的更廣泛控制。

未來議程的主要焦點應該是**公共價值**的觀念，而這迄今為止是指為了環境品質而重組空間。自 1970 年代中期以來，規劃師和社區居民團體使用的公共價值觀念，指出在地景的自然與社會力量之間（建成空間與未建空間，或新的與舊的營造），應該有無可化約的最低均衡。藉由限制開發保有公共價值也是民主行徑，因為這容許成長由地方控制來節制。因此，公共價值並非無法與自我利益共存。雖然它回應了市場力量，但與私人價值不同，它也反映了地方的文化。¹⁵

一種公共價值的感受暗中塑造威爾頓的投資銀行家、支持麥

克路斯鋼鐵的密西根商業部，以及將奧提斯升降機工廠轉換為其他製造用途的港務局工業再發展計畫。在這些案例中，公共價值保留生產和消費之間的均衡，並發現工作地景是道德秩序的最佳基礎。由於它們各自的理由，捲入的行動者解決了博藍尼所描述的困境：亦即摧毀居住地以促進改良的困境。公共價值往往受困於私人價值。市中心區及威切斯特郡的大部分地區裡，菁英與富人合力排除那些無法跟上市場力量帶來的改良的人。在迪士尼世界和以類似風土意象為基礎的新住宅社區裡，改良明顯排拒了居住地的社會多樣性。在這些情況中，公共價值藉由排除來保障安全，以致地方文化屈服於市場價值。比起在工業地景裡，這在消費地景中顯然更加危險。

一個更具生產力且平等的經濟是否需要新的所有權形式或限制奢侈消費，依然跟熊彼得的時代一樣有爭議。但是它確實要求一種公共價值觀念，以驅使人們為了明智的長期目標運用投資，像是為大眾消費確保經濟根基。我們檢視的地景案例已經說明了不會出現突然解決這些議題的答案。地景是層層堆疊的；它們具有歷史和文化上的局限。它們總是顯示了權力的不對稱。我們受到這些文化再現的約束，即使是權力關係看似最自主（例如鋼鐵工業的歷史）、最矛盾（例如核心城市同時展開的貧困化和縉紳化）、最富狂想（迪士尼世界）的時刻。

資本銘刻於空間，肯定描繪出新的社會控制形式。但這些形式並未預先決定。「市場力量」包括社會與文化，還有經濟的因素。市場概念本身就是動態的。唯有作為直接交換所在地的市

場，它的意義才絕對清晰、毫無爭議，並受到空間和時間的限制。然而，就像這種原始的市場所在地，市場是由形成忠誠與改變方向的有意識行動者在社會層次上建構。他們可以從所有權和公共價值的角度重新定義市場文化的基礎。

275 這種改變並未處理議程的視角應該決定公共價值的議題。我們觀察的地景顯示，最佳情況是納入關鍵的行動者，最糟的則是排除和遷移弱勢者。不對稱性的基本問題影響地方機構如何能抵抗全球市場文化的要求。不只像汽車工廠這種生產空間，還有像速食連鎖店、購物中心和迪士尼世界這種消費空間，施加它們自身的規則於風土之上。當地景完全轉變為迎合消費的服務業經濟時，即使是社會想像（展望其他遠景的能力）也腐化了。儘管如此，辯論的條件已經改變。批評者無法再呼籲勞工階級拯救社會。勞工階級已過度分化，並且過度捲入消費而無法回應舊有的工業改革願景。我們也不能指望藝術家和建築師對抗經濟力量。他們也深深捲入市場生產而無法描繪另類出路。籲求地方社區產生變革也是個浪漫的想法。地方行動者一點也無法自主（即使他們曾經自主）。雖然他們意圖保留風土形式，最終卻經常是令自己緊緊依附權力地景。

從公共價值角度形成議程的問題是它很模糊，無法解決全國層次的議題，也不能處理權力的不平等。然而，藉由讓選擇變得明顯（像是喪失信譽的工業政策觀念），公共價值讓我們注意到，菁英如何脫離某種資本投資形式而轉移到其他形式的關鍵問題。再者，視其執行情況，公共價值還能促使以公民資格而非所

有權為基礎的發展目標討論。雖然這很類似經濟民主制，卻不帶任何保證。

過去 100 年來，市場文化強調消費基於公民資格。但美國與生俱來的民粹主義，樂於接受強調地方社區的政治，強調投資要給公民社會回饋而非給持股人財務報酬，以及企業要有扎根的義務。人們依然希望生活於特定地方。或許，這可以成為開啟另類市場文化的標誌。

第 1 章

- 1 Joseph Schumpeter,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1942]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2), p. 83 ; 黑體字為原文所加。
- 2 Joseph Schumpeter,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1934]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p. 156; Henry James, *The American Scene* [1907]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 102ff.
- 3 參見 Karl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Boston: Beacon Press, 1957)。
- 4 羅勃·藍恩 (Robert E. Lane) 詮釋最近美國針對這些主題所做的一份民意調查結果時指出：「鼓勵賺取是最好的，給予真正需要者還可接受；但是拿走，即使取自富人，也是不好的。」（參見"Market Justice, Political Justic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0 [1986]: 392）。
- 5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p.34.
- 6 Jean-Christophe Agnew, *Worlds Apart: The Market and the Theater in Anglo-American Thought, 1550-1750*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22-23.
- 7 同前註，p. 39。艾倫·麥克法蘭 (Alan Macfarlane) 在 *The Origins of English Individualis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一書中，主張具有土地和勞動市場以及大量地理和社會流動的市場社會，發生時間應該更早，大約在13世紀左右。
- 8 Fernand Braudel, *The Structures of Everyday Life* [1979], vol. 1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1), pp. 501-2, 引用時人塞巴斯提·梅西耶 (Sabastien Mercier) 的說法。
- 9 這段時期法國「市場文化」緩慢發展的相關討論，請參見William M. Reddy, *The Rise of Market Culture: The Textile Trade and French Society, 1750-19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 10 Lion Murard and Patrick Zylberman, *Le Petit Travailleur in-fatigable: Villes-usines, habitat et intimités au XIXe siècle*, 2d ed. (Paris : Recherches, 1976), p.

- 38。勞工史學家葛特曼 (Herbert Gutman) 對這項描述有不同角度的觀察，他指出如紐澤西州的派特森 (Paterson) 等小型工業城鎮 (相對於紐約或倫敦等大城市) 及其人口組成，使僱主的權力運用更明顯易見，也較難以對抗有組織的勞工 (*Work, Culture, and Society in Industrializing America* [New York: Knopf, 1976], pp. 257-58)。
- 11 近年來，這些過程啟發了一些重要的學術研究，內容結合社會階級、地方社區，以及地方和全國性政治組織。這些饒富趣味的研究中，對我影響最深的有：John Foster, *Class Struggle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Early Industrial Capitalism in Three English Towns*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74)，以及 Alan Dawley, *Class and Community: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Lyn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 12 Mark Granovetter, "Labor Mobility, Internal Markets and Job-Matching: A Comparison of the Sociological and the Economic Approaches," *Research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5 (1986): 3-39
- 13 "Changes in Labor Law Studied by Both Parties,"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4, 1986; "U.S. Panel Divided on Aiding Displaced Workers,"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2, 1987.
- 14 產品週期參見 Raymond Verno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in the Product Cycl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80 (1966): 190-207；利潤週期則參見 Ann Markusen, *Profit Cycle, Oligopoly,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85)。
- 15 有關地方政府對經濟發展漸增的積極態度，參見 Richard Child and Cynthia Negrey, "The Politics of Industrial Policy in Michigan," in *Industrial Policy: Business and Politic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France*, ed. Sharon Zukin (New York: Praeger, 1985), pp. 119-38；各項計畫相關討論，請參見："Funds and Jobs Pledged to Boston Students,"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10, 1986; "Boston Businesses Give a Future to the Young,"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14, 1986; "7 Cities Picked in Plan to Foster School Attendance," *New York Times*, April 18, 1987。
- 16 有關「昂貴的資產」，參見 Matthew Edel, Elliot D. Sclar, and Daniel Luria, *Shaky Palaces: Homeownership and Social Mobility in Boston's Suburbanization* (New York: Columbia Press, 1984)。有關將消費提升為

- 「物質利益的實質區分」起源的部分爭議，其概念闡釋可參見 Peter Saunders, "Beyond Housing Classes: The Soci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Private Property Rights and Means of Consump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8 (1984): 202-27, 以及 David Thorns,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and Change in the Labour and Property Markets in Britain,"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14 (1982): 745-63。
- 17 現代哲學思想與社會理論同樣不重視空間（或地理）而偏向時間（或歷史）。參見E. J. Soja, *Postmodern Geographies* (London: Verso, 1989); J. A. Agnew, "Devaluing Place: 'People Prosperity versus Place Prosperity' and Regional Planning,"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2 (1984): 35-46。
- 18 Wolfgang Schivelbusch, *The Railway Journey*, trans. Anselm Hollo (New York: Urizen, 1979), pp. 57-72; John R. Stilgoe, *Common Landscape of America, 1580-1845*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 28-29; 以及 Joshua Meyerowitz, *No Sense of Place: The Impact of Electronic Media on Social Behavio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 19 Wolfgang Schivelbusch, *The Railway Journey*, trans. Anselm Hollo (New York: Urizen, 1979), pp. 57-72; John R. Stilgoe, *Common Landscape of America, 1580-1845*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 28-29; 以及 Joshua Meyerowitz, *No Sense of Place: The Impact of Electronic Media on Social Behavio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 20 參見Neil Smith, *Uneven Development* (Oxford: Blackwell, 1984) 以及 "Deindustrialization and Regionalization: Class Alliance and Class Struggle," *Thirtieth North American Meetings of the Regional Science Association* 54 (1984): 113-28; Massey, *Spatial Divisions of Labor*。
- 21 大多數文獻都強調區域間的「均等化」，至於區域間漸增的異質性，參見 William W. Falk and Thomas A. Lyson, *High Tech, Low Tech, No Tech: Recent Industrial and Occupational Change in the South*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8)，有關西德請參見 Josef Esser and Joachim Hirsch, "The Crisis of Fordism and the Dimensions of a 'Postfordist' Regional and Urban Structur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13 (1989): 417-37。

- 22 Massey, *Spatial Divisions of Labor*, pp. 194-234.
- 23 Ann Markusen, Peter Hall, and Amy Glasmeir, *High Tech America* (Boston: Allen & Unwin, 1986), pp. 144-69.
- 24 Edward J. Malecki, "Technological Imperatives and Modern Corporate Strategy," in *Production, Work, Territory*, ed. Scott and Storper, pp. 67-79; Barry Bluestone and Bennett Harrison, *The Great American Job Machine: The Proliferation of Low Wage Employment in the U.S. Economy* (study prepared for the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U.S. Congress, 1986);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Per Capita Personal Income Widen in the 1980s* (August 20, 1987).
- 25 不過1987年之後，東西兩岸各州的住宅價格和政府稅收（包括個人所得稅收入）大幅減少，雖然失業率仍然低於國內其他各州。Democratic Staff,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U.S. Congress, *The Bi-Coastal Economic: Regional Patterns of Economic Growth during the Regan Administration* (July 9, 1986); Robert Kuttner, "Dukakis, Cuomo, and Other Egg-Spattered Faces," *Business Week*, December 4, 1989.
- 26 資本相對於社區：Barry Bluestone and Bennett Harrison, *The Deindustrialization of America*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2)；勞工或資本的再結構：Mark Goodwin and Simon Duncan, "The Local State and Local Economic Policy," *Capital & Class* 27 (Winter 1986): 14-36；生活空間相對於經濟空間：John Friedmann, "Life Space and Economic Space: Contradictions in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Crisis of the European Regions*, ed. Dudley Seers and Kjell Ostrom (London: Macmillan, 1983), pp. 148-62；人相對於地方繁榮：Agnew, "Devaluing Place"。
- 27 去工業化理論的具體代表是Bluestone and Harrison的 *The Deindustrialization of America*；反面論點可參見Robert Z Lawrence, "The Myth of U.S. Deindustrialization," *Challenge* (November-December 1983)，以及 "Is Trade Deindustrializing America? A Medium-Term Perspective," in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83); Richard B. McKenzie, *The Economics and Politics of Plant Closings* (San Diego: Pacific Institute, 1983)；以及後續的「工業政策」和「工業競爭力」論戰，參見Zukin, ed. *Industrial Policy*，有關去工業化的最小化，

- 參見William J. Baumol, "America's Productivity 'Crisis' : A Modest Decline Isn't All That Bad,"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5, 1987。有關美國多國企業透過其海外公司的出口，參見Robert E. Lipsey and Irving B. Kravis, "Sorting Out the Trade Problem: Business Holds Its Own as America Slips,"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8, 1987。有關資本投資並未萎縮的論點，參見Paul Craig Roberts, "Investment Is Fine – It's the Critics Who Are Wrong," *Business Week*, August 21, 1989。
- 28 這項架構類似於將地方定義為具歷史偶然性的社會和物質建構，參見Allan Pred, "The Social Becomes the Spatial, The Spatial Becomes the Social: Enclosures, Social Change and the Becoming of Places in Skane," in *Social Relations and Spatial Structures*, ed. Derek Gregory and John Urr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5), pp. 337-65。
- 29 雖然這是我對地景與風土的用法，仍可參考：John Brinckerhoff Jackson, *Discovering the Vernacular Landscap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 and "Urban Circumstances," *Design Quarterly* 128 (1985); D.W. Meinig, ed., *The Interpretation of Ordinary Landscap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Stilgoe, *Common Landscape of America*; Denis E. Cosgrove, *Social Formation and Symbolic Landscape* (London: Croom Helm, 1984); Daniel Miller, *Material Culture and Mass Consumption* (Oxford: Blackwell, 1987); Lester Rowntree, "Cultural/Humanistic Geography,"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10 (1986): 580-86; Denis Cosgrove and Stephen Daniels, eds., *The Iconography of Landsca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 30 參見Kenneth Clark, *Landscape into Art* [1949] (Boston: Beacon Press, 1961), pp.1-15; John Barrell, *The Idea of Landscape and the Sense of Place, 1970-1840: An Approach to the Poetry of John Cla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2), and *The Dark Side of the Landscape: The Rural Poor in English Painting, 1730-184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and Cosgrove and Daniels, eds., *Iconography of Landscape*。
- 31 "Repetition and singularity" from Rosalind E. Krauss, "The Originality of the Avant-Garde," in *The Originality of the Avant-Garde and Other Modernist Myths*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85), pp. 166。

- 32 E. P. Thompson, "Time, Work-Discipline, and Industrial Capitalism," *Past and Present* 38 (1967): 90; 強調為本文所加。傅柯 (Michel Foucault) 在以邊沁式敞視建築 (panopticon) 及19世紀監獄為焦點的刑罰建築歷史研究中，甚至更進一步指出地景的構成隱含著社會控制計畫。參見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1975], trans. Alan Sheridan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7); 比較 Christine Boyer, *Dreaming the Rational City: The Myth of American City Planning*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83)。
- 33 溫哥華部分，請參見 David Ley, "Liberal Ideology and the Post-industrial City,"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70 (1980): 238-58；有關矽谷的缺點，參見 AnnaLee Saxenian, "the Urban Contradictions of Silicon Valley: Regional Growth and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Semiconductor Indust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7 (1983): 237-62。
- 34 地景的改變啟發了許多相關研究，包括 Marshall Berman, *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82); T.J. Clark, *The Painting of Modern Life* (New York: Knopf, 1985); Stephen Kern, *The Culture of Time and Space, 1880-1918*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以及 Schievelbusch, *Railway Journey*。
- 35 Meinig, "Introduction," in *Interpretation of Ordinary Landscapes*, p. 6; Robert Venturi et al., *Learning from Las Vegas*, rev. ed.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77).
- 36 J.B. Jackson, "The Order of a Landscape," in *Interpretation of Ordinary Landscapes*, ed. Meinig, pp. 153-63.
- 37 J.B. Jackson, "The Order of a Landscape," in *Interpretation of Ordinary Landscapes*, ed. Meinig, pp. 153-63.
- 38 David Harvey, "The Geopolitics of Capitalism," in *Social Relations and Spatial Structures*, ed. Gregory and Urry, pp. 128-63。藉由建成環境的創造性破壞來重造資本的論述，是哈維著作中一再重覆出現的主題，也或許是最重要的主題。參見哈維的 *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 及 *Consciousness and the Urban Experience* (both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5)。
- 39 Meinig, "Symbolic Landscape," p. 183；有關大都會分散請參見 M. Gottdiener,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Urban Space* (Austin: University of

- Texas Press, 1985)；對大量生產及建成環境標準化的批判，參見Kenneth Frampton, "Towards a Critical Regionalism: Six Points for an Architecture of Resistance," in *The Anti-Aesthetic: Essays on Postmodern Culture*, ed. Hal Foster (Port Townsend, Wash.: Bay Press, 1983), pp. 16-30。
- 40 可參考對大量生產和地景標準化為數不多但日漸增加的批判文獻，例如E. Relph, *Place and Placelessness* (London: Plon, 1976), 和*The Modern Urban Landscape*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7)。比較Christine Boyer, "The City of Collective Memory" (unpublished essay, 1988)。有關「拯救」巴爾的摩鑄鐵立面所需技術，可參考下面這段公開支持：「紐約鑄鐵建築之友 (Friends of Cast iron architecture) 總裁瑪格·蓋爾 (Margot Gayle) 表示：『當這些建築不能繼續留在原地時，如何將其拆解並移至其他位址重新組合，樹立了一個全國性的重要典範』，該機構贊助巴爾的摩建築師大衛·萊特 (David G. Wright) 搶救該建築立面的行動」 ("A City Saves a Cast-Iron Façad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5, 1987)。
- 41 Daniel Bell, *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p. 37。
- 42 有部格外豐富的論文集，參見Bryan Robert, Ruth Finnegan, and Duncan Gallie, ed., *New Approaches to Economic Life / Economic Restructuring: Unemployment and the Social Division of Labor*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5)。另外，下列文獻組織這些資料的方式略有不同，參見Scott and Storper, eds., *Production, Work, Territory*。
- 43 摘自Scott and Storper, "Industrial Change and Territorial Organization," in *Production, Work, Territory*, ed. Scott and Storper, p. 310。

第 2 章

- 1 Fredric Jameson,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New Left Review*, no. 146 (July-August 1984): 53-93, esp. 89-92. 雖然這篇論文對我的後現代文化理解影響甚鉅，但我的詮釋有三個主要不同之處：否定先進資本主義具有內在的文化邏輯，而是尋找持續出現的模糊性和對立

性；強調現代主義的延續性而非不延續性，尤其是消費文化；否定詹明信認為後現代主義重視空間多於時間，一如現代主義重視時間多於空間的論點。

- 2 John Rajchman, "Postmodernism in a Nominalist Frame," *Flash Art* 137 (November-December 1987): 51。詹克斯 (Charles Jencks) 將後現代視覺形式定義為復古主義和「逼近的創造力」，並將不一致、多元主義、都市主義、擬人觀、諷刺、諷仿與「多重意義」等，都視為後現代的譬喻 (Jencks, *Post-Modernism: The New Classicism in Art and Architecture* [New York: Rizzoli, 1987])。狹義的後現代主義一詞早在1930年代即已使用；在1960年代時開始在紐約的藝術家和評論家間通用，以指涉發達現代主義 (high modernism) 的枯竭或制度化。
- 3 Joseph Giovannini, "Design Notebook," *New York Times*, March 12, 1987。不過，在此同時，後現代建築注重修飾、彈性和色彩，也使鋼鐵和花崗岩之類建材再度風行。Thomas Fisher, "P/A Technics: The Use of Steel," *Progressive Architecture*, July 1987: 100-105; Albert Scardino, "New Look in Skyscrapers Revives Quarries," *New York Times*, August 5, 1987。
- 4 "Post-Modernism Hits the Road," *Architectural Record*, June 1985, p. 79。
- 5 參見Edward Relph, *Place and Placelessness* (London: Plon, 1976)，以及 *The Modern Urban Landscap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7)。
- 6 「抵抗和……反動的後現代主義」擷自Hal Foster, "Postmodernism: A Preface," in Foster, ed., *The Anti-Aesthetic: Essays on Postmodern Culture* (Port Townsend, Wash.: Bay Press, 1983), p. xii。本處的討論並未包含女性主義和反軍國主義。
- 7 參見Marshall Berman, *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82); Stephen Kern, *The Culture of Time and Space, 1880-1918*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Wolfgang Schivelbusch, *The Railway Journey*, trans. Anselm Hollo (New York: Urizen, 1979)。
- 8 T. J. Clark, *The Painting of Modern Life* (New York: Knopf, 1985), p. 49。
- 9 分化為當代社會的關鍵社會學議題，參見下列兩種不同取向：Niklas Luhmann, *The Differentiation of Society*, trans. Stephen Holms and Charles Larmo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以及Pierre Bourdieu,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trans. Richard Nic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 10 透納在許多不同著作中都曾論及臨界，例見 "Liminal to Liminoid, in Play, Flow Ritual: An Essay in Comparative Symbology," in *From Ritual to Theatre* (New York: Performing Arts Journal Publications, 1982), pp. 20-60。此外也可參見前文第一章。
- 11 John Updike, *Rabbit Is Rich* (New York: Knopf, 1981).
- 12 Don DeLillo, *White Noise* (New York: Viking, 1985)；正文括弧內頁碼為本引用版本的頁碼。
- 13 Robert Ward, *Red Baker* (New York: Dial Press, 1985)；正文括弧內頁碼為本引用版本的頁碼。
- 14 Jay McInerney, *Bright Lights, Big City* (New York: Vintage, 1984)；正文括弧內頁碼為本引用版本的頁碼。
- 15 Tama Janowitz, *Slaves of New York* (New York: Crown, 1986); Adam Gopnik, "The Blue Room," *New Yorker*, February 23, 1987, pp. 34-38.
- 16 Brett Easton Ellis, *Less than Zero*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85)；正文括弧內頁碼為本引用版本的頁碼。Nathanael West, *The Day of the Locust* [1939] (New York: Farrar, Straus, 1957).
- 17 William Sharpe and Leonard Wallock, "From 'Great Town' to 'Nonplace Urban Realm': Reading the Modern City," in *Vision of the Modern City: Essays in History, Art and Literature*, ed. Sharpe and Wallock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7).
- 18 Frederick Barthelme, *Moon Deluxe*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83)；正文括弧內頁碼為本引用版本的頁碼。

第 3 章

- 1 參見David Harvey,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Oxford: Blackwell, 1989), pp. 210-307。哈維明顯樂於將文化因素帶入馬克思主義分析，這也讓如何整合美學與政治經濟、文化和資本成為一個迫切問題。
- 2 依透納的觀點，臨界性只存在於社會分類穩定的前工業社會，肯定也是

- 前資本主義的社會。先進市場經濟中的男女可能會選擇某種政治、專業或藝術的臨界性或邊緣性；透納稱這種現像為類臨界（liminoid）狀態。渥特·班雅明部分，參考Susan Buck-Morss, *The Dialectics of Seeing: Walter Benjamin and the Arcades Project*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89)。
- 3 參見T. J. Clark, *The Painting of Modern Life* (New York: Knopf, 1985), ch. 1; David Harvey, *Consciousness and the Urban Experienc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5); Mark Gottdiener, *The Social Production of Urban Space*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5), John R. Logan and Harvey Molotch, *Urban Fortune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lace*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另一方面，甘斯（Herbert Gans）則極力反對以經濟化約論解釋社會—空間結構；例見 'American Urban Theory and Urban Areas,' in *Cities in Recession*, ed. Ivan Szelenyi (Beverly Hills, Sage, 1984), pp. 278-307。
 - 4 參見Fredric Jameson,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New Left Review*, no. 146 (July-August 1984): 53-93；這些議題在 Logan and Molotch 的 *Urban Fortunes* 一書中亦曾簡要討論。
 - 5 David Harvey, "Flexible Accumulation through Urbanization: Reflections on 'Post-Modernism' in the American City," in *The Urban Experience* (Oxford: Blackwell, 1989); cf. Logan and Molotch, *Urban Fortunes*, ch.4 and "Postscript: More Market Forces," in Sharon Zukin, *Loft Living: Culture and Capital in Urban Change*, 2d ed.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89).
 - 6 參見William Severini Kowinski, *The Malling of America*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1985)。Beth Mintz及Michael Schwartz寫到：「只有金融機構有可能理解郊區化的意涵，雖然只是一知半解並加以配合及規劃、雖然並不完美。」（*The Power Structure of American Busines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5], p. 43）。
 - 7 Joseph Giovannini 指出：「根據時尚專家，過去十年來，義大利公司已整合米蘭的設計、紡織和生產資源，而且各家義大利精品公司的規模雖然都不大，卻是更大的世界性組織運作的一部分」，參見 "The 'New' Madison Avenue: A European Street of Fashion," *New York Times*, June 26, 1986；另見 Richard J. Meislin, "Quiche Gets the Boot on Columbus Avenue,"

- New York Times*, July 25, 1987。
- 8 Lisa Belkin, "Benetton's Cluster Strategy," *New York Times*, July 25, 1987.
 - 9 班尼頓近年來開始跨足金融服務業，建立自己的通路網絡，但這個基礎衍生不少問題。有關班尼頓的發展史，參見Andrea Lee, "Profiles: Being Everywhere (Luciano Benetton)," *New Yorker*, November 10, 1986，以及 "Why Some Benetton Shopkeepers Are Losing Their Shirts," *Business Week*, March 14, 1988；麥當勞的發展請參見 "McWorld?" *Business Week*, October 13, 1986，以及 Joseph K. Skinner, "Big Mac and the Tropical Forests," *Monthly Review*, 37, no. 7 (December 1985): 25-32。
 - 10 極端的「民粹主義式」陳述如 Robert Venturi, *Complexity and Contradiction in Architecture*, rev. ed. (New York: Museum of Modern Art, 1977) 和 Venturi et al., *Learning from Las Vegas*, rev. ed.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77)。經由建築來追求企業獨特性，請參見 Stephen Kieran, "The Architecture of Plenty: Theory and Design in the Marketing Age," *Harvard Architecture Review* no. 6 (1987): 103-13。
 - 11 Ron Durcker 於波士頓的研討會，"Was Postmodernism the Heir to the Preservation Movement? What Will Come Next?" 引用於"Preservation and Postmodernism: A Common Cause?" (editorial), *Architectural Record*, June 1987, p.9；Ada Louise Huxtable, "Creeping Gigantism in Manhattan," *New York Times*, March 22, 1987。另見 Adrian Forty, *Objects of Desire: Design and Society from Wedgwood to IBM*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7)。
 - 12 除了日本人，獎盃建築的主要外國投資客還包括英國人、荷蘭人和西德退休基金。"Real Estate Trophy Hunt," *New York Times*, August 23, 1987。花旗參見 *Business Week*, April 3, 1989；通用食品 (General Foods) 大樓參見 *New York Times*, August 19, 1987。
 - 13 Robert A. M. Stern et al., *New York 1930: Architecture and Urbanism between the Two World Wars* (New York: Rizzoli, 1987), pp. 511-13.
 - 14 Calvin Tomkins, "Forms under Light," *New Yorker*, May 23, 1977, pp. 43-80.
 - 15 參見Douglas C. McGill, "Taking a Close Look at the Art of Post-Modernist Architects," *New York Times*, August 31, 1987，以及1988年以後如 *Vogue*和 *Elle*等時尚雜誌的任何一期。有些建築史著作銷路相當不錯，例如 Witold Rybcynski, *Home: A Short History of an Idea* (New York: Viking, 1986)，

- 以及Tom Wolf, *From Bauhaus to Our House* (New York: Farrar, Straus & Giroux, 1981), 但一般人對建築現況的知識仍明顯貧乏 ("Cultural Blindspot," *Progressive Architecture*, July 1987, p. 7)。
- 16 H. I. Brock, "From Flat Roofs to Towers and Slats,"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April 19, 1931, pp. 6-7, 16, 引用於Stern et al., *New York 1930*, p. 515; 另見 Kieran, "Architecture of Plenty"。
 - 17 市府規劃局長表示：「我們（在重建舊金山市中心時）未曾預見的，是徵求全國性事務所且不冒任何建築風險竟成為一種潮流。」（*New York Times*, December 5, 1987）。亦可參見Paul Goldberger, "Architecture View: A Short Skyscraper with a Tall Assignment," *New York Times*, March 26, 1989。
 - 18 該名建築師繼續說：「波士頓、後灣（Back Bay）和紐柏利街（Newbury）的特徵，並不存在於巨星級建築師蓋的那些大而無當建築。我們波士頓人非常謹慎（非常洋基）。我們對巨星級建築師已經蓋好……和正在興建的建築……以及他們在其他城市和國家平行進行中的各計畫所給予的設計時間，頗感疑慮。我們得提防有更多稀釋的、時髦的、誇張的，但永遠無法成為波士頓的『波士頓』建築。」（George E. Marsh, Jr., "Lettersw," *Architectural Record*, May 1987, p.4）。然而大致來說，波士頓（及舊金山）的都市規劃主管機關對於投機式過度建設的反應，已比其他城市強硬得多。
 - 19 Giorgio Vasari, *Lives of the Artists* [1550, 1568] (London: Penguin Books, 1965), p. 169.
 - 20 「他們說在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最珍貴的資產，是那些高知名度無可取代的電視新聞報導名人」（Alison Leigh Cowan, "Tisch is Holding a Hot Potato," *New York Times*, March 14, 1987）；CBS唱片總裁艾爾·泰勒（Al Teller）說：「超級巨星是巨大的意外之財。最重要的是仔細鋪設巨星的事業道路，那會是你最大的勝利。」（Geraldine Fabrikant, "A Long and Winding Road: Band's Quest for Stardom," *New York Times*, July 31, 1987）。反之，隨著獲利下降，許多華爾街金融公司開除他們的超級巨星或高營收創造者，將權力重新轉移給傳統經理人（"The Decline of the Superstar," *Business Week*, August 17, 1987, pp. 90-98）。
 - 21 Stern et al., *New York 1930*, pp. 19, 513-14, 引言出自營造商 William

- A. Starrett (1928), pp. 513-14. Henry James, *The American Scene* [1907] (Bloomington, Indian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 83-84. Andrew Saint認為芝加哥自1870年代起，因商業週期及火災事件而不斷反覆重建的過程，產生積極強勢的營建業及一批商業導向的建築師，如「某位法國觀察者所言『厚顏無恥地接受投機客開出的條件』」（Saint, *The Image of the Architec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84），建築師之間的美式市場競爭想必讓法國來的訪客大驚失色，在那兒大部分建築案都由公立的法國美術學院（Ecole des Beaus Arts）關係網包辦。
- 22 普曼引於Joseph Giovannini, "Westweek, Star-Studded Los Angeles Design Event," *New York Times*, April 2, 1987. 另見Anne-Marie Schiro, "Lacroix: Meteor of Constant Star?" *New York Times*, April 22, 1988.
- 23 Catherine W. Zerner, "The New Professionalism in the Renaissance," in *The Architect*, ed. Spiro Kostof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158.
- 24 比較Stuart Ewen, *All Consuming Images: The Politics of Style in Contemporary Cultur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8)。設計草圖或原型在過世後轉化成大眾市場產品的普遍程度，已到達某種荒謬的極致，參見Joseph Giovannini的報導："Marketing Frank Lloyd Wright," *New York Times*, March 24, 1988。
- 25 "The Prisoner of Seventh Avenue [Halston],"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March 15, 1987, pp. 16ff.; Michael Gross, "In Search of the Perfect Angel," *New York Times*, August 30, 1987; Bob Colacello, "The Power of Pierre," *Vanity Fair*, September 1987。但是在較低層的設計專業中，受僱員工可能會因專業自主受到限制而惱怒，參見Maevie Slavin, "Interiors Business: Jobs Are Not What They Used to Be," *Interiors*, September 1983, pp. 130-31。
- 26 Debora Silverman, *Selling Culture: Bloomingdale's, Diana Vreeland, and the New Aristocracy of Taste in Reagan's America*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6), p. 11。另見Fred Ferretti, "The L.A. Spirit' Makes a Splash in Brooklyn," *New York Times*, April 19, 1985; Cathleen McGuigan, "The Avant-Garde Courts Corporations,"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November 2, 1986。
- 27 貨幣中心銀行在費紐爾中心開工前，承諾提供2000萬美元長期貸款及1000萬元短期貸款，但這些貸款的前提是波士頓金融機構必須同時投資300萬元（*Fortune*, April 10, 1978, pp. 85-91，引自Mintz and Schwartz,

- Power Structure of American Business*, p. 61)。有關歷史保存作為美學典範及重建策略的討論，請參見 Zukin, *Loft Living*, pp. 75-78。
- 28 Stephen Kern, *The Culture of Time and Space, 1880-1918*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187-91; Wolfgang Schivelbusch, *The Railway Journey*, trans. Anselm Hollo (New York: Urizen, 1979), pp. 161-69.
- 29 Robert Thorne, "Places of Refreshment in the Nineteenth-Century City," in *Buildings and Society*, ed. Anthony D. King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0), pp. 228-53; Gunther Barth, *City People: The Rise of Modern Culture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Rosalind H. Williams, *Dream Worlds: Mass Consumption in Late Nineteenth-Century France*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2); Susan Porter Benson, *Counter Culture: Saleswomen, Managers and Customers in American Department Stores, 1890-1940*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6); James, *American Scene*, pp. 102-6.
- 30 Jameson, "Postmodernism," pp. 81, 82.
- 31 James, *American Scene*, pp. 440-41.
- 32 參見 Dennis R. Judd, "Electoral Coalitions, Minority Mayors, and the Contradictions in the Municipal Policy Agenda," in *Cities in Stress: A New Look at the Urban Crisis*, ed. M. Cottdiener, *Urban Affairs Annual Reviews* 30 (1986): 145-70; Larry Bennett, "Beyond Urban Renewal: Chicago's North Loop Redevelopment Project," *Urban Affairs Quarterly* 22 (1986): 242-60; Chester Hartman, *The Transformation of San Francisco* (Totowa, N.J.: Rowman & Allenheld, 1984).
- 33 Jeffrey R. Henig, "Collective Responses to the Urban Crisis: Ideology and Mobilization," in *Cities in Stress*, ed. Cottdiener, p. 243.
- 34 Silverman, *Selling Culture*, p. 19.

第 4 章

- 1 Edward Greer, *Big Steel: Black Politics and Corporate Power in Gary, Indiana*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9), pp. 72-89.

- 2 引述摘自Francis G. Couvares, *The Remaking of Pittsburgh: Class and Culture in an Industrializing City, 1877-1919*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4), p. 86 ; 鋼鐵業工匠部分, 參見David Brody, *Steelworkers in America: The Nonunion Er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David Montgomery, *The Fall of the House of Labo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ch. 1 。
- 3 Horace B. Davis, "Company Towns,"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New York: Macmillan, 1931), 4:119-23.
- 4 Greer, *Big Steel*, p.63.
- 5 紅河廠區的設計和使用, 取代早期福特在高地公園 (Higland Park) 的生產線, 相關討論參見 David A. Hounshell, *From the American System to Mass Production, 1800-1932*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267-68 。
- 6 參見 *LIFE: The First Decade* (New York: Time, 1979); *Precisionist Perspectives: Prints and Drawings* (New York: Whitney Museum of American Art at Philip Morris, 1988); *Charles Sheeler* (New York: Whitney Museum of American Art, 1988); Vicki Goldberg, *Bourke-White* (New York: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Photography, 1988) 。
- 7 沙特爾教堂及紅河廠區照片參見 *Charles Sheeler* ; 交《浮華世界》發表一事, 參見 Mary-Jane Jacob, "The Rouge in 1927: Photographs and Paintings by Charles Sheeler," in *The Rouge: The Image of Industry in the Art of Charles Sheeler and Diego Rivera* (Detroit: Detroit Institute of Arts, 1978), pp. 13-14 。
- 8 Linda Down, "The Rouge in 1932: The *Detroit Industry* Frescoes by Diego Rivera," in *The Rouge: The Image of Industry in the Art of Charles Sheeler and Diego Rivera*, p. 72.
- 9 Couvares, *Remaking of Pittsburgh*, ch. 7.
- 10 以每十年為期的鋼鐵工業與聯邦政府衝突的說明, 參見 Paul A. Tiffany, *The Decline of American Steel*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
- 11 地方政府和地方菁英也有類似的自主性問題, 尤其是在地方政府試圖實施本身偏好的經濟成長策略時, 所承受各種限制。例見Simon Duncan, Mark Goodwin, and Susan Halford, "Policy Variations in Local States: Uneven Development and Local Soci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 Regional Research* 12 (1988): 107-28，或John Logan and Harvey Molotch, *Urban Fortune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 12 Henry W. Broude, *Steel Decisions and the National Econom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3), p. 21.
 - 13 這些數據指涉的是高爐和基本鋼鐵製品工人，摘自Richard Belous, *Employment and Compensation in the U.S. Steel Industry: Problems and Prospects* (Washington, D.C.: Library of Congres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1984), p. 5。摘自《商業周刊》(*Business Week*)的定期性就業數據則有不同。
 - 14 關於小型工場，參見Charlotte Breckenridge and David J. Cantor, *Regional Aspects of Shifts in the Steel Industry in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 Library of Congres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1983); Zoltan J. Acs, *The Changing Structure of the U.S. Economy: Lessons From the Steel Industry* (New York: Praeger, 1984), pp. 98ff.; Jonathan P. Hicks, "Nucor's Ambitions Expansion," *New York Times*, June 30, 1986; "U.S. Minimills Launch a Full-Scale Attack," *Business Week*, June 13, 1988, pp. 100-102。
 - 15 *Business Week*, September 19, 1977。有關英國經濟學家與即使違背事實，卻堅持認定鋼鐵在美國經濟中扮演關鍵結構性角色的論點，參見Broude, *Steel Decisions and the National Economy*, esp. pp. 29ff。Broude指出：在某些「條件下……有時候經濟無法及時脫離該項產業的策略性結構位置，或付出得以忽視產業內變化的代價」(p. 3)。此外，雷諾·班漢(Rayner Banham)則認為歐洲建築師如科比意等，意圖神話化(而非複製)美國的工業結構形式，參見Rayner Banham, *A Concrete Atlantis: U.S. Industrial Building and European Modern Architectur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86)。
 - 16 Robert W. Crandall, *The U.S. Steel Industry in Recurrent Crisis*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81), p. 125.
 - 17 艾森豪和甘迺迪政府，以及民主黨主導的國會施予鋼鐵業的壓力，參見Gardiner C. Means, *Pricing Power and the Public Interest* (New York: Harper, 1962); Broude, *Steel Decisions and the National Economy*；以及Tiffany, *Decline of American Steel*。

- 18 鋼鐵業減少產能的歷史性企圖及其對多角化經營的排斥，參見 Tiffany, *Decline of American Steel*。
- 19 參見 Linda Brewster Stearns, "Capital-Market Effects on External Control of Corporations," in *Structures of Capital: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the Economy*, ed. Sharon Zukin and Paul DiMaggio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175-201; Crandall, *U.S. Steel Industry in Recurrent Crisis*, pp. 28-30; Tiffany, *Decline of American Steel*, pp. 139ff., 引述出自 Iron Age, p. 180; Acs, *Changing Structure of the U.S. Economy*, pp. 174ff.
- 20 Tiffany, *Decline of American Steel*, pp. 134, 181; Crandall, *U.S. Steel Industry in Recurrent Crisis*, pp. 81ff.
- 21 Broude, *Steel Decisions and the National Economy*, pp. 110ff.
- 22 參見 *Business Week*, Jun 23, 1975, September 17, 1979, February 25, 1985.
- 23 Achs, *Changing Structure of the U.S. Economy*, p. 93; Crandall, *U.S. Steel Industry in the Recurrent Crisis*, pp. 34-38, 83.
- 24 進口、就業和每小時工資數據來自 Crandall, *U.S. Steel Industry in the Recurrent Crisis*；亦見 Belous, *Employment and Compensation in the U.S. Steel Industry*。獲利率數據出自 World Steel Dynamics, "Financial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Steelmakers," 引自內陸鋼鐵公司 (Inland Steel Company) 董事長 Frank W. Luerssen 代表美國鋼鐵協會 (American Iron and Steel Institute) 於美國參議院勞工暨人力資源委員會下的就業與生產力委員會會議中的聲明，見 *Employment and Productivity Trends in the Steel Industry*, 98th Congress, 2d sess., March 22, 1984, p. 91。
- 25 日本鋼鐵生產區的問題，可參見 Steve Lohr, "Critical Shift for Japan's Steel," *New York Times*, March 20, 1984；法國部分，參見 Sharon Zukin, "Markets and Politics in France's Declining Regions," *Journal of Policy Analysis and Management* 5, no. 1 (Fall 1985): 40-57, 或 Alan David Stoleroff, "Deindustrialization in Nord-Pas-de-Calais: The Restructuring of Capital and the Disorganization of Traditional Working-Class Community" (Ph.D. diss., Rutgers University, 1983)。
- 26 觸發價格試圖以高效率日本製造商於產能接近飽合時的成本為基準，建立一個「公平」價格。這個方法意在避開有關外國業者以低於生產

- 價格對美國市場「傾銷」鋼鐵的無窮爭論，同時希望將其對消費者價格的衝擊減至最小。觸發價格是由卡特政府時的財政部長安東尼·索羅門（Anthony Solomon）手下一個團隊所設計，有關這項措施背後的策略細節，請參見 Crandall, *U.S. Steel Industry in the Recurrent Crisis*。商業部、HUD和白宮顧問群之間的歧見，可參見下列關廠個案研究，David Bensman and Roberta Lynch, *Rusted Dreams: Hard Times in a Steel Community* (New York: McGraw-Hill, 1987)，以及 Staughton Lynd, *The Fight against Shutdowns: Youngstown's Steel Mill Closings* (San Pedro: Singlejack Books, 1982)。
- 27 這類連篇指責和責任歸屬在每個國家再度大致相同。參見 Ira Magaziner and Robert B. Reich, *Minding America's Busines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82); Tony Manwaring, "Labour Productivity and the Crisis at BSC: Behind the Rhetoric," *Capital and Class* 14 (Summer 1981): 61-97; Michael Schwartz and Sharon Zukin, "De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France: Structural Convergence, Institutional Contrast," *Political Power and Social Theory* 7 (1988): 293-320.
- 28 *Business Week*, June 23, 1975。即使是「理性的」批評者，對鋼鐵業者在1970年代前的多角經營決心也各有不同看法。Peter Brantly and Michael Schwartz, "Intercorporate Power and the Decline of the Steel industry" (1988年亞特蘭大美國社會學學會年會發表論文) 援用Achs, *Changing Structure of the U.S. Economy*中對鋼鐵業的這項批判，但文中也強調鋼鐵業者面對金融業界的壓力。
- 29 *Wall Street Journal*, July 22, 1980, p. 1。洛夫的背景也可參見 "National Intergroup: How Pete Love Went Wrong," *Business Week*, March 6, 1989。
- 30 參見 Schwartz and Zukin, "De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France"一文中的討論和引用的商業報導文獻。
- 31 National Steel Corporation, *Annual Report*, 1981 (Pittsburgh); *Moody's Industrial Manual* (New York: Moody's, 1982).
- 32 *New York Times*, January 31, May 20, May 21, May 25, May 28, June 12, August 6, August 2, Sept 12 and October 23, 1985; *Wall Street Journal*, June 6 and August 12, 1985.
- 33 雖然1970年代期間不時有些與鋼鐵危機有關的報導，包括 "Steel's Sea of

- Troubles" (September 19, 1977), 但第一篇形容結構性危機的文章 "Big Steel's Liquidation", 出現在1979年9月17日的《商業週刊》。
- 34 對大湖區鋼鐵業較樂觀的診斷, 參見 Crandall, *U.S. Steel Industry in Recurrent Crisis*, pp. 140-46。
- 35 參見 Terry F. Buss and F. Stevens Redburn, *Shutdown at Youngstown*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3), 以及 Schwartz and Zukin, "De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France" 引用的參考文獻。
- 36 有意思的比較, 請參見 David C. Perry, "The Politics of Dependency in Deindustrializing America: The Case of Buffalo, New York," in *The Capitalist City*, ed. Michael Peter Smith and Joe R. Feagin (New York: Blackwell, 1987), pp. 113-37。
- 37 參見 Robert B. Reich and John D Donahue, *New Deals: The Chrysler Revival and the American System* (New York: Times Books, 1985), 以及 Davita Silfen Glasberg, "Chrysler Corporation's Struggle for Bailout: The Role of the State in Finance Capitalist Society," *Research in Political Sociology* 3 (1987): 87-110。
- 38 這是我閱讀 Lynd, *The Fight against Shutdowns* 書中敘述時的個人理解, 尤其是有關威爾頓的部分。
- 39 Bensman and Lynch, *Rusted Dreams*。Greer, *Big Steel*, 比較蓋瑞 (Gary) 新當選的黑人官員及以白人族裔社區為主的舊政治機制, 後者數十年來都不願意正視美國鋼鐵公司造成的空氣和水污染問題。
- 40 Lynd, *Fight against Shutdowns*, p. 164.
- 41 除了後文註釋引用的出版文獻外, 我對威爾頓收購行動的資訊和詮釋, 反映了我於1983年7月至1984年10月間對事件參與人士的訪問: 來自拉扎德銀行的投資銀行家、麥肯錫公司管理顧問, 以及紐約威奇法爾律師事務所的律師; 威爾頓地方工會主席及工會律師; 俄亥俄州斯圖本維基層勞工反對派領袖; 以及一家參與底特律ESOP貸款計畫的商業銀行。所有受訪者都獲得不透露姓名的保證。
- 42 「威爾頓工賊」引自 Terry Dodsworth, "Weirton Steel: A Cooperative Effort at Resurrection," *Financial Times*, September 11, 1985; 另見 Jonathan Prude, "ESOP's Fable: How Workers Bought the Steel Mill in Weirton, West Virginia, and What Good It Did Them," *Socialist Review* 78 (November-December

- 1984): 27-60 ; Mary Williams, "The Weirton Steel That Was and May Yet Be," *Progressive*, November 1982, pp. 30-36; *New York Times*, March 14, 1983; Jeffrey Leites,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the Legitimation of Authority in Southern Mill Towns," *Social Problems* 29 (1982):540-50.
- 43 David Radick 根據美國威爾頓—斯圖本維標準都會統計區 (SMSA) 人口普查資料計算而得。
- 44 *New York Times*, June 8 和 July 4, 1982, 以及訪談。
- 45 參見Prude, "ESOP's Fable"; Peter Pitegoff and Staughton Lynd, "Workers Can Be Choosers," op-ed pag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7, 1982; Joyce Rothschild-Whitt, "Worker Ownership: Collective Response to an Elite-Generated Crisis," *Research in Social Movements, Conflict and Change* 6 (1984): 167-94; Raymond Russell, "Using Ownership to Control: Making Workers Owners in the Contemporary United States," *Politics and Society* 13 (1984):253-94; "A Coming Surge in ESPOs," *New York Times*, January 6, 1985.
- 46 參見 Felix Rohatyn, *The Twenty-Year Century: Essays on Economics and Public Finance*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4)。
- 47 市場狀況的資料來源，除訪談外，還包括 Weirton Joint Study Committee, Inc., Weirton Steel Corporation, *Disclosure Document Regarding the Acquisition of the Assets of the Weirton Steel Division from National Steel Corporation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Weirton Steel Corporation Employment Stock Ownership Plan (ESOP)* (Weirton, West Virginia, August 19, 1983), pp. 27-29, 以及Williams, "The Weirton Steel That Was and May Yet Be"。
- 48 Joint Study Committee, *Disclosure Document*, p.17.
- 49 "Making Money – and History – at Weirton," *Business Week*, November 12, 1984, pp. 136-40; Dodsworth, "Weirton Steel," *Financial Times*, September 11, 1985; "Has Weirton's ESOP Worked Too Well?" *Business Week*, January 23, 1989;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6, 1989.
- 50 "At National Intergroup, the Choice May be Love or Money," *Business Week*, July 11, 1988;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1, 1988; "National Intergroup: How Pete Love Went Wrong," *Business Week*, March 6, 1989; "Japan's NKK

Buys More of National Steel," *New York Times*, April 26, 1990.

- 51 1976年《商業週刊》報導，斯圖本維居民抗議威爾頓的空氣汙染是心臟病和支氣管炎病例增加的主因，這項抗議是在極不情願的情況下提出，因為鋼鐵工業使該地區失業率維持在6%以下（February 2, 1976）。
- 52 *Wall Street Journal*, October 18, 1984; *New York Times*, March 31, 1985.

第 5 章

- 1 失業資料引自大都會事務公司（Metropolitan Affairs Corporation），報導於*Detroit Free Press*, June 30, 1988，以及美國勞工部，刊於*New York Times*, August 3, 1988。
- 2 底特律政治經濟的歷史背景，參考Richard Child Hill, "Uneven Development in Metropolitan Detroit," ch. 2 in Joe T. Darden et al., *Detroit: Race and Uneven Development*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87)，以及Sheldon Friedman and Leon Potok, "Detroit and the Auto Industry: An Historical Overview" (paper delivered at a Conference on Economic Crisis and Political Response in the Auto City: Detroit and Turin, Harvard University, Center for European Studies, 1981)。
- 3 Jeffrey A. Leib, "Steelmakers Listen to Detroit," *New York Times*, August 8, 1985; "The Steelworkers Are Getting Desperate," *Business Week*, December 30, 1985; "Steelmakers Are Running Out of Options," *Business Week*, June 23, 1986; *McLouth Steel Corporation* (New York: Lazard Frères, 1982).
- 4 除某些罕見出版品外，麥克路斯的資訊都引自我執行的兩波訪談。1982年至1984年破產重組後，我在底特律、紐約市與華盛頓特區，訪談麥克路斯的執行長、企業律師和投資銀行（Lazard Frères）；公司擔保債權人之一的主要代表，以及擔保債權人的兩位律師；鋼鐵工人聯合會29區理事，鋼鐵工人聯合會2659地方分會主席；眾議院議員約翰·丁傑爾的華盛頓幕僚；美國商業部經濟發展局局長；以及《底特律新聞》（*Detroit News*）報導破產訴訟的商業記者。1988年，員工持股計畫重組後，我在底特律和紐約，訪談麥克路斯的財務副總、鋼鐵工人聯合會29區理事（第二度）、密西根州商業部部長、密西根商業部汽車與鋼鐵處處長，

以及麥克路斯的投資銀行家（這一次是Shearson Lehman Hutton）。跟威爾頓的訪談一樣，我答應受訪者引述時不具名。

- 5 "Tale of Woe," *Forbes*, May 15, 1977, p.54.
- 6 David Halberstam, *The Reckoning* (New York: Morrow, 1986), p. 604; 有關麥克路斯，參見*Forbes*, May 15, 1977; *Wall Street Journal*, August 18, 1980, and June 18, December 8, and December 9, 1981;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7, 1981, December 19, 1982, December 17, 1985; *Iron Age*, January 4, 1982。麥克路斯商業史的討論，也仰賴我的訪談與鋼鐵工人聯合會29區蒐集的資料。
- 7 麥克路斯破產史的資料，除了訪談外，有賴羅伯特·路克（Robert Luke）蒐集的1981年12月8日至1982年9月21日，密西根東區南部分局的美國破產法庭記錄，以及鋼鐵工人聯合會2659地方分會準備的年表。
- 8 除了我的訪談外，有用（但時有矛盾）的資訊取自*New York Times*, March 3 and May 2, 1982。自從麥克路斯賣給唐仲英後就成為私有公司，因此並非所有資料都公開。
- 9 關於唐仲英，參見"The Gambler Who Salvaged McLouth Steel," *Fortune*, May 2, 1983, pp.113-14; *Wall Street Journal*, September 13, 1982;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9, 1982.
- 10 *New York Times*, January 6, February 5, July 30，以及October 28, 1987; "Cancel the Funeral—Steel Is on the Mend," *Business Week*, October 5, 1987; "Big Steel Is Humming Again—It Just Needed Some Oil," *Business Week*, August 8, 1988.
- 11 一波稱讚員工持股計畫的文章，參見*Business Week*, April 24與May 8, 1989，以及May 15, 1989封面故事。
- 12 參見Robert N. Stern and Tove Helland Hammer, "Buying Your Job: Factors Affecting the Success or Failure of Employee Acquisition Attempts," *Human Relations* 31 (1978): 1101-17.
- 13 簡短評論參見George Sternlieb and Carole W. Baker, "Placing Deindustrialization in Perspective," in *Women, Households, and the Economy*, ed., Lourdes Beneria and Catharine R. Stimpson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85-107.
- 14 參見Richard Child Hill and Cynthia Negrey, "Deindustrialization and Racial

Minorities in the Great Lakes Region, USA," in *The Reshaping of America*, ed. D. Stanley Eitzen and Maxine Baca Zinn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1989), pp. 166-78, 以及James Jacobs, "Black Workers and the New Technology: The Need for a New Urban Training Policy" (未出版論文, Industrial Technology Institute / Michigan Community College, Ann Arbor, 1987).

第 6 章

- 1 George A. Lundberg, Mirra Komarovsky, and Mary Alice McInerney, *Leisure: A Suburban Stud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34), pp.27-37; Alex Shoumatoff, *Westchester: Portrait of a County* (New York: Coward, McCann & Geoghegan, 1979).
- 2 Robert Fishman在*Bourgeois Utopias: The Rise and Fall of Suburbia*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7)裡, 以沒那麼工具性的手法, 描述了19世紀郊區排除與消費的主題。
- 3 一般性觀點, 參見Jean Gottman, *Megalopolis: The Urbanized Northeastern Seaboard of the United States*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61), 第四章, 以及Kenneth Jackson, *Crabgrass Frontier: The Suburbaniz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183頁以下; 參照 John R. Stilgoe, *Borderland: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Suburb, 1820-1939*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8).
- 4 參見Ann R. Markusen, "Class and Urban Social Expenditure: A Marxist Theory of Metropolitan Government," in *Marxism and the Metropolis*, ed. William R. Tabb and Larry Sawer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90-111, 以及John R. Logan and Harvey Molotch, *Urban Fortune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 5 方便起見, 參見Jackson, *Crabgrass Frontier*, 190頁以下摘要。
- 6 David Harvey, *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5); Gwendolyn Wright, *Building the Dream*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81), pp.248-58; Richard L. Florida and Marshall M. A.

- Feldman, "Housing in U.S. Fordis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12 (1988): 187-210。強調生命週期與社會階級的論文，參見Herbert F. Gans, "Urbanism and Suburbanism as Ways of Life: A Re-evaluation of Definitions," in *People and Plan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68), pp.34-52.
- 7 參見William H. Whyte, Jr., *The Organization Man*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56), 尤其是295-434頁。當然，許多描寫該時代象徵地景的書（例如小說*The Man in the Gray Flannel Suit*, *Please Don't Eat the Daisies*裡的幽默小品，John Cheever的短篇 "The Swimmer"，以及David Riesman的社會學專著*The Lonely Crowd*），顯示個人欠缺進取心與超組織的吊詭結合，使其核心關切都是從眾（conformity）。總體來說，麥卡錫主義政治淨化後的那些年，這種從眾形象不能說有錯。
 - 8 參見E. Relph, *The Modern Urban Landscap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7); Mark Gottdiener, "Recapturing the Center: A Semiotic Analysis of Shopping Malls," pp.288-302 in *The City and the Sign: An Introduction to Urban Semiotics*, ed. M. Gottdiener and Alexandros Ph. Lagopoulo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William Severini Kowinski, *The Malling of America* (New York: Morrow, 1985).
 - 9 Lundberg et al., *Leisure*.
 - 10 「即將來臨的斯洛波維亞危機」是Richard F. Crandell大體上頗為正面的地方史*This is Westchester: A Study of Suburban Living* (New York: Sterling Publishing, 1954) 的最後一章。在1961年版本中，這一章被積極得多的「舊郡新觀」取代，暗指支持開發的態度盛行。另見Marilyn E. Weigold, ed., *Westchester County: The Past Hundred Years, 1883-1983* (Valhalla, N.Y.: Westchester County Historical Society, 1984), 44頁及188頁以下。
 - 11 Regional Plan Association, *Information Bulletin*, nos. 80, August 1952, and 87, June 1957.
 - 12 Shoumatoff, *Westchester*; Mary Lou Mayo, "Residential Patterns and Their Socio-Economic Correlates: A Study of Blacks in Westchester County, New York" (Ph.D. diss., Fordham University, 1974); 有關商業擴張相對於居住滿意度的開發「兩難」，參見*Changes in Westchester and How People Feel about Them* (White Plains, N.Y.: Westchester County Department of Planning,

- 1955)，這是親成長的研究與小冊子，由大衛洛克菲勒資助，他也是北塔里頓規劃委員會成員。
- 13 全國尺度郊區階層化的類似觀點，參見Logan and Molotch, *Urban Fortunes*, 181頁以下。
 - 14 J. Thomas Scharf, *The History of Westchester County* (Philadelphia: Preston, 1886), 93頁以下，什麼都寫了，獨漏貝克蘭德。
 - 15 Scharf, *History of Westchester County*; David Sicilia, "Technological Risk in Manufacturing, 1850-1880, Yonkers, New York: A Case Study" (MS, Brandeis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Civilization, 1985).
 - 16 Scharf, *History of Westchester County*, p.102.
 - 17 電梯自動化的資訊，取自Grace Palladino, "A Promise and a Warning: Building Service Workers and Automation in New York City, 1936-1970" (paper delivered at the Six Annual North American Labor History Conference, Detroit, October 1984).
 - 18 法國資料，承蒙1983年勞工部勞動檢查局 (Inspection du Travail) 提供。
 - 19 1980年代末，奧提斯還是世界最大升降梯公司，在世界高樓升降梯中有60%市占率，占有所有新設升降梯和電扶梯裝置的22%，估計價值60億或更多。參見Moody's *Industrial Manual* (New York: Moody's, 1982); Ronald Fernandez, *Excess Profits: The Rise of United Technologies*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1983), pp.246-51; Katya Goncharoff, "New Hope for Those Impatient with Elevator Service"(microprocessors), *New York Times*, July 24, 1983; N. R. Kleinfeld, "Otis's '29 Stories Full of What-Ifs,'" *New York Times*, July 2, 1989.
 - 20 Lawrence J. Tell, "Plant Shutdowns: The Cities Fight," *New York Times*, May 15, 1983; 1983年與市長的奧提斯升降機特別小組成員訪談。
 - 21 *New York Times*, April 2, 1985。雖然整個1970年代揚克斯市應課稅不動產的閒置率不及3%，這卻是白原市空屋率的兩倍。揚克斯每人平均不動產估價同樣僅及白原市一半 (Commercial and Public Construction in Westchester County [White Plains, N.Y.: Westchester County Department of Planning, January 1982], p. 79)。辦公室建築集中於郡中部地帶的持續趨勢，以及將白原市的空屋壓在最低限度，參見*Commercial and Public Construction in Westchester County*, May 1986, 以及 "Westchester Market

- Survey," *Westchester Office Buildings, 1988*, pp. 9-10.
- 22 與前任工廠經理訪談，奧提斯升降梯公司，揚克斯，1985；*Labor Relations Reference Manual* (Washington, D.C.: Bureau of National Affairs, Inc., 1984), no. 115, p.1281；以及各種有關聯合科技的報紙文章。以西屋電氣公司（Westinghouse Electric Corporation）來說，因為低成本、高品質的升降機零件很容易從法國、巴西與南韓供應商進口，該公司於1985年開始將紐澤西州工廠的升降機製造業分階段遷出（*New York Times*, April 2, 1985）。
 - 23 1985年2月18日《紐約客》雜誌的「談論城鎮」專欄報導Life Savers工廠。因為他在1987年股票崩盤時，遇到不可預見的結構性問題，開發商卻面臨銷售危機。他決定提供低於市場行情的抵押借款，結合租賃及購買的選擇來吸引承租人。參見*New York Times*, August 25, 1989。
 - 24 有關通用的討論，參見*New York Times*, August 21, 1982; May 10, 1984; June 14, 1985; February 4, 1987。
 - 25 與港務局工業園區經理的訪談，揚克斯，1985年。
 - 26 紐約州緊急財政控制局各種會談的紀錄，揚克斯市，1984年；與助理城市經理訪談，揚克斯，1985年。
 - 27 Crandell, *This is Westchester* (1954 ed.), p. 179.
 - 28 承蒙威切斯特郡協會提供〈威切斯特郡44名最大雇主〉，1975年3月。在協會的各種調查中，公部門雇主的種類繁多。
 - 29 在聯邦要求AT&T解體後，從紐約電話公司分出獨立的新區域公司NYNEX。承蒙威切斯特郡協會提供數據。呈報數據的差異說明了列表名冊中的某些不一致，從北地鐵到泰克尼康公司的數字顯示的是1986年的全職員工。
 - 30 揚克斯是那裡輸出而非引入勞工的唯一地區。"Import and Export of Labor within Sub-Areas," *Commercial and Public Construction in Westchester County*, January 1982, p.91.
 - 31 1980至1984年間，紐約都會區所有新建辦公空間，紐約市占37%，卑爾根郡11%，威切斯特郡10%，密德塞克斯郡10%（*Commercial and Public Construction in Westchester County*, May 1986, p.31）。但1985年後，辦公空間多興建於郊區而非紐約市（*New York Times*, July 27, 1985; April 29, 1986）。

- 32 例見Regina Belz Armstrong, *The Office Industry: Patterns of Growth and Location*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72), pp. 44-53; Christopher B. Leinberger and Charles Lockwood, "How Business Is Reshaping America," *Atlantic*, October 1986, pp. 43-52; Logan and Molotch, *Urban Fortunes*.
- 33 Sidney M. Robbins and Nestor E. Terleckyj, *Money Metropolis: A Locational Study of Financial Activities in the New York Reg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p. 43。這本書是Edgar M. Hoover and Raymond Vernon領導的二十世紀基金會 (Twentieth Century Fund) 紐約市研究的一部分。15至20年後，做為城市與去工業化的持續辯論之一，基進經濟學家開始強調去中心化的壓力，通常著重勞動因素。參照David M. Gordon,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nd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Cities," in *Marxism and the Metropolis*, ed. Tabb and Sawers, pp. 25-63.
- 34 有關IBM商業策略的批判性觀點，參見Richard Thomas DeLamarter, *Big Blue: IBM's Use and Abuse of Power* (New York: Dodd, Mead, 1986)。Raymond Vernon以後見之明說道，二十世紀基金會的紐約市研究，錯在沒料到電腦普及，從而低估辦公室分散化的潛力 (訪談，1985)。
- 35 1985年，通用食品訪談資料。Crandell, *This Is Westchester* (both eds.), pp. 182-3，強調為本文所加。
- 36 *Changes in Westchester*, pp. 17, 22; Crandell. *This Is Westchester* (1961 ed.), p.238; Weigold, ed., *Westchester County*.
- 37 有關遷移的資訊取自與IBM、通用食品、區域規劃協會、威切斯特郡協會1985年的訪談。參見William H. Whyte, Jr.在*The City*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8) 裡聲稱，如果董事長已住在威切斯特一費爾菲爾德區，大部分企業就會將總部遷到那。
- 38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1, 1989.
- 39 引自Thomas J. Lueck, "An Office Boom Transforms Once-Ailing Connecticut City," *New York Times*, March 10, 1985.
- 40 通用食品的主管說，他們在威切斯特每個工作只面試3個應徵者，相較於紐約市的11人；參見Crandell, *This Is Westchester*, p.51。有關德士古的資料，取自各次訪談，威切斯特郡，1985年。參照K. Nelson, "Labor Demand, Labor Supply and the Suburbanization of Low-Wage Office Work," in *Production, Work, Territory*, ed. Allen J. Scott and Michael Storper (Boston:

Allen & Unwin, 1986), pp. 149-71.

- 41 參見*Attitudes of Westchester Business Leaders toward Westchester County as a Business Location* (White Plains, N. Y.: Westchester County Association Inc. and Westchester County Bankers Association), 1977年起每兩年出刊一次；中位數收入與住宅價格，參見*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7, 1987。
- 42 *Attitudes of Westchester Business Leaders* (1985)；對於企業連鎖空間面向的關注，參見Roger Friedland and Don Palmer, "Park Place and Main Street: Business and the Urban Power Structur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0 (1984): 393-416。感謝Roger Friedland對威切斯特的友善關注；我的詮釋若有誤，不能歸責於他。
- 43 Nick Ravo, "Fairfield County Losing Its Corporate Midas Touch,"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1, 1989.
- 44 *Changes in Westchester*, p.1.
- 45 Regional Plan Association, *The Region's Agenda* 13, no. 3(December 1983): 2-3.
- 46 參見*Planning and Zoning Problems: Papers Presented at the 1931 Conference of the Westchester County Planning Federation* (White Plains, N.Y.: Westchester County Planning Federation, 1931) 以及*Westchester County and the Regional Plan* (New York: Regional Plan Association, 1932).
- 47 非批判性的觀點，參見Weigold, ed., *Westchester County*, 102頁以下。
- 48 Robert A. Caro, *The Power Broker: Robert Moses and the Fall of New York* (New York: Knopf, 1974), p. 162; Weigold, ed., *Westchester County; Fishman, Bourgeois Utopias*.
- 49 在城鎮和村落反對下，郡級政府的逐漸浮現，參見Weigold, ed., *Westchester County*, 152頁以下。
- 50 *The Future of Westchester County* (New York: Regional Plan Association, 1971), p.5.
- 51 Regional Plan Association, *Information Bulletin*, no. 4 (October 19, 1931), p. 9; *Westchester County and the Regional Plan*, p. 19.
- 52 *Westchester County and the Regional Plan*, p. 28.
- 53 Marilyn E. Weigold, *Pioneering in Parks and Parkways, 1895-1945* (Chicago: Public Works Historical Society, 1980), pp.24-25.

- 54 參見*The Selection of the Headquarters Site of United Nations in New York in 1946, the Participation Therein by a Westchester County Special Committee and the Conclusion of the Matter by the late John D. Rockefeller, Jr., in Purchasing a Site on the East River and Presenting It to the United Nations*, comp. Otto E. Koegel (n.p., 1971)。William Zeckendorf在1971年的自傳*Zeckendorf*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1970)裡，不動產開發商宣稱東河位址是他的想法，而洛克菲勒付錢 (pp. 63-78)。參照Caro, *The Power Broker*, pp. 772-75。雖然我的朋友Bob Fitch強調，洛克菲勒許多策略始終是用來確保洛克菲勒中心的經濟價值，但Caro強調羅伯特·摩西的仲介角色。摩西代表紐約市長向洛克菲勒提議，聯合國落腳紐約市有其益處。
- 55 參見Henry Etzkowitz and Roger Mack, "Imperialism in the First World: The Corporation and the Suburb" (paper presented at Pacific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meetings, San Jose, March 28-30, 1974).
- 56 那些遠離開發計畫居住者，比那些住在附近的人更喜歡它們，尤其當他們從地產價值升高中獲利時 (*Changes in Westchester*, 第8頁及各處)。
- 57 *Changes in Westchester*, and "People, Jobs and Land, 1955-1975," *Regional Plan Association Bulletin*, no. 87 (June 1957), p.46.
- 58 *Future of Westchester County*, pp. 17-18.
- 59 參見*Future of Westchester County*, esp. p. 7; Weigold, ed., *Westchester County*, p. 244.
- 60 Weigold, ed., *Westchester County*, pp. 244 ff.
- 61 Weigold, ed., *Westchester County*, p. 247; 1985年與白原市規劃局員工訪談。
- 62 1985年與「弗農山商業吸引與保留計畫」主管訪談資料。
- 63 參見*Westchester 2000: Ecology, Economy, Demography Task Force*, Final Report, April 1, 1985.
- 64 參見*Westchester County as a Business Location* (1985), pp. 33-34.
- 65 *Westchester 2000*, pp.34-36; *Characteristics of Job Openings, Mid-Hudson Metropolitan Areas* (Albany: 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Labor, January-December 1987), pp. 73-92.

第7章

- 1 參見Robert E. L. Faris, *Chicago Sociology, 1920-1932*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0); Martin Bulmer, *The Chicago School of Soci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David Ward, *Poverty, Ethnicity, and the American City, 1840-192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針對芝加哥學派社會學家的遺產，及其與中地理論類似之處的評論，參見Mark Gottdiener, *The Social Production of Urban Space*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5)，第二章。
- 2 Lewis Mumford, *The City in History*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1961), pp. 544, 552。齊美爾的意象不僅透過芝加哥學派而傳播，還透過都市表現主義而影響了繪畫和藝術的歷史，針對這種傳播的有趣評論，參見Rosalyn Deutsche, "Representing Berlin: Urban Ideology and Aesthetic Practice," in *The Divided Heritage: Theories and Problems in German Modernism*, ed. Irit Rogoff and MaryAnne Steve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即將出版)。
- 3 直到1960年代，西歐城市都保留了不同於美國城市的中心模式。傳統的、甚至是前工業中心的有兩個元素最重要：持續保有上層階級和勞工階級。人們通常將歐洲市中心的連續性歸因於文化價值。然而，我認為這反映了制度因素，像財產與保有權、土地使用分區法律、小型企業的條件，以及二次大戰後重建的財政要求。其淨效果是延緩美國於1949年後發動的大規模都市更新計畫和新郊區建設。1970年代期間，伴隨許多本地中產階級與勞工階級家庭移離中心、舊建築物的破敗和拆除，以及尋找廉價住處的新移民到來（主要為臨時工或「客」工），歐洲市中心開始展現跟美國城市一樣的中心性與權力的張力。
- 4 參見Manuel Castells, *Luttes Urbaines* (Paris: Maspero, 1973); Sharon Zukin, "A Decade of the New Urban Sociology," *Theory and Society* 9 (1980): 575-601; Gottdiener, *Social Production of Urban Space*; Michael Peter Smith and Joe R. Feagin, *The Capitalist City* (New York: Blackwell, 1987)；有關以土地使用分區和都市再開發而建造的中心位置，參見Robert Fitch, "Planning New York," in *The Fiscal Crisis of American Cities*, ed. Roger E.

- Alcaly and David Mermelstein (New York: Vintage, 1977), pp.246-84, 以及 Roger Friedland, *Power and Crisis in the City* (London: Macmillan, 1982)。
- 5 Henri Lefebvre, *La Production de l'espace* (Paris: Editions Anthropos, 1974), pp. 65, 121; 強調為原文所加。
- 6 Ibid., pp. 357-58.
- 7 David Harvey, *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3), chapter 5。哈維的後續研究，包括奧斯曼 (Baron Haussmann) 領導的19世紀中期巴黎重建的歷史解釋，以及大型不動產利益與投資銀行的動力，嘗試更全面的呈現都市空間與時間的「創造性破壞」，亦即「資本主義創造的空間，其自身社會再生產所需的空間……必須加以消滅」 (*Consciousness and the Urban Experienc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5], p.28)。
- 8 Neil Smith, *Uneven Development* (New York: Blackwell, 1984), pp. 119-24; Nigel Thrift, "The Fixers: The Urban Geography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apital," in *Global Restructuring and Territorial Development*, ed. Jeffrey Henderson and Manuel Castells (London: Sage, 1987), pp. 203-33.
- 9 Harvey, *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 p.189。哈維在《意識與都市經驗》 (*Consciousness and the Urban Experience*, pp.63-220) 的1850-70年巴黎重建研究裡，生動描繪了這個過程。
- 10 參見Thomas Bender and William R. Taylor, "Culture and Architecture: Some Aesthetic Tensions in the Shaping of Modern New York City," in *Visions of the Modern City*, ed. William Sharpe and Leonard Wallock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189-219, esp. pp. 212-17.
- 11 John Berger, "Manhattan," in *The Sense of Sight*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5), p. 67。伯格對曼哈頓「作為一種道德觀念，一種抽象概念」的看法，影響我對中心性的思索。
- 12 Neil Smith, "Gentrification, the Frontier, and the Restructuring of Urban Space," in *Gentrification of the City*, ed. Neil Smith and Peter Williams (Boston: Allen & Unwin, 1986), pp. 15-20。雖然它可能愚弄了中產階級，這個意識形態煙幕對「原住民」而言是透明的。一名西班牙裔紐約市府律師如此描述她所住公寓的合作式改建，「縉紳化是用來將少數族群趕出去的當代天命，而那就是為什麼我會留下來。對那些買不起我要買的房子

- 多黎各人來說，這太習以為常了」(New York Times, March 27, 1988)。
- 13 參見Peter D. Sahlin, "The Limits of Gentrification," *New York Affairs* 5, no. 4 (1979): 3-12; Brian J. L. Berry, "Islands of Renewal in Seas of Decay," in *The New Urban Reality*, ed. Peter E. Peterson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85), pp. 35-55; J. I. Nelson and J. Lorence, "Employment in Service Activities and Inequality in Metropolitan Areas," *Urban Affairs Quarterly* 21, no.1 (1985): 106-25; Smith, *Uneven Development* and "Of Yuppies and Housing: Gentrification, Social Restructuring, and the Urban Dream," *Society and Space* 5 (1987): 151-72.
 - 14 針對錯紳化的經濟與文化取向的更細緻回顧，參見Sharon Zukin, "Gentrification: Culture and Capital in the Urban Cor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3 (1987): 129-47。
 - 15 一般性政治背景，參見Jack Newfield and Paul DuBrul, *The Abuses of Power* (New York: Viking, 1977)，以及Martin Shefter, *Political Crisis / Fiscal Crisi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7)。
 - 16 租隙的討論，參見Neil Smith, "Toward a Theory of Gentrification: A Back to the City Movement by Capital Not Peopl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ers Association* 45 (1979): 538-48；有關租隙概念的批評，指出錯紳化的再開發只是可能選項之一，參見Robert A. Beauregard, "The Chaos and Complexity of Gentrification," in *Gentrification of the City*, ed. Smith and Williams, pp.35-55；從機會的角度來捍衛租隙解釋的嘗試，參見Smith, "Of Yuppies and Housing."
 - 17 很早便認識到生態模型的這些「例外」者，參見Walter Firey, "Sentiment and Symbolism as Ecological Variabl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0, no. 2 (1945): 140-48.
 - 18 參見Neil Smith, "Gentrification and Capital: Theory, Practice and Ideology in Society Hill," *Antipode* 11, no. 3 (1979): 24-35; Paul R. Levy and Roman A. Cybriwsky, "The Hidden Dimensions of Culture and Class: Philadelphia," in *Back to the City*, ed. Shirley Bradway Laska and Daphne Spain (New York: Pergamon, 1980), pp. 138-55; Roman A. Cybriwsky, David Ley, and John Western,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vitalized Neighborhoods: Society Hill, Philadelphia, and False Creek, Vancouver," in *Gentrification*

- of the City*, ed. Smith and Williams, pp. 92-120; and Conrad Weiler, "The Neighborhood's Role in Optimizing Reinvestment: Philadelphia," in *Back to the City*, ed. Laska and Spain, pp. 220-38.
- 19 參見Sharon Zukin, *Loft Living: Culture and Capital in Urban Change*, 2d ed.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89).
- 20 Nathan Silver, *Lost New York* (New York: Schocken, 1967).
- 21 Jane Jacobs, *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1); Herbert Gans, *The Urban Villagers* (New York: Free Press, 1962); Marc Fried and Peggy Gleicher, "Some Sources of Satisfaction in the Residential Slum,"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Planners* 72, no. 4 (1961): 305-15。另見美國市長會議 (U.S. Conference of Mayors) 的歷史保存特殊委員會, *With Heritage So Rich*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6; repr. 1983)。
- 22 有關單身女性在市中心居住的低成本討論, 參見Damaris Rose, "Rethinking Gentrification: Beyond the Uneven Development of Marxist Theory," *Society and Space* 1 (1984): 47-74, 有關舊金山同性戀社群的空間形式, 參見Manuel Castells, *The City and the Grassroot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ch. 14。
- 23 最初的描述, 參見Ruth Glass在*London: Aspects of Change*裡的導言, Centre for Urban Studies編 (London: MacGibbon & Kee, 1964), pp. xiii-xlii。美國結合縉紳化、歷史保存與市中心再投資的開發模式, 對其廣泛擴散的熱烈支持, 參見 "Spiffing Up the Urban Heritage" (封面故事), *Time*, November 13, 1987, pp.72ff。
- 24 皮耶·布迪厄 (Pierre Bourdieu) 的研究對這項分析似乎很重要, 尤其其他強調擁有較高文化資本而非經濟資本者的品味。參見Bourdieu,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trans. Richard Nic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但我的論點提出一個更複雜的歷史偶然性解釋, 首先, 涉及了文化資本逐漸升高的社會接受度, 以及其次, 它與當前都市中心轉型的關連, 這在巴黎的IVième、Vième或XVième區, 都跟紐約一樣顯而易見。
- 25 Andree Brooks, "About Real Estate: Brooklyn School Converted to Housing," *New York Times*, March 25, 1988。當然, 開發商誇大了該地區縉紳化的速

- 度和可行性。
- 26 藝術家Meyer Schapiro的引文，引自Diana Cran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Avant-Garde: The New York Art World, 1940-1985*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p. 83。有關居家閣樓不動產市場的興起，及其從藝術家風格到豪華住宅的轉變，參見Zukin, *Loft Living*。
 - 27 John Logan與Harvey Molotch率先認識到縉紳化過程的複雜性，他們考慮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的馬克思主義式衝突：「無論是富裕或貧窮鄰里，在中心城市或都市邊緣，鄰里的未來都取決於來自外部的企業壓力，與內部物質利害關係及情感依附的交錯方式」（*Urban Fortunes*, p. 123）。
 - 28 引自Patrick Wright, "The Ghosting of the Inner City," in *On Living in an Old Country: The National Past in Contemporary Britain* (London: Verso, 1985), pp. 228-29。有關曼哈頓市中心聯合廣場（Union Square）周邊空間，在迎合移民、勞工階級和外區顧客的折扣商店，與組成女仕一條街的20世紀早期閣樓建築物的文化價值兩方的爭論，參見Martin Kronauer, "Urban 'Revitalization' and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Ph.D. diss., Free University of Berlin, 1987)；參照Rosalyn Deutsche, "Krzysztof Wodiszko's *Homeless Projection* and the Site of Urban 'Revitalization,'" *October* 38 (Fall 1986): 63-98。
 - 29 然而，其他城市可能有更強烈的親鄰里、反開發的定位。譬如，其他地方的縉紳化與新建設擴展市中心之際，芝加哥哈洛德·華盛頓（Harold Washington）市長的政府卻抗拒開發商改變鵝島製造區的規劃。
 - 30 國家藝術補助（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的藝術家與縉紳化研究，引自Dennis E. Gale, *Neighborhood Revitalization and the Postindustrial City: A Multinational Perspective* (Lexington, Mass.: Lexington Books, 1984), p. 155。
 - 31 計聞，*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5, 1986。
 - 32 一個組織名為「城市傳說（City Lore），是下東區都市民俗文化中心，〔已經〕開始利用影片及錄音帶，在他們前往越野障礙賽公園與貝爾摩爾自助餐館之前，掌握某些紐約市的鄰里機構」（Elizabeth Kolbert, "Street Life: Keeping 'Beloved Places,'" *New York Times*, March 28, 1988; 強調為本文所加。）
 - 33 Michael Musto, "The Death of Downtown," *Village Voice*, April 28, 1987, pp.

15-20.

- 34 參照 Rosalyn Deutsche and Cara Gendel Ryan, "The Fine Art of Gentrification," *October* 31 (Winter 1984): 91-111。
- 35 相較於巴爾的摩和波士頓，密西根州佛林特 (Flint, Michigan) 與俄亥俄州托雷多 (Toledo, Ohio) 水岸購物中心的無利可圖，參見 "Jim Rouse May Be Losing His Touch," *Business Week*, April 4, 1988, pp. 33-34。曼哈頓市中心南街海港的表面成功同樣很可疑。有些以富裕觀光客為目標的商店失敗，引發將其改造成服務當地居民的商店的討論：從新都市地景轉變成新都市風土。參見 Mark McCain, "Commercial Property: A Troubled Urban Mail; Rouse Makes Plans for the South Street Seaport; Among Prospects, Shops to Serve the Community," *New York Times*, March 13, 1988。
- 36 後來幾年，部分為了回應當地及付費使用者的抱怨，市政當局制定更嚴格的規則，禁止遊民出入地鐵、賓州車站、巴士總站和其他公共空間，同時忽視私人所有者攔阻公眾（尤其遊民群眾）進入享有土地使用分區獎勵的廣場及展覽館等「公共空間」的企圖。Richard Levine, "Plan Urges New Look at Terminal,"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1, 1987; Bob Fitch, "Put 'Em Where We Ain't," *Nation*, April 2, 1988, p. 466; *New York Times*, April 11, 1988; *October* 1 and 25, 1989; Helen Thorpe, "Open to the Public?" *New York Observer*, March 12, 1990。與此形成對比的曼哈頓市中心歷史調查，參見 Emanuel Tobier, "Gentrification: The Manhattan Story," *New York Affairs* 5, no. 4 (1979): 13-25。
- 37 William E. Schmidt, "Riding a Boom, Downtowns Are No Longer Downtrodden,"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1, 1987。
- 38 Michael Musto, *Downtow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86), p. 5。
- 39 *New York*, December 25, 1989-January 1, 1990, p. 3。對於一般購物及消費重構之重要性的確認，參見 Beauregard, "Chaos and Complexity," pp. 44-45，以及 Smith, "Of Yuppies and Housing," pp. 165-70。
- 40 Schmidt, "Riding a Boom."
- 41 Musto, "Death of Downtown."
- 42 有關服務生與服飾銷售員的部分，感謝 Stephen Duncombe 與 Henri Peretz 的意見。

- 43 參見William Leiss, "Icons of the Marketplace,"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1, no. 3 (1983): 10-21, 以及Smith, "Of Yuppies and Housing."
- 44 Russell Baker, "Worse than Gluttony," *New York Times*, January 4, 1986.
- 45 Wright, "Ghosting of the Inner City," p. 230.
- 46 Edith Wharton, *The House of Mirth* [1905] (New York: Bantam, 1984), p. 175。參照布迪厄 (Pierre Bourdieu) 有關同樣是追求地位財 (positional goods) 的觀點：「良好投資的判斷力，將資本從過時或只是貶值的物品、地方或實踐撤離，並在無止盡的求新動力下，轉進更新穎的標的，轉投資的過程在每個地區、運動與烹飪、渡假勝地及餐廳中運作，由無數的各種不同標誌指引，從明確的警告（『聖特羅佩』 [Saint-Tropez] —— 或里昂、或任何其他地方的火車站自助餐室）——『已經完全不行了』。」到幾乎意識不到的直覺……不知不覺引發對淪為稀鬆平常之物件或實踐的厭惡或作嘔 (*Distinction*, p. 249)。
- 47 引自Francis X. Clines, "The Simple Life, with Lobster, in Wales,"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0, 1987；關於利用銷售物件來創造消費意識，以及因此而來的生活覺察，參見"Interview with Ettore Sottsass," *Industrial Design*, January-February 1988, p. 31。
- 48 注意將「品味」視為文化資本與文化產品的差異。前一種詮釋強調文化生產者的自主性（雖然他們被認為是支配階級裡的受支配者），後者再次指涉他們身為服務階級，對更大市場的依賴。同時要留意的是，我強調的是關鍵基礎設施的勞工，但多數作家傾向於強調他們的偏好。參見Bourdieu, *Distinction*，以及Scott Lash and John Urry, *The End of Organized Capitalism* (London: Polity Press, 1987), ch. 9。
- 49 引自John Urry, "Cultural Change and Contemporary Holiday-Making,"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5 (1988): 35-55。有關旅行做為尋找真實經驗的現代朝聖，參見Dean McCannell, *The Tourist* (New York: Schocken, 1976)。
- 50 Barbara Novak, *Nature and Culture: American Landscape and Painting, 1825-1875*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強調為原文所加。
- 51 Saskia Sassen-Koob, "Growth and Informalization at the Core: A Preliminary Report on New York City," in *The Capitalist City*, ed. Michael Peter Smith and Joe R. Feagin (New York: Blackwell, 1987), p. 141.
- 52 評論文化產品和服務既為公司提供商業機會，也帶來各式各樣工作。例

- 如，始於1970年代末的業餘餐廳刊物評論，已成長為小型產業，有著與讀者分享相同文化價值的「創始人」。業餘餐廳評論出版商受過良好教育，經常是企業律師或銀行家訓練出身，曾遊歷歐洲並熱愛美食。參見Richard W. Stevenson, "Restaurant Guides: Personalized Views of New York Scene," *New York Times*, August 14, 1985，以及Trish Hall, "Zagat Restaurant Guides: Whose Voice Is Being Heard?"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8, 1989.
- 53 John Nielsen, "Even Those Who Serve Must Audition for the Part," *New York Times*, March 2, 1988；參照Tom Wolfe在*The Bonfire of the Vanities* (New York: Farrar, Straus & Giroux, 1987) 的觀察——反映新服務階級的模式及舊有的族裔分工——曼哈頓的餐廳沒有黑人服務生。
- 54 Trish Hall, "A New Spectator Sport: Looking, Not Cooking," *New York Times*, January 4, 1989。食物報刊評論的早期變遷，某種程度上可說是替新美食家鋪了路，參見Stephen Mennell, *All Manners of Food* (Oxford: Blackwell, 1985), ch. 9-10。
- 55 Eric Schmitt, "Discount Stores for Fledgling Gourmets,"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3, 1988.
- 56 Waverley Root, "A Simple Lunch with Paul Bocus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December 17, 1972.
- 57 Bryan Miller, "With a Gallic Touch: Three French Chefs at Epcot," *New York Times*, January 6, 1988.
- 58 Waverley Root, *The Food of France* [1958] (New York: Knopf, 1972), pp. 3-12.
- 59 參見Jack Goody, *Cooking, Cuisine and Clas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以及Mennell, *All Manners of Food*。
- 60 A. J. Liebling, *Between Meals* (San Francisco: North Point Press, 1986), p. 9.
- 61 不幸地，我們描述的復甦是在威佛利·路特淡出舞台後才發生。參見Waverley Root and Richard de Rochemont, *Eating in America: A History* (New York: Ecco Press, 1976)，尤其最後一章，"Where Do We Go from Here?"。作者稍早提到，「19世紀後半葉的特色，是許多人將新食品推廣給公眾所耗費的心力；20世紀後半葉的特徵則是許多其他人努力減少可以推廣給公眾的新食品。大眾市場經濟不想為過多產品煩惱；集中處理最少而非最多種類的食物，才更有利可圖」(pp.233-34)。
- 62 Marian Burros, "A Tribute to American Cooking,"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 June 2, 1985, p. 69, 以及 "New American Eating Pattern: Dine Out, Carry In," *New York Times*, October 30, 1985.
- 63 "Chefs' Debate: Innovation vs. Classic French Food," *New York Times*, May 13, 1987。參照Liebling, *Between Meals*, 他主張在1914年左右，法國的大飯店傳統開始式微，部分原因是新的工業工作將潛在的學徒吸收到其他職業。
- 64 *New York Times*, August 9, 1985.
- 65 Craig Mishler, "The Texas Chili Cook-Off: An Emergent Foodway Festival," *Journal of Popular Culture* 17, no. 3 (1983): 22-31。同樣的，參照Peter H. Lewis, "The Open-Pit Barbecue: A Texas Tradition in Good Hands,"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3, 1988。裡描述的餐廳：「店主是夏威夷出生的74歲日裔婦女，經理是正統訓練的英國主廚，廚師是墨西哥人，服務生是密蘇里州南方的山區居民。」同樣的，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法國，當商業觀光與可支配所得提高，令到訪鄉間的遊客量增加，對廉價紅酒的大眾需求導致小瓶玫瑰紅酒（little rosés）的發現，在某些情況裡則是發明（Liebling, *Between Meals*, pp.75-76）。
- 66 John Bryce, "Le Grand Restaurant," *House and Garden*, March 1988, pp. 72-76.
- 67 David W. Dunlap, "West Side Sites to Be Weighed as Landmarks,"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7, 1986；強調為本文所加。

第 8 章

- 1 Michael Sorkin, "Travel: Miami Virtues: Sun, Sea and Dazzling Urban Design," *Vogue*, January 1986, p. 140；缺乏都市形式與社會形式之間的關係，取自Reyner Banham, *Los Angeles: The Architecture of Four Ecologies* (London: Allen Lane, Penguin Press, 1971), p. 237。另參見E. W. Soja, "Taking Los Angeles Apart: Some Fragments of a Critical Human Geography,"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4 (1986): 255-72，以及James J. Flink, *The Automobile Ag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88), pp. 140-48。
- 2 Henry James, *The American Scene* [1907]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 Press, 1968), pp. 447, 462; Sorkin, "Travel," o., 142; Banham, *Los Angeles*, p. 21.
- 3 James, *American Scene*, p. 442; 參照David Reiff, *Going to Miami: Exiles, Tourists, and Refugees in the New America* (Boston: Little, Brown, 1987), pp. 11-24-27。詹姆斯有關科摩湖的評論取自 *Italian Hour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09), pp. 131-32。
 - 4 參見Raymond A. Mohl, "Miami: The Ethnic Cauldron," in *Sunbelt Cities: Politics and Growth since World War II*, ed. Richard M. Bernard and Bradley R. Rice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3), pp. 58-99; Penny Lernoux, "The Miami Connection," *Nation*, February 18, 1984, pp. 186-98; Joan Didion, *Miami*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87); Rieff, *Going to Miami*.
 - 5 參見Edward W. Soja. "Economic Restructuring and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Los Angeles Region," in *The Capitalist City*, ed. Michael Peter Smith and Joe R. Feagin (New York: Blackwell, 1987), pp. 178-98; Allen J. Scott, *Metropolis: From the Division of Labor to Urban Form*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pp. 91-202; Mike Davis, *City of Quartz: Excavating the Future in Los Angeles* (London: Verso, 1990).
 - 6 幻影劇場、透景畫和全景畫的描寫取自Wolfgang Schivelbusch, *Disenchanted Night: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Light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rans. Angela Davie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另參見Francis D. Klimgelder, *Art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London: Paladin, 1972), pp. 86-87; Joshua Meyerowitz, *No Sense of Place: The Impact of Electronic Media ON Social Behavio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73.
 - 7 Martin Pawley, "Tourism: The Last Resort," *Blueprint*, October 1988, p. 38.
 - 8 清除過往矛盾的論題，參見Mike Wallace, "Mickey Mouse History: Portraying the Past at Disney World," *Radical History Review* 32 (1985): 33-57; 意象師引自pp. 35-36。
 - 9 Pawley, "Tourism: The Last Resort," p. 39.
 - 10 同前註，p. 39。
 - 11 Wallace, "Mickey Mouse History," pp. 38, 42.
 - 12 博覽會的描述引自Steve Nelson, "Walt Disney's EPCOT and the World's Fair

- Performance Tradition," *Drama Review* 30 (Winter 1986): 106-46; Warren I. Susman, "The People's Fair: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a Consumer Society," in *Culture as History*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4), pp. 211-29; 以及M. Christine Boyer, *Dreaming the Rational City*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83), pp. 46-50.
- 13 Susman, "People's Fair," p. 224.
- 14 「五十年收藏：藝術在IBM」(50 Years of Collecting: Art at IBM)，IBM科學與藝術館的展覽，紐約市，1989。
- 15 Susman, "People's Fair"; 引自 p. 228。
- 16 強調於Wallace, "Mickey Mouse History," pp. 42ff.
- 17 Pawley, "Tourism: The Last Resort"; 引述取自Joseph Giovannini, "At Disney, Playful Architecture Is Very Serious Business,"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8, 1988。這些主題自始就與華德·迪士尼的意圖一致。環型的配置「刻意要讓感官超載」，而缺乏真實與超現實環境的區分則是為了讓人們忘記他們的日常生活。參見Patricia Leigh Brown, "In Fairy Dust, Disney Finds New Realism," *New York Times*, July 20, 1989。
- 18 James, *American Scene*, p. 443。
- 19 E. L. Doctorow, *The Book of Daniel*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1), p. 289。產品搭售令某些批評者相信，達特羅預料的幻想殖民已經發生。Janet Maslin, "Like the Toy? See the Movi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7, 1989。
- 20 娛樂產業分析者引自Douglas C. McGill, "Mickey Sells: Is He Now Oversold?" *New York Times*, May 20, 1989。有關新產品、授權、利潤和股價間的關聯，另參見*New York Times*, August 29與November 6, 1989。
- 21 Banham, *Los Angeles*, pp. 127ff; 有關好萊塢主題樂園的引述出自Michael Eisner於"Magical World of Disney"這個慶祝迪士尼米高梅製片廠開幕的電視節目的引介，1989年4月29日。
- 22 Trish Hall, "Making Memories Go Better: Coke Plans Museum in Atlanta,"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3, 1988; Allon Schoener, "Can Museums Learn from Mickey and Friends?" *New York Times*, October 30, 1988.
- 23 關於威爾的引述，取自*New York Times Magazine*, December 25, 1988; Duany的引述出自Philip Langdon, "A Good Place to Live," *Atlantic*, March

- 1988, p. 45。杜安尼的團隊抵達某個開發位址待一天，與地方建築師和適合的開發者商談，將基地資料輸入它們的電腦模型，然後產生一個基於風土建築與地方欲望元素的城鎮計畫（*Progressive Architecture*, May 1989, pp. 84-88）。
- 24 足球員的引述出自 George Vecsey, "Amid Uneasiness, Super Bowl Visitors Stream In,"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9, 1989; 另參見 "Report: Disney in Florida," *Progressive Architecture*, March 1990, p. 80。
- 25 1980年代中期，EPCOT開幕後，超過九成的遊客是白人，他們的收入中間值是35,700美元，48%擁有專業和技術性工作，26%是經理和管理人員（Wallace, "Mickey Mouse History," p. 53）。
- 26 Nathanael West, *The Day of the Locust* [1939] (New York: Farrar, Straus, 1957), pp. 334, 351.
- 27 Banham, *Los Angeles*, pp. 156-57, 238.
- 28 參見Banham, *Los Angeles*; Scott, *Metropolis*; E. W. Soja, R. Morales, and G. Wolff, "Urban Restructuring: An Analysis of Social and Spatial Change in Los Angeles," *Economic Geography* 59 (1983): 195-230.
- 29 Banham, *Los Angeles*, pp. 201ff; Soja, "Economic Restructuring and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Los Angeles Region."
- 30 Charles Jencks, *Daydream Houses of Los Angeles* (New York: Rizzoli, 1978); 關於窮人和少數族裔的集中，參見Soja et al., "Urban Restructuring"; 關於幫派與警察，參見Davis, *City of Quartz*.
- 31 Jencks, *Daydream Houses*, p. 10.
- 32 Banham, *Los Angeles*, p. 124.
- 33 Banham寫道：「私家汽車和公共高速公路共同提供一種民主都市運輸的理想版本（若不碩是理想化的）：隨著需要而以相對高的平均速度橫越廣大地區的及門移動」（*Los Angeles*, p. 217; 另參見pp. 127, 242）。比較 Scott L. Bottles, *Los Angeles and the Automobile*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 34 *Frank Gery: Building and Projects*, comp. and ed. Peter Arnell and Ted Bickford (New York: Rizzoli, 1985).
- 35 Michael Kimmelman, "Disney Concert Hall Design Selected,"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3, 1988.

- 36 Germano Celant, "Reflections on Frank Gehry," in *Frank Gehry: Buildings and Projects*, p. 5。參見Davis, *City of Quartz*, pp. 236-40。
- 37 參見Donald W. Curl, *Mizner's Florida: American Resort Architectur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and the Architectural History Foundation, 1984) 與Rieff, *Going to Miami*, pp. 8ff。參照Karen J. Weitze, *California's Mission Revival*, vol. 3 of *California Architecture and Architects* (Los Angeles: Hennessey & Ingalls, 1984)。
- 38 Curl, *Mizner's Florida*。
- 39 David Rieff, "A Reporter at Large: The Second Havana," *New Yorker*, May 18, 1987, p. 65。
- 40 關於帝國大樓，參見 "Once Again, Primary Colors," *Architectural Record*, July 1983, pp. 92-95;關於休斯頓的哈登城鎮住宅 (Haddon Town House)，參見 "Introductory Passage," *Architectural Record*, August 1984, pp. 88-91;關於利馬的信貨銀行 (Banco de Credito)，參見Joseph Rykwert, "Arquitectonica: Sede del Banco de Credito, Lima," *Domus*, November 1988, pp. 30-32，以及Karen D. Stein, "Bankers' Trust," *Architectural Record*, February 1989, pp. 90-99。
- 41 最重要的是，ARQ建築事務所為這一切品質收取的費用很低廉。開發商的訪談見 Charles K. Gandee, "Those Kids in Town," *Architectural Record*, June 1985, p. 119。
- 42 Andrea Branzi, "Cose e Case," *Domus*, November 1988。
- 43 Emily Benedek, "Inside Miamin Vice," *Rolling Stone*, March 28, 1985, p. 56; 另參見Pat Aufderheide, "Music Videos: The Look of the Sound," in *Watching Television*, ed. Todd Gitlin (New York: Pantheon, 1986), pp. 120-21。到了1980年代晚期，當快克 (crack，強效古柯鹼，一種毒品) 疫情的暴力毀滅許多都市人口時，「邁阿密風雲」被譴責為自動武器的展示櫥窗。
- 44 Elvis Mitchell, "'Miami Vice' Is Losing Its Virtue," *Rolling Stone*, March 27, 1986, p. 137。
- 45 Geoffrey H. Hartman, "Literature High and Low: The Case of the Mystery Story," in *The Poetics of Murder*, ed. Glenn W. Most and William W. Stowe (San Diego: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83), pp. 210-29; F. R. Jameson, "On Raymond Chandler," 收於前引書，pp. 136-39; James Wolcott, "Mixed

- Media: Mann at His Best," *Vanity Fair*, February 1987, p. 20.
- 46 Tom Shales, "The Re Decade," *Esquire*, March 1986, p. 69, 另參見p. 17; Wolcott, "Mixed Media," p. 20; Mitchell, "'Miami Vice' Is Losing Its Virtue," p. 45.
- 47 關於馬奈，參見T. J. Clarke, *The Painting of Modern Life* (New York: Viking, 1985), 尤其p. 111。
- 48 Sorkin, "Travel," p. 140; Spalding Gray, "Christmas in Miami," *Fame*, December 1988, pp. 160-61。當然，電影提供以視覺消費來設定期望的前例。
- 49 關於貪腐，參見Lernoux, "The Miami Connection," 以及 Pete Hamill, "White Line: How Cocaine Corrupted a City," *Village Voice*, August 26, 1986, pp. 21-27。關於主角的「酷勁」，一個比較負面但依然未成定論的觀點，參見Todd Gitlin, "Car Commercials and Miami Vice: 'We Build Excitement,'" in *Watching Television*, pp. 156-60。
- 50 Wolcott, "Mixed Media," p. 20; 參照Dennis E. Baron, "Against Interpretation: The Linguistic Structure of Television Drama," *Journal of Popular Culture* 7 (1974): 950: 「懲罰者，以〔FBI的〕厄斯金警探為代表，是那些鄙視法律者的舊約復仇之神，對那些想要回歸其庇護者，則是新約的寬大之神。」
- 51 Horace Newcomb, "The Mystery: Order and Authority," *Journal of Popular Culture* 7 (1974): 970; 另參見Stefano Tani, *The Doomed Detective: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Detective Novel to Postmodern American and Italian Fiction* (Carbonda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84)。
- 52 Thomas Morgan, "NBC Rebutts Poll Results on Drugs,"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3, 1986.
- 53 Michael Holquist, "Whodunit and Other Questions: Metaphysical Detective Stories in Postwar Fiction," in *Poetics of Murder*, ed. Most and Stowe, p. 173; 另見Tani, *Doomed Detective*, p. 51。
- 54 Hartman, "Literature High and Low," in *Poetics of Murder*, ed. Most and Stowe, p. 225.
- 55 Mike Davis with Sue Ruddick, "Los Angeles: Civil Liberties between the Hammer and the Rock," *New Left Review* 170 (July-August 1988): 53.

- 56 當然，洛杉磯不僅要與紐約競爭電視製作，也因自動化和境外製作而失去後製工作，尤其是在動畫卡通方面。Scott, *Metropolis*; Mitchell, " 'Miami Vice' Is Losing Its Virtue," p. 136; Aljean Harmetz, "Universal Television at Top in Prime Tim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4, 1985; Peter J. Boyer, "Production Cost Dispute Perils Hour TV Dramas," *New York Times*, March 6, 1986; Richard W. Stevenson, "A Financial Battle to Make TV Series," *New York Times*, April 27, 1987。
- 57 Lernoux, "The Miami Connection"; 引自 p. 192; 參照Didion, *Miami*。
- 58 "The Civic Virtues of 'Miami Vice,'" *Economist*, September 13, 1985, p. 26.
- 59 James, *American Scene*, p. 411.
- 60 關於嘗試收購接管的軼事描述，參見John Taylor, *Storming the Magic Kingdom* (New York: Knopf, 1987)。關於該公司的歐洲和日本主題樂園的最近展望，參見"An American in Paris," *Business Week*, March 12m 1990, pp. 60-64。
- 61 James, *American Scene*, p. 461.

第9章

- 1 「事實上，這個場域自我呈現為各種情境的準連續體，而情境就是指全球經濟裡的地方性體制和置入模式」，Alain Lipietz如此寫道（"New Tendencies in 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Regimes of Accumulation and Modes of Regulation," in *Production, Work, Territory*, ed. Allen J. Scott and Michael Storper [Boston: Allen & Unwin, 1986], p. 24）。
- 2 Daniel Bell,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6)。雖然有不同主體含觀點，享樂主義論點的「衰頹與覆亡」在針對美國社會的社會學、文化及組織分析中一再出現。在*The Reckoning* (New York: Williams Morrow, 1986)，David Halberstam回顧仰賴生產而非股票價值維生的汽車產業。Robert N. Bellah et al.偏好18世紀城鎮會議的公民社會，基於允諾自助和自我滿足的20世紀心理治療（*Habits of the Heart: Individualism and Commitment in American Life*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James Fallows批評以消費

- 品味（及考試成績）來鎖定社會地位的當代傾向（*More Like Us: Making America Great Agai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89]）。
- 3 Fred Hirsch, *Social Limits to Growth*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7); 另參見Adrian Ellis and Krishan Kumar, eds., *Dilemmas of Liberal Democracies: Studies in Fred Hirsch's Social Limits to Growth* (London and New York: Tavistock, 1983). 「耗盡道德遺產」是賀希的用語。
 - 4 Jean-Christophe Agnew, *Worlds Apart: The Market and the Theater in Anglo-American Thought, 1550-175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56.
 - 5 參見Erica Shoenberger, "From Fordism to Flexible Accumulation: Technology, Competitive strategies, and International Location,"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6 (1988): 248-49.
 - 6 Neil McKendrick, John Brewer, and J. H. Plumb, *The Birth of a Consumer Society: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London: Europa Publications, 1982); 其他人將經濟發展裡大眾消費具有結構重要性的日期定得更早：Chandra Mukerji, *From Graven Imag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 ch. 5，以及Joan Thirsk, *Economic Policy and Project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8).
 - 7 John Urry曾做了一個初步分析, "Some Social and Spatial Aspects of Services," *Society and Space* 5 (1987): 5-26，但他關心的是生產而非消費，這使他聚焦於勞動力、勞動過程，以及空間遷址與尺度。
 - 8 David Harvey, *The Limits to Capital* (Oxford: Blackwell, 1982)與*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5)。
 - 9 在最近的著作裡，大衛·哈維試圖連結非傳統的、廣義的大型文化投資（「彈性積累」）和新的生產組織策略（「彈性技術」）。然而，誠如這段討論的暗示，我認為從基本上由生產領域決定的「後福特主義」角度來理解「後現代主義」的一切嘗試，注定會漏掉從生產到消費的轉移中的主要創新。
 - 10 Geraldine Fabrikant, "The Media Business: An Odd Couple Fills a Gap in Los Angeles," *New York Times*, March 20, 1989; Edwin Diamond, "The New (Land)lords of the Press," *New York*, February 27, 1989, pp. 44-50.
 - 11 Paul Goldberger, "Grand Old Athens in the Land of Grand Old Opry," *New*

York Times, March 5, 1989.

- 12 關於這種努力的好例子，參見第一章引述的Derek Gregory and John Urry, eds., *Social Relations and Spatial Structure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5) 裡的論文。
- 13 例見 "A Decade of the New Urban Sociology," *Theory and Society* 9 (1980): 575-601，以及 "Postscript: More Market Forces," in *Loft Living: Culture and Capital in Urban Change*, 2d ed.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89).
- 14 W. G. Hoskins,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Landscape* [1955] (London: Penguin Books, 1985), pp. 170-74。然而，這裡文化與政治再度塑造了經濟行為。在17世紀期間，荷蘭一段類似的國家富裕時期，荷蘭地景卻不關心映繪封建領主和鄉間風土之間的區別。參見Svetlana Alpers, *The Art of Describing: Dutch Art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3), pp. 148-49。
- 15 參見Tony Hiss, *The Experience of Place* (New York: Knopf, 1990)。

索引

- Agnew, Jean-Christophe 歐格紐·尚－克里斯多菲, 28, 256
- Architects 建築師, 39, 46; superstar 超級巨星, 47-49. 參見 Architecture 建築; *names of individual architects* 個別建築師的姓名
- Architecture 建築, 11, 16, 38, 42-48, 49, 142, 260; fantasy 幻想, 235, 238; marketing 行銷, 44; modern 現代, 44, 48, 50-51; postmodern 後現代, 26, 27, 44, 45, 46, 228, 241; public 公共, 230; and value of designs 設計的價值, 261; vernacular 鄉土, 238, 264
- Arquitectonica ARQ建築設計事務所, 46, 239-40, 241, 248, 263
- Banham, Reyner 班漢·雷納, 218, 230-31, 233-35
- Bankruptcy 破產, 111, 124, 129-30, 164; law (Chapter 11) 法律, 108, 110, 113, 129-30; insteel industry 鋼鐵業, 68. 參見 McLouth Steel 麥克路斯鋼鐵
- Barthelme, Frederick 巴瑟姆·佛列德瑞克, 37
- Bell, Daniel 丹尼·貝爾, 255
- Benetton 班尼頓, 43-44
- Benjamin, Walter 班雅明·渥特, 41
- Bicoastal economy 東西兩岸經濟, 4, 14-15, 33, 45
- "Blue Room, The," 「藍房間」 34, 36
- Bocuse, Paul 博古斯·保羅, 211, 227
- Braudel, Fernand 布勞岱·佛迪南, 6
- Bright Lights, Big City* (McInerney) 《大城光輝》(麥因納尼), 33-34, 35, 36, 38, 201
- Busch Gardens 布什花園, 20
- Buyouts 收購, of business 企業: community 社區, 80, 81-82, 86; leveraged 槓桿收購, 84-85, 101; worker 員工, 82-86, 88, 89, 91, 94, 95, 98-99, 101, 103, 107, 111, 126, 128. 參見 Employee Stock Ownership Plans 員工持股計畫
- Capital 資本: accumulation 積累, 12, 14, 19, 183, 257, 260, 267, 268; centralization of 集中, 139, 182-83; circuits of 迴路, 260-67; investment 投資, 8, 12, 13, 19, 47, 80, 75-76, 97, 100, 105, 183, 184, 185, 214, 257, 272-73; markets 市場, 70; mobility 移動力, 15, 81, 84-85; social and spatial centralization of 社會與空間集中,

- 184, in steel industry 鋼鐵業, 66-67.
參見Cultural capital 文化資本
- Carnegie, Andrew 卡內基·安德魯, 61
- Central-place theory 中地理論, 181
- Centrality 中心性, 215; as cultural process 之為文化過程, 185-86; as landscape of power 之為權力地景, 181-84; of modern city 現代城市, 180, 183, 217
- Chicago School (of urban sociology) 芝加哥學派 (都市社會學), 181-82
- Collective bargaining 集體談判, 72-73, 95, 107, 124, 257; and work rules 工作規則, 96. 參見Flexibility 彈性; *names of individual labor unions* 個別工會的名稱
- Community 社區, local 地方, 4, 6, 12, 21-22, 65, 67, 77-82, 93, 100-101, 147-48, 214, 275
- Community mobilization 社區動員, against shutdowns 反對關廠, 79, 80
- Community ownership 社區所有權, 80, 81-82
- Company towns 公司城, 參見Factory towns 工廠城鎮
- Consumption 消費, 17, 38, 135, 254, 257-58; of American landscape 美國地景, 222; cultural 文化, 191, 259-60, 267; domestic 家庭, 223, 226, 229, 233, 236, 237, 238, 240, 243; individualized 個人化, 219, 233, 235; internationalized 國際化, 43; luxury 奢侈, 274; mass 大眾, 11, 41, 45, 51, 171, 222, 235, 258, 274; and mass leisure 與大眾休閒, 219; means of 手段, 11, 221; modern 現代, 235; organization of 組織, 10-11, 39, 54, 191, 211, 214, 253, 259, 271; private 私人, 51-54, 237; reflexive 反身性, 188, 215; spaces of 空間, 269, 275; of steel 鋼鐵, 68, 69; visual 視覺, 20, 38, 50, 53, 54, 219, 221, 223-24, 225, 226, 229, 230, 232, 240-41, 256, 259, 266, 267
- Corporate relocation 企業遷址 3, 145, 160-62, 174, 273; and decentralization 與去中心化, 5, 106, 138, 154-55, 162, 177; out of New York City 遷離紐約市, 154-64; of offices 辦公室, 143, 145; and recentralization 與再中心化, 154, 176
- Corporate restructuring 企業再結構, 84-85, 89, 96, 111, 129-30, 131, 136, 256
- Creative destruction of landscape 地景的創造性破壞, 4, 5, 25-38 41, 53, 54, 107, 136, 142-44, 175, 179-80, 186, 254, 259, 275. 參見Schumpeter, Joseph 熊彼得·約瑟夫
-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評論階層, 214, 258, 260, 270
- Cuisine 料理: classical 經典, 210, 212; fast-food 速食, 43-44; French 法國, 259; nouvelle 新式, 36, 210, 261, 263, 264; nouvelle American 美國新

- 式, 211-12; vernacular 鄉土, 213
- Cultural capital 文化資本, 259-67, 271
- Cultural producers 文化生產者, 54
- Culture 文化, 20-23, 28; and commerce 與商業, 48-51; global market for 全球市場, 275; mass 大眾, 242; of place 地方, 273; urban 都市, 258
- Deaner, Milton 迪納·米爾頓, 112, 116, 118-20
- Decentralization 去中心化, 220; commercial 商業, 43; of jobs 工作, 186; postmodern 後現代, 258. 參見 Corporate relocation 企業遷址
- Degentrification 去縉紳化, 142-45
- Deindustrialization 去工業化, 5, 12, 15, 23, 27, 111, 131, 136, 142-45, 174, 176-77, 180, 253, 269, 271, 275; of the city 城市, 180, 188; in novels 小說, 30-33; in Westchester County 威切斯特郡, 145-54, 174, 176, 177
- Day of the Locust, The (West)* 《蝗蟲的日子》(威斯特), 34, 232-33
- Department stores 百貨公司, 49-50, 52, 53, 54, 254
- Design 設計, 38, 46, 48-50
- Designers 設計師, 39, 47, 48-50, 259
- Detroit 底特律, 3, 10, 103-33, 135, 143, 155, 256, 269
- Differentiation 分化: of capital 資本, 16; regional 區域, 13-15; socio-spatial 社會-空間, 258; spatial 空間, 268
- Disney, Walt 迪士尼·華德, 221-22, 224, 229, 230, 250
- Disney Company 迪士尼公司, 224-25, 228, 229, 230, 250
- Disney World 迪士尼世界, 12, 20, 217-50, 257, 259, 263-66, 270, 272, 273, 274, 275; and EPCOT 明日世界, 224-26, 230, 231; as fantasy 之為幻想, 242-50
- Downriver (Detroit) 下河(底特律), 105-6, 107, 110-11
- Downtown 市中心, 19, 47, 50, 51, 105, 171-72, 180, 217, 220, 221, 233, 244, 263, 266; commercial redevelopment in 商業再開發, 51; as liminal space 之為臨界空間, 195-202; and loft living 與閣樓生活, 190, 261, 263; New York City 紐約市, 184-87, 188, 189, 190, 191, 192, 193, 195, 215, 269; old 老舊, 239; property values 地產價值, 261
- Dutournier, Alain 杜托尼爾·阿蘭, 213-14
- Employee Stock Ownership Plans (ESOPs) 員工持股計畫, 82, 86, 88, 92-93, 94-95, 96-97, 100, 101, 115-16, 123, 126-30. See also Weirton Steel 威爾頓鋼鐵; McLouth Steel 麥克路斯鋼鐵
- Employee Retirement Income Security Act (ERISA) 員工退休收入保障計畫,

- 92-93, 94n
- England 英格蘭, 4, 5-6, 16
- Factory town 工廠城鎮, 7-8, 62-63;
Pullman 蒲門, Illinois 伊利諾州, 7-8, 63; Gary 蓋瑞, Indiana 印第安納州, 7-8, 60
- Faneuil Hall (Boston) 費紐爾中心 (波士頓), 20, 50-51, 260
- Fiscal crisis 財務危機, of cities 城市, 53, 145
- Flexible accumulation 彈性積累, 42
- Flexibility 彈性, 254; of labor 勞動, 9, 127, 152; technological 技術, 68, 97
- Ford, Henry 福特·亨利, 63-64
- Fordism 福特主義, 11
- Gary 蓋瑞, Indiana 印第安納州, 7-8, 60
- Gehry, K Frank 蓋瑞·法蘭克, 235-37, 239, 241
- General Foods 通用食物, 45, 153, 156-64, 176
- General Motors 通用汽車, 3, 105, 106, 110, 112, 116-17, 130, 151-54, 167, 226
- Gentrification 縉紳化, 12, 180, 186, 258, 259, 261-63, 267, 269, 270, 272, 259, 261-63, 267, 270, 272, 273; and cuisine 與料理, 179-215; "literary," 「文學的」 35, 38; as market and place 之為市場與地方, 187-95
- Giddens, Anthony 紀登斯·安東尼, 21, 268
- Global economy 全球經濟, 220, 253; local context of 地方脈絡, 21; restructuring of 再結構, 209-10, 268
- Global Markets 全球市場, 12, 27, 41, 60, 66, 67, 73, 101
- Government 政府, local 地方, 10, 15
- Graves, Michael 葛瑞夫·麥可, 46, 228-29, 239-40, 259
- Halberstam, David 賀伯斯坦·大衛, 103, 110
- Harvey, David 哈維·大衛, 21, 41-42, 183, 185, 260, 265, 267
- Hirsch, Fred 賀希·佛瑞德, 255
- Homogeneity 均質性: of labor 勞動, 16; as landscape of power 權力地景, 141-45; regional 區域, 12-13; social 社會, 140, 171, 176; suburban 郊區, 142; in Westchester 威切斯特, 165, 168, 176
- Huxtable, Ada Louise 霍斯塔伯·阿達·路易斯, 44-45
- IBM 國際商務機器, 153-57, 226; relocation of 遷址, 9, 159-64, 175
- Independent Steelworkers' Union 獨立鋼鐵工人工會, 83, 85, 87, 88, 89, 95, 101
- Inner city 內城, 182, 187, 267
- Inner Harbor (Baltimore) 內港 (巴爾的摩), 20, 32-33, 50, 132, 230, 269
- International Electrical Workers 國際電子

工人, 148

James, Henry 詹姆斯·亨利: on Florida 佛羅里達, 217, 249-50; on hotels 旅館, 4, 52-53, 218-19, 229, 233, 237, 239, 241, 258; on real estate development 地產開發, 48

Jameson, Fredric 詹明信·佛瑞德瑞克, 25, 52-53, 233, 260

Jahn, Helmut 詹恩·赫爾穆特, 52

Johnson, Philip 強森·菲力普, 45-46

Labor force 勞動力: in cuisine 料理, 206; and gender 與性別, 29, 61, 84, 131, 141; and immigrants 與移民, 220; in manufacturing 製造業, 84, 144, 146-47; retraining of 再訓練, 131-32; in services 服務業, 84, 131, 144, 265; in steel industry 鋼鐵業, 61-62, 72-73, 75, 82, 83, 86-87; in tourist economy 觀光經濟, 258-59; in Westchester 威切斯特, 153-54, 161-62

Labor market 勞動市場, 6-8, 11, 21, 110, 132, 182, 258

Labor mobility 勞工移動性, 8, 9-10, 15

Labor unions 工會, 15, 79, 85, 88, 105, 113-14, 174, 256, 257; and retirement rules 與退休規定, 95, 97. 參見 Collective bargaining 集體談判; *names of individual unions* 個別工會名稱

Landscape 地景, 5, 16-20, 22-23, 130, 218, 220, 228, 231, 268; of affluence 豐裕, 141, 145; of consumption 消費, 5, 20, 35-37, 100, 106, 136, 138, 140, 141, 142, 214-15, 219, 230, 241, 254, 274; of cuisine 料理, 208-14, 215; of culture 文化, 5, 205, 206; deindustrialized 去工業化, 131; of devastation 破壞, 5, 20, 37, 77, 106, 141, 145, 149-50; divided 分隔, 15, 131, 132, 135; downtown 市中心, 184-87; economic 經濟, 25, 30, 41, 132; of economic power 經濟權力, 4, 29, 65-66, 82, 101, 102, 131, 136, 161, 177, 184, 185, 189, 214, 215, 240, 242, 269, 271; financial 金融, 17n; formation of 形成, 269, 270; imaginary 想像, 224, 229-30, 231-32, 241, 259; industrial 工業, 17, 66-69, 83, 100, 214, 254; moral 道德, 253-75; in painting 繪畫, 16-17, 18, 22; of paternalistic industrial power 家長制工業權力, 62-63; postindustrial 後工業, 17, 132; postmodern 後現代, 27-28, 36, 241, 242, 243; of power 權力, 5, 42-48, 138, 140, 141, 179, 183, 217, 218, 221-32, 237, 238, 249, 258, 269, 270, 275; of production 生產, 37, 106, 140, 141; shifting 轉變, 20, 29-37, 39, 54, 106, 220; suburban 郊區, 138-40, 159, 174; symbolic 象

- 徵, 27-28, 102, 141, 144, 161, 182;
urban 都市, 22, 39-54
- Lazard Frères 拉扎德·佛瑞斯, 84, 93, 98,
99, 108, 113, 114, 115, 128
- Less Than Zero* (Ellis) 《零下的激情》
(依利斯), 33-34, 36, 38
- Lester, Harry 列斯特·哈瑞, 112, 115-18,
120-24, 126-27, 129, 130, 131
- Liminal space 臨界空間, 28, 38, 41, 50-51,
54, 142, 231. 參見 Agnew, Jean-
Christophe 歐格紐·尚-克里斯多菲;
Liminality 臨界性
- Liminality 臨界性, 28-29, 38, 41, 52, 219,
224, 237, 239, 254, 269; visual 視
覺, 233; zone of 地帶, 50. 參見
Turner, Victor 透納·維克多
- Los Angeles 洛杉磯, 34-35, 217-50, 257,
263, 269
- Los Angeles: The Architecture of Four
Ecologies* 《洛杉磯：四種生態的建
築》(班漢)(Banham), 233-35
- Love, Howard 洛福·霍華德, 74-75,
76-77, 83, 87, 94, 99, 101
- Lowenstein, Alan 羅文斯坦·亞倫,
88-89, 92
- Market culture 市場文化, 5, 23, 26-28, 38,
41, 42, 66, 68, 81, 131, 140, 180, 186,
229, 242, 261, 262, 264, 265, 274,
275
- Market economy 市場經濟, 5-11, 23, 29,
183, 227, 229, 233, 250, 253, 256,
259, 265, 268
- McDonald's 麥當勞, 43-44, 254
- McKinsey and Company 麥金塞公司, 85,
89, 91, 93, 95, 96, 97, 123
- McLouth Steel 麥克路斯鋼鐵, 103-33,
151, 265; as new landscape of power
之為新權力地景, 128-33; bankruptcy
reorganization of 破產重組, 111-20
- Miami 邁阿密, 217-50, 257, 269
- "Miami Vice," 「邁阿密風雲」 46, 240,
241, 242-50, 263
- Michigan Commerce Department 密西根
商業局, 111, 124
- Middle West 中西部, 10-14, 68, 77, 106
- Mizner, Addison 密茲納·艾迪森, 237-38
- Modernism 現代主義, 11-12, 18, 26-28,
44, 46, 53, 218, 239
- Modernization 現代化, of steel industry 鋼
鐵業, 70-74, 97, 99, 100, 101, 108,
118-19
- Monongahela Valley (Pennsylvania) 莫農加
希拉山谷(賓州), 10, 77
- Moses, Robert 摩西·羅伯, 167
- Mumford, Lewis 孟福·路易斯, 181-82
- National Steel (National Intergroup) 全國
鋼鐵(全國鋼鐵), 60, 74-77, 82,
85, 86-88, 90, 95, 97, 98, 99, 101,
111, 114
- New York City 紐約市: and corporate
relocation 與企業遷址, 154-57;
downtown 市中心, 184-87; economy

- 經濟, 190; financial sector 金融部門, 155; Grand Central Terminal 中央車站, 199
- Organization Man, The* (Whyte, Jr.) 《組織人》(懷特), 141, 143
- Otis Elevator Company 奧提斯升降機公司, 146-48, 150-54, 164, 167, 274
- Paris 巴黎, 6, 18, 27-28
- Pension Benefit Guarantee Corporation 退休福利保證公司, 87, 114, 123, 125
- Place 地方, as social institution 之為社會制度, 11-16
- Plant closing 工廠關閉, 9, 10
- Portman, John 波特曼·約翰, 52-53
- Postindustrial society 後工業社會, 5, 15, 21, 27, 177, 241, 253; as landscape 之為地景, 17, 66, 174-77; in novels 小說, 30-37; in steel-towns 鋼鐵鎮, 83; in suburbs 郊區, 174-77
- Postmodern city 後現代城市, 34, 38, 44, 218, 221, 241, 242
- Postmodernism 後現代主義, 21, 25-29, 37, 46, 52, 54, 143, 230, 235, 243, 144, 247-48, 249, 259. 參見 Architecture 建築; Postmodern city 後現代城市
- Power 權力, 19, 138; accumulation of 積累, 183; asymmetries of 不對稱, 274; and autonomy 與自主, 65-66; of centrality 中心性, 182; centralized 中心化的, 182, 201, 224, 229, 254, 268; cultural 文化, 66, 180, 187, 214, 215; economic 經濟, 17, 19, 20-23, 26, 28, 39, 66, 70, 179, 180, 181, 182, 183 186, 221, 224, 229, 254, 257, 259, 268; of fantasy 幻想, 250; and homogeneity 與均質性, 135-77
- Public space 公共空間, 51-54, 235, 236
- Public value 公共價值, 273, 274, 275
- Pullman 浦門, Illinois 伊利諾州, 7-8, 63
- Putman, Andrée 普特曼·安菊, 48-49, 179
- Rabbit Is Rich* 《兔子發財了》(厄普戴克) (Updike), 29-30
- Reagan, Ronald 雷根·隆納德, 5, 49-50, 115, 227
- Real estate developers 地產開發商, 42, 44, 141, 189, 190, 240, 261, 267
- Real estate development 地產開發, 5, 42, 48, 480, 217, 260, 263, 266, 267; in Westchester 威切斯特, 164, 165-74, 230
- Red Baker* (Ward) 《瑞德貝克》(渥德), 31-33
- Reindustrialization 再工業化, 23, 152
- Relocation 遷址 參見 Corporate relocation 企業遷址
- Restructuring 再結構: global economic 全球經濟, 211; spatial 空間, 15, 18, 186, 187, 215. 參見 Corporate restructuring 企業再結構
- Rivera, Diego 里維拉·狄亞哥, 63-65,

- 257
- Robertson, Dave 羅伯森·戴夫, 89, 95, 96, 99, 129
- Roderick, David 羅德瑞克·大衛, 68-69, 74-75
- Rohatyn, Felix 羅哈廷·費利克斯, 85n, 89-90
- Ross, Doug 羅斯·道格, 121-22, 127
- Sassen, Saskia 沙森·莎絲吉雅, 205-6
- Schumpeter, Joseph 熊彼得·約瑟夫, 5, 41, 44, 54, 57, 254, 274; on creative destruction 創造性破壞, 4; on entrepreneurialism 企業主義, 101, 130
- Service economy 服務業經濟, 5, 17, 23, 32-34, 48, 138, 220, 248, 258-59, 259-60, 261, 262, 263, 264, 265, 266, 267, 271, 273, 275
- Service sector 服務業部門, 223, 230, 231, 245, 263
- Shearson Lehman Hutton 謝爾森雷曼赫頓公司, 124-26
- Sheeler, Charles 席爾勒·查理斯, 63-64
- Shopping centers 購物中心, 17, 20, 37, 43, 51, 83, 105, 106, 142, 161, 171, 185, 254, 274
- Shutdowns 關廠, 3, 10, 68, 95-96, 132; at McIouth 麥克路斯, 110; in Yonkers 揚克斯, 145, 148-49, 151. 參見Steel industry 鋼鐵業; Plant closings 工廠關閉
- Silverman, Debora 希佛曼·狄波拉, 49-50
- Simmel, Georg 齊末爾·喬治, 181-82
- Slaves of New York* (Janowitz) 《紐約奴隸》(詹諾維茲), 34
- Smith, Adam 亞當斯密, 8
- Sorkin, Michael 索金·麥可, 218, 219, 244
- South Street Seaport 南街海港, 20, 50, 185, 230
- Space 空間, in social theory 社會理論, 21; and markets 與市場, 267-70
- Steel Industry 鋼鐵業: bankruptcy in 破產, 129; competition in 競爭, 66, 67, 69, 70, 73; and import controls 與進口控制, 73, 101; masculine ethos in 男性氣概精神, 61-62; modernization of 現代化, 70-72, 101-2; and President Truman 與杜魯門總統, 66-67; shutdowns in 關廠, 10, 75, 78, 81, 95-96, 110; work force 勞動力, 61-62, 75, 82, 92-93, 98, 101, 105, 107-8, 109, 114, 128. 參見*names of individual companies* 個別公司名稱
- Suburbs 郊區, 12, 19, 42-43, 106, 132-33, 136, 139, 140, 141, 143, 145, 155-56, 180, 182, 183, 186, 188, 189, 192, 220, 223, 233, 237, 258, 260, 267; as landscape 之為地景, 138-40, 155, 174; post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後工業發展, 175-76. 參見Corporate relocation 企業遷址

Sunbelt 陽光帶, 4, 217-18, 219

Tang, Cyrus 唐仲英, 112, 114, 116-19,
120, 124, 127

Turner, Victor 透納·維克多, 28, 41

United Nations 聯合國, 143, 167-70

United Steel Workers' Union 美國鋼鐵工
人聯合會, 68, 72, 79, 80, 83, 101,
103, 106-7, 108, 111, 113-15, 116,
117, 120, 122, 123-27, 129, 152

United Technologies 聯合科技, 147-50,
164

Urbanization 都市化, in social theory 社會
理論, 138, 181

Urban renewal 都市更新 參見Downtown
市中心; Gentrification 縉紳化;
Westchester 威切斯特

U.S. 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美國住宅與都市發展
局, 73, 80

U.S. Economic Development Agency 美國
經濟發展局, 80, 100, 118-19, 129

U.S. Steel (USX) 美國鋼鐵, 65-66, 74, 75,
78, 81-82, 98-99, 101-2, 103, 108-9,
112, 116, 128

Values 價值: and abstraction 與抽象, 41;
cultural 文化, 174, 180, 182, 214,
254, 260, 261, 262; economic 經濟,
174, 180, 182, 254, 255, 259, 260,
261, 262, 263. 參見Public value 公共

價值

Vasari, Giorgio 瓦撒利·喬吉歐, 47

Vernacular 鄉土, 38, 47, 105-6, 129,
130-31, 133, 145, 167, 175, 180, 181,
182, 184, 188, 189, 218, 221, 228,
230, 231, 232, 237, 238, 269, 275;
architecture 建築, 222, 225, 227,
232-42, 263; culture 文化, 19, 37;
images 意象, 227, 230, 274; power
of 權力, 79; segmented 分割的, 212,
214, 215

Weirton 威爾頓, West Virginia 西維吉尼
亞, 60, 75, 82-102, 103, 109, 131,
151, 256, 269, 272

Weirton Steel 威爾頓鋼鐵, 82-102, 103,
109-10, 151; modernization of 現代
化, 97, 123, 125, 126, 128, 129, 130

Westchester County 威切斯特郡, 135-77,
269, 270, 274; deindustrialization
of 去工業化, 145-54, 174, 176;
employment in 就業, 144, 153-54;
industry in 工業, 145; urban renewal
in 都市更新, 172-73; zoning laws in
使用分區法律, 171

White Noise (DeLillo) 《白噪音》(德里
羅), 37

Work force 勞動力, 參見Labor force 勞動
力

Worker ownership 員工所有權, 86-101,
120-28

World's Fair 世界博覽會(1939), 225-27

Yonkers 揚克斯, New York 紐約州, 13,
145, 149, 172, 176

Youngstown 楊斯鎮, Ohio 俄亥俄州,
78-79, 80-81, 82, 90, 91, 100-101,
130